

D O W N
G I R L

www.qitubk.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

不只是 厭女

厭女從不是個人問題，
更不需要真正厭惡女性，
重點在於權力結構。

為什麼越「文明」的世界，
厭女的力量越強大？
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

The Logic of Misogyny

Misogyny is a hot topic, yet it's often misunderstood. What is misogyny, exactly? Who deserves to be called a misogynist? How does misogyny contrast with sexism, and why is it prone to persist - or increase - even when sexist gender roles are waning? This book is an exploration of misogyny in public life and politics by the moral philosopher and writer Kate Manne. It argues that misogyny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primarily in terms of the hatred or hostility some men feel toward all or most women. Rather, it's primarily about controlling, policing, punishing, and exiling the "bad" women who challenge male dominance. And it's compatible with rewarding "the good ones," and singling out other women to serve as warnings to those who are out of order. It's also common for women to serve as scapegoats, be burned as witches, and treated as pariahs.

Kate Manne 凱特·曼恩 —— 著 巫靜文 —— 譯

www.qitubk.com 奇兔電子書下載

摩斯這樣描述一個女人：「最初，」他這麼說，「一個女人是被創造來成為男人的幫手的。」而她們確實如此，她們幫忙花費和消耗男人辛苦賺取來的東西。他也說，女人是從男人的肋骨變來的，而她們難以駕馭（難相處）的本性也昭示了這點，因為肋骨是扭曲而毫無其他用處的，而女性在本質上也是扭曲的，小小的事件就可以使她們憤怒。

《對淫穢、懶惰、冒失與無常之女人的指責》（*The Arraignment of Lewde, Idle, Forward and Unconstant Women*），約瑟夫·史威南，1615

有罪、有罪、有罪。毀謗與中傷女性的罪。

《恨女者史威南》（*Swetnam the Woman-Hater*），匿名，1618

曼寧漢先生：真令人敬佩，我親愛的貝拉！令人敬佩！我們早該讓你當一個邏輯學家——一個蘇格拉底、一個約翰·史都華·彌爾！你應該在歷史上留名，因為你有著當代閃耀的心智。前提是，當代歷史不會淹沒你——不會將你與同儕們隔離。而你知道，這個風險是存在的，且不只以一種方式。〔把牛奶放到壁爐架上〕嗯，我是怎麼說的？如果你沒有找到那張帳單，我會對你做什麼？

曼寧漢太太：〔哽咽〕你說你會把我關起來。

《天使街》（*Angel Street*）（或《煤氣燈下》〔*Gaslight*〕），派翠克·漢米爾頓，1938

序 出錯Going Wrong

在這草地上，我的思緒顯得多渺小而不重要，就像一條魚，如果被一個好漁夫抓到了會被放回水中，好讓它可以長得更肥美然後有朝一日值得被烹煮與食用……但是不論它多渺小，它仍舊具備一個獨特的神祕特質——當它被放回心中時，就立刻變得令人興奮且重要，而隨著它衝刺又沉沒，四處飛馳，它激起了如此奔流以至於無法再沉靜下來的思緒。那時我正急速穿過一片草地，突然間一名男性起身攔截了我。這名對象表情奇特，穿著長禮服外套與襯衫，而一開始我並未意識到他的手勢乃是針對我，他的臉上是驚恐與不滿。直覺對我伸出援手，而非理性：他是一位教區執事，而我是一個女人。這裡是草地，那裡是小徑。只有研究員和學者被允許踏在草地上，碎石路才是我的地盤。這樣的思緒是一個當下的產出。

維吉尼亞·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

「女人什麼時候才會成為人？什麼時候？」女性主義者與法學理論家凱薩琳．麥金儂（Catharine MacKinnon）在一篇寫於一九九九年的論文中這麼問道^{註1}。類似問題也曾經被其他人提出過，例如哲學家瑪莎．納思邦（Martha Nussbaum, 1995；2001）和瑞．朗頓（Rae Langton, 2009）在討論女性的性物化時，以及廣受歡迎的作家亞瑟．朱（Arthur Chu）與琳蒂．魏斯特（Lindy West）針對厭女威脅和暴力的著作中。這個問題在性侵害、跟蹤、親密伴侶暴力和其他型態的殺人事件上引起共鳴，這些犯罪的受害者主要（儘管絕非總是）由女性而非男性構成，而其行為人主要——或有些時候幾乎全部——皆為男性而非女性^{註2}。

為什麼這樣的模式持續不斷呢？即使是在世界上被稱為後父權（post-patriarchal）時代的地區，例如現代美國、英國及澳洲^{註3}。針對其他將在本書討論到的多種厭女情結類型——從隱晦的到厚顏無恥的、從慢性而逐漸積累的到急性且具有爆炸性的、從那些因為集體（或「鄉民」）活動，以及純粹的結構機制而生的，到個人主體的行動，我們可以提出同樣的問題。借用約翰．奧利佛（John Oliver）的話說：為什麼厭女情結仍然存在？

毫無疑問的，在這些社會裡，伴隨著女性主義運動、文化變遷、法律改革（例如：禁止性別歧視的法律），以及制度政策上的改變（例如：優惠性差別待遇，在美國的主要受益者為白人女性），性別平等已經有了相當的進展，女孩與女人在教育狀況上的改善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如同本書將揭示的，厭女情結仍然存在你我之間。

這些持續存在、甚至在某些人眼裡正日益崛起的難題提出了一個棘手、令人費解，並且緊急的疑問。我相信道德哲學可以在此扮演一個非常珍貴的角色，儘管最終我們還是需要一整個村莊的理論家才能夠對此現象有完整的了解。在本書裡，我希望能夠針對我們如何理解厭女情結的本質做出貢獻，包括它的一般性邏輯，以及它在運作時的一個（儘管只有一個）主要動力，也就是男性透過不對稱的道德支持角色利用女性。（我的討論將局限於前文所提到的文化脈絡，但我歡迎其他人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進行歸納、修正和應用。）

這些道德支持關係等同於什麼呢？為了有助於理解，首先，我們可以設想一下那些享有最多特權的男性們，舉例來說，亦即那些白人、異性戀（也就是「直」）、順性別而非跨性別、中產階級，且沒有身心障礙的人。和其他相較之下沒有那麼多特權的同伴們相比，他

們的行動會因此受制於比較少的社會、道德和法律限制。接著，我們可以設想一群多元的女性，而上述的男性會默認自己有資格可以仰賴這些女性提供照顧、安慰、關心，以及性、情緒和生殖勞動。或者，她可能代表「某一類型」或曾服務於這種目的，或被招募來服務這種目的，的女性。

當然，只因為一個人被社會默許可以用這些方式或類似方式仰賴女性，並不代表那個人就會想這麼做，也不代表即使他想這麼做，他就會成功（亦即得以利用這個機會）。同樣的，儘管和較無特權的同伴們比起來，他的行為所受到的外在限制比較不嚴格，他仍可能觀察到這些或其他類似的規範，並且認定自己在道德原則和良心上是受到限制的。然而，在其他的情況下，這類限制的不足與這些權利的存在將會影響他如何看待並對待那些存在於他的社交圈中的特定女性。具體來說就是：他會認定，她應該將她特有的人類服務和能力貢獻給他或他的哥兒們，但反過來卻遠非如此。

這種不對稱道德支持關係的例子於多處可見，包括在親密且相對穩定的社會關係中——她作為他的母親、女友、妻子、女兒等等；或者這類關係也可能發生於職場，將他置於消費者的位置之上，或出現在他和女孩與女人的臨時互動中，而他試著透過不同手段懇求對方的注意，從在街上對著她吹口哨、在網路上發表惡意評論，到男性說教（mansplaining）。

我的看法是，在我所處的社會環境裡，很大一部分（雖然遠非全部）的厭女情結乃是用來監督與執行這些社會角色，並且從這些女性身上取得道德好處和資源，以及用來抗議她的不參與、她看似輕忽的態度或背叛。某些（雖然再一次的，遠非全部）仍舊留存的厭女情結型態，例如針對女性公眾人物的反應，很有可能是這種情況的衍生。這反映了一種剝奪感心態，認為女性應該是奉獻、關心、慈愛與體貼的，而非渴望權力、冷漠，並且支配的。這也涉及了一種獨占心理，用來為那些一直以來都是受益者的男性們保留某些假定的集體道德認可和讚揚位置。那些企圖爭奪這類角色的女性往往會在至少三個方面被看作一名道德嫌疑犯：她對那些在她的社交圈裡被視為弱勢的人們不夠關心與體貼、她試圖不正當地取得她沒有資格獲得的權力，以及因為違背上述兩種角色，而使她在道德上不可信任。

這樣的看法錯誤並有害，但從很多方面而言卻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就歷史上的不良性別協議來說，它們是正確的。她在道德上是錯誤

的，因為我們在進行測量時使用了錯誤的道德標準，換句話說，他的道德標準——這個道德標準致力於保護長期以來擁有特權與權力的男性們免於面臨道德垮台。它們也保護男人免於蒙受羞恥感所帶來的侮辱、內疚感的腐蝕性影響，以及道德譴責所造成的社會和法律成本。它們讓男人得以根據這個「他良善、有理且正確」的預設來形成看法並提出訴求，而在道德上受縛於他的女人們則不得反對。

結果便是，上述這些女性反而可能在道德上比較不可靠，在她們遇到許多自身可能虧欠了更多（往往是擁有較少特權）的人時；或遇到比起男性，她們其實更應該相信的人，尤其當對象是這些較少特權的女孩與女人時。

就我所知，本書是第一本由投身於分析女性主義哲學領域的個人，試圖以這樣的篇幅來處理厭女情結（至少是這個描述下的厭女情結）之著作。但我要強調，其他的哲學家、女性主義者和其他領域的工作者都已經指出了許多厭女情結的主要表現形式，以及相關的概念和現象，例如性物化、性侵害、性別化的侮辱言語、性別歧視和壓迫^{註4}。因此，很多時候，我所發展的圖像將會結合那些由其他學者清楚描繪出的個別焦點；其他時候，我則會在這些背景圖像上加以潤飾，或讓它們為我自身（我希望不是太邪惡）的目的所用。同時，接下來的某些內容，將會是延伸於我個人過去在後設倫理學的哲學領域中，針對道德思考的本質與道德觀的社會基礎所提出的相關論述。

我在本書中的論點乃是，在我所在的這類社會環境中，對於像我這般擁有一定特權的女性——例如我本身——而言，我們的人性一般來說是被充分認可的，而且我認為這很可能已經維持了一段時間^{註5}。這個事實反映在一件事情上，也就是厭女情結經常與斯特勞森（P. F. Strawson, [1962] 2008）^{註6}稱為「反應型態度」（reactive attitude）的情緒有關，例如怨懟、責怪、憤慨、譴責，與（在第一人稱情境裡）內疚、羞恥、責任感，以及當一個人被認定應該受罰時，接受懲罰的意願。第二和第三人稱的反應理當被局限在我們和那些被認可為「人類同胞」（fellow human beings）^{註7}的他人之間的互動上，至少在第一個例子中是如此。更進一步說，我們只傾向於對那些被預設為理性和足夠成熟的個人、那些我們願意而且能夠就他們的行為提出勸誡的人，產生那些滿載道德感受和概括性的司法與法律反應。相對的，斯特勞森指出，在面對兒童、嚴重意識不清者、經歷精神崩潰者，和那些暫時或非暫時「不在狀態內」的人時，我們會採取一個客觀的立

場。我們會試著管理、治療、教育，或單純避開某個我們持有客觀立場的人，並且，面對那些我們可以互動但卻選擇不要有人際接觸的人時（〔1962〕2008，頁10、13與18），我們可能把這個客觀立場當作一個遠離「參與負擔」（strains of involvement）的「避難所」。我們可能感到太過疲累——或懶惰，或不堪重負，或因為其他可能的狀況——而無法在這個情境裡和他們互動。

斯特勞森對反應型態度的分析精妙、新穎，而且對日後的道德哲學助益良多，但也狹隘一如他慣常的觀點——正好是一個二十世紀中的牛津大學教師的典型。這並不令人意外，畢竟他就是。就我們如何實踐怨懟、責怪，如何表現不贊同、驚愕，以及（面對相對應的正向價值時）表現原諒、讚美、贊同和感激，他只考慮到了有益的面向。

斯特勞森也只考慮到了單方面的故事，而那自然也就是在一個迷你劇場裡的主角那方；他是想要表達怨懟的那個人，他期盼或希望得到解釋或道歉。在斯特勞森的開場案例裡，一個人踩到了他的手，他因此氣憤，除非她向他證明她不是故意的、她對他心存善意、這只是一個意外。在此處，這是一個典型的範例，在這個脈絡裡也不經意地引人深省。

如果你是這個分歧裡的另一方呢？如果是你踩到了另一個人的手或腳趾呢？或者，舉例來說，回想吳爾芙《自己的房間》（1929）裡的開場場景：如果你被認定擅自入侵了一個禁區，或他的地盤呢？如果他誤以為你不准踏足草地，反而只能走在那不吸引人、不平穩的石子路上呢？如果他認定了什麼東西是他的所有物，或捍衛著其他人的財產，但這卻是誇大、不正義，與歷史的殘餘？

如果他對你的（非）擅自入侵的反應是不合理的呢？如果他架上警語，宣告所有的擅自入侵者都會被處決或——如同我們今日仍可見到的——被槍擊？

斯特勞森的分割中，另一方，那個因你誤踩而氣憤怨懟的人，可能因為你違反了規範或拒絕扮演你被指定的角色而由衷地感到驚嚇和苦惱，他可能早已習慣期待像你這種人的服從和表現。過去，你可能盡責地滿足他的期待，所以當你不再這麼做時，他可能就感到氣憤怨懟。他表現得彷彿你是錯的，因為從他的角度來看，你確實是錯的。你誤踩了、僭越了、背離了，或錯待了他。

即使並非全部，大多數的我們皆擁有某種形式上不正義、不配得到的特權，進而容易犯下這類錯誤。特權會讓個人對自己的所有地盤

產生一種知識上和道德上的錯誤認知，例如相對於黑人女性，白人女性心照不宣的論述主導地位和對道德焦點的索求，仍是（白人）女性主義內的嚴重問題。

當吳爾芙踏上牛劍^{註8}的草地時，她被教區執事憤怒地趕走；她找到了圖書館，卻不被允許留在那裡，她需要來自大學「同胞」的介紹信或陪同。今日這類規定已經不復存在，圖書館也對所有性別開放，但當女性涉足到一個在今日以前屬於男性的地盤，或是打破了他已經失效或不再被普遍執行的規矩時，某些人仍舊回應以怨懟，或憤怒。這些反應可能不會、通常也不會，反映出它們的觸發因素，亦即——她這個女性以過去所不允許的方式脫軌了，或作夢了。因此他們準備好了事後的辯解：她看來就像懷有什麼詭計；她隱約給人威脅感；她看來冷漠、有距離且傲慢。或者另一種可能：她愛出風頭，冷酷地排除所有擋路的人。

所以也許教區執事至今仍未停止對不規矩的女性投以不讚許的目光，他仍然因為女人從小徑上偏離而憤怒。他挪用謬論或利用幾乎隨處可見的過失，來合理化對她的怨懟。他可能不太清楚是什麼驅使了他的敵意，而教區執事的妻子有可能完全同意他的道德判斷，正如同我們將看到的，她可能鮮有或毫無其他好的選擇。

於是你試著和教區執事夫婦講理，你試著說服他們，他們的反應在道德上站不住腳，而是反映了老舊、高度內化，且他們如今聲稱自身亦反對的社會價值觀。但是，隨著你發展自己的論點，他們的臉色變得越來越氣憤怨懟（他的），還有不贊同、憤慨，甚至憎惡（她的）。接著你意識到這個糟糕的陷阱：在此番情境裡，有人認為像你這樣的女人（例如我）必須給予男性道德權威（在此例中是相當瑣碎的道德權威），其中一部分就是那種在斯特勞森看來非常重要、必須從個人的人類同胞之處獲得的善意。但當他說「人類同胞」和「一個人」時，卻掩蓋了一件事：除了其他支配和弱勢系統外，這種渴望被獲得的善意與對善意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性別的影響。

這是因為，和男性一起被放置於不對稱道德支持關係內的女性，一直以來都被要求得對男性展示道德尊重、認同、讚賞、服從，和感激，以及道德注意力、同理與關懷。當她打破這個角色，試著對他提出道德批評或指控時，她就扣押了他習慣從她身上獲得的善意。某方面來說，他甚至可能仰賴她的善意來維持稀薄的自我認知或自我價值。於是她的怨懟或責怪可能像是一種背叛，反轉了他們之間正確的

道德關係，這可能讓他想要尋求報仇、報復或懲戒；而對和他沆瀣一氣的人來說——例如執事夫人，但遠遠不只有她——對執事的道德批評看起來會像是冒犯，或毫無掩飾的謊言。道德上來說，批評他的人是不可信任的。

進而，厭女情結是一個自我掩飾的現象：試著喚起人們對此現象的注意將可能使它變得更常見，這造成了一種進退維谷的情況，然而在我看來，卻無法避免。

這也揭露了，「無法將女性視為人類同胞」一事，並不一定、通常也不會構成厭女情結的基礎，因為厭女情結針對女性的方式可能已經預先將她設想為一個人類同胞了。於是，主要的差別自然而然地轉移到了這個詞組的第二部分。當身處支配地位的男性在女性身上尋求各種道德支持、讚賞、注意力與其他情感時，女性可能不是單純的人類同胞（human beings），而是被當成人類付出者（human givers）。她不被允許和他一樣，如果她付出得不夠，或付出的對象不正確、沒有用正確的方式或以正確的精神付出，那她就可能會惹禍上身。而如果在這件事情上犯錯，或是她為自己尋求相同的支持和注意力，那就有可能遭遇到厭女情結的怨懟、懲罰和憤慨。

因此，一個女性的人性被認可，可能會使她錯失許多道德自由，她可能會在某一方面責任感過重，而在其他許多方面卻又缺乏責任感。

我現在可以意識到，之所以撰寫這本書，主要乃一長期的嘗試，讓我自己擺脫許多虛假的義務，好得以蒐集並更好地滿足其他真實的義務。我也想要克服某些虛假的內疚和羞恥，那是當我和看似（再一次，有時候是被捏造出來的）道德權威的人士目的不同時，我經常會有的感受。更有甚者，當我必須拒絕這些看似權威，但細思後就顯得並無根據、甚至可能有害的指令時，我經常會感覺到某種形式的道德困窘，隱隱約約地讓我聯想到米爾格倫（1974）實驗^{註9}參與者的感受。

當我從那些被攻擊與殺害的女性角度出發，來檢視本書開場的事件——伊斯拉維斯塔（Isla Vista）殺人案——時，我在道德上感到困窘。同樣的，當我持續仔細討論這起事件時，我感到困窘，彷彿當討論到那些女性被害人時，我應該更抽離冷漠，而非像我真實的狀態一樣，受到我因為這些女性，還有其他在美國土地上每一日因類似原因而被殺害的女性而產生的道德恐懼和悲傷所驅動。我感到某種壓力，

我應該要轉向討論全然結構性的厭女情結案例，或隱晦、慢性且積累的厭女情境。

但是，儘管這些都是很重要的現象，值得研究，而我也在接下來的內容裡持續這麼做，但我一度懷疑起自己最初那個想要轉開視線，而非改變視角並擴充關注焦點的直覺反應。我一度憂慮這種直覺會對我的思考有負面影響，或反應了一種知識分子的怯懦。女性主義哲學當然不應該只專注於男性支配、父權、有毒的男子氣概和厭女情結上。儘管某些學術中堅分子經常聲稱這些分析已經過時，但一個事實否定了這種說法：當我在二〇一四年五月開始這部寫作計畫時，市面上尚未有任何一本書籍或長文，對厭女情結做出這樣的分析。我認為，這類有點老派、不時尚的分析有其價值，而且我們可能需要更多這類的分析，這個想法在二〇一六年的美國總統選舉過程中得到了支持，緊接著更因為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的結果而被強化。有毒的男子氣概和厭女情結現今一點都不罕見（若真是那樣該有多好）。

我也相信我們在此的分析越清晰越好。我發現我們討論不同階段女性主義的方式和其他政治論述領域相當不同，為什麼？因為針對女性主義的思考存在著一種根深柢固或被假定的荒廢感，卻沒有修正的模式、補充和新的討論中心。

我反覆說明這點，因為我相信，許多時候我們在自身的思考和行動中所傳達與執行的社會力量，遠遠超過於我們所能夠意識或發掘到的程度，有時甚至和我們外顯的道德信仰與政治承諾明顯相悖。因此，我們可能會透過一種事後的合理化來說服自己，不要太嚴格地看待仍在我們的文化中殘留運作的父權力量，與此同時，父權力量則聚集在一起，在背後嘲笑我們，並因我們的缺席而日益茁壯。在我心情糟糕時，我會想像現場有派對帽和汽笛。

另一個風險則是，個人主體不會因為厭女行為而受到責怪或承擔責任。如同你將在本書前言中讀到的，我相信，責怪在此有其限制，但是如果我們斷然地認為我們不應該用一種會令人難堪的角度來考量個人行為，那麼，就這些主體而言，結果將會變得不出所料地溫良，甚至禮貌。某些方面來說，這會讓事情變得容易，且觸發較少焦慮，而這讓我很困擾，所以我在這裡花了很多時間思考那些以社會制度為背景或被社會制度所鼓勵，進而傳達與大量地供給力量給厭女社會的主體們。

整體來說，在撰寫本書時，我試著要自己目光長遠、嚴格、不自在，有時候從令人不適的角度，還有很多時候則是痛苦地使用錯誤的方式、在錯誤的時間、以錯誤的順序，檢視所有看起來錯誤的領域。因為我擔心自己忽略了某些值得考慮的面向，它們可能在我眼前而我卻未能察覺，或被我們慣常的道德和情緒支點所遮掩。有時我發現這種面向並不存在，或是它們存在但我卻未能發現，這些內容最後便沒有被呈現在本書裡頭；但有時我會發現，一個例子裡的值得學習之處比我原本想像得更多。動機、主題和模式會慢慢浮現，它們的一致性令我驚訝，而新的、豐富的思考路線會毛遂自薦。因此，最終我很高興自己相信了不聽從直覺的決定，而是相反，在談到厭女情結時，試著去脫離常軌。

多虧了許多人的知識和道德支持，我才能夠留在這條（彎曲的）路徑上，並堅持這個計畫。首先是我的父母，羅伯與安，以及我的妹妹露西，和他們相隔了半個世界的距離，我每一天都很想念他們。我很感激在我成長的家庭裡，嚴肅的道德對話伴隨了因荒謬的社會和政治事件而生的歇斯底里大笑。我也很感激我的前任顧問和目前的督導，以及我的朋友和同事們。我想要特別感謝（以下順序隨機）莎莉·哈斯蘭格（Sally Haslanger）、瑞·朗頓、理查·霍頓（Richard Holton）、茱莉亞·馬可維茲（Julia Markovits）、麥特·戴斯蒙（Matt Desmond）、毛拉·史密斯（Maura Smyth）、傑森·史丹利（Jason Stanley）、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蘇珊娜·席格（Susanna Siegel）、南西·鮑爾、蘇珊·布里森、蜜雪兒·科許（Michelle Kosch）、漢娜·蒂爾尼（Hannah Tierney）、威爾·史達爾（Will Starr）、莎拉·莫瑞（Sarah Murray）、泰德·布雷南（Tad Brennan）、德爾克·派爾布姆（Derk Pereboom），與約書亞·柯恩（Joshua Cohen），他們幫助我思考與改進書中的想法。我要感謝凱瑟琳·波金（Kathryn Pogin）和大衛·史勞伯（David Schraub）的精采評論（分別發表於二〇一六年一月的耶魯意識形態研討會和二〇一七年二月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我亦要感謝許多評論者，包括伊曼尼·派瑞（Imani Perry）、安柏·阿里·佛洛斯特（Amber A'Lee Frost）、蘇珊·布里森、克莉絲汀娜·霍夫·索默思（Christina Hoff Sommers）、道格·漢伍德（Doig Henwood）、塔利·曼斗柏格（Tali Mendelberg）與薇薇安·高爾尼克（Vivian Gornick），他們大方地回應我的前作《厭女情結的邏輯》（*The Logic of Misogyny*）（Manne,

2016d)，該文是《波士頓評論季刊》（Boston Review）二〇一六年七月號中一個論壇裡的主題論文。

我非常感激協助我的學生們，尤其是那些幫我整理資料，並在我二〇一七年春季學期所開設的研究生討論課上與我分享他們精彩洞見的人，包括碧央卡．塔考卡（Bianka Takaoka）、李恩婷（En Ting Lee）、阿德南．穆塔利比（Adnan Muttalib）、艾咪．拉米雷茲（Amy Ramirez）、班傑明．賽爾斯（Benjamin Sales）、艾琳．傑爾柏（Erin Gerber）、伊莉莎白．思奧斯蓋德（Elizabeth Southgate）、奎特利．高諾特（Quitterie Gounot）、亞歷山大．柏格林（Alexander Boeglin），與艾瑪．拉格渥（Emma Logevall）。我也要向曾參加過我針對這個主題的演說的觀眾們致上謝意，包括在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匹茲堡大學、康乃爾大學、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杜克大學、皇后大學、倫敦國王學院、康乃狄克大學（在一場由哲學系的「不正義聯盟」所舉辦的「支配性言論」研討會上），以及一場由金．馬龍．史考特（Kim Malone Scott）所主持、由《波士頓評論季刊》在矽谷所舉辦的活動上。因為許多人在這些令我收穫豐富的拜訪活動中提出的敏銳問題，我的思考得以改變、進步，這同樣也要歸功於豐富的電子郵件往來（儘管我的壞習慣總讓我想要給予一個妥善的回覆，而非即時的回覆），以及自二〇一四年十月起^{註10}我開始投入公共書寫以來，一路上與我工作過的編輯們。我曾一度列了一張名單，但名單實在長得令人不好意思，而且還是有可能因為我的記憶缺失而遺漏一些人。還有我所珍惜的臉書友人們，我覺得很幸運，在我的電腦裡存在著這樣的一個社群，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聰明人們，其中許多人助我良多，讓我整理出那些才剛萌芽的想法。綜合各方面，在這段旅程裡，我很感激能有許多人的支持和幫助，不論我將他們的洞見納入本書的過程中有多少缺失。對於金妮．法比爾（Ginny Faber）和茱莉亞．透納（Julia Turner）兩人一絲不苟又敏銳的審閱與編輯，我不僅印象深刻，更是滿懷感激，後者出色地處理了製作本書的相關事務。

最後，我想要特別感謝兩個人，如果沒有他們，這本書——伴隨著它所有的缺點和不足——不可能問世。他們仔細地閱讀了每一個版本的每一個部分，有時甚至讀了不只一次，更別提那些最後未被納入書裡的瑣碎內容。第一個人是我的責任編輯，彼得．歐林（Peter Ohlin），他在這段過程裡逐步給我鼓勵，我無法想像有其他編輯可以

給予更多支持、更有耐心，或是在沒有丁點「男性說教」的影子下提供編輯建議。這本書因為他冷靜的監督和優秀的判斷而受惠良多。

最重要的，我要感謝我的丈夫，丹尼爾·曼恩（Daniel Manne），他是我超過十年的伴侶，並和我一同扶養我們的三個毛小孩——我們的柯基犬「麵包粉」以及我們的兩隻貓「艾蜜莉亞」跟「佛雷迪」（願牠一路好走）。如果沒有我的家庭生活給予我的光亮、歡笑和愛，以及在現實生活、情緒和知識面向上來自丹尼爾的道德支持，我是無法撐過這樣一個灰暗又令人氣餒的素材的。如果沒有和他一起即興創作，我的許多想法（再一次的，儘管它們的最終成果有其限制，而我為那些限制負有全部責任）不會有得見天日的一天。此外，是丹尼爾讓我注意到本書中所提到的許多案例，他也親身激勵了我——身為律師，他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免費的法律辯護，並在哈佛大學跟隨黛安娜·羅森費爾德（Diane L. Rosenfeld）教授研究親密伴侶暴力。最後，在他典型的靈光一現裡，他想出了「同理他心」（Himpathy）這個詞。

以最深的愛與感謝，我將本書獻給丹尼爾——尤其因為他幫我找到了我的文字，並且鼓勵我使用它們。

註1：重新刊於麥金儂於二〇〇六年出版的著作中，這句我用來開場的引言，是麥金儂該文中的最後一句話。

註2：我在此暫時排除了兒童以及不屬於二元性別的成人。此舉並非因為他們在這個議題上的（不幸）遭遇不是極端重要的議題，而是因為他們所涉及的複雜性與我此刻的目的是相互獨立的。上述的內容已足夠我提出我最初想要審視的問題。

註3：這將會是我在本書中的主要焦點，一部分是因為在這些脈絡裡，這些現象經常被否認，或令人費解。而既然我的研究興趣在於普及的文化敘事和找出其中的模式，這些也是我個人有較多相關知識的脈絡。我將在前言中進一步說明。

註4：在此僅就這些主題內豐富的女性主義文獻提出幾個例子，但絕對遠不夠詳細，可參考：安·葛德（Anne E. Cudd, 1990）和蘇珊·布里森（Susan J. Brison, 2002; 2006; 2008; 2014）針對性侵害的討論；金柏利·克倫肖（Kimberlé W. Crenshaw, 1991; 1993; 1997; 2012）就針對有色女性的暴力以及交織性概念的討論；瑞·朗頓（2009）、依珊妮·麥特拉（Ishani Maitra, 2009）、麥特拉與瑪莉·凱特·麥可高溫（Mary Kate McGowan, 2010）和南西·鮑爾（Nancy Bauer, 2015）針對性物化和色情，以及沉默與臣屬論述的討論；克莉絲蒂·道森（Kristie Dotson, 2011; 2012; 2014）和米蘭達·弗里克（Miranda Fricker, 2007）探討知識壓迫和不正義；琳奈·提瑞爾（Lynne Tirrell, 2012）和蕾貝卡·庫拉（Rebecca Kukla, 2014）討論論述習慣如何促使暴力與壓迫；蘿倫·艾許威爾（Lauren Ashwell, 2016）討論性別化的污辱。也可以參考瑪莉琳·弗萊（Marilyn Frye, 1983）、佩姬·麥可因塔許（Peggy McIntosh, 1998）和派翠西亞·希爾·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 [1990] 2000）針對壓迫、性別歧視與特權的經典文本，以及希爾·柯林斯所提出的「控制形象」的討論。再一次的，我要強調，在針對與厭女情結相關的某些概念與現象所進行的細緻——並且最清楚的——討論中，這只是一小部分的文獻，若其他相關主題浮現，更多的相關文獻也將會被提及。此外，我的參

考書目裡也列出了在這個寫作過程中曾經教導並啟發我的女性主義學者和批判種族理論學者的部分著作。

註5：我並不排除一個可能性：對於處於不同社會位置的女孩與女人來說，比方說當她們涉及多個互相交織與連結的壓迫體系，以及擁有不同的物質處境——例如貧窮和流離失所——時，她們所面對的不正義確實最能被理解成一種「去人性化」。我認為自己並無資格回答許多和厭女情結相關的問題，而這是其中之一，但我希望我為了理論化厭女情結而發展出的一般性架構（且這個架構著重於其邏輯，而非主觀本質）能夠為其他得以回答這些問題的評論者與學者開拓一些空間。當然，與我希望能夠稍微回應的各問題相比，我並不認為這些問題比較不重要，很多時候恰好相反。但是如我將在本書前言中所提到的，我認為它們也是糾葛的。

註6：編註：英國哲學家，語言哲學牛津學派代表。

註7：假如不考慮擬人化的情況，這些感受是否仍應該如此受限，則是另一個問題。我認為這個說法是合理的，但有趣的是，我們可以去設想，當你寵愛的柯基犬（打個比方）追逐著一隻松鼠跑遠並拒絕回應你的呼喚回頭，使得你為她的（註：原文如此）安全擔憂時，你的感受為何。「道德失望」可能聽起來有點奇怪，但這卻可能是我在文獻內所能找到，最接近這一類氣餒感受的標籤，這種氣餒感受全然不具懲罰性，卻仍然帶有價值規範；可參考弗里克（2007，第四章第二節）的討論。

註8：譯註：牛津與劍橋的簡稱。

註9：譯註：米爾格倫實驗（Milgram experiment）：由美國心理學家史丹利·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於六〇年代所設計的社會心理學實驗。該實驗請參與者扮演「老師」，要求他們在由實驗助手所扮演的「學生」犯錯時對他施以電擊，並觀察實驗參與者們在以為電擊強度逐漸增強、「學生」因電擊而痛苦的情況下，何時會選擇拒絕再施以電擊。本實驗的目的是研究在面對由權威者所下達的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們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為何。

註10：本書某些內容最初刊登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第五章部分內容）、《波士頓評論季刊》（第三章部分內容）、《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第四、第六和第八章部分內容），與《社會理論與實踐》（*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期刊（第五章乃修改於我寫於二〇一六年的《人道主義：一種批評》〔*Humanism: A Critique*〕原文）。其餘的內容則是第一次公開，雖然本書前兩章的某些內容曾經被寫成不同形式的文章，並於過去幾年刊登於我的個人網站和www.academia.edu頁面上。

前言 吃下她的字Eating Her Words

我很強烈地感覺到，一股〔對女性主義〕的反挫已經存在一段時間了。我們為什麼感到震驚呢？我並不震驚。父權體制還沒有受到足夠深入的挑戰或改變。這一切僅關乎於父權體制的聲音贏得公眾的認可，而女性的意見卻被消音，彷彿兩者之間有一場戰爭正在進行，然後父權體制就可以因此覺得，「我們即將贏得這場戰爭」。

貝爾·胡克斯 (bell hooks) [註11](#)

針對二〇一六年十一月的美國總統大選受訪內容 [註12](#)

壓制 Smothering

被勒脖的女性鮮少與警方合作（Resnick, 2015）。非致命的「以手勒脖」（strangulation，經常被錯誤地稱作「窒息」〔choking〕）其實是很危險的，它可能會在事發的幾個小時後、幾天後，甚至是幾週後，因為腦部缺氧產生的併發症而導致死亡^{註13}，也可能在不留下任何痕跡的情況下對脖子造成傷害（Snyder, 2015）。如果你不知道要怎麼檢視被害者的喉嚨、要在她的眼睛裡尋找哪些線索（被稱為「瘀斑」的紅點）、要詢問哪些問題，很可能就會以為沒有造成任何傷害（Turkel, 2008）。事情通常會越演越烈，她可能不會尋求醫療協助，這起事件將會「被沉默掩蓋」（Doston, 2011，頁244）。有時候，在隔天，或是之後的某天上午，她將再也醒不過來。更有甚者，研究發現這類非致命暴力事件的受害者有約七倍高的機率成為同一個加害者謀殺未遂的受害者（Strack, McClane, & Hawley, 2001），但是美國國內許多州沒有專門的法規將勒脖定罪（而是將其納為單純的傷害罪，通常屬於輕罪）（Turkel, 2008）。

勒脖雖然有時也發生於其他家屬關係間，但它其實是一種常見的親密伴侶暴力形式，且不限於特定的地理區域，數據所及之處皆可看到它的存在，但在許多國家之內，尤其是較為貧困的國家，相關的資料數據則尚未被蒐集（Sorenson, Joshi, & Sivitz, 2014）。

勒脖可能是以雙手執行，或者是以繩狀物，例如繩索、皮帶、細繩、電線或其他物品（Sorenson, Joshi, & Sivitz, 2014）。最近一則由佛羅里達州當地電視台播報的案例中，一名外出遛狗的七十五歲女性被一條金屬鍊勒住脖子，反常的是，攻擊她的男性看來是一個陌生人^{註14}。

根據整合分析的結果（Archer, 2000），在大多數的勒脖案件裡，受害者皆為女性親密伴侶——儘管幼童與嬰孩的受害也不成比例地高，而在絕大多數的案件裡，加害者是男性。這當然不違背只有少數——或許極少數——的男性有勒脖行為的事實^{註15}。「（幾乎）只有」和「（將近）所有」之間有著明顯的差別，但有時可能會因為像「男性有勒脖舉動」這樣的一般性宣稱而變得模糊^{註16}。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勒脖是一種酷刑。研究者曾將勒脖和水刑相比，包括它帶來的感受（痛苦、令人恐懼）以及後續的社會意義。勒脖被認定為一種權威和支配的展現（Sorenson, Joshi, & Sivitz,

2014)。奠基於此，再加上它於性別上的意義，根據我在此所發展出的定義，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厭女行為類型。勒脖行為的另一個特徵則是人們對它所展現的冷漠和無知，以及許多受害者會將此舉大事化小，或受到「煤氣燈操縱」^{註17}效應的影響（Abramson, 2014; McKinnon, 2017），這我稍後會討論到。

由於遭到勒脖的受害者通常相當不願意作證指控虐待他們的加害者，考慮到目睹犯罪的證人們可能被威脅，或者可以說是被壓制，調查人員目前正在遊說通過法案，企圖透過以證據為基礎的案子來起訴犯罪者（Resnick, 2015）。這裡呼應了克莉絲蒂·道森（Kristie Dotson, 2011）提出的「證詞壓制」（testimonial smothering）一詞，意指當發言者因為聽眾源於（或者看似源於）「惡性無知」^{註18}而缺乏「證詞能力」，導致發言者發表某些言論可能不甚安全，或帶有風險，或很可能根本無用時，自我消音的行為^{註19}。很明顯的，根據這些特質，在親密伴侶關係裡發生的勒脖可能會導致道森所說的證詞壓制；如果她決定發聲，那麼他所展現出來的、願意不惜一切以重新占得上風的意圖，將會使事態變得危險。同時，如同我即將提出的，對於勒脖這個概念，證詞能力不足是非常普遍的情況。整體而言，本書將會說明，這樣的無力乃是源自於一種惡性無知，厭女情結賴其維生，並藉此壯大。

消音 Silence

道森（2011；2012；2014）針對知識壓迫的研究指出，一個人可以透過許多不同的方式消音或被消音^{註20}。她以一個譬喻式的註解來解釋了一些可能性，並且提出精準的分析：你可以把話放到她嘴裡，你可以把恭敬的陳腔濫調塞進她的嘴巴和雙頰，你可以威脅讓她吃下她可能會說的話，好防止她作證或單純理解到發生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事情，你可以阻礙她、讓她的發言註定會失敗，或至少顯得空洞。

你可以訓練她不說出「勒脖」二字，而是使用「窒息」或另一個更好的說詞「抓住」，甚至是最好的情況——什麼都不說。那沒什麼大不了的，什麼事情都沒發生。當他吹噓自己如何一把抓住女性的私處時，那成了「更衣室閒聊」，彷彿這種說法就足夠使評論消音^{註21}。結果，對許多人來說，這確實就足夠了。他的前妻曾經作證指出他強暴了她，但他的發言人表示「那是過時的消息了，且從未發生過」，而據他的律師麥克·柯恩（Michael Cohen）所說，那「並不是你想要用來形容這件事的詞語」，伊凡娜·川普（Ivana Trump）覺得「在情緒上被強暴了……她在說的，並不是法律上被視為犯罪的強暴，而且不是字面上的涵義，儘管這個詞在字面上有很多涵義。」說出這段話之前，柯恩曾激動地（在二〇一五年時對著一個《野獸日報》〔*Daily Beast*〕的記者）堅持那不可能是強暴，因為根據許多已被廣為接受的法律前例，一個人無法強暴他自己的妻子。但我們很快就會知道，婚內強暴早在該事件發生的幾年前就在紐約州被入罪——令人羞愧地晚，但是還不夠晚到可以自動赦免川普（Darcy, 2015）。故某些語義上的遁詞是必要的：這件令人沮喪的事情發生在「情緒」的層面，所有的問題基本上都在伊凡娜自己的腦袋裡。如同後來當哈利·赫特三世（Harry Hurt III）出版《墮落的大亨》（*The Lost Tycoon*）一書（1993），並在書裡根據伊凡娜的證詞描述該事件時，她在被迫（再一次的，被川普的律師）加上的免責聲明裡所說，那並不是一個「法律或犯罪意義」上的侵害。川普大致上否認了這些指控，除了一個故事裡的細節——這部分我稍後會談。

這類的否認可能有許多形式。「不是強暴，不完全是，但儘管如此仍是令人不快的，非常地令人不快」——這是柯慈（J. M. Coetzee）的小說《屈辱》（*Disgrace*）裡的角色，五十二歲的教授大衛·魯睿如此描述他從女學生梅蘭妮身上所獲得的性。「彷彿她決定要變得遲

鈍，在這段過程中讓自己的內在死亡，就如同一隻兔子的頸項被狐狸咬上時一樣」（1999，頁23）。我們如何稱呼這個狀況？如果不完全是強暴，那是什麼^{註22}？

川普的律師柯恩試著用上述故事打消與他聯絡的《野獸日報》記者報導該事件的念頭。否則，他宣告：

我將確保你和我某天會在法庭見面。然後我會奪走那些你現在還沒有賺到的每一分錢。然後我會鎖定你的《野獸日報》以及所有你可能認識的人……因此我警告你，他X的謹言慎行，因為我將對你做的事情會非常他X的噁心。你聽懂了嗎？

柯恩接著說：

這一點都不合理，你想報導某個人怎麼使用「強暴」這個詞彙——當那個人只是在描述她情緒上有所不滿。

他重申：

雖然這個詞彙有很多字面上的意思，但如果你扭曲了它的意思，如果你在上面加上川普的名字，那你可以放心，你一定會嘗到後果的。所以你想做什麼就去做，你想在二十歲就毀掉自己的人生？你儘管去做，我會很榮幸幫你達成這件事情（Darcy, 2015）。

川普的競選團隊進一步撇清他和這些威脅的關聯。「川普並不知道〔柯恩〕這些發言，但他並不同意……除了川普自己，沒有人能為他代言。」他的發言人這麼說（Santucci, 2015）。

表面上看來，依凡娜如今否認她過去的說法（以及離婚官司時的法庭證詞），她的態度激烈到可以同時代表她和川普兩人；她堅持她自己的說詞「毫無可信之處」。《野獸日報》刊出前述報導時，她發表了一份聲明：

我最近讀到了一些我在近三十年前所做的評論，那時候我和唐納的離婚過程相當緊繃。那些描述完全沒有可信之處，唐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一起養育三個我們深愛且深感驕傲的小孩（Santucci, 2015）。

根據她過去的描述，這個男人曾經因為她推薦的外科醫師搞砸了他的頭皮手術——不僅痛苦，更顯然的是沒有成功——而在盛怒中扯下一把她的頭髮。在那之後，依凡娜寫道，她的丈夫在沒有預先通知（也就是未經同意）的情況下「將他的陰莖硬塞」入她體內；她寫

道，他在第二天上午得意洋洋地微笑，並以一種懷有惡意的輕鬆態度問她：「痛嗎？」而這背後的意涵是，他希望讓她痛；這是對她的復仇，因為她讓他的頭疼痛。川普只否認了一件事：他沒有因為一個不存在的問題——也就是他的禿頭——而做那個手術（Zadrozny & Mak, 2015）。

依凡娜的聲明最後如此作結：

我對唐納只有喜愛，並祝福他的競選活動一帆風順。此外，我認為他會是一個驚人的總統。

在我撰寫本書的此刻（二〇一七年五月），川普頭一百天的總統生涯確實超越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

改變說法 Vocal changes

在某些例子裡，我們很難認出，某些聲音是來自於那些曾經直截了當而公開地指控男性虐待她們的女性。麗莎·漢寧（Lisa Henning）決心要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並建議其他女性也這麼做，而不是試著改變丈夫的虐待行為。她說她發現自己無法改變他，於是她離開他，失去了一切：

對我來說，同時我相信對大多數的女性來說，我們必須停止把重心放在男人身上，以及他們做了什麼、我們可以怎麼改變他們。我們必須開始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我們無法控制他們，重心必須回到我們自己身上。

這段話出自於麗莎·漢寧一九九〇年上《歐普拉脫口秀》（*The Oprah Winfrey Show*）的片段，她當時化名為「安」，帶著大眼鏡與假髮。該集的節目名稱是「受暴上流女性」。漢寧條理清晰地談論，她意識到父權力量是如何讓她無法獲得法律協助或她所期待的保護；她談到，問題在於整個社會並不支持她，尤其當她的丈夫是一個富有且非常成功的律師。昭然若揭的是：

尤其當你對抗的是司法體系時……這是個非常父權的體系，這些些優秀的老男孩們。他們罩著彼此，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很大的問題」有一部分是她的丈夫擁有法律免責權，而且對此心知肚明，他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用擔心任何法律後果。而根據麗莎·漢寧的證詞，他想做的是殘暴地對待她。在一九八六年為離婚官司提供口供證詞時，她指出他曾經重重地毆打她，特別是，曾經讓她不能呼吸。

他攻擊我，讓我不能呼吸。他把我摔到地上、打我的頭、用他的膝蓋撞我的胸口、扭我的手臂、把我拉到地上、把我往牆上扔、試著阻止我打電話報警，然後踢我的背。

漢寧也作證指出他曾在車裡揍她，然後警察曾經兩度在接到電話後前往他們的住所。但在《歐普拉脫口秀》上，她說：

最令人害怕的是離開。因為當我脫離他的那刻，當我公開此事的那刻，請記得我的前夫是一個公眾人物——每個人都知道他是誰也知道

他做了什麼——當我公開此事的那刻，他誓言要報復我。他說，「我會看著你陷入臭水溝裡。這件事會沒完沒了，你會為此付出代價。」

那她付出代價了嗎？

在那之後，麗莎·漢寧再婚並改名，因此二〇一六年時是麗莎·費爾斯坦接到消息，得知她的前夫安德魯·帕茲德（Andrew Puzder）被點名為美國總統川普的勞動部長人選之一。每個人都知道那起指控，但是在歐普拉的節目片段被私下播放給參議員們看過並隨後公開於媒體上之後，基本上，這件事就結束了。帕茲德放棄了提名人的資格。

但為什麼呢？麗莎·漢寧已經改口。麗莎·費爾斯坦堅持這一切都是她編造的，或者說，是她的前身麗莎·漢寧編造的。彼時代表漢寧的律師說他過去相信她，但現在則不，一部分是因為她的醫療紀錄，以及他們之間的討論。他認為她正在掩蓋虐待（沒）發生過的事實，或者更恰當的說法是，他仍舊相信過去那個麗莎的證詞。「我認為她的故事不只可信，而且真實。」他說（Fenske, 2016）。

無論是在離婚官司的口供證詞裡，還是在《河濱週報》（*Riverfront Times*）的報導裡，帕茲德都否認虐待一事，並表示他的前妻麗莎·漢寧的指控「毫無根據」。

「肢體虐待從來沒有發生過。」帕茲德聲稱。

如今麗莎·費爾斯坦完全同意她的前夫。

在一封她於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所撰寫的電子郵件中，她直白而且（根據前述報導的巧妙形容）扁平地指出：「你沒有虐待我。」她寫道：

你知道我有多後悔，那時我做了很多倉促的決定，我誠摯地希望那些決定不會在此刻造成你的困擾。我衝動地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申請離婚，然後聽從建議提出虐待的指控。我非常後悔，直到今日仍然很後悔那個決定，我收回三十多年前所做的所有指控，你沒有虐待我。

如果有任何人問我，我一定會肯定地告訴他，沒有任何虐待行為發生過。我們有過激烈的爭吵，我們都對彼此說了一些直到今天仍感到後悔的話。我一直都很感激，我們能夠原諒彼此帶給對方的傷害。

這麼多「後悔」——兩個段落裡共四個（包括同類詞）。電子郵件的內容伴隨著強烈的信念繼續下去：

你和我很久以前就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不再想起這件事情，且如今有著我認為充滿愛與尊重的關係。這證明了你的正直與優雅，如果你曾經是一個有暴力和虐待行為的丈夫，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你並不是。無論你做什麼，我都永遠祝福你無比順遂，我知道你會是川普團隊絕佳的新成員（Fenske, 2016）。

你現在可以想像，看過歐普拉節目片段並讀過這封郵件的參議員們為什麼有了態度上的區別^{註23}。這個重新偏向她前夫的轉折令人震驚。這不是一個解釋，反而會被邏輯學家稱為一個可能性證據：一個曾經變裝、化名為「安」參加歐普拉的節目，並在節目上說出前段所引用之文字的女性，她寫出這樣一封郵件的可能性。此外，麗莎·漢寧（也就是「安」）曾經詳細闡述：「大多數處於那種社會地位的男性是不會留下痕跡的，你沒有辦法看見我所受的傷害。那是永久、永久的傷害，但沒有痕跡，而且從來沒有。」

如今依舊沒有。但是曾經說過那些話的女人已經不見了，消失於事件的表面上。再讀一次上面的那些段落吧，她曾如此努力地想要攀上一個不同的焦點和視角：一個她自己、而非她前夫的焦點和視角。她找到了那些字，她說出了那些字。然後不知何故、不知在何處，她失去了它們——或者被迫吃下了它們。

在任何情境下，這個主張與反悔都可能具有多種解釋，包括最初的證詞其實是錯誤的。但是把這些和其他這類的例子放在一起檢視時，你會開始留意到一個模式。男性支配的內涵之一（尤其當事情涉及那些最有特權、最有權力的男性）似乎是緊緊抓住敘事的控制權，並藉此控制她、迫使她贊同。這並不完全是服從；相反的，根據凱特·亞布蘭森（Kate Abramson, 2014）發人深省的解釋^{註24}，這和煤氣燈操縱的道德目標十分相似。受害者獲得獨立視角的能力已經遭到摧毀，或至少在某些主題上是如此。她被迫同意他；她可能不只是相信，甚至還接受並訴說，他的故事。

從某些方面看來，此為這類有權而跋扈的主體一般慣用伎倆的一種延伸：他發表看法，僅僅純粹為了規定什麼事情「將會」被相信，並且會被當成事件後續進展的官方版本。他用來指揮世界的主張（表面上是信仰，但骨子裡是命令）瞄準了內心，然後要求人們去改變他們的主張、去採納那個被世界引導的心理狀態（也就是信仰，至少表

面上如此），而我們一般認為，個人是沒有能力自願採納這個狀態的。如果要形成信仰，通常我們需要論證或證據，或類似事物——某個貼近真相之物，以便說明什麼可以被信仰，而不只是這麼做的實際好處。在決定我們是否真的可以如此聽從指令而改變想法（我懷疑這是可能的，儘管很感傷且令人疑惑）的因素中，不只是他的意志要成為法律，他說的話還必須成為真理。

目標 Aims

這是一個熟悉的論點，事實上可說是陳腔濫調了：在政治裡，飽含道德意義的字詞很重要。「強暴」和「勒脖」便身處其中。然而，這並不是單單幫一個問題命名而已（參見Friedan, 1963）。當字詞有了嚴肅的道德和法律意義，這就可能變成某些人拒絕使用它們的動機和藉口：不可能是那樣，他不是那樣的人；一個詞語被假設了不同的涵義，超出了一個人在受到這些指控前所能想像到的。因此，我們有必要主張自己有權利使用這些詞語來命名某些嚴肅的道德問題，當我們考量到這個純粹的權利有被腐蝕的風險時。

我相信「厭女情結」一詞就是一個絕佳範例。一方面，作為女性主義者的我們需要這個詞；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正正面臨著失去它的危險。因此，本書的企圖是成為在這個領域內抵禦煤氣燈操縱效應的壁壘：從私人生活和公共論述裡頭的厭女問題，以及伴隨而生的否認機制之中，抽取出熱與光。

一個問題是：在書寫一本關於厭女情結這樣一個巨大又令人焦慮的主題作品時，什麼樣的目標和野心才是合適的？尤其，如我在序言中所說，當這是第一部處理此主題的專書，而作者擁有像我這樣的學術訓練背景時。限制了我的發言權威的一個因素，正是我自己（享受許多特權）的社會位置，以及與此相關的知識立場或有利位置。我同時也受限於我能夠用什麼樣的鏡頭來貼近這個主題，因為我的學術訓練主要是在道德和女性主義哲學領域，而非——舉例來說——心理學、社會學、性別研究、人類學或歷史^{註25}。我將會經常表達我個人的看法，根據我提出的概念，說明某些有爭議的案例是否屬於厭女情結的範疇。但是請記住，此處經常有提出合理反對意見的空間，我的主要目標並不是讓讀者同意我所提出來的任何特定結論；我想要的是提供一組有用的工具，讓人針對這些議題提問、解答並辯論，同時為深入而實在的厭女情結討論創造空間，因為這些討論影響到特定的女孩與女人群體。

在本書的第一部分中，我的目標是打造一個可以被想像成概念骨架之物：一個從「它對女性做了什麼」的角度來理解厭女情結的一般性架構。也就是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將厭女情結理解為各種相似的支配體系（包括：種族歧視、仇外、階級歧視、年齡歧視、身心障礙歧視、恐同、恐跨，以及其他）中的一個分支，它為了維持父權秩序而

服務。厭女情結透過使特定（某種程度上是有限定範圍的）類別的女孩或女人遭受敵意或負面的社會後果，以執行與監督那些在理論（也就是內容）或實踐（也就是規範執行的機制）上被性別化的社會規範，進而得以達到這個結果。

請留意這個主張說了什麼、又沒說什麼：依據身處不同處境的女孩與女人們的整體社會位置，規範本身的內容或執行的機制都可能大不相同，而考量到不利條件和弱勢的各種形式可能彼此強化，這可能也會對厭女情結的經驗和影響產生一個重要的效果。在我看來，這就是被稱為「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政治思考所涉及的方法和取向所帶來的重要啟示之一；這個概念最初由金柏利·克倫肖（Kimberlé W. Crenshaw）所提出（1991；1993；1997；2012）。第二章中，我會進一步談論我如何特別參考這些洞見而建立了我的改良性分析。

因此，讀者可以把這套說明單純看作是一份大綱，邀請具有相關知識和道德權威的理論家們來填入內容，如果他們願意的話。這個過程將包括選擇一組針對特定類別之女孩與女人的社會規範，然後不只分析它們的內容，與它們如何被執行（或被過度執行），還有它們特定的後續影響，以及它們與其他社會內部構成的特權和弱勢體系之間的互動。

當我將討論從厭女情結的邏輯轉向其具體的真義或本質時，對我來說，這麼做的意義好像是在暗示，我對那些在我所處的特定社會位置上，且令我感到熟悉的厭女情結格外感興趣（雖然我感興趣的議題並不限於此）。但在我的情況裡，作為一個擁有許多特權的中產階級、異性戀、順性別、沒有身心障礙、而且居住在現代安格魯美國社會（最初也包含澳洲）的白人，這個關注焦點可能一開始聽起來沒什麼前景；事實上，對某些讀者來說，這還可能聽起來很荒謬，且令人反感。中產階級的異性戀白人（特別是）女性曾被批評過，我們依據自身的經驗，不正當地以過度概括甚至普遍化的方式來操作女性主義，而這件事並非冤枉。（Lorde, [1997；2007, 二版] 所提出的「主人的工具將永遠無法拆解主人的房子」正是一個理當為人所知的呼籲，指出我們應對此採取行動。）但儘管我的限制將使我在這整張大畫布上止於我所能觸及的小角落進行揮灑，才不致僭越他人，並無可避免地（相對於僅僅「有可能」）一敗塗地，但我的所作所為，一部分亦是為了我的畫筆所不能觸及之處。

我對占有優勢地位的社會行動者所施予女孩與女人——就算不是全體，這也包含了大部分的我們——的厭女情結很感興趣，儘管因為社會位置的其他面向（我稍後會討論到），它們可能以相當不同的方式呈現。但是在某方面而言，我確實特別想要了解在白人男性面前，白人女性所受到的待遇，不僅因為這本身即為一個道德問題（雖然這確實是一部分原因），更因為我相信，它可以直接為其他更嚴重的社會問題提供參考：更弱勢的女性們所遭遇到的厭女情結，例如非白人、跨性別，還有其他更加不具社會優勢者。讓我在開頭就單刀直入地說吧：最有權力的白人男性，他們的厭女情結很顯然會不合比例地傷害到最弱勢的女性，這些男性也最不會受到道德和法律制裁。事實上，他們可能可以造成傷害，卻不受任何懲罰。但是我們，也就是白人女性，往往為了某種程度上的自我保護而透過各種方式讓這件事情變得可能發生。白人女性面臨的厭女情結可能最常造成一種傷害：道德的傷害（參見Tessman, 2005）。因此，我相信，我們必須清楚揭露這種形式的厭女情結，一方面是為了了解我們犯了什麼錯，另一方面，則是為了了解我們可以如何改進。

在美國脈絡裡，這個問題的嚴重程度在總統大選後變得清晰，當超過一半的白人女性不顧川普有著漫長的厭女、性侵害和騷擾紀錄，仍選擇將選票投給他，而非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的時候。這些內容我將在稍後深入討論。但是針對白人女性，眼前的問題乃是：我們在想什麼？為什麼我們之中，有這麼多人已經準備好原諒並忘記像川普這種人的厭女情結？我們提前被煤氣燈操縱了嗎？我們自己用煤氣燈操縱了自己嗎^{註26}？

無痕 Nonappearance

川普預定的白宮閣員中，安德魯．帕茲德並非唯一一名有對女性施暴紀錄之人；川普本人之外，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曾於一九九六年因家庭暴力被起訴，比帕茲德晚了十年。但隨著他擔任川普競選顧問，幫助川普在面對希拉蕊時贏得了令人沮喪的勝利，班農於二〇一六年十一月的總統大選結束幾天後被提名為川普的首席戰略師，在我撰寫本書的此刻（二〇一七年五月），他仍舊於該職位任職。

整起事件起始於班農因為覺得他當時的妻子瑪莉．路易絲．皮卡（Mary Louise Piccard）太吵而憤怒。她當時起床餵他們七個月大的雙胞胎女兒，在這段過程中，她製造了一些噪音，驚醒了在沙發上睡覺的班農。那是一九九六年的元旦（Gold & Bresnahan, 2016），他們於七個月前結婚，那是雙胞胎女兒出生的三天前，在羊膜穿刺檢查確認她們「正常」之後（這是班農同意結婚的條件）（Irwin, 2016）。

皮卡隨後向班農索取信用卡好去買日用品。那是他的錢，他堅持，並叫她用支票本。當他準備離家時，皮卡跟著他走到了車邊，兩個人隔著駕駛座的車窗爭吵起來。她威脅他要離婚，他嘲笑她，並說自己永遠都不會搬出去。她對著他的方向或往他的身上吐口水（警方報告中並未說明），此時他從駕駛座裡伸出了手，抓住她的一隻手腕，然後抓住她的脖子。他試著把她朝自己所在的位置抓進車內，她掙扎，然後打他的臉，好鬆開他的箝制。一段時間之後她掙脫了，並跑進房子裡打電話報警，他隨即跟上^{註27}。

她抓著手提電話在客廳裡四處跑，撥打九一一報警，而他在此刻越過雙胞胎朝她跳去，並把電話從她手中搶走。他把電話丟到房間的另一頭並且大吼：「你這個瘋狂的賤貨！」她於日後作證時這麼提到。然後他走出房子、駕車離開，而她發現電話已經被摔成碎片，無法再用。

警察仍然來了，在那通被掛掉的報案電話後，因為這是標準程序。一名警官在皮卡的手腕和脖子上看到紅痕，隨後警方的攝影師拍了照片，和現場報告一同歸檔。後來皮卡描述班農使她「窒息」，新聞網站「政治」（Politico）於二〇一六年報導這起事件時也使用了同樣的字眼（Gold & Bresnahan, 2016）（Irwin, 2016）。這個字眼沒有

出現在警方的報告裡，但是他們可能是不知道應該問什麼問題，至今，許多警察依舊不知道。

但對於任何一個熟悉親密伴侶勒脖相關研究的人來說，此處的各種敘述，包括皮卡抱怨脖子痠痛、他抓著她的脖子好把她往下朝車子的方向拉，且同時抓著她的手腕、使她只能扭動掙扎並抓傷了他的臉（推論是用她空下來的那隻手），都符合一般人對這十到十五秒的時間內會發生什麼事情所懷有的預期，也就是當一個成人被勒住脖子時，在失去意識前，通常會直覺性地掙扎。

此外，警方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在她的脖子上看到紅斑痕，而且明顯到能夠被拍照記錄，這也是重要的資訊——再一次的，如果這確實是勒脖。只有15%的勒脖舉動會導致在警方歸檔照片中有可見的痕跡，大多數時候，勒脖造成的是內傷（Snyder, 2015）。研究顯示，在其他肢體症狀以外，當攻擊強度越高，痕跡也會越明顯（Plattner, Bolliger, & Zollinger, 2005）。另一個症狀是瘀斑，也就是一個人眼白裡的紅點。警方報告開頭就寫到皮卡的眼睛「泛紅而且透著水光」，同時她「顯得非常心煩而且哭過」。當她在前門迎接警官時，她說，「喔！謝謝你，你來了。你怎麼知道要來？」他解釋他是因為一通被掛斷的報案電話出自這個地址而前來，有三到四分鐘的時間，皮卡沒有辦法說話解釋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她在哭，那位警官這麼寫道。

根據記者瑞秋·路易絲·史奈德（Rachel Louise Snyder）和勒脖預防訓練中心（Training Institute on Strangulation Prevention）的執行長蓋爾·史崔克（Gael Strack）的談話，史奈德解釋道，在勒脖的情境裡：

警方通常會對事件輕描淡寫，列出如「脖子上的紅痕、割傷、刮傷或擦傷」等傷痕，急診室通常會在做電腦斷層掃描和核磁共振前就讓受害者出院。今日史崔克和家暴社群所知的是，大多數勒脖所造成的傷害是內在的，而且勒脖行為正好往往是謀殺案前加害者最後的攻擊行為。「統計上來說，我們現在知道，一旦雙手被放到了脖子上，下一步就是謀殺。」席薇亞·維拉（Sylvia Vella），聖地亞哥警察局家暴小組的一名醫師和檢官這麼說，「它們不會倒退。」（Snyder, 2015）

因此，當人們想要提出理由以反對班農被任命為白宮首席戰略師時，為什麼他們不更加認真地看待上述事件？儘管不久前還有著史奈德一文這般優秀的報導刊登於主流媒體平台上（在此例中是《紐約客

雜誌》〔*The New Yorker*〕）。為什麼人們對勒脖的認識還是這麼少？即使是在醫護人員中，無知——有時是純粹的敵意——仍舊是一大問題。「也許你應該停止對你的丈夫尖叫。」不久前，一名聖地牙哥的急診室醫師對一名被勒脖的女性這麼說（Jetter, Braunschweiger, Lunn, & Fullerton-Batten, 2014）。

瑪莉．路易絲．皮卡比大多數的受害者被更認真地看待。班農因家庭暴力創傷和毆打，以及脅迫證人的輕罪而遭起訴，班農聲稱自己「無罪」，最後這起案件因為皮卡未出庭作證而被駁回。她隨後解釋，這是因為班農威脅她，他的律師叫她出城直到案件結束，否則她將沒有地方可住，也沒有錢扶養他們的女兒。皮卡補充：「他告訴我，如果我出庭，他和他的律師保證我會變成有罪的那個人。」她沒有出庭，他沒有履行他的威脅。而如今，「最要緊的是，他和雙胞胎有著極好的關係，他和前妻有著極好的關係，他仍舊扶養她們。」他的發言人說。

對於那些壓制並威脅女性、使其無法發聲，或是讓她們改變說詞以維持和諧的男性來說，沉默是金。沉默隔離了他們的受害者，並使得厭女情結得以發生。所以，讓我們打破沉默。

概述 Overview

本書首先將會針對厭女情結的概念提出一個常見的、字典解說式的理解。根據該定義，我稱其為「天真式理解」（naïve conception），厭女情結主要是個別的厭女者所擁有的一種屬性，他們傾向因為女性身為女性——也就是因為她們的性別——而普遍性地，或至少非常一般性地仇視女性。在這個觀點之上，如果他們要被稱為真正的厭女者，這些主體也可能必須在心中藏匿著這股恨意，好提供一種「深層」的或根本的心理學解釋。於是乎，厭女情結就是厭女者所表現的樣貌，而厭女者們則為符合某種特定心理狀態的主體。

我將在第一章剩餘的篇幅內指出，對厭女情結的天真式理解並無法幫助到它的受害者、攻擊目標，以及其他被指控厭女但其實無辜的人。這個定義讓厭女情結變成一個基本上不存在、在政治上邊緣，更無法被理解的現象。從受害者這方來說，這樣的天真式理解讓我們很難去解釋為什麼某些常規和行為是厭女的；從行動主體那方來說，為厭女指控所做的成功辯護則會變得沒有太大意義，（被指控的）個人會和那些看起來特別針對女性、但其實不見得只針對女性的主體們，一同被歸類於一個極其曖昧不清的群體中。但是，如我接下來將會繼續說明的，我們完全不清楚，為什麼他們會只單單針對女性。偏執仇恨的不同形式往往有著很高的共病性。

我將在第二章就厭女情結發展出一個正面的提議。根據此提議，我們應該將厭女情結主要理解為社會環境中的一個屬性，在這些環境裡，因為父權規範與期待的執行與監督，女性比較可能遭遇到敵意，而這經常——雖然不是只有這種原因——是因為她們破壞了父權的律法和秩序。因此，厭女情結的功用是執行和監督女性的臣屬姿態，並維持男性的支配地位，而這個過程的背景則是由其他和壓迫／弱勢與支配／劣勢相關的體系、迥然不同的物質資源、各種帶有鼓勵或限制意圖的社會結構、制度、官僚機制互相交織而成的。

因此，就我看來，根據厭女情結而假設的某種概念上的普遍性經驗，並不存在。相對的，厭女情結應該是一個名稱，用來指稱任何在女性的行動背後構成背景的敵意力量，這個力量將她們和所對應的男性區分開來（在其他條件都對等的情況下）。她不一定會面臨這些潛在的、帶有敵意的後果，面臨與否，取決於她如何表現，這便是社會控制一般運作的方式：透過激勵或抑制的因素，形成正向與負向的增

強機制。如果有機會，她有可能藉由在某些理想或標準上的「乖巧」表現來逃過負面的後果，但某些時候，這類機會並不存在。雙重困境——或更糟的情況——是很常見的。

請不要忘記了，根據我所提出的分析，厭女情結的本質在於其社會功能，而非心理學上的狀態。對於主體來說，厭女情結不一定需要任何來自內在的特定「感受」或現象學。如果厭女情結涉及任何感受，那有可能是自詡正義，像是為了自己或為了道德挺身而出，或者——很多時候結合了兩者——是為了「小人物」們。對那些受到厭女情結吸引的人而言，這就像是一場道德的十字軍東征，而非獵巫。它之所以針對這些目標對象，並不是因為仇視女性，而是因為熱愛正義；它也可能單純是一個結構現象，由規範、慣例、制度和其他社會架構所展現。

據上所述，跟隨我的思考路徑，我們應該從厭女情結的潛在攻擊目標和受害者的角度來理解它，亦即女孩與女人。因此，厭女情結是厭女情結對這個群體中的某些人所做之事，通常是為了先發制人，或是控制其他人的行為。厭女情結選取某個屬於特定社會類別（一個根據種族、階級、年齡、身體類型、身心障礙、性、順／跨性別等因素，或多或少被完整規範的分類）的女孩或女人，然後威脅她，作為這個性別化群體中的成員之一，如果她違反或挑戰了相關規範或期待，她將會遭受到飽含敵意的後果；這些規範包括了他（假定）的權利，以及她的義務。她也可能被定位成特定類型的女性，代表著那些沒有安分守己，或是越界踏入他的勢力範圍的人。

我在第三章指出，既然「性別歧視」和「厭女情結」二詞可以被有效地用來標註一個重要的對比，我們就應該這麼做。我所提出的，是將性別歧視看作父權意識形態的分支，目的是正當化並合理化父權的社會秩序，而厭女情結則是一個用來監督與執行其治理規範和期待的系統。因此，性別歧視是科學的，厭女情結則是道德的，而父權秩序則永遠處於霸權的地位。

在這三章之中，將厭女情結的邏輯理論化的同時，我認為我的分析具有幾個重要的理論和實務優勢。我認為，我的分析有以下幾個主要的優點，依序說明即為：

- 無論從認識論、心理學還是形而上學的層面而言，天真式理解有可能讓厭女情結成為一個謎團，而我的分析則得以讓我們將厭女情結理解為一個比較不神祕且在認識論上可及的現象。

- 它讓我們得以將厭女情結理解為父權意識形態核心且自然的一種表現形式，而不是一個相對邊緣而且不含政治本質的現象。

- 它為厭女情結因為女孩與女人的交織身分而產生的不同運作形式，保留了多元的空間，包括在質、量、強度、經驗和敵意所帶來的影響上，以及用來傳遞厭女情結的主體與社會機制上的不同。倘若（比如說）她同時受制於不同但平行的男性支配體系（再一次的，根據其他交織的社會因素而定），或者，她因為同時所佔據的多個社會位置而必須扮演一些互不相容的角色，那麼，厭女情結也可能包含了多個混和的厭女形式。

- 藉由專注於女性在探索社會時所遭遇到的敵意反應，而不是促成這些反應的根本心理基礎，它讓我們得以將厭女情結理解為一個系統性的社會現象。這類敵意絲毫不需要直接立基於個人主體的心理狀態。制度或其他社會環境也可以針對女性持有不同程度的嚴峻、冷淡或敵意。

- 它促使「厭女情結」一詞更廣泛地往外延伸，以和近期的「草根性」、語意學上的倡議（“grass-roots” semantic activism）接軌。這些倡議行動已經將該詞彙的使用以及——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在字典中的定義，往一個更富前景的方向推展。它也可以幫助我們解釋，許多看起來迥然不同的案例之間具有哪些特別的共通點。

- 面對某些於近日出現、針對厭女情結所生的爭議性問題，這個分析可以提供一些合理的回答。

- 它讓我們能夠在厭女情結和性別歧視間做出清楚的區別。

我將於第四章中接著探討，在我所關注的社會環境中的白人異性戀父權秩序底下，厭女情結一個關鍵而重要的動力。在這個道德好處經濟裡，女性有對他付出的義務，而不該提出要求；女性被認為要感到蒙受恩惠或心懷感激，而不是理所當然。在涉及某些代表性的道德好處時更是如此，例如注意力、關愛、同理心、尊重、讚揚和照顧。反過來說，他則是有資格取用這些道德好處，包括——我們會看到的——那些無法再給予他想要的道德援助的人的性命。他可能在本質上愛著並珍惜著她，亦即因為她這個人而愛她，但這份愛卻有許多附帶條件，意味著那並非因為她作為一個人的身分（不論那代表什麼），而是因為她在面對他時，第二人稱式的善意態度。

在第五章裡，我將暫且轉為探討並反駁一個主流的對立意見，它在談到「男性對男性的殘忍」（或者在這個例子裡，對女性）時經常被提出，它也是一個人們可能會用來理解厭女情結的方式。根據這個被我稱為「人道主義」（humanism）的看法，厭女情結的心理根源乃是無法認可女性的完整人性。但我認為，很多時候問題並不在於缺少對女性人性的覺察，她的人性反而恰好是問題所在——當在他的眼中，她的人性被給予了錯誤的人，或她以錯誤的方式、因錯誤的原因而付出。因此，與其認為對立是來自於女性被認定為「人類同胞」還是「次人類的生物或無心智的物件」，我們應該試著在「人類同胞」這組詞語的第二個部分中找出關鍵的對比。在第四章裡談到了「付出者／拿取者動力」，被捲入其中的女性是人類同胞中的人類付出者（human givers），因此，她的人性可能會被認定是屬於其他人類的，而她的價值則根據她所給予他們的道德好處而定，例如生命、愛、歡愉、照顧、支持、安慰等。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人們通常能夠接受女性有自己的獨立心智，但是當這份心智看似導向錯誤的事物、以錯誤的方式、給予錯誤的人——包括她自己和其他女性——時，女性就會被粗暴而殘忍地懲罰。

本書餘下的大部分內容則涉及那些伴隨了厭女情結、但（在我看來）鮮少被注意到的偏見、資源、方法以及驅動／自我遮掩機制。我相信這些都反映在優勢文化商品的形式中，包括道德論述、社會文本、藝術品到團體活動的模式，而且受到了於背景運作的付出者／拿取者動力所影響。

第六章討論到的，是擁有高度特權的男性們經常受惠的赦免論述；我也將討論同理心是如何從女性受害者們流向她們的男性加害者，我將此稱為「同理他心」。為了和廣受討論的伊斯拉維斯塔殺人案對比，我援引了近期一起受關注程度遠遠小於它的案件：奧克拉荷馬州一名專對黑人女性犯案的連續強暴犯。加害人斷定受害者們不會報案，且因他本人是一名警察，即使她們報案，也無能將他繩之以法。他雖然如此篤定，不過最終事情並未如他所願，但單單從是否能夠躲過法律制裁的角度來看的話，那是一個精明的手段。莫亞·貝利（Moya Bailey）提出了一個有力的名詞「厭黑女情結」（misogynoir）（2014），應該最能說明這個問題，這個詞彙描繪了厭女情結和反黑人的種族主義在美國的獨特交織性。

我在第七章裡轉向討論另一個主題：當特權女性們處於道德「付出者」的社會位置時，可以預期會有什麼後果——當厭女情結與攻擊來

自於特權位置不下於她的男性同伴時，特權女性會對受害者產生敵意與懷疑。反之，若它們源自於在某些層面上處於支配地位的非白人男性主體，並對白人至上主義造成威脅時，則反向的同理心會取得優勢。原因在於，這類論述將其對象放到受害者的角色上，而這將會置她於道德聚光燈下，成為照顧、關心、同理心和注意力的指定所在地。但這是厭女機制的禁忌，並因種族歧視機制而轉變調性，因為這兩者都堅守著一道規範，也就是女性（尤其是有色女性）應該要去給予，而非去要求獲得這一類的注意力。

最後，在第八章裡，我運用了我的理論來解釋希拉蕊·柯林頓於二〇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落敗。這個例子說明的是，厭女情結往往藉由攻擊女性在道德「付出者」方面的能力，來針對那些擅自闖入傳統男性領地並威脅要從他身上奪取某些東西的女性。尤其，這可能包括把一個與她有關的集體問題，變成她個人的問題；除了個人化之外，還重新描述她的意圖或行為，以呈現另外一個人的視角，而此人是她在各方面的競爭對手，並且有資格獲得所有數量有限的寵愛。因此，（上述女性的）擁有成了貪求，抱負成了緊抓不放，獲勝相當於偷盜，而疏忽則是（對他人的）徹底無視。

這類的概念轉化很常見，但它們可能不是很好的推論；事實上，從表面看來，它們確實前後邏輯不一致。疏忽有可能是一種粗心與侮辱，或者，它們可能其實是源自於在道德和知識論上一種健全的謙虛態度，源自於認知到個人只是一個道德主體或研究者社群中的一分子。儘管這個社群缺乏多元性——例如在哲學圈裡往往很遺憾地便是如此，但要憑個人去獨立修正這個狀況，程度相當有限。就算如此，個人貢獻仍有其價值。

伴隨於此，容我說明一些本書不會討論到，或只會在有限程度下提到的重要主題，以及背後的思索。

遺憾 Regrets

本書最重大（雖然有很多）的遺漏之處，或許是「厭跨女」（transmisogyny）的討論。由於跨性別女性——尤其是有色的跨性別女性——在今日的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都是一個極弱勢的群體，故而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甚至可說是急迫的議題。當她們的能見度提高了，這固然令人欣喜，然而與此同時，也令人遺憾（但不令人意外）地導致了反挫。而跨性別男性，亦同樣極為弱勢^{註28}。想到「恐跨」與「厭跨女情結」所造成的暴力、騷擾、個人或結構性歧視有多普遍，我很遺憾自己並未能夠就此議題的本質進行討論。但是，即使遺憾，我也很清楚知道，我並不具備相關的知識權威。在撰寫本書的此刻（二〇一七年五月），近期於哲學領域內所發生的爭議強調了在針對這些議題發言時，實際生活經驗的必要性^{註29}。若讀者想要進一步了解跨性別女性主義，我的參考書目中涵蓋了一些我個人認為在該主題上最有幫助與發人深省的著作，包括塔莉亞·美伊·貝特契（Talia Mae Bettcher, 2007；2012；2013；2014）、蕾秋·麥金儂（Rachel V. McKinnon, 2014；2015；2017）、小山繪美（音譯，Emi Koyama, 2003；2006）與茱莉亞·塞拉諾（Julia Serano，〔2007〕2016）等人。

在知識論的層面上，我也試著比平日更加地謹慎和謙卑，來面對「厭黑女」情結（如前所述）的討論。身為一名白人女性，當我在書寫過程中，鮮明地將黑人女性的身體變成貶抑和暴力的對象時，我會有一些道德上的疑慮，因為這有可能引發一種不恰當的猥褻氛圍，在我們這方於過去所造成的傷害以及至今仍持續進行的冷漠和剝削之上，又增添一筆侮辱。但我確實花了一點篇幅討論丹尼爾·霍茲克洛（Daniel Holtzclaw）的案例，以說明一個權威個體是如何掠奪特別弱勢的黑人女性，也就是貧窮、在法律上站不住腳（例如遭到通緝）、身為性工作者，或有著毒癮的女性。儘管陪審團裡的白人女性們也因為加害人對黑人女性犯下的重度性犯罪而將其判刑，但當她們為加害人流下了同情的淚水時，我無法不感到震驚。同時，主流女性主義媒體中的白人女性也幾乎都保持了沉默。這些彼此相加之後，說明了一種厭黑女的形式，它來自於共謀與無知，而白人女性們往往難辭其咎。在此，我也將自己納入這個可以做得更好，也必須做得更好的群體中。

由於我認為我無法以一個道德上無懈可擊的方式來處理上述議題，我做了這幾個決定。如同琳達·馬丁·阿柯芙（Linda Martín Alcoff, 1991 - 92）所說，就連「繞道而行」（moving over）都是一種來自特權位置的舉動，然而，也如她後續所指出的，有時候，此舉仍舊必要（頁24 - 25）。但這並不表示，對於個人後續的沉默以對，我們沒有可檢討之處。

在這八個章節和結論中，我試著取得一個平衡，一方面，讓它們自成一格，每一章都可作為獨立的論文閱讀（因為我知道，讀者會自行在這些素材中找到進出的方式）；但同時我也試著展示，個別章節如何為這個主題貢獻一個系統性的——儘管並非全面性的——取徑。再一次說明，我之所以使用前者，而非後者的說法，是因為儘管我試著發展出一個一般性的理論架構以思考厭女情結，但若要為這個架構增添血肉，仍需要整個村莊的不同理論學家的努力。而我自身在接下來的章節裡所提供的細節，乃是刻意針對那些我身為其中政治參與者的文化環境——也就是當代的美國與澳洲。這並不是因為一種不恰當的民族優越感（我這麼想，也這麼希望），而是因為我的研究方法結合了文化批評、意識型態檢視與哲學分析的元素，因此我需要內部知識。同時，另一個重點也在於，我要在一個「厭女情結經常遭到否認」的脈絡裡，對其進行診斷，而非（有時以一種種族歧視與仇外心態的態度）指責其他人或其他文化——作為一名澳洲裔的旅外白人，這始終並非我的立場。我也歡迎其他人對此進行修正與歸納。

另一個我想要在一開頭便說清楚的警告，同時也是本書為何以此命名的原因之一，則是我認為二元的性別系統——亦即人們被區分為兩個互斥並窮盡的類別，一邊為男孩與男人，另一邊則為女孩與女人——是不正確且有害的。有些人為陰陽人，有些人則無性別，有些人屬性別酷兒，遊走於不同的性別身分之間，還有其他非二元的可能性。因此我絕不擁戴性別二元論，事實上，我堅決地拒絕它。但是我仍斷斷續續地沿用這個系統，彷彿此類錯誤是正當的，原因是為了觀察其後續的發展，畢竟父權體系的邏輯——故也是厭女情結的邏輯——很大程度包含了對性別二元論（參考Digby〔2014〕）的支持，連帶包含了一種反對跨性別的性別形上學（參考Bettcher〔2007; 2012〕），以及對人類性／別的異性戀霸權看法（可參考Dembroff〔2016〕針對慣常的同性戀、異性戀和雙性戀分類所提出的另類概念架構），還有讓單偶制成為強制性的，愛的理想（參考Jenkins〔2017〕如何從女性主義出發為多偶制辯護）。

在研究厭女情結的邏輯時，經常牽涉到去探索這類有問題或根本錯誤的假設裡頭到底包含了什麼；這些假設將許多人排除在外，並認定了什麼是合理且有益的身體、生活與愛，甚至是某些人的人性和存在本質。但是，去理解一個用以維持現狀的系統內部如何運作，以及它那些錯綜複雜的、甚至有時在道德上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節，有助於我們發掘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攻克它。當我斷斷續續地在討論中沿用某些令人皺眉的假設時，這便是我的用意，而最終，我希望的是能夠試著揭露並瓦解厭女情結的操作（Haslanger, 2012）。

在此也帶出了我將「邏輯」作為本書副標題（原文：The Logic of Misogyny）的最終原因。我試著徹徹底底從內部出發，不將厭女情結理解為一個心理現象，而是一個有著心理上、結構上與制度上表現形式的社會政治現象。我要提出的是，厭女情結乃是一個具有敵意力量的系統，而從父權制度的意識形態而言，它絕大多數時候是「合理」的，因為它的作用就是在於監督和執行父權的秩序。既然我相信父權秩序帶來了壓迫、不合理，並且投下了一個長久的歷史陰影，因此我也相信厭女情結應該是要被反對的，而且個人主體往往有與之對抗的理由，某些時候，甚至有與之對抗的義務（可參考Hay〔2013〕和Silvermint〔2013〕的討論）。

然而，跟隨著批判種族學者查爾斯．勞倫斯三世（Charles Lawrence III, 1987；2008）的腳步，本書主要採取了一種他稱之為「知識學」的路徑來探討社會正義議題。也就是說，在將厭女情結理解為一個有著政治基礎的道德兼社會現象同時，我專注的主要面向，是進行道德診斷或釐清厭女情結的本質，而非提供道德處方箋或性格判斷、進而對個人進行審判，並因此導致他們進入防禦狀態。最重要的是，我認為這種處理厭女情結的方式並沒有幫助，還鼓勵了道德上的自戀：一種對個人罪疚和清白的迷戀。更有甚者，我們將在後續的章節裡一路反覆看到，厭女情結經常牽涉到說教式的打擊，或是因為女性們（真實或是想像）的道德錯誤，進而無情地羞辱她們。厭女情結也使女性受制於一種我如今視之為「弱勢暴政」（tyranny of vulnerability）的情況，因為它指出了她周遭任何一個以及每一個（據說）更為弱勢的（想像中的）個人或生物，並指出她（再一次的，據說）應該可以對對方更好，進而要求女性照顧他們，不然她就有可能被評價為麻木不仁，甚至像怪物般沒有人性。與此同時，她的男性同伴則能夠在相對不受懲罰的情況下，繼續追求他自己的「個人計畫」。

——借用英國道德哲學家伯納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 1982）的話來說。由此看來，她承受了過度的道德重擔。

也因如此，主要藉由道德判斷式的語言來對抗厭女情結，便有點像是試著用氧氣滅火，火勢規模小時可能有用——畢竟我們確實能夠吹熄火柴跟蠟燭，但若我們試著把策略升級，便有可能受到反挫。我們所做的，將會是提油救火。

那麼，有什麼其他的可能方案呢？跟隨威廉斯的思路，我想要做的，是在所謂「評估性」（evaluative）和「指示性」（prescriptive）的道德與政治主張之間，做出區別。前者是針對世上某些事物狀態的善與惡所做出的主張（或是賦予它們更為複雜或「厚重」的道德兼政治特性），因此，評估性的主張乃是關於何為（或不為）應然（*ought [or ought not] to be the case*），而根據威廉斯的看法，在談到社會正義的問題時，它們往往與答案應有的形式若合符節。相對的，提出指示（或者以反面來說，發布禁令）的主張，則是給予個人主體命令或指導的基礎，告訴對方應該（或不應該）做什麼（*ought [or ought not] to do*）。威廉斯也進一步說明了，在所謂的「如果我是你」的情境之中，這些指示建構了提供對方忠告的基礎。

我贊同威廉斯的「內在論」（internalist）看法，也就是，針對特定主體的指示性主張之真實性，要視該主體的「個人計畫」和價值而定（Manne, 2014a）。但即使該主體反對這個有爭議的主張，前述評估性模式的存在也顯示了，在此脈絡之中，我們並不需要在一個帶有道德指控或甚至絕對指示性的態度，以及一個突出的道德中立位置之間，做出選擇；原因便如本書序言中所討論到的，前者往往會招致怨懟，後者則顯得怯懦，有時甚至令人厭惡。因此，本書大部分的內容，將致力於描述那些顯然被我看作道德不健全——例如不公平或造成壓迫——且需要改革的事物狀態。作為讀者，我邀請您做出同樣的結論，或是請根據同樣的原則，找到理由去支持一個可能有所助益的反對立場。這個主題上並沒有任何道德中立性可言，但我確實大幅地在該如何（還有依照什麼程度）分配責任、責任歸屬給誰，以及我們可以怎麼樣改善該情況等話題上留白。有些時候，「如何對抗厭女情結」這個問題的答案簡直明顯得不能更明顯了：不要參與或鼓勵它、試著阻止它，諸如此類；有些時候，我們面臨許多可能性，它們的風險與成本必須和可能的獎勵與好處相互比較、衡量；還有些時候，我們一點都不清楚該怎麼做，而我們必須發展策略、實驗、謹慎行事，諸如此類。無論什麼情況，我猜想，對抗厭女情結都將像是一場亂七

八糟的零售事業，難以取得批發式的幾個少數答案，正如同大多數長期的道德和社會維修工程一般。

我之所以認為對抗厭女情結的過程將格外零散瑣碎，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它的機制和方法是如此的投機——或者可以說是有了創意了，端視你怎麼看待它——而且如此的多樣。女孩與女人可能被貶低或被剝奪的，通常幾乎是所有人都很珍視的東西：物質、社會狀態、道德名聲、知識資格，以及其他方面的人類成就、自尊、驕傲，諸如此類。這可能有很多表現形式：故作高人一等、男性說教、道德教化、責怪、懲罰、噤聲、譏諷、藐視、誇張化、剝削、消抹，以及特別對她們表現出冷漠。

這是我如此為本書命名的另一個理由：上述的原因以外，同時這個標題儘管看似一道指令，但它卻不需要帶有獨裁的意圖——它可以被溫和地表達出來，並且被快樂地遵從。我的狗女兒「麵包粉」就證明了這一點。不過，某些事情對她來說是「令她感到自由的責任」——借用約瑟夫·拉茲（Joseph Raz, 1989）^{註30}之語，對我來說，卻遠非如此。作為人類，我們的自由來自於透過其他形式遵守規則，以及修改、創造、突破和改革。

註11：編註：Gloria Jean Watkins，美國作家，女性主義者，以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為筆名，其研究主要在分析種族、資本主義和社會性別的交織性。

註12：Lux Alpturam, “bell hooks on the State of Feminism and How to Move Forward under Trump: BUST Interview,” Bust, 2017/02/21, <https://bust.com/feminism/19119-the-road-ahead-bell-hooks.html>

註13：窒息（choking）指的是呼吸道內部受到阻礙——例如人們可能因為食物等外來物而噎到，但勒脖（strangulation）則是在喉嚨或脖頸處施加外在壓力，造成「以下狀況之一或全部：頸動脈阻塞（使大腦缺氧）、頸靜脈阻塞（使缺氧血無法離開大腦），以及呼吸道關閉，導致受害者無法呼吸（Terkel, 2008）。」只需要一點點壓力（約五公斤），即可阻塞頸動脈，使當事人在幾秒鐘內失去意識，並在幾分鐘內腦死。作為比較基準，打開一罐汽水大約幾乎需要雙倍的力道（約十公斤）。見：“Strangulation: The Hidden Risk of Lethality,”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efs of Police, <https://www.theiacp.org/sites/default/files/all-i-j/IACPIntimatePartnerViolenceResponsePolicyandTrainingGuidelines2017.pdf>

註14：“Deputies: Palm Harbor Man Used Metal Leash to Choke Elderly Women Walking Her Dog,” WFLA News Channel, 2017/04/14, <https://www.wfla.com/news/pinellas-county/deputies-palm-harbor-man-chokes-elderly-woman-walking-her-dog-with-metal-leash/994891462>

註15：男孩有時也會出現勒脖行為，雖然少有數據顯示這種情況有多普遍（無論是絕對的數值還是與其他兒童的比較）。HBO電視台於二〇一七年播出的影集《美麗心計》（*Big Little Lies*）中有個案例扮演了關鍵角色，一名男孩被同班的女同學指控用手勒了她的脖子，並留下明顯的瘀痕，男孩否認了，而隨著劇情發展，謎團之一便是男孩究竟有沒有這麼做，如果有

的話，為什麼？如果沒有，那真正的肇事者是誰？當女孩被要求指認攻擊她的人時，她為什麼會錯誤地指控該名男孩？

我的社交圈子裡對此有些討論：這兩個孩子都是一年級生，而如此幼小的孩子是否真會對彼此這麼做。我可以證明這是有可能的，我五歲時也曾遇過這般情況，但主要的差別在於，我的同班同學用了一條毛線——技術上來說，他用的是繩狀物。當我甦醒後被告知一件事：他無法接受在拼音比賽裡輸給我。

註16：為了對「不是所有男人（#NotAllMen）」的支持群眾表示謹慎公平，這類宣稱確實可能造成一些誤會，因為作為一般性的敘述，它們可以從兩方面解讀。因此我會盡量避免使用它們，除非使用這類宣稱的意圖在某些特定情境下非常清楚明顯。

註17：譯註：gaslighting，亦即因為關係裡的權力不平等而受到有權力一方的蒙騙與操縱。

註18：編註：pernicious ignorance，簡略來說即為對某種知識領域缺乏敏感度或判斷力，通常是由於個體／群體的社會位置導致。

註19：更準確地說，道森將「證詞壓制」定義為「為了確保一個人的證詞只包含了他的聽眾能夠理解的內容，進而選擇刪減部分證詞。在一個證詞交換的情況裡，證詞壓制是由三種情境所構成：1）證詞內容必定是不安全且帶有風險的；2）針對該證詞內容，聽眾必定展現出對發言者缺乏理解的能力；以及3）對該證詞的無能力理解必須來自於或者看似來自於惡性無知」（2011，頁249）。

註20：亦可參考米蘭達．弗里克（2007）在討論知識不正義的形式時所提出的「證詞不正義」，以及蕾秋．麥金儂（Rachel V. McKinnon, 2016）就知識不正義這個主題所介紹的有用文獻。接下來，在第六章時我也會引用何賽．梅迪納（José Medina, 2011; 2012）和蓋樂．博豪斯二世（Galie Pohlhaus Jr. 2012）兩人的著作，以及瑪莉塔．吉伯特（Marita Gilbert）與道森（2014）合作的研究。

註21：David A. Fahrenthold, "Trump Recorded Having Extremely Lewd Conversation about Woman in 2005," Washington Post, 2016/10/0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ump-recorded-having-extremely-lewd-conversation-about-women-in-2005/2016/10/07/3b9ce776-8cb4-11e6-bf8a-3d26847eed4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df00bc6b4276

註22：針對這樣的案例，亦即當她光是抬起自己的臀部好讓他可以更輕易地脫下她的衣服，就已經是幫了他一個忙時，我過去曾經指出（Manne, 2017）：在幾乎不抗拒的情況下，「所有發生在她身上的事都可能顯得很遙遠。」（1999，頁23）我如今感到好奇的是，這個距離是來自於空間還是時間，或者兩者都有？這麼做使她彷彿快轉了，將自己投射到一個未來的時間點，在那裡，她沒有被毛手毛腳也不被覬覦，而不是她讓他這麼做、不是她同意了。

註23：為免費爾斯坦的郵件僅僅被看作是照本宣科的公式，我們需要留意的是，她曾經反覆多次提出要親自和參議員們會談，似乎因為影片重新曝光而真心感到不悅。

註24：針對政治「盟友」的概念如何可能成為煤氣燈操縱和證詞不正義的煙幕彈，亦可參考麥金儂（2017）所提出的重要討論。

註25：因此，為了避免讓人失望，我應該要警告您：我將無法回答「厭女情結為什麼當初會出現」這個有趣的人類學問題，以及它為什麼存在於這麼多的地方和文化中，又持續了這麼長的時間。

註26：參見克倫肖等人（2016），其中收錄了克倫肖與其他十六位社會正義領導人在選後所進行的討論的片段擷選，他們就這個問題和其他議題提供了一系列有趣的觀點。

註27：苟德和布瑞斯南（Gold & Bresnahan）於「政治」（Politico）網站上的報導中提供了警方報告的連結，可見以下網址。如果沒有特別說明，上述細節都是直接從警方報告中擷取（換句話說，幾乎是逐字稿，只有我個人在針對警方的手寫報告撰寫逐字稿時，在幾處文句

上做了句法和風格上的改變，但並不涉及內容的修正）。見：<https://www.politico.com/f/?id=00000156-c3f8-dd14-abfe-fbfbbe310001>

註28：請留意，跨性別男性所遭遇到的恐跨情結是否能被歸類於「厭跨女」情結，這要取決於我們採用的「厭跨女」定義為何。參見茱莉亞．塞拉諾（Julia Serano，〔2007〕2016）討論其作為第一個發展出此概念的理論家，她如何試著維持概念的連續性。亦可參見塔莉亞．美伊．貝特契（2007）分析跨性別男性和跨性別女性所面對的恐跨形式有何不同。我認為後者的分析和前者的討論相容。

註29：Jennifer Schuessler, “A Defense of ‘Transracial’ Identity Roils Philosophy World,” New York Times, 2017/05/19, <https://www.nytimes.com/2017/05/19/arts/a-defense-of-transracial-identity-roils-philosophy-world.html>

註30：編註：以色列法學家、政治哲學家。

第一章 威脅女性Threatening Women

嗯，當然，儘管晦暗不明，我們還是略略有些概念的——關於我們正在討論什麼。

彼得·斯特勞森

《自由與怨恨》（*Freedom and Resentment*）

「厭女情結」是一個飽滿的字眼。近日它越來越常在媒體標題上出現^{註31}，還有針對它的意思與用法的爭論也是。「我絕對不是唯一一個對厭女情結這個詞感到迷惑的男人。」湯姆·佛地（Tom Fordy）在二〇一四年七月二日刊登於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上的文章裡寫道^{註32}。佛地顯然是對的，但是並非只有男性試著掌握這個詞的涵義，更緊要的問題是，有多少女孩與女人正在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試圖應對這個實際的現象？「每一個男人的內在都有一個厭女者嗎？」佛地陰冷地提問。又，是不是真的像推特（Twitter）上的「#所有女性」（#YesAllWomen）倡議行動所主張的那般，所有女性都可能受某種形式的厭女情結影響？

本章著重於厭女情結這個概念的意義、使用以及目的。有些議題過去鮮少被分析哲學家（包括女性主義者和其他）討論^{註33}，但結果它們卻有著豐富的哲學意涵、心理學上的複雜性，以及政治層面上的重要性。因為上述與其他原因，我相信我們應該從此刻開始給予厭女情結更多的注意力。我將於第二章結尾提出基本的說明。

但你可能好奇這樣的說明有何必要，因為你可能以為「厭女情結是什麼」這個問題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根據一種如字典定義般、對這個詞的常見理解——我把它稱作「天真式理解」——厭女情結主要是個別主體（雖然不一定總是，但大部分時候是男性）所擁有的一種屬性，他們傾向對任何與每一個女性，或至少一般性地針對女性，感覺到仇視、敵意或其他類似情緒，僅僅因為她們身為女性。也就是說，一般認為，單單藉由聲稱某人是女性（無論個人或集體），且不需要考量某人特有的其他特質，一名厭女者就會產生或被激起這樣的態度。在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的情況裡（換句話說，少數的例外是可能的，例如當極少數的女性得以成功驅散他的敵意時），當這樣的宣稱結合了個人主體對於女性所抱持的背景態度，例如將女性視為令人作嘔/厭惡/恐懼的，或無心智的性物件，理應就足以激起他的敵意。因此，厭女的態度透過它們的心理本質和基礎——也就是它們「深

層的」或終極的心理學解釋——獲得整合，而根據一個文化包含與餵養厭女者以及它受厭女者支配的不同程度，該文化就有可能是厭女的。

我相信，這種對厭女情結的天真式理解在某些方面太過狹隘，在另外一些面向上，目標卻又不夠明確。儘管我同意我們應該將焦點置於與敵意有關的態度上，但我認為，我們也應該同意這類敵意的攻擊目標只包含特定的女性，或至少是特定類型的女性，不然的話，依據道德心理學中關於敵意與仇視的某些特定老套說詞，厭女情結的定義就會讓它在父權社會的情境裡——我認為這是厭女情結的原生棲地——變得罕見。這個天真式理解也無法瞄準這類反應中的子集合：也就是那些父權意識形態的副產品，而我卻認為，在此它們值得我們加以注意。因為，儘管厭女情結經常看似個人化，但它卻最適合被理解成一種政治現象。我尤其認為我們應該將厭女情結理解成一個在父權社會秩序下運作的體系，它的目的是監督與執行女性的臣屬角色，並維持男性的支配地位。

因此，在本書的第一部分中，我的目標是著手進行一個被莎莉·哈斯蘭格（2012）稱為「分析性」（analytical）或「改良性」（ameliorative）的計畫（頁223 - 225；頁366 - 368），或也稱之為「概念倫理」（conceptual ethics）（Burgess & Plunkett, 2013）與「概念工程」（conceptual engineering）（Floridi, 2011）。我會在本章提出一個針對厭女情結的改良性女性主義概念，並在下一章進一步發展。而根據此概念，厭女情結主要是整體社會體制或環境中的一個屬性，女性在其中比較可能遭遇到敵意，因為她們是身處於男性（也就是父權）世界中的女性，而且被認定未能符合父權的標準（也就是得以在這個環境裡立足的父權意識形態信條）。正因如此，厭女敵意經常會選擇性地針對某些女性，而非瞄準所有的女性。個人主體可能會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而懷有這些敵意，針對他們的態度和行動所提出的完整心理學解釋，也可能非常不同；或者另一種可能是，這類敵意的根源是出自於更廣泛的社會制度裡的行動、慣習和政策。這些敵意之間必要的共同之處，則是它們「社會兼結構」上的解釋：粗略地說，它們必須屬於一個體制的一部分，這個體制監督、懲罰、支配並譴責那些被父權視為敵人或對父權造成威脅的女性。

因此，我針對厭女情結所提出的女性主義分析，致力於強調厭女情結的政治面向，以改良這個概念，藉此使它在心理學上變得更容易解釋，也在厭女情結和性別歧視之間打造出更清楚的對比。這組分析也針對厭女情結一詞作出延伸，使它吻合女性主義者的使用習慣。這

縱然限制了我的改良性建議的修正空間，但它同時也指出，這種使用習慣有著理論上的一致性，而非隨機與臨時的。我會在第三章討論這組分析的優勢。

在提出以上說明後，讓我們來看個例子。下一節我將概述某起事件，以及後續的媒體爭議，正是這一連串事情引發了佛地撰文發表，並激起二〇一四年五月時在推特上的「#所有女性」倡議行動。近期有三起事件促使字典和谷歌（Google）裡「厭女情結」一詞的搜尋次數飆升，而它即為其中之一，在接下來的三章中，我將逐一討論這三起事件。

伊斯拉維斯塔殺人案 The Isla Vista killings

「嗨，艾略特·羅傑在這。嗯，這是最後一支影片，最後就只能這樣。明天是復仇日。」二十一歲的羅傑坐在BMW轎車的駕駛座上說著。他描述自己一直以來都必須「被迫忍受孤獨地活著、被拒絕、性欲無法被滿足，因為女孩們從來都不受我吸引。女孩把她們的情感、性和愛給了其他的男人，卻從來不給我……這讓我一直以來都很痛苦。」他接著抱怨^{註34}。他描述這些「女孩們」不喜歡他，反而「倒貼」那些「討人厭的畜生」、「那些高人一等的紳士」。「她們不喜歡我哪裡？」他相當哀傷地提問。

接著，羅傑從原本以第三人稱口吻來談論這些女性，轉為對她們說話——使用第二人稱複數，例如「你們全部」，或是說得特別明確，例如「我將為此懲罰你們所有人」。然後，他說明他將如下執行復仇計畫：「復仇日當天，我會去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全校最辣的姊妹會的宿舍，然後我會屠殺每一個我在那裡看到的驕縱、高傲的金髮蕩婦。」接下來，他又再次使用第二人稱複數進行對話：「屠殺你們所有人將會帶給我極大的快樂。你們終將看到，事實上，我才是更優秀的那個——一個真正的阿法男（alpha male）^{註35}。沒錯。等我殺光了姊妹會宿舍裡每一個女生後，我會走上伊斯拉維斯塔的街道，然後殺死每一個我在那裡遇到的人。」

羅傑準備許久的「復仇日」在他家裡揭開序幕。他刺死了公寓裡的三名年輕男性（他的兩名室友及他們的友人），接著他將他的影片上傳到YouTube，然後開車前往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阿法斐（Alpha Phi）姊妹會宿舍。但羅傑太過大膽放肆地在姊妹會宿舍宣告他的到來，導致計畫受到了阻礙。屋內的一名女性表示，他的敲門聲很不尋常，既大聲又暴躁^{註36}。當他無法進門時，他感到怒氣沖天，極為挫折，並對著他在轉角遇到的三名年輕女性開槍^{註37}。她們是該校三德爾塔（Tri Delta）姊妹會的成員。羅傑發射了幾輪子彈，其中兩人死亡、一人受傷。之後他開車離去，沿路開始了一場混亂而看似隨機的掃射，他殺死了另外一名年輕男性並使其他十三名男女受傷。當警方靠近他時，羅傑將槍枝轉向自己，並開車撞向一台停靠在旁的車子；他死在駕駛座上，他的BMW起火燃燒。

對於許多女性主義評論者來說，除了這起案件其他可能牽涉到的額外元素，伊斯拉維斯塔殺人案為厭女情結的運作提供了一個相當清

楚的案例。同時，許多人將它視為一個更廣泛的文化模式中一種極劇烈的表現形式，也就是一種更加激化的厭女情結——它往往出現在今日的美國，以及世界上其他偶爾被稱為後父權社會的表象下。

許多女性看完羅傑說明自身暴力行動的影片後，都有類似的反應。推特上隨後就發起了「#所有女性」（#YesAllWomen）倡議行動，這個名稱乃是為了回擊那些已經在社群媒體上發酵的辯護說詞，類似「不是所有男人都那樣」。以當日的標準來說，這標籤極為迅速地成為趨勢：在出現後的頭四天，該標籤在推特上的使用次數就超過一百萬次。許多推特發文來自女性，她們出來見證曾經遭遇過的男性侵犯、敵意、暴力和性騷擾；另外有些發文則記錄了一些表面上看來沒有這麼嚴重，但實際上卻有所關聯的犯行，例如各種較為隱晦的輕蔑與盛氣凌人的行為，包括男性說教。這是因為，儘管羅傑的行動很顯然處於光譜上最暴力的那個極端，但他的言詞裡卻有一些內容喚起了許多女性的痛苦過往。具體來說，就是那些話語聽起來實在有點太過耳熟能詳。

許多右派和主流評論者立刻拒絕了女性主義者提出的厭女診斷，許多人也並沒有把與其相關的「#所有女性」倡議當成一回事，這之間此往彼來，有種彷彿「是／不是」乒乓球般的節奏感。槍擊案次日，潔西卡·瓦倫提（Jessica Valenti, 2014）在英國《衛報》（*The Guardian*）上撰文寫道「厭女情結殺人」，再隔天，心理學教授克里斯·佛格森（Chris Ferguson, 2014）就在《時代雜誌》（*Time*）上回擊：「厭女情結並沒有把艾略特·羅傑變成殺人犯。」相反的，他認為羅傑的厭女情結是心理疾病、社會孤立、性挫折的產物，僅僅如此而已，「而非任何社會所『教導』給他的事情。如果他沒有這麼專注於自身性生活的不足，他的焦點可能就會是去購物商場的客人，而不是姐妹會的成員。」^{註38}同一天，勞麗·佩尼（Laurie Penny, 2014）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上提出異議：「好一陣子以來，我們總為極端的厭女者開脫，正如同所有由白人男性所犯下的恐怖主義行為都被原諒、被視為脫軌之舉，或視為由隨機的瘋子——而不是真男人——所犯下的行為，為什麼我們要否認這裡面存在一個固定模式？」

隨後，在一則不經思索的推特發文裡，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註39}看似回應了佩尼的提問——至少從某種方面來說：「要說發生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謀殺案屬於一個仇視女性的固定模式，這想法在統計上是不準確的。」他寫道。那則推特附上了一則網

址，連結至海瑟．麥可唐納（Heather MacDonald）^{註40}刊於《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文章。平克的推特發文有些撲朔難解，我們可以留意那些他成功地沒有使用到的字眼，他沒有使用「女性主義」、「不理性」、「歇斯底里」或「愚蠢」這些詞彙。令人驚訝的是，他甚至沒有使用「厭女情結」一詞。相反的，他只是提供了麥可唐納的文章連結，文章裡說了所有他沒有說的事，以及更多，正如同某些人所期待的一樣。

麥可唐納的文章有著古怪的標題：「加大聖塔芭芭拉分校的唯我論者」，標題之下的標語則恰好可以歸納文章內容：「一個反社會者大開殺戒，而且殺的男性更多過於女性，但女性主義者又再次提起她們最愛的話題。」麥可唐納（2014）把羅傑的行為輕描淡寫形容為「顯然是一個瘋子的行為……他所說的每一個字、做的每一個動作，都彰顯了瘋狂、自憐的錯覺，而這又在他錯亂的自戀心態所構築成的回聲密室裡遭到放大。」更有甚者，「這個國家裡頭，並沒有任何以性別為基礎的暴行；在這裡，逐漸浮現的模式『是』因為精神疾病未接受治療而造成的暴行。但是，」麥可唐納繼續表示（而此處我們應該留意那個「但是」），「針對羅傑的大規模殺人，女性主義者們的基本分析前提——亦即美國是一個厭女的社會——顯然是荒謬的。」事實上，「正好相反，」

我們的文化著迷於促進並慶祝女性的成功。全國沒有任何一個科學機構或實驗室沒有受到來自大學校方或聯邦政府持續不斷的壓力，要求它們聘雇女性教授和研究員，就算沒有合格的候選人，也不管那會對菁英管理標準造成什麼樣的成本。富有的基金會和個別慈善家大量炮製一個又一個針對女孩的自尊和學術成功所設計的行動方案，而儘管在學術和社會層面上越來越落後的是男孩而非女孩，男孩們卻是與慈善援助有著遙遠距離的亞軍……女孩不斷接收到「強壯的女性可以做到所有事」這樣的訊息，包括自己養育子女。如果任何一個稍稍接觸到公領域的女性沒有深刻地意識到，在要求研討會座談、媒體職位和新聞評論版面納入女性保障名額的壓力下，自己已經成為「受益者」，那她就是在自我蒙蔽。企業董事會和管理階層飢渴地尋求女性，就算這種差別待遇明天就消失，女性，尤其是那些構成女性主義者階級的坐擁特權、高教育程度女性，也依舊會面對一個有著空前與無限機會的世界（2014）。

麥可唐納是對的嗎？那些抱怨男性（性或其他方面上的）侵犯如何限制了她們的女性呢？「那些女性顯然活在一個和我不同的世界裡」，她們大概和那些被她認為「唯我論者」的女性主義者一起。

在拒絕女性主義者針對伊斯拉維斯塔殺人案所提出的分析時，麥可唐納有著許多組成參差的同伴。為了否認厭女情結在這個特定事件裡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解釋性角色，以下是評論者們所提出的一些理由：

- 在內心深處，羅傑並不恨女人；他是太過渴望女人了，而非不夠欲望她們（也就是因為她們而感到噁心、排斥或產生其他感受）。根據一個知名男權倡議者的看法，他「膜拜女陰」，而這因此讓他成了「第一個女性主義大規模殺手」（Valizadeh, 2014）^{註41}。

- 在內心深處，羅傑並不恨女人；從某個分析層面上來說，他甚至對女人不感興趣。說到底，他恨的是那些比他更能成功吸引女人的男人們。如一位文化研究學者指出，女人對他來說並不是真的^{註42}。

- 女人對羅傑來說太過真實了，他並沒有把她們視為物品，不論是在性或其他層面上。他賦予女性太多能動性、主體性，以及性自主，所以這使得他不能被看成一名厭女者。他也不認為自己理應得到和女性的性接觸，這同樣讓他不符厭女者的情況；當他無法成功吸引她們時，他並沒有直截了當地奪取他想要的東西^{註43}。

- 在內心深處，也就是在終極的心理學解釋層面上，羅傑並不恨女人；他恨女人，僅僅是因為他自戀、妄想，而且精神不穩定，或者如麥可唐納（2014）所描述的，是一個「瘋子」。

- 羅傑並不特別恨女人，或者說他不只恨女人。如他在自己的「宣言」（但更像是回憶錄）所清楚說明的，他對黑人和亞洲男性亦飽含種族仇恨（儘管他母親的家族有著中國人的血統）。另外一種說法則是，他恨每一個人，這讓他成為一個厭世者^{註44}。

- 羅傑並不恨所有女人，他甚至不恨大多數的女人。他尖酸的言詞僅僅針對「辣」女，也就是那些對他有性吸引力、但在他看來無視了他且因此使他受挫的年輕女性。然而他愛他的母親，並且直到事件發生之前，情緒上都仍然很依賴母親^{註45}。

- 羅傑的比例不對；比起女性，他最終殺了更多男性，包括他自己。因此，他怎麼可能算是厭女者（Mac Donald, 2014）？

我們可以針對上述的主張逐點進行回應——我們可以這麼做，但此刻，這麼做並不太具啟發性。對於我們這些傾向於認為辯證過程中出現了某些謬誤的人來說，我們可能希望能夠更完整地去診斷，為什麼有如此多（或多或少不合情理）的否認論述？我們也可能想要找出一個把厭女情結重新概念化的方式，而這個方式可以同時提前壓制這些（在我看來的）錯誤。我們能如何進行這件事情？有哪些指引或基本原則？

「厭女情結是什麼」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What kind of question is “What Is Misogyny?”

當像「厭女情結」這樣的詞受到質疑時，我們如何能夠解決這些和它的意義、使用方式及指涉有關的問題？針對如何一般性地回應「X是什麼？」這類問題，社會哲學家莎莉·哈斯蘭格（2012）就三個不同的取徑提出了一個有助益的區別：

（1）「概念性」（conceptual）計畫涉及了調查我們（也許是「我們」，也許是「他們」）對X的普遍性概念，通常是藉由運用演繹方法，例如反思平衡和概念分析。

（2）「描述性」（descriptive）計畫涉及調查這個詞語的延伸，也就是X這個詞彙在世界上通常會用於指涉什麼，或被應用於什麼事情之上。同時我們會問：這個主題的標準或相對不具爭議的範例之間，是否有任何特殊的共通之處？若有，那是什麼？若有，在鄰近的範疇內最自然且重要的屬性是什麼？因此我們會立即提問，當人們使用該詞彙時，他們通常看起來在說什麼？基於這個原因最為重要，因此這類計畫將會必須包含實證，亦即歸納式的調查。

（3）「分析性」（analytical）或「改良性」（ameliorative）計畫則試圖制定一個概念，使它最為符合該詞彙存在的意義^{註46}。我們會問，討論X的目的究竟是什麼？這些目的是合理或有據的嗎？如果目的超過一個，哪一個最重要？考量這點，我們是否應該把一個現有的詞語強行拆開，或把幾個不同的詞語歸併在一起？我們要如何找出一個整體的概念架構，進而能夠為解放性的政治目標，以及其他有價值的計畫提供最多支持？（2012，頁222-225）

因此，改良性（或「分析性」）計畫需要主動決定我們的文字要有什麼意涵。同樣的，如果我們想要改變這個世界，我們可能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將其概念化。當我們的討論對象是社會活動和慣習時，更是如此：作為社會的、有自我意識的生物，我們會遵守受到我們的基本概念、類別和架構所保護的規範，而當涉及他人時，我們傾向於執行那些我們不加批評的規範和期待。因為上述這些與其他更多理由，改良性計畫對於社會進展來說相當重要。

我認為，在此脈絡中，哈斯蘭格為這三個取徑所做的區分很有用，甚至相當關鍵。除了至少有意識地追求這三種不同路徑中的其中

一種，我們很難找到其他方法，以在此獲得方法論上的立足點。但同時還有一個有所幫助的作法，便是認可（正如同哈斯蘭格自己隨後所承認的）這三種計畫也有可能互補，至少在某些情境裡如此（2012，頁351-354，尤其可見353頁第23行與376頁）。比方說，一個人可能最初並不是因為擁戴傳統的演繹方法而投入一系列的概念提問，而是為了要了解一個詞語的天然目的，亦即它最適合的用法，或——以一個譬喻來形容——它的工作內容描述。這些目的隨後可能會被質疑，而這個詞彙的意義會在此基礎上得到協商。

描述性計畫也可能必須做出類似的語意選擇。一方面來說，不同群體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該詞，例如用來涵蓋不同類型的案例，或是有著較為狹隘或廣泛的應用範疇。有鑑於此，我們可能必須要判斷，哪一種語言和社會社群應該被視為權威性的。這可能經常涉及一些價值上的考量，包括政治價值，至少，從一開始我們似乎就沒有任何明顯的理由去排除政治價值。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前兩種計畫如何可能自然而然地延伸到第三種，至少當我們抱持著特定的精神投入其中之時。在那樣的脈絡下，我將先進行概念性及描述性的思考，而我最終的目標則是為「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厭女情結」提出一個改良性的建議。

前文中列出了各種意見，它們反對女性主義者對伊斯拉維斯塔一案的厭女診斷，而這些意見已清楚彰顯，某些人很明顯地接受了對厭女情結的天真式理解；根據該定義，厭女情結主要為個別厭女者們所擁有的一種屬性，他們傾向因為女性作為女性——也就是因為她們是女性——而一視同仁地，或至少非常一般性地仇視她們。此外，如果他們要被稱為真正的厭女者，這些主體可能也必須在心中藏匿著這股恨意，好提供一種深層或根本的心理學解釋。

但是，對於厭女情結的天真式理解有著嚴重的限制。某些限制是在於認識論上的考量，因為隱藏在個別主體的態度背後，所謂的深層或根本的心理學解釋，經常是無法被探知的，所以，天真式理解將可能導致厭女情結變得非常難以診斷，除非我們是該主體的諮商師（而有時即便那樣也並不足夠）。這尤其會使得女性相當難以認識厭女情結，這也表示，面對她們所可能遭遇到的厭女情結時，女性將可能被奪去必要的資源，使她們無法獲取與厭女情結表現形式有關的知識，以及合乎情理的見解，也無法在那基礎之上進一步提出正當的主張。故對於受害者來說，這個厭女情結的概念實際上將等於無聲。

有鑑於厭女情結的意涵可能扮演著某種概念性的角色，用以揀選出以性別為基礎的壓迫中最富敵意、最為有害的面向，這有可能會讓女性失去一個合適的名稱，可用於稱呼那些她們可能遭遇到的強力問題。若考量到其他相關選項的明顯不足，情況便越發如此。還有什麼其他的英文字彙表達了類似的，或蘊含相近道德重量的性別特定概念？就我所知，沒有。「性別歧視」這個詞彙一開始可能會浮上心頭，但是在我聽來，該詞彙缺少了「厭女情結」所有的敵意氣味。（我將於第三章深入討論性別歧視／厭女情結的對比。）因此，我們面臨了讓「厭女情結」這個詞彙逃離我們的風險^{註47}。

讓指控厭女情結變得難以執行，這還會造成另一個重要卻較不明顯的成本：它會讓那些遭控為厭女者但其實無辜的人難以獲得公道。如果連艾略特·羅傑都可以脫身，那麼一個「無罪」的判決（讓我們姑且這麼說）便顯得不太有意義。既然相關的犯行變得如此無法理解而罕見，那麼，辯護也就幾乎每次都能成功。

然而對厭女情結的天真式理解所帶來的問題並不僅止於此，還遠遠超出這些認識論上的考量。除了讓厭女情結成為一個在心理學上，以及進一步在形上學方面晦澀難懂的現象以外，這個理解無法包含其他解釋。

何以如此？我們可能以為，厭女情結至少有著在典型的父權情境裡往外蔓延的潛力，但在我們採用了天真式理解的情況下，我們如今便很難理解那是如何形成，以及為何形成。我先就我所理解的父權社會秩序、關係和角色的本質進行一些說明，將有助於我們了解這點。（希望我無需多說——我要做的，並不是就它們的複雜社會學概念來進行完整討論，而是就一些有用且並不太具爭議性的基本內涵進行說明。）接著我便將能指出，對厭女情結的天真式理解，基本上會讓厭女情結在父權秩序裡變得毫不普及，而我認為父權秩序乃是厭女情結（最）自然而然發生的情境。

我認定一個社會環境乃是父權的，假如某些類型的制度或社會結構不僅在這個環境裡擴散，也在其中享受著——比方說，來自國家和廣泛文化來源的普遍支持，例如物質資源、社群價值、文化敘事、媒體和藝術描寫等等。這些父權制度在物質內涵、結構以及社會特徵上會有大幅差異，但它們都會將女性置於一個臣屬於某個特定男性或身處此制度內的男性們的位置，因此（基於同樣的理由），根據他們的性別（以及其他相關的交織因素），後者之於前者有著支配性的地位。

在我們繼續討論前，有三個較為微妙而不明顯的論點值得一提。

第一，我並不認為在這個脈絡裡，臣屬（subordination）是一個成功的用詞。若依照我希望的方式來理解臣屬一詞的意涵，它可以是某種社會壓力，意圖將女性規範在特定的位置，但這個壓力可能偶爾會被擊敗，或甚至被取消（當然也可能被對立的社會壓力抵銷，因為其他以階級壓迫為基礎的體系是和性別與其他因素互有交織的），而不一定能夠「成功」。第二，某些父權結構不僅僅是男性特權的堡壘，它們更純然屬於男性，或大幅地由男性所支配。然而，我認為一般而言，這些結構需要其他來自父權結構的支持，在這其中，女性因為她們所被交付之服務工作的獨特型態而被放置於臣屬的位置（且不僅僅只有一時）。第三，這些支配與臣屬的關係對於特定的父權結構與身處其中的個人而言，往往非常局部。再一次的，有鑑於權力關係的交織性——這依照種族、族群、階級、性和障礙程度而產生，認知到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為一個男人可能身為他所在領域的主人，但在其他脈絡裡卻是臣屬的、被剝削的，或被邊緣化的。因此，一個男人並不需要（而且通常也不會）被放置在一個得以支配所有和每一個，或甚至大部分女性的位置上，他也仍然可以被視為是一個完整運作中的父權家父長；他只需要在面對某個或某些特定的女性時占有支配性的地位就好，而這通常會是在家庭或親密關係裡。從此意義上來說，父權的意識形態——我將緊接著討論由其所決定與控制的社會關係、結構和實質性角色——可能也需要所有或絕大多數的男性扮演家父長，並支配某個或某些女性，以遵守它的整體規範性願景。

然而，在一個父權文化裡，性別化社會關係的階級本質可能會與女性處於其中臣屬地位時的實質性內容產生衝突。以某些陰性屬性的照顧工作類型為例，當女性不只被交付執行某些特定的情緒、社會、家務、性和再生產勞動，更被認定要同時以一種充滿愛與關懷的方式，或滿懷熱情地執行它們時，父權的規範和期待便必須低調而安靜地操作，它們的強迫性質最好不要明說。父權意識形態獲得了一長串機制的支持，以服務這個目標，包括女性們對於相關社會規範的內化、對於女性獨特氣質和偏好的敘事，以及將相關照護工作定調為可以帶給個人滿足感、對社會而言有其必要、在道德上有其價值，並且是「酷」、「自然」與健康的（只要是由女人來執行它們）。女性遵從這些相關的社會角色時，理應要盡可能地看來自然，或看似是自由選擇的結果，例如幾個最明顯的例子便包括了充滿愛意的妻子、奉獻的母親、「酷」女友、忠實的祕書，或好的服務生等等。陰性屬性的

非正式角色亦同，例如女性經常要作為家庭、工作場所或公領域內的情緒下屬，且從事相關工作。然而，整體而言，這個無縫的表象幾乎必定是迷惑人心的，因為，一旦這些「軟性」的社會權力形式顯得不足以維持它們時，或多或少便會有一些隱晦地帶著敵意、威脅和懲罰性質的規範執行機制隨侍在側，或在背景進行操作。這些機制對女性帶來的後果大不相同，從造成生命威脅的暴力，到微妙地不表贊同的社會訊號皆有（例如當女性和她們的男性同僚一樣，在人際互動中表現直接或不輕易道歉時，人們會不自覺地微微感冒）。厭女情結的運作精髓在於，這些強迫性的執行機制對應著父權規範與期待，以及它們所管理的社會角色。我將於下一節對此進行討論。

但首先，為了理解為什麼當厭女情結和厭女者的天真式理解受到採納時，厭女情結便會在父權情境裡變得罕見，可以思考以下這點：在一個典型的父權情境裡，為什麼任何特定男性會對女性普遍地、甚至非常一般性地懷有不滿，無論他們之間的關係為何？相對的，我們反而會期待，即使最蒙昧的男性也能被某些女性所取悅，亦即那些友好地為其利益服務的女性。對這些女性抱持敵意不僅僅會帶來雙重的問題，包括在個人層面上顯得無禮，在道德上亦令人反感，同時，這也會在基本的道德心理學層面上顯得非常奇怪。直言不諱地說：如果有個女性不僅僅忠於本分，而且還滿懷愛意地迎合他的欲望，那麼，到底還有什麼好恨的？

當然，在一個典型的父權情境裡，若是這些女性剛好終究令某些男性失望了，他們可能會對自身實際上接觸過的大多數或甚至所有女性抱持著敵意，但是這無法導向一個普遍性被量化的真實主張，或甚至一個真實的、較不嚴格的概化。至少從一個心理上和社會上合乎現實的情境而言，這些量詞理當包括任何一個或大多數這個主體可能遇見的（個別）女性，而這仍然是不可能的。一個類比是：一個人即使對他一生中曾經去過的所有或大多數餐廳感到失望，他也不會就此普遍性地仇視所有或大多數餐廳。也許他剛好運氣不太好，也許他的選擇有限，或受到了挫折。當有一間餐廳是專門設計來取悅他的，亦即迎合了他所有的興趣和胃口時，若他仍仇視這間餐廳，這很難不令人感到驚訝。

於是，讓我們想想艾略特·羅傑吧。很有可能並且絕對可以理解的情況是：當他面對的，是給了他所渴望的注意力和情感的女性時，他並不會抱持敵意；事實上，對於身處如此一般性社會位置的男性來說，賦予這樣的女性價值或「崇拜」她們，會是很自然的事。於是，

這樣的一名男性，將無法滿足前言所述之普遍性的量化主張，甚至無法滿足一個較不嚴格的概化，因為他會對多少女性抱持敵意，結果可能隨著偶然的社會條件而大幅變動。若他有可能對他的狀態感到滿意，並因此只對相對少數的女性抱持敵意，那麼，根據前述的天真式理解，他就不符合厭女者的資格。但是有多少男人（遑論女人）可能符合呢？假如唯一符合的主體必須持續（不間斷且任性地）反咬那雙安撫並服務他們的手，我們猜想這樣的例子可能會非常罕見。因此，對厭女情結的天真式理解，便會遇到經典的「沒有真正的蘇格蘭人」（no true Scotsman）問題（或者說反對），「真正的厭女者不會……」，這樣的辯護將幾乎隨處可見。

行文至此，我認為，對厭女情結的天真式理解是不恰當到無可救藥。對於這個英文裡唯一一個（如我們很快會理解到的）越來越常被用於指涉一名女性需要為其命名的問題的字眼來說，這是種浪費。這個詞彙最初就是為了因應這個目的而被創造出來的——由十七世紀的英國女性主義者所創，用以反擊文藝復興青年約瑟夫·史威南（Joseph Swetnam）對女性做出的道德「毀謗」，而這導致如今反女性主義者不經意地挪用這個詞彙並過濾掉它的政治意義^{註48}一事，顯得更為諷刺。根據天真式理解，厭女情結基本上成為一個太過心理主義的概念，它建立在一種恐懼症或深層厭惡的模式上。它成為一種心理學上的不健康或不理性狀態，而非社會權力關係的一個系統性面向與一個可預測的表現形式，以用於顯示出主宰它們的意識形態：父權。

厭女情結可能是什麼 What misogyny might be

在此，我們可以藉由提問而重新開始：考量前述內容，我們自然而然可能期待的厭女情結會是什麼樣子？換句話說，那股導向女性的敵意和憤怒（就算不完全是，但至少一定程度是因為她們的性別），它們之下的天然基礎會是什麼？而其中哪些可以用來理解，厭女情結如何作為父權意識形態的面向或表現形式之一？考量到父權文化裡某些女性的社會角色是作為提供男性注意力與關愛的臣屬者，這指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明顯可能性：若察覺到女性反抗、破壞了用以定義這些社會角色的規範和期待，正好便有可能自然而然地引發這類反應。還有什麼可以比從一個體貼而關懷的臣屬角色叛逃這點，為敵意和憤怒提供更天然的基礎？我們可以預期，這會讓典型的性別既得利益者（也就是男性）同時感到被奪權與被忽視，而從情緒上來說，這個組合可能會招致大禍。

模擬一個簡略的實例可能有助於我們思考。想像一個人在餐廳裡，他期待自己不僅要獲得恭敬的對待——顧客永遠都是對的，他所點的餐點更要被殷勤地奉上，還要伴隨一個笑容。他期待餐廳令他感覺受到照料且與眾不同，同時他的餐點會被送到面前（這對他來說，是一個有點弱勢但同時又富有權力的位置）。現在，想像這個客人感到失望——因為他的服務員並沒有在服務他，雖然那是因為她正在招呼其他桌的客人，或者，也許她看來像在懶散地四處閒晃，或單純在做她自己的事，因為不明原因而忽視了他。更糟的情況是，她可能看似在期待從他身上獲得服務，使兩人的角色發生了令人困惑的反轉。不論哪一種情況，她表現出來的舉止態度都不是他在這類情境中所習慣的。我們很容易能夠想像，此人會變得迷惘，進而怨懟；我們很容易能夠想像他用湯匙敲擊餐桌；我們很容易能夠想像他的挫折感爆發。

很顯然，這只是一個簡略的例子，但我認為這確實為進一步的闡述和延伸奠定了一個大有可為的基礎；我們第一次看到了一個容易理解的情況，關於近似仇視和敵意的態度可能如何被激發出來，同時因為女性的性別以及——在此案例裡——因為認為她破壞了父權的規範與期待。此外，如果我們同意這是一個有效的例子，這例子也告訴了我們，厭女情結不必是什麼。一方面來說，它不需要針對所有的女性，相反的，它可以只針對特定的女性，例如那些被看作不服從的、怠忽職守的，或違反規則的女性；另一方面，這個模型終結了一種想法，亦即認為厭女情結和性渴望從某種角度來說並不相容（儘管怪異，但

如我們所見到的，這個想法並不是沒有人擁護）。羅傑對阿法斐姊妹會女性成員的性渴望，以及他希望她們也可以欲望他的渴望，在他憤怒的醞釀過程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表示，面對她們，他感到無力。從他的角度看來，她們「掌握」了他，而他對於即將發生的羞辱感到深刻的憤怒，就如同一個飢餓的用餐者，他所感受到的弱勢地位很有可能導致他對無故擅離職守的服務員暴怒。

這個模型也針對某些典型的厭女情結攻擊目標和受害者提供了初步的預測。前者將囊括那些被認定不稱職的女人——性別理念的叛徒、壞女人和「難以控制」的女人^{註49}。因此，厭女情結的受害者經常會包括那些進入了之於男性而言具有權力和威信位置的女性，以及那些避開或選擇逃脫以男性為依歸的服務角色的女性。在這其中，一個自然的攻擊對象就會是女性主義者（想不到吧）。

延續著這個思路，讓我們思考女性主義作家琳蒂·魏斯特被網路酸民騷擾的經驗，這名騷擾者事後表示了懺悔^{註50}。以下是一段來自魏斯特數年後與該名男子的訪談節錄，他以一種不常見的坦率和洞見，解釋了自己當時的思路：

男子：當你談論到，你因為你是誰、你在哪裡與你前進的方向感到驕傲時，那有點為我的憤怒添了一把柴火。

琳蒂·魏斯特：好的，所以你看到了我的文章。你看到了我的文章，然後你不喜歡。

男子：其中某些方面。你用了很多大寫，你就是非常……當你寫作時你幾乎沒有任何恐懼。你知道嗎？就好像你站在書桌上，然後說：「我是琳蒂·魏斯特，這是我的信仰，假如你們不同意我，去你們的。」即使你並沒有真的用那些字眼，但我就覺得，「這個自以為她什麼都知道的賤人是哪位？」

琳蒂·魏斯特：我問他，是不是因為我是女人，所以他這樣覺得。

男子：喔，絕對是，絕對。現在女人在寫作時比較直截了當，她們說話或寫作時沒了膽怯的姿態，她們就這樣大聲說出來。我覺得那……我覺得，對我來說，也是一樣，最初那是很具有威脅性的。

琳蒂·魏斯特：嗯，你一定知道——那就是我為什麼這麼做的原因，因為人們並不期待聽到女人那樣說話，而我想要其他女性看到我那麼做，我想要女性的聲音變得更大。

男子：我了解，我了解。問題是，我整天都和女性一起工作，我對任何人都沒有意見；我那時候會告訴你，如果有人對我說，「噢，你是一個厭女者。你恨女人。」我會說，「才不，我愛我的母親、我愛我的姊妹、我愛我的——我這一生有過的女朋友。」但你不能一邊說你對女人沒有意見，一邊上網侮辱他們，把她們抓出來然後在情緒上傷害她們。

我以為事情正是如此。厭女者可以愛他們的母親，更別提他們的姊妹、女兒、妻子、女友和祕書。他們不需要恨所有的女性，或甚至絕大部分的女性；重要的是，他們傾向於恨那些直言不諱的女性。

毫無疑問，某些人會抗拒我剛剛所提出的想法。某些人可能會堅持，厭女情結必須是因為女人的身分而仇視她們，而且沒有進一步的原因，故而厭女情結不能只是針對某些女性。但我找不到什麼理由來支持這個概括性的堅持。而我懷疑，它的基礎來自於無根據地假設厭女情結必定與最常被預設的（雖然在歷史面向上往往並不正確）反猶太主義形式十分相像，而反猶太主義顯然針對的是整體所有的猶太人民^{註51}。但是，為什麼這種壓迫形式就該被視為標準範本？為什麼我們無論如何都該接受這個，讓我們這麼說吧，「範本中的範本」？以性別為基礎的壓迫可能在某方面自成一格，或者它可能為其他形式的壓迫提供一個有用的範例，我將在第五章簡短討論其可能性。

無論如何，把父權意識形態的目標看成清除世界上的女性，或是從某種直觀的角度來說，將女性放逐到貧民窟，是不太有意義的。女性被徹底整合入典型的父權家戶之中，被賦予各種關鍵的家務、社會、情緒與（異性戀）性服務工作，這樣的女性對於支配者而言有太多用處了。這使她們變得不可或缺，甚至也無法在空間上被隔離，因為這會讓她們無法為支配者的需求和利益提供服務。

雖然厭女情結的攻擊目標會因此變得不是所有女性，但這不代表「#所有女性」倡議行動的論點是錯的——也就是，幾乎每一個女性都有可能受到厭女者的威脅和懲罰。因為有一個可能，在於除了被認定或實際對父權規範與期待造成破壞以外，還有單純象徵性或代表性的破壞，而一個女性會被迫為其他女性可能的罪責付出代價。

更廣泛地說，我相信厭女情結的控制可能也超出了它所及的範圍，因為它的企圖乃是藉由將某些女性看作其他人的替身或代表，遂行「打沙包」（punching down）的作為——也就是仗著她剛好在那裡

或可能缺少資源（例如在親密伴侶暴力的脈絡下），故而在她身上發洩來自他處的挫折感，以重建父權秩序。

就我後續的目的來說，最重要的是，小小地破壞規則可能會被不成比例地放大，然後用來暗示一名女性的人格中有某種必須被譴責的東西。他人可能聲稱她違反承諾、說謊，或背棄了「她」那一部分的協議，因此她強烈地不可信賴、欺騙他人、不負責任等等。如果我們努力搜尋，我們經常可以在一名女性的行為裡找到一些（或多或少）名義上支持這類抱怨的基礎，但被違背的承諾和未完成的協議卻是父權體制以她之名所進行的不正當作為。

這解釋了在伊斯拉維斯塔殺人案後，女性主義診斷所遇到的反對意見之一，亦即艾略特·羅傑的攻擊目標和受害者（分別）都沒有真正地違背與他有關的父權規範和期待，她們僅僅「代表」了那一類他覺得忽略並羞辱了他的女性。那些被他針對的加大聖塔芭芭拉分校阿法斐姊妹會女性成員事實上從未有過機會給予他任何注意力，因為，即使他曾經跟蹤過她們，他也從來沒有對她們介紹過他自己。

然而，這是否代表羅傑有妄想的狀況，因此就能駁斥女性主義者們在他的案例中所做的診斷？答案是否定的。我將會在下一章中指出，厭女情結經常涉及這一類的妄想，即使是最不容置疑地會受到道德批評的主體們，都確確實實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

為了提供說明，拉許·林博（Rush Limbaugh）出場了。

註31：針對厭女情結一詞如何自二〇一二年起在新聞標題中的出現次數逐漸增加，尤其在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地，可從 Google Trends 的圖表中取得證據：<http://www.google.com/trends/explore?q=misogyny>；（分別於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和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兩次擷取數據，確認此趨勢持續發生）。

註32：Tom Fordy, “Is There a Misogyny Inside Every Man?” The Telegraph, 2014/07/02, <https://www.telegraph.co.uk/men/thinking-man/10924854/Is-there-a-misogynist-inside-every-man.html>

註33：為了對此提供簡短的說明：在書寫的此刻（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當我在 philpapers.org 網站上就厭女情結（misogyny）和厭女者（misogynist）兩詞進行搜尋時，總共分別獲得六十七和三十一筆結果。但這些著作中，大部分討論主要針對某些重要人物是否算是厭女者。（不意外的，針對尼采便有這樣的提問，但同樣的討論也常見於艾里斯·梅鐸〔Iris Murdoch〕和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身上。）這些概念在當前的分析女性主義哲學文獻中也並非一個重要的考量規則。以三名分析女性主義哲學家代表為例，她們的著作在我發展分析時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莎莉·哈斯蘭格（2012）的《抗拒現實》（*Resisting Reality*）一書中，「厭女情結」一詞與其變形僅僅在討論具有厭女內涵的歌詞範例時出現（頁387 - 389）；在瑞·朗頓的《性唯我論》（*Sexual Solipsism*）（2009）中，這

個詞則出現六次，但多是順帶一提。不過朗頓在她唯一一次探討厭女情結的原因論時提出了重要的看法，我稍後將在第三章中進行討論。

我們自然而然可能會揣測，瑪莎·納思邦（2011）的《物化與網路厭女情結》（*Objectification and Internet Misogyny*）中會針對這個概念有更多討論，但出人意料的，儘管該論文就物化提出了很多我所認同，並將於接下來的章節中援引的內容，「厭女情結」一詞與其變形除了標題之外就只出現了一次（如果我沒有算錯）。據上所述，目前在分析女性主義哲學的文獻中，並沒有很多著作直接就我的開篇提問「什麼是厭女情結？」進行討論。好在有許多著作（包括前面所提到的文本與其他）從不同角度闡述這個議題。我認為在此議題上特別有所啟發的一些經典女性主義文本包括了：安德里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的《恨女：對性的積極檢視》（*Woman Hating: A Radical Look at Sexuality*）（1976）、凱薩琳·麥金儂的《女性主義本色》（*Feminist Unmodified*）（1987）、派翠西亞·希爾·柯林斯的《黑人女性思考》（*Black Feminist Thought*）（2000）以及蘇珊·法魯迪（Susan Faludi）的《反挫：誰與女人為敵》（*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2006）。針對厭女情結多元表現形式中的一些可能性，以及各種相關並交織的壓迫和支配體系，也可以參考序言的註釋4，針對與這些議題相關的豐富文獻，我提出了一些建議的切入點。

註34：該影片隨後從YouTube上被移除，但網站democraticunderground.org上可找到影片逐字稿：<http://www.democraticunderground.com/10024994525>（內容於二〇一五年四月四日擷取）。羅傑之前也曾拍攝其他類似影片並上傳YouTube。許多評論者則試圖在羅傑所謂的宣言《我的扭曲世界》（*My Twisted World*）中進一步探索關於其思路和動機的證據。該宣言於事件發生後被公諸於世，我也將在第五章中援引其中內容。宣言內容可見：<http://s3.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1173619/rodger-manifesto.pdf>（內容於二〇一五年四月四日擷取）。

註35：編註：另一說為「至尊男」。

註 36：“Timeline of Murder Spree in Isla Vista,” CBS News, 2014/05/26, <https://www.cbsnews.com/news/timeline-of-murder-spree-in-ista-vista/>

註 37：“Thwarted in His Plan, California Gunman Improvised,” CBS News, 2014/05/25, <https://www.cbsnews.com/news/thwarted-in-his-plan-california-gunman-improvised/>

註38：照此邏輯，若羅傑是男同志的話，那他大概就會去敲一個兄弟會宿舍的門。那如果羅傑是女人呢？他的性別有可能在此造成任何不同嗎？在佛格森的分析上，我們並不清楚是否有這個空間。

註39：編註：知名實驗心理學家、認知科學家、語言學家，目前為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二〇一六年入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註40：編註：美國政治評論員，以其世俗保守主義的立場為人所知。

註41：羅傑也活躍在男性權益網路論壇上，例如「仇視搭訕藝術家」（Pick-Up Artist Hate），雖然這類社群和魯之·瓦礫札德（Rooj Valizadeh）自己的部落格「王者回歸」（Return of Kings）（<http://www.returnofkings.com>）相當不同；瓦礫札德在部落格上宣揚上述信仰。前述社群的主要訪客是那些氣憤地反對「搭訕藝術」（也就是那些經常使用各種操縱技術來「搭訕」女性的男性「玩家」們所進行的「遊戲」）的人，但搭訕藝術卻為後者所擁護。

註42：戴克斯特·湯瑪斯二世（Dexter Thomas Jr.）寫到：

近來我們聽到很多關於艾略特·羅傑可能厭女的討論，有些人說這宗殺人案是一起仇恨犯罪，另外一些人則偏好將對話導離女性這個主題。這是公平的作法，因為說真的，艾略特完全沒有提到女人，他在說的是男人……除了他的直接家庭成員以外，女人對艾略特來說無關

緊要。艾略特把女人描寫為平板、沒有面容的角色，她們鮮少有名字，而且從來沒有人格。事實上，艾略特花在描述女性上的時間，跟他用來描述他新買的BMW三代差不多。

請注意，湯瑪斯最終似乎仍舊承認，羅傑的書寫中具有明顯的厭女情結。但另一方面，他始終沒有撤回他開頭的論點，亦即在槍擊案後，女性不應該是討論的主要焦點，因為在某個層面上，事件並不真的與她們有關。我將於第二章討論這一點。

註43：在一篇批評女性主義者的厭女情結診斷太過簡化的文章中，梅根·道姆（Meghan Daum, 2014）寫道：「羅傑不僅不是一個強暴犯，他渴望得到女性的愛這一點更顯示了，他甚至沒有把她們物化，而是崇拜她們到了一個令人無法忍受的痛苦程度。」甚至，「他的問題不在於拒絕，而是分離……〔他〕不屬於任何群體，考量他所有的既得利益，他事實上是擁有權利的相反。他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人。」接下來，我將會指出，借用麥可·基梅爾（Michael Kimmel, 2013）的概念，羅傑表現出的是一種權利受侵害的心態。

註44：凱西·楊（Cathy Young）於《理性》（*Reason*）網站上指出：

針對羅傑的心態，「厭女情結」是一個非常不完整的解釋，最好的描述也許是，伴隨著心理變態的惡意型自戀。他的「宣言」清楚顯示他對女性的仇視……只是對人性整體概括性仇視中的一部分，而且也對應著他針對那些擁有成功浪漫關係和性關係的男性的仇視……有些人可能會說，因為那些男人可以和女性發生性關係而你無法，故而仇視他們，仍然屬於厭女的一種形式，但是那感覺像是一種過度延伸的作法，讓這個概念變得沒有意義，或是把它變成一個沒有辦法被證明為錯誤的、類宗教式的教義（2014）。

註45：若想概略了解在社群網站上有哪些論點經常被用於反對女性主義者對伊斯拉維斯塔一案的分析，可參考以下摘錄，這些是在柴克·雄費爾德（Zach Schonfeld）刊登於《新聞週刊》（*Newsweek*）文章下的評論，雄費爾德認為這確實是厭女情結：

PT：錯。他因為漂亮女人無視他而痛恨她們，但他無視那些普通的或更不如的女性，他並不恨所有的女人，他不恨他媽、他的女老師，等等等等。他也恨他的中國室友，但難道他恨所有的亞洲人嗎？在表達對他的憤怒時，你應該要精準一點。

SA：他恨每一個人。

GB：被殺死的六個人裡有四個是男人。

AJ：如果他這麼恨女人，為什麼他刺死跟槍殺的大多數是男人？

“Misogyny and Mass Murder, Paired Yet Again,” *Newsweek.com* 臉書（Facebook）粉絲專頁，2014/05/28，<https://www.facebook.com/newsweek/posts/101524437227756101>

（以上姓名都已經過編輯並以字首取代全名）

註46：雖然為了行文清晰，我在此將使用後者，但這兩個標籤實為同義詞。

註47：比較米蘭達·弗里克（2007）提出的詮釋不正義（hermeneutical injustice）概念，也就是當人們缺少概念性資源去了解 and 明確表達他們的社會經驗（第七章）。此處的問題比較不在於不足，而是主動嘗試去把女性一直以來已使用得相當成功的一個詞語從她們身上剝奪，我們隨後會討論到這點。

註48：「厭女情結」大概最適合被看成不知名的女性主義者為了回應史威南所撰寫的反女性小冊而發展出來的一個新詞（或者講得遠些，這個詞是從數個散落的古希臘文文本中重新被引進英文的）；可參考本書開篇與結尾章節的題詞。

註49：一個女性藉由抗拒父權壓迫而變得「不稱職」，針對這個概念，根據包括哈斯蘭格（2012，第七章）在內的某些關於如何做女人的討論，我們可以進行半字面上的詮釋。根據她對性別的分析性或改良性說明，做一個女人的內涵就只是於其認同性別或實際生理性別基礎方面，在社會上臣屬於男性。然而，如同哈斯蘭格自己隨後承認的，她的說明至少需要一

些修正，好還給跨性別女性的經驗一些公道。可參考凱瑟琳．詹金斯（Kathryn Jenkins, 2016）的討論與塔莉亞．美伊．貝特契（2013）所提出的另一條路線。

註50：這名男性所做的各種事情包括了在推特上冒充琳蒂．魏斯特不久前去世的父親。他諷刺性的個人簡介裡寫著：「一個白癡的難堪父親——不過其他兩個孩子還可以。」這裡的「白癡」指的是琳蒂。“If You Don’t Have Anything Nice to Say, Say in in All Caps,” This American Life, 第五百四十五集，首播日期為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可見：
<https://www.thisamericanlife.org/545/transcript>

註51：參考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其知名著作《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中對阿道夫．艾希曼的評價：「讓他不恨猶太人的『私人原因』之一是他家中的猶太人……『我個人對猶太人沒有任何仇恨，因為我的父母給予我的教育是嚴格地遵守基督教義，而我的母親，因為她的猶太親戚，她有著和眼前親衛隊圈子非常不一樣的想法。』他接著花了很多時間證明他從來沒有對他的受害者們抱持任何不好的觀感。」更有甚者，

假如艾希曼沒有這麼一板一眼，或是警察詰問時沒有這麼小心慎重（並沒有進行交叉詰問，這麼做的理由可能是因為詰問者想要確保他的合作），他的「缺乏偏見」也有可能另外一方面顯現出來。在維也納時，艾希曼非常成功地強迫了猶太人離開該國，而當時他似乎有著一個猶太情婦，一個他在林茲時有過的「老情人」。「Rassenschande」一字的字面翻譯為「種族玷汙」，但是在納粹的詞彙裡，這個字單純表示和猶太人進行性行為，而這大概是納粹親衛隊成員所能犯下的最嚴重犯罪。儘管在戰時，強暴猶太女孩成為前線軍士熱衷的休閒活動，但和猶太女性交往在高階的親衛隊軍官中絕不普遍。（Arendt, 1963，頁30）

我們也要考慮的是，在一九三三年前，猶太人在德國社會中特別成功而且融入，相比起來，其他許多歐洲國家內的猶太人則處於就業不穩定和被邊緣化的情況。包括阿默斯．埃隆（Amos Elon）和高茲．阿里（Götz Aly）在內的歷史學家近期（分別）指出，因為如此，在激發強烈的反猶太主義的過程中，德國社會內感覺猶太人「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的心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見第五章，註釋40。

第二章 改良厭女情結的解釋 Ameliorating Misogyny

哲學家至今僅僅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了世界；重點是改變它。

卡爾·馬克思 (Karl Marx)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Theses on Feuerbach*)

拉許．林博評論珊卓．福魯克 Rush Limbaugh on Sandra Fluke

右派名嘴拉許．林博並不是以對女性主義者的友善態度而出名的，然而儘管如此，當他於二〇一二年二月在自己的每日電台節目上針對珊卓．福魯克做出以下評論時，厭女的指控還是給他帶來了大麻煩：

當女大學生蘇珊．福魯克〔原文如此〕來到國會委員會前，然後她基本上說的是我們必須要付錢讓她做愛，這說明什麼？這代表她是什麼？這代表她是一個蕩婦，對吧？這代表她是一個妓女^{註52}。

福魯克——她當時其實是喬治城大學的法律系學生——在民主黨眾議院成員前主張，在宗教機構裡，健康保險仍應給付避孕措施。林博自然而然地導出結論，福魯克是在要求當她沒有辦法自己負擔足夠的避孕用品時，林博和美國納稅人要為她的性生活買單。因此，他說福魯克是一個「蕩婦」和「妓女」——「侮辱性的字眼選擇」，他後續承認，並補充說明這些字眼的用意乃是要「表達幽默」^{註53}。但此時林博看來卻徹頭徹尾無法決定自己要用什麼比喻：

那代表我們是什麼呢？我們是皮條客（中斷）。嫖客？我們會是嫖客嗎？不，我們不是嫖客（中斷）。是的，沒錯，皮條客不是正確的用詞。好，所以她不是「蕩婦」，她只是「很隨便」。我收回那個詞。

但林博沒有收回那個詞很久。才不過隔天，他就再次於節目上稱呼福魯克是一個「蕩婦」。最終，他撤回了這個主張，發表了道歉：「在就這個情境提出類比的時候，我選擇了不恰當的字詞。我並非有意對福魯克女士進行人身攻擊。」^{註54}

這帶我們來到了一個重要謎團，這個謎團與厭女情結的病原和攻擊目標有關。它怎麼會經常如此地充滿妄想？又是為什麼會如此？人們怎麼會根據這樣顯然薄弱的基礎，就對那些他們並非親身認識的女性懷著看來如此個人性的怨恨，或引發其他人這麼做？而且很明顯的，林博指望他的謾罵對他的聽眾而言不僅清晰易懂，還更有吸引力。

林博對福魯克的評論明白地暴露了這個謎團^{註55}，但也同時幫助我們解開了它。林博所選擇的意象中有一個發人深省的面向，在於這些意象讓他可以把自己和他的聽眾投射其中。他描繪了一名明確地表達一項需求、主張其應得的權利、理所當然且堅決的女性，同時將福魯克描繪成從他們——特別是納稅人——身上理所當然要求某樣事物；不只如此，她要求他們為她買單，好讓她可以沉溺於性交之中。客氣一點地說，這很牽強，但它得以讓林博把福魯克描述得好像對他們有所虧欠。讓我們回想林博後續在「被福魯克提供性服務」（也就是作為「嫖客」）和「福魯克成為他的下屬」（也就是讓他自己成為「皮條客」）兩種意象間的游移不定。林博一度提出了以下這個小小的安排；福魯克可以拿他的錢——只要她把性交過程的影片發布在網路上：

我們被玩弄了，儘管我們都沒有當面見過她！福魯克女士，你有沒有聽過不要做愛呢？所以，福魯克女士，如果我們要坐在這裡，如果我們要成為這件事情裡的一分子，那我們得有些回報：不如把所有的性愛影片公布在網路上，好讓我們能看看我們到底在幫什麼買單^{註56}。

這段話引人注目，一部分是因為跟艾略特·羅傑的告白影片一樣，它從第三人稱轉變成第二人稱的對話，或者說，指控。但是林博在和誰對話？似乎連他自己都察覺到，感到自己被一個自始至終的陌生人「玩弄」了的奇怪之處。

我相信，這個謎團的部分解方是要認知到女性的臣屬地位把她們放置於功能性和關係性的條款之下（Haslanger, 2012，頁57-63）。前一章裡提到，根據父權的意識形態，女性經常被期待去扮演一個臣屬角色，給予男性注意力和關愛——用譬喻來說的話，就好比不斷對支配者投以愛慕的眼光。因此，女性在男性面前的行為會被過度嚴重地看待（被男性本身，或是更甚，被他人以男性的名義），這便是深植於父權性別關係內的本質。因此，女性的冷淡等同於厭惡、不知情等同於刻意忽視、經驗分享等同於嚼舌，而要求就等同於勒索。

若要解決這個謎團，我認為另一個元素則是要留意到，（個別）女性如何經常被認為能夠代表一種特定類型女性，且能夠互相替換。因此，女性可以被單獨挑出來看成代表性的攻擊目標，然後在想像中代理一大群他者^{註57}。因此，艾略特·羅傑在他所謂的宣言裡宣示他的意圖：「我會攻擊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裡最辣的姊妹會成員，這些女人正好代表著女性性別裡我所痛恨的每一件事。」而林博則稱呼

福魯克為「一個典型的自由派代表」。但這些被迫成為代表的女性卻不需要展示自己具有任何她們所代表的女性類型特質，例如自私、孩子氣、想要讓人類史上的墮胎數量達到高點的跋扈「女權法西斯」。事實上，某些時候的關鍵在於她們並未具有這些特質，因為這類女性根本不存在。

在這每一個例子裡，屬於敵意一類的態度皆扮演了顯著角色，包括怨懟、惡意、反感，和各種威脅性或懲罰性的傾向。如果這些例子可以提供任何指引——而依據哈斯蘭格（2012）對描述性認識的看法，它們理應可以——那麼，厭女情結經常包含了某些被斯特勞森稱為「人際型」的反應態度。正如前言所討論到的，這些態度某種程度上只發生在我們和其他成熟、自主、精神健全的人類同胞互動之時，而且應該要包含「所有在本質上個人化的敵對情感」（Strawson, [1962] 2018, 頁11）。因此，它們有可能會被提升至第二人稱，但很多時候，似乎是第二人稱複數。讓我們回憶羅傑的話：「我將會為此懲罰你們所有人。」從很多方面來說，這似乎是厭女情結的典型情緒，它是懲罰性的、怨懟的，而且是個人的，但卻不特定指向某個對象。這類態度的心理目標可能和實際的受害者不太相似；相反的，它們往往只指向一個粗略合成的女子樣貌，而這個樣貌被黏貼在一個真實的臉孔上。

某些人曾告訴我，這可能可以為我們提供一點樂觀的基礎。他們的看法是，就分析上而言，厭女情結並不真的和它的女性受害者有關（例如可參考Thomas, 2014）。但首先，為什麼他們會如此認為？相較之下，換成反猶太主義以及其他種族與族群仇恨的形式時，一般而言並不會被視為一種深層或基礎的心理學解釋。想像有一個人指出希特勒在內心深處並不真的反猶太人，他只是因為自己缺乏藝術天分而感到不安，而且吸了大量的鴉片跟冰毒（甲基安非他命）。儘管事情看來確實如此，而且可能並不意外地在關鍵時刻導致了逐漸加劇的惡意，但在之後指出希特勒並不反猶太，這份說詞顯然並不值得受到重視。然而，當事情針對厭女情結的時候，類似說法卻很常見。傾向去挪用厭女社會力量的那些人們有著各種焦慮以及其他心理跟社會適應問題，這件事情本身並不讓人驚訝，但這如何能夠減緩女性所面對的問題？當一個人的身體就是她的肖像時，一燃俱燃。

這說明了，改變討論的焦點可能會對我們有所助益。與其從那些被指控者的角度來概念化厭女情結或隱晦地這麼做，我們不如開始從它的攻擊目標或受害者的觀點進行思考。換句話說，討論厭女情結

時，我們可以聚焦的，是女性在探究這個社會世界時所面對的敵意，而非（優先考慮）男性和特定女性接觸時可能有或沒有感受到的敵意——不論那是否有一種深層的心理學解釋，或甚至有沒有任何原因（隨後我會就後者的可能性進行更多討論）。

這樣的思考態度會包含以下的好處：

（1）避免了心理主義，卻不否認厭女情結的敵意「意味」，或它可能包含來自個人主體的敵意態度，儘管不一定非得如此。它可以幫助我們統合厭女情結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例如，透過盛氣凌人或失望的厭女者，以及透過個人主體或全然結構上的機制）。

（2）避免了個人主義，藉由認可到社會慣習、制度、政策等也可以表露出對女性的敵意，例如營造一個「敵意的工作環境」或一個「不友好」程度不一的社會氛圍。以及，

（3）從認識論上來說，這讓我們在此更有能力處理厭女情結的議題，而且是透過一個有意義的方式，因為我們可以指出，一名理性的女性會針對厭女情結採用什麼樣的標準。或者更準確也更好（因為比較不是從健全主義〔ableist〕出發）的是，我們可以詢問，在一個理應要融納女孩或女性的環境裡，她們是否會合理地將其中某些遭遇、面向或慣習詮釋為帶有敵意的^{註58}？這種作法將不同於進行心理學研究好蒐集主體的意圖，或必須以他們的說詞為憑。

有鑑於前述已然指出，個人的厭女情結通常包含了負面的人際型反應態度，這說明了，針對我此處所發展的看法，我們可以如何先發制人地提出一個無可避免的反對意見。因為，如今我們自然會好奇，我對厭女情結的看法要如何能夠避免心理主義和後續的認識論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我之所以反對天真式理解的部分原因。我們要如何得知某個表現出怨懟、惡意的人是真的在內心深處感到怨懟，還是單單感到（比方說）焦慮？

答案是，基於討論焦點從厭女情結的主體轉移到了受眾，所以此處的重點並非在其內心深處，而是就在表面。因為儘管我確實想要堅守怨懟和不贊同等反應對厭女情結本質的重要性，但我也想要用比較不那麼心理主義的方式去理解這些態度，比較不去強調「態度」的部分，而是更著重於「反應」。這些是女性在探索她們的社會環境時會面對的反應，同時，當她們遭遇著各種限制時，也影響了這些反應可以如何被合理詮釋（如我在前述第三點內更為直白的說明）。因此，

依循這個思路，那些被表現出來、卻沒有被有意識地覺察到的敵意，即可被看作真實的敵意；主體對於其自身行動的社會意義並沒有壟斷權，而儘管他們的意圖對此有所影響，也幾乎無法以意圖斷言一切。

因此，在後續對厭女情結的分析中，一個厭女的社會環境可能會、但卻不一定源自於個別主體的偏見；它反而可能是一個結果，來自於某些人感受到了不太完整的不自在和敵意，因為任一種根深柢固的社會規範體系某種程度上正在遭到拆解。抗拒或藐視性別規範與期待的女性有可能隨後便會獲得猜忌和驚愕，這不太是因為她們挑戰了特定的性別規範本身，而僅僅只是因為，她們挑戰了根深柢固的規範。對某些人來說，女性主義尤其深刻地破壞了他們對社會秩序的認知。這麼說吧，他們對那些破壞或威脅了性別化社會階序的女性所展現出來的敵意，和他們在理論上作為一個平等主義者並不衝突；就算作為平等主義者，他們仍舊可能把那些不願意將自身力量用來服務男性利益的有權女性視為惱人的、帶有威脅性的。由於這個關鍵原因，一個厭女的社會環境，部分便有可能來自於一定程度上懷有善意的人們出於被否認的情緒而表演出的行動，或是他們短暫地展現出自己沒有意識到的憤怒。而確實，之所以表演出這樣的憤怒，一部分可能是為了取代感受它：「表演出來」（*acting out*）一詞在這個脈絡裡有其涵義。

此外，厭女情結可能是集體（或「群眾」）活動的產物^{註59}。這樣的敵意可以激起更多它所傳達的情緒，但這樣的活動經常是四散且雜亂的，而且也沒有協調到足以被視為一群貌似真實的群眾主體的行動。厭女情結也可能是制度和社會慣習的產物，它們有著意味深長的價值，並對那些在某些方面無法或拒絕聽從命令的女性傳達了某些事。有時候，這些制度和社會慣習（包括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厭女元素在此刻早已大幅退化；但有些時候，它們可能會被比較有權力的人加以倡導或復興，在激進的社會運動獲得成果之際，這些人利用了無權者之中常見的不安全感，以及權利被剝奪的感受。這些有權者是否單單只是趁勢或犬儒（亦即企圖贏得選票和提高支持率），還是確實認同他們所兜售的毒藥，從我接下來分析厭女情結的角度而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對厭女的社會運動所作出的貢獻，也就是他們根據父權律法與秩序來監督和懲罰女性的程度。由此看來，艾略特·羅傑和拉許·林博的成果超出水平，因此可以在接下來的分析中被看作厭女者。

一個改良的、交織性的提議 An ameliorative, intersectional proposal

在一定程度上，改良性計畫具有規定性的本質，但這並不會（或至少不應該）讓它們變得專斷。如哈斯蘭格（2012）所說，它們獨有且富生命力的關懷為：「這個是我們必須思考的現象。」因此，在我進行了概念性和描述性的思考過程以了解它們能導向什麼結論之後，於此階段，我想提出一個改良性的提議，好指出基於許多理由，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厭女情結。

我認為，就最一般性的描述來說，厭女情結應該被理解成父權秩序下的「執法」部門，整體功能在於監督和執行父權秩序主要的意識形態。以下我們可以說得更詳細一些：

本質上而言，一個社會環境內的厭女情結包含了敵意的社會力量，它們：

（a）將與一個類別（範圍或寬或窄）的女孩與女人迎面碰上，因為她們就是身處於該社會位置（而那是什麼樣的位置，某種程度上會被清楚說明）的女孩與女人；並且

（b）服務於監督和執行父權秩序，且它們會隨著其他壓迫與弱勢體系而具體地展現出來，這些體系彼此交織，並適用於相關類別中的女孩與女人（例如各種形式的種族歧視、仇外情結、階級歧視、年齡歧視、恐跨情結、恐同情結、健全主義等等）。

同時，作為一個實質性的事實，這些厭女的社會力量將會：

經常因為（身處於相關類別中的）女孩與女人對適用的父權規範與期待提出了真實、假定或代表性的挑戰或破壞，而攻擊她們（再一次的，與其他適用的交織壓迫力量聯合運作）。

舉例來說，此處所指的父權規範和期待可能包括：

（a）特別依性別而定的內容，它們反映且協助了規範或重建父權秩序；或

（b）和（身處同樣類別中的）男孩與男性（也就是她們的男性對照組）相比^{註60}，對（身處相關類別中的）女孩與女人採用特別嚴厲的執行機制；或

(c) 和男性對照組相比，對(身處相關類別中的)女孩與女人採取特別密集和/或帶有侵略性的監督(例如監管、檢視和猜疑)。

因此，相對於天真式理解，我的看法是：

厭女情結主要以女性作為攻擊目標，因為她們是活在男性世界(亦即，最重要的是，一個長期以來父權的世界)裡的女性，而不是因為有個男性是厭女者，而她們在他心中是女性。

我們也可以回顧，據我就厭女情結應該如何被理解的分析，相關的敵意可能由個別主體、集體(或「群眾」)活動，或純粹的結構機制所展示。在我們繼續之前，以下延伸幾點值得留意：

根據這個定義，厭女力量可能會針對處於社會空間裡不同位置上的特定女孩與女人，也可能以一種一般性的方式在女孩與女人身上運作。

比方說，「厭黑女情結」中的消抹(erasure)以及隨之而來的隱身(invisibility)形式，便可以說是既獨特，又絕對只專屬於某些地區的某些人；該詞由莫亞·貝利(2014)所提出，用來指稱美國黑人女性因其獨特的社會位置而面臨的厭女情結，這種厭女情結結合了反黑人種族主義、異性戀霸權，以及父權力量的運作。我會在第六章末就此進行討論，並援引包括克莉絲蒂·道森和瑪莉塔·吉伯特(Marita Gilbert)等學者的論述。

儘管如此，即使運作的方式是一般性的，卻不代表厭女情結被體驗到的方式，或它對女孩與女人造成的後續影響是一致的。這個推論並不成立，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會是錯誤推論，因為那將會掩蓋弱勢如何彼此強化，或是因特權而被減緩的重要可能性(以及其他的可能情況)(Crenshaw, 1991)(Crenshaw, 2012)。

為了就此舉例，我們可以回想不久前的羅賽塔·華森(Rosetta Watson)一案。她是居住在美國密蘇里州楓林市的一名黑人身障女性，因為男友的家暴——包括「窒息」，或者用更恰當的術語說，非致命的以手勒脖(如我們在前言中所討論過的)——而於短期內報警四次。由於她是租屋者，所以當她於一百八十天內報警超過兩次後，她被認定為「公害」。這是一條在美國很多城市與鄉鎮內常見的法規，華森因此失去了在該市定居所需要的居留資格，且基本上因此過了六個月的流放生活。這一切都是因為她在遭遇了具有致命危險、恐怖的暴力形式時試著尋求保護^{註61}。

對於黑人女性來說，被驅離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社會學家馬修·戴斯蒙（Matthew Desmond）認為此問題類似於黑人男性被大量監禁的狀況，它構成了一個深層的系統性不平等與弱勢來源，卻鮮少受到注意。「可憐的黑人男性被關了起來，而可憐的黑人女性則被關在外面，」戴斯蒙（2016）指出。這說明了厭黑女情結和居住不安全、遊民、法律問題以及監禁等各種負面結果緊密相關^{註62}，且使得弱勢黑人女性特別容易受到這些問題影響。因為這種種因素的結合（這使她們早已弱勢得不合比例），處於這類境地的女性又特別容易遭遇到家庭暴力和性侵害的威脅。厭黑女情結導致厭黑女情結，而這個循環便如斯持續。

在首先將厭女情結定義為社會環境內的一個屬性後，我們如今可以說：

由此衍生，個別主體在一個社會脈絡裡所展現出來的態度或行為可以被看作是厭女的，只要它們反映或延續了其中的厭女情結。

我們也可以用類似方式將厭女情結定義為社會慣習、制度、藝術品或其他人造物件等的屬性。

但大體說來，當我們稱呼個別主體為厭女者時，必須謹慎面對箇中風險，這是有理由的；風險則包括我們可能高估了自己，以及可能會涉入某些道德教訓，而後者正是在處理厭女情結時，我們被教導須謹慎以對之事。此外，這裡當然也有公平性的相關考量，我們通常不會想要因為一個近乎普世性的人格特質、態度或行為意向而給某人貼上一個羞辱性的標籤。

因此，我認為「厭女者」一詞最適合被看作一個門檻概念，而且是一個比較性的概念，它具有某種「警告性標籤」的功能，並且被謹慎地使用於那些在不同社會脈絡中，態度和行動格外且一致性地厭女的人身上。根據此觀點，

當且僅當和其他相對可以類比的大多數人（亦即在類似的社會環境裡有著相同性別，以及很可能有著相同種族、階級、年齡等條件之其他人）相較之下，個別主體的厭女態度和／或行動顯著地（a）更為極端，以及（b）更為一致時，他們才能被看作是厭女者。

某方面來說，「顯著地」和「相對」是含糊的表達，但我卻是刻意為之，因為在這個脈絡裡，以我的目的而言，我不需要決定如何填

寫這個定義。因此，最好的做法是保留空間，讓人們可以根據規範性和道德性理論中的不同目標而自行發展。

在展示我針對厭女情結所提出的改良性分析後，我將稍事暫停，先專注於討論這個分析的某些重要特點，以及從我的思考方式而言，它所能帶來的吸引力與好處。這包括了此論點在概念上和實質上的進一步應用，以及厭女情結何時有可能崛起：它如何運作、針對誰，以及由（或者某些時候更好的說法是透過）哪些主體和社會慣習、制度、藝術品、人造物件等，進行運作。我也會從厭女情結的認識論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亦即我們如何能夠指認出這世界上的厭女情結和厭女者，以及，什麼可以作為它或他們存在的可靠證據。

厭女情結在形上學與父權的從屬關係 The metaphysical dependence of misogyny on patriarchy

我提出的分析將厭女情結辨認為一個固有的政治現象，它尤其讓社會環境裡的厭女情結在形上學方面仰賴具有父權本質的規範與期待。這並不代表厭女情結只發生在一個完整運作的父權體制中，但這確實代表它們必須有著某種歷史上的連結，而此「連結」的解釋則廣泛到足以囊括對另一個文化、對早期規範和期待的借用以及直接繼承^{註63}。我有意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某些重要的預警，亦即：對於女性的敵意僅僅是個人的怪癖或某種類似恐懼症的東西，而缺少在背景運作的父權壓迫體制^{註64}。我的意思並非這類（樣貌如此的）「恐女症」從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例如，它們可能來自於某種心理學上的「母親議題」，這是人們在討論到這類議題時有時會援引的概念，我們將在下一章討論到這點^{註65}。但我並不認為於此當前的政治氛圍裡，這會是一個我們需要非常關心的問題，因為女性已經面對著這麼多更加系統性的難題。

厭女敵意的多種形態 The varieties of misogyny hostility

依我看來，厭女敵意可以是任何能用以達到懲罰、威懾或警告功能的行為；取決於你對懲罰的看法，它們可能是對一般人——或獨獨朝向被針對的女性——表示厭惡的行為。厭女敵意包含了各式各樣「貶抑女性」（down girl）的舉動，多樣到讓整份清單看起來彷彿毫無止盡，但一般說來是如此：成人被帶有羞辱意味地比作兒童、人類被比作動物或甚至比作物品。幼兒化或藐視也屬此範圍，包括了奚落、貶低、嘲弄、侮辱、毀謗、妖魔化，以及「性化」，或是相對的，「去性化」、噤聲、無視、羞辱、責怪、故作紆尊絳貴或高人一等，或是其他在特定社會脈絡下，帶有輕視與輕蔑意味的對待。然後還有暴力跟威脅的舉動：包括「打沙包」——亦即延宕攻擊，或是替代性攻擊^{註66}。而根據我的看法，既然在厭女的想像中，個別的女性經常成為全體的替代品或代表，那麼，幾乎每一個女性都有可能受害於來自某處、某種形式的厭女敵意。

接下來，我將會特別專注於討論厭女情結如何透過一般性的社會規範執行機制、道德主義，其他人格層面上的負面概化、有階序的社會行動，以及類似的過程進行運作。據我所見，厭女情結並不需要、通常也並非來自於某些特定的或（在我看來）不知為何被普遍認定的心理態度，例如將女性視為性物件、次等人類，或將女性視為擁有某些令人厭惡與憎恨的「本質」。相反的，厭女情結通常是為了執行或重新建立父權秩序，或是在此秩序受到挑戰時的抗議。厭惡乃由此社會過程而生，並由此擴大。這將會是我在第五和第八章個別的討論重點。

換句話說，除了有時可能是一廂情願或刻意否認所導致的結果以外，很多時候，這些各式各樣的「抑女」行為所反映出的，並非女性實際上究竟如何被看待，而是動態、主動，並且強而有力的巧妙操作，以便在女性有著逾越本分的想法時叫她們安分守己。因此我認為，來自個別主體的厭女情結其實較無關信仰，而是更涉及欲望——要求世界能夠維持在父權秩序之下或與其接軌的欲望，和類似的心理狀態——至少一開始是這樣的^{註67}。我會在第三章時回到這個主題，同時一併討論厭女情結與性別歧視的差異。

厭女情結的認識論 The epistemology of misogyny

說起厭女情結的認識論，首先有兩組對比的關聯特別重大（儘管這組對比的間接證據或許可藉由不同方法找到）。藉由展示一個男性對照組，而該男性處於一個可供比較之社會位置（亦即在種族、階級、性、順／跨性別身分、身心障礙、年齡以及其他條件上與另一女性的狀況一致），但無論就強度、普遍程度、品質、數量或時間長短上來說，他都很有可能不會面臨到另一女性所面臨的類似敵意，我們便得以證明該女性是否受制於厭女情結。我認為這個說法精巧地構成了一種對厭女情結的通俗定義。

必須注意的是，這類敵意即使沒有不成比例地瞄準了女性（意即：和她們的男性同儕相比之下），也可以被視為厭女情結的症狀或表現。只要某個待遇在某種性別的維度上有特殊性，就已足夠。因此我們可以接受這樣的看法：某些男性在類似的位置上，也可能遇到同樣——甚至更強烈——的敵意；根據我的分析，只要這份針對女性的敵意帶有某個特殊的性別基礎或特質，那麼，就仍然可以看作是厭女情結的展現。

依我所見，另一個可以診斷厭女情結的方法，則是假設一個狀況類似的人生活在沒有父權規範與期待的世界裡時，不會遭遇到同樣的敵意。舉例來說，懷孕者（通常是順性別生理女性，也有一些跨性別男性和不屬於二元性別者）經常無法從雇主那裡獲得必要的醫療與合理的經濟安排，反而因此被解雇。我認為這是我的論證裡一個重要的優勢，因為一來，這讓我們可以適當地思考和懷孕相關的案例；如果順性別生理男性懷孕了，他們會遭遇到同樣的職場懲罰嗎？或者他們只會單純地成為一邊生育一邊工作的二線員工？我們很難得知。這看起來也不是一個太有意義的問題；我們可以揣測，這個問題並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在跟懷孕、哺乳、停經以及其他情況相關的例子裡，這一類在社會學（以及科學）意義上極為縹緲的想像世界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比較基礎。更好的做法是去想像，如果一個懷孕之人並非生存在一個「男人的世界」裡——亦即並非生存在這個以異性戀父權規範和恐跨情結為架構的真實世界，而是活在另一個世界裡，在其中每一個人都有權利主張和別人在道德上進行平等的互動，情況可能會是如

何？我認為，在那個世界裡，我們會更加致力於為那些負責生養人類下一代的人們提供協助。

（潛在的）厭女情結作為一種傾向 (Latent) misogyny as a disposition

在此階段，我對厭女情結的看法有另一個面向值得提出，那就是它刻意引發意向，或趨勢。因為如此，一個社會環境並不需要在當下主動對任何人顯露出負面的態度或行動，才能真正地符合厭女的資格，只要某些和厭女情結有關的反事實是有效的，就已足夠。而我相信，事情正該如此。從此方面來看，厭女情結可以是潛在並暫時冬眠的。

有鑑於這個和前一個論點，我們自然而然便會好奇：假如相關的社會機制太過成功，是否還會有任何方法能夠得知一個社會環境是否厭女？也就是說，假如女性在當下遭受到的厭女敵意或攻擊非常少，我們又如何能夠判定，這僅僅是因為她們被如此成功地放逐到某些臣屬的社會位置？

而這帶著我來到了下一個論點，我認為，它可以作為這一整章內容的重要補充，並且將會鼓勵後續討論。

厭女情結作為一種體系，並且屬於另一個更為廣大（許多）的體系 Misogyny as systemic, and as itself part of a (much) larger system

雖然我認為合理的作法是在一開始就聚焦於指向女性的敵意態度，以及它們的典型表現形式（考量它們的特點和造成不可回復之傷害的能力），但切記，硬幣的反面也同樣重要。事實上，我的分析指出，有兩個硬幣會需要被翻面：一個是在否定態度方面，還有一個是性別方面。

因為，儘管厭女情結的主要表現形式可能是懲罰壞女人並監督女性的行為，然而一個懲罰與獎勵——以及定罪與赦免——的系統幾乎總是全面運作。因此，藉由單單就這個論點的結構特性進行反省，我們可能會預測到，伴隨著用來執行性別服從的大量方法，我所定義的厭女情結有可能是持續不斷的。若向我們周遭的社會世界進行粗略察看，即可為此提供初步的確認：針對女性的敵意真的只是一座巨大且惱人的冰山一小角。我們也應該為那些服從性別化規範與期待的女性們所受到的獎勵和評價而感到憂心，也就是當她們成為一個（舉例來說）充滿愛的母親、殷勤的妻子、忠誠的祕書、「酷」女友或優秀的服務生時，我們該感到憂心。另一個擔憂的焦點，則應該是藐視男子氣概規範的男性所受到的懲罰和監督，這是一個相當受到注意、在某種程度上也頗受接納的論點。（而雖然它並非本書的主題，這也絕不會否定它的重要性。可參考迪歌比〔2014〕年的討論。）然而，也許，比較少被注意到的是，會讓支配女性的男性們受惠的正向和赦免態度，以及它們的表現形式。不過，我期待第六章將能捕捉到其中一些可能性。

本分析揭示了厭女情結內含的道德特質 The analysis exposes underlying moral characteristics of misogyny

我的論點有另一個特徵，在於它能夠容納一些也許最初看來頗為不同、但卻可信的厭女案例：例如在進步的社會環境中出現的厭女情結，以及在較為專制高壓的社會條件下所出現的厭女情結，我的論點揭露了兩者所共享的根本道德特徵。以孟加拉國內的潑酸或硫酸攻擊行為為例，其中幾乎80%的攻擊都是針對女孩或女性。這些攻擊造成嚴重的傷害、留下傷疤，並對受害者的臉部、胸部和生殖器官造成組織與骨骼創傷；有時候，這些攻擊也可能致命。根據一份不久前的報告，「這些攻擊最常見的原因是求婚、求愛或是追求遭拒。」（Pawan & Dhatarwal, 2014）此外，學者指出，這類犯罪的典型動機是「出於嫉妒或復仇心態而想使她受傷或毀容」（Swanson, 2002）。米立杜拉．邦多帕迪耶與馬穆達．汗（Mridula Bandyopadhyay & M.R. Khan, 2013）進一步解釋，這些「因為被拒絕而發起的攻擊不僅因為女性的拒絕而懲罰她們，也奪去了她們的社會／性資本」，而針對孟加拉國內對女性的暴力與高壓社會規範之間的關係，她們的整體結論為：

暴力的條件、形式和風險由當地對性與性別的意識形態形塑。工作的性別分野建構了一個「性別階序」，把女性放逐到私領域，使她們為求生存而持續依賴男性，並將她們置於一個弱勢的位置。因此，暴力和經濟實力與經濟參與內的性別差異有所關聯，並且是一個索引。潑酸攻擊強調女性對男性的高度依賴，它的作用在於警告許多可能會抗拒男性權威的女性（Bandyopadhyay & Khan, 2013）。

根據這份對孟加拉國內潑酸攻擊行為特徵的描寫，在我的分析裡，它很明顯是極度厭女的；同時對我們有所助益的則是去反省該攻擊行為和艾略特．羅傑的作為之間的相似性，這也是我的分析所闡明的。相對於海瑟．麥可唐納（2014）的意見，也就是認為厭女情結主要由偏激人士所為，這類的種族主義刻板印象會掩蓋深層的結構相似性，而這些值得有能力對此進行探索的人們仔細地檢視^{註68}。

厭女情結可與厭女者共生或獨立存在 Misogyny can exist with or without misogynists

我列出了一些例子來說明，在沒有個別偏執者專心致志於厭女行為的情況下，許多厭女社會機制可以如何運作。不過，考量到這些補述內容中確實包含了個別主體，我的論點亦明確地證實了，個人主體有可能應該要被稱為厭女者。再三考慮後，我認為保留這個可能性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我認為，厭女情結的「壞蘋果」譬喻顯然有誤，而且無所助益，一直以來我也渴望突破它，但我們也不應該太急著赦免每一個人。而根據我的論點，粗略來說，厭女者就是厭女情結所做的事；意思就是，厭女者有可能單純只是在為厭女的社會環境做出貢獻時，始終表現卓越的人（無論考量所有的因素之後，該體系是否可以被視為是厭女的，重點在於他們堅定致力於往那個方向推進）。此外，厭女者也可能是被一個厭女的社會氛圍深深影響了信仰、欲望、行動、價值、忠誠、期待、修辭等等，的人。因此，根據我的論點，羅傑和林博都做了不少事，讓他們得以贏得這個稱號。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將看到另外一些符合該要求的主體。

故而，針對厭女情結，我的研究取徑試著避免兩個在我看來錯誤的極端情況：第一個是把厭女情結看作由個別「壞蘋果」所散布的禍害；第二個則是以全然結構和社會的語言來思考厭女情結，排除了個別主體和人際互動的特殊性。如哈斯蘭格（2012）所說，我們必須試著在理論化的過程中，同時公平地對待個別主體和社會結構，以及在物質現實裡，它們如何以複雜的形式彼此密切相關（頁11、414-418，尤其是頁414第8行）。其中一個我將試著在此強調的後續可能性是，一個社會體系或環境可能對於身處其中的某些人而言有著特定的氣氛或「氛圍」，而這需要在廣義上以態度的語言來描述，好持平地理解人們身在其中的經驗。對特定女性來說，這樣的氛圍可能被形容為特別不友善、令人生畏，或是「感到寒意」。

對比於厭女情結的天真式理解，在我的分析之上，這個說明補全了我對厭女情結的邏輯（亦即其構成本質）的簡短概述；然而，若討論到厭女情結的實質內容，還有很多工作等著我們，其中某些內容是特定的地方脈絡所獨有的。我將在下一章中陸續處理這段過渡過程，討論厭女情結和性別歧視之間的對比，以及這兩者在當前的美國政治中經常如何互相合作。我也會討論一些不同類型的厭女者，以及厭女

情結如何得以透過全然的結構機制、政治運動和社會慣習的運作而被化為實體。

但首先，讓我回到伊斯拉維斯塔殺人案上，為一些開頭討論中尚未被處理到的問題收尾。

無人區 No man's island

在第一章裡，對女性主義的厭女情結診斷所提出的反對論點中，此刻還剩下哪些？透過我的分析，其中大多數已經變得沒有意義，因為它們乃立基於以下的錯誤對比：

- 一名男性是自戀者或妄想者，與他是一名厭女者——亦即一個強力且持續傳達厭女社會力量的人，兩者之間並沒有衝突，因為厭女情結在本質上就是自戀而妄想的。它把非個人的失望轉化成苦澀的怨懟，或某種「忿忿不平的理所當然」（aggrieved entitlement）的感受——若我們借用社會學家麥可．基梅爾為此發展的用詞（2013，頁18-25，第一章）來形容的話。厭女情結也能夠將主體和他完全不認識的女性之間的關係轉化成親密的，在一種想像的層面上。

- 一名男性感到弱勢和缺少安全感，與他是一名厭女者之間並沒有衝突；事實上，我的分析將可能會預測，這類弱勢乃是一個常見的驅動因子。一個人是種族主義者（比方說）和他是一名厭女者之間同樣也沒有衝突。相反的，一個人可能會異常固戀於他在眾多顯著社會階序中的位置，這是很合理的。

- 一名男性會攻擊其他男性，與他是一名厭女者之間也沒有衝突。像艾略特．羅傑這樣的一個人，他渴望能同時支配地位較高的男性以及受他們吸引的女性，這是完全合理的組合。事實上，對於如羅傑一般的人來說，這樣的支配可能是唯一能讓他得償所願、獲得「阿法男」地位的可行辦法，至少在他能夠正確判斷自己於社會階序中的位置時是如此。他必須在社會世界裡晉升到比其他男性更高的位置，而為了這個目的，他在「辣」妹——也就是高地位女性——眼中的地位會很有用，可能還很關鍵；反之亦然。性別內部和性別之間的階序當然深刻地相互交纏著。

- 與史蒂芬．平克的意見相反，我們沒有理由期待厭女情結通常會以暴力或甚至暴力傾向的形式呈現。從執行父權社會關係的觀點來看，這並沒有必要，甚至並不值得嚮往。當一切依照計畫行事時，父權社會關係理應要是溫和而無縫的，暴力大多要在事情出狀況時才會浮出水面。當強大的女性被認定不夠全心全意地為了支配性男性的利益而提供服務時，有很多非暴力且低成本的方式可以化解她們所帶給男性的精神威脅，例如藉由毀謗、妖魔化、貶低、侮辱、嘲弄、譏諷、躲避，和羞辱；女性可以在想像層面，而非實際層面上被打倒。

• 與克里斯·佛格森（2014）的意見相反，我們沒有理由設想厭女情結可以透過直接的教導而在不同文化間傳播。再一次重複，這沒有必要。除了強烈地認定個人理所當然有資格獲得權利以外，個別主體被教導的——或者更恰當地說，他們所學習或內化的——反而是各種父權規範和期待，這些規範與期待用來決定女性在服務身處支配地位之男性的利益時，所處的社會地位。因此，當一個女性被認定為挑戰、抗拒或破壞了這些規範與期待時，她和其他女性便有可能受到懲罰，或面臨其他遭遇。因此，厭女情結往往涉及的是，當一個主體覺得被女性威脅、推入困境、反對、貶低、辜負、訓斥、傷害、擊敗、勝過、糾正、超越、奪權、取代、打破希望、侮辱、磨練、顛覆或驅逐時，所產生的普通反應。

• 與海瑟·麥可唐納（2014）的意見相反，女性體驗到的社會進步與針對她們的厭女情結之間並無衝突。進步和怨懟完全可以共存；事實上，女性正有可能因為她們在某些領域內達到了快速的社會進步而遭受怨懟。在我的分析裡，當某些女性在迄今為男性所支配的角色上獲得成功，以及當她們放棄傳統上陰性的照護工作時，這有可能成為激發厭女敵意的預言。厭女情結經常源自於想要打倒女性的渴望，藉此使她們再次安分守己。因此，當她們爬得越高，她們越有可能因此而被迫摔落。玻璃天花板也許被打破了，但打壓也會有，而在其他女性崛起時，某些女性會被灑落的玻璃碎片擊中。

最後，每一個男人心裡都住著一個厭女者嗎？一如湯姆·佛地所好奇的那般。假如按照我在此處所下的定義，亦即將厭女者看作一個門檻概念，答案是否定的。與此同時，一個人也不需要是一名男性，才能成為厭女者。就此而言，女性也可以符合這個描述，不屬於二元性別者亦同。（雖然單就女性而言，要有多高的頻率才能符合厭女態度與行動的必要一致性，這是一個仍未有定論的實證問題，我在最後一章裡將會提到一些相關研究。）但除此之外，身處於眼前這個歷史性時刻，我們之中的許多人、甚至是大多數人，在某些時候都可能具有運作厭女社會力量的能力，即使我們抱持著真誠的平等主義信念並投身於女性主義。我相信，我也不例外。這些運作的形式可能不只包含不經意地監督和執行性別化的規範與期待；根據我的分析，它也可能是過度監督和過度執行在性別上中立且可能正當有效的規範，也就是真正的道德義務。倘若這麼做的結果，是在面對被隱約認定（再一次，正確或錯誤地）某些方面不守規矩的女性時，我們會表現出和她們的男性同儕相比，更過度且具有針對性的敵意，那麼，在本書裡，

她們所面對的情況仍然可以被視為厭女情結。本書接下來的例證中將不乏許多清楚展現雙重標準的案例。

註52：這段以及接下來正文中的節錄都來自於林博於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的節目逐字稿，可於《拉許林博秀》（*Rush Limbaugh Show*）官方網站上找到。“X—Butt Sisters Are Safe from Newt and Rick,” *Rush Limbaugh Show*, 2012/02/29, https://www.rushlimbaugh.com/daily/2012/02/29/x_butt_sisters_are_safe_from_newt_and_rick/

註53：Rush Limbaugh, “A Statement from Rush,” *Rush Limbaugh Show*, 2012/03/03, https://www.rushlimbaugh.com/daily/2012/03/03/a_statement_from_rush/

註54：節錄自林博於三月三日發表的聲明（見上註釋2）。

註55：我們也可以思考，在評論女性政治人物時（不只是負面的，還包括中立或甚至正面的評論），一種不恰當的私人語氣經常受到採用。其中一個症狀是使用女性政治人物的名字，例如「希拉蕊」和稱呼澳洲第一位女性總理茱莉亞·吉拉德為「茱莉亞」，我將在後面章節裡討論到後者的政治崛起和衰落。還有一個例子是，德國總理安格拉·梅克爾的暱稱為「媽咪」（Mutti）。

註56：Rush Limbaugh, “The Dumb Don’t Know They’re Dumb,” *Rush Limbaugh Show*, 2012/03/01, https://www.rushlimbaugh.com/daily/2012/03/01/the_dumb_don_t_know_they_re_dumb/

註57：可比較納思邦（1995，頁257）和朗頓（2009，頁226）對物化與可替代性的討論。我將在第三章分別就兩人各自的看法進行更多說明。

註58：我在此把凱薩琳·麥金儂和其他學者就性騷擾所發展出的法律概念當成典範。同時可以參考米蘭達·弗里克（2007，第七章）的論點，她討論到此概念在性別平等職場改革中的重要性，藉此說明這個成果來臨前所存在的詮釋不正義。

註59：但此處必須說明的是，並不是每一個相信這類厭女「群眾」心態的人都一定會直接地傳達厭女社會力量，某些人反而會留意並模仿其他人的（道德）厭惡反應——換句話說，也就是間接或二手地傳達厭女社會力量。本書第八章會針對這類機制如何被用於擊倒公領域內的女性有更多討論。

註60：此處我特意留白，並未討論在此議題之上那些不屬於二元性別者可能遭遇到更糟的情況，不論是和身處相關對應類別中的女孩／女性還是男孩／男性來進行對比。

註61：Melissa Jeltsen, “A Missouri Town Exiled a Woman for Calling the Police on Her Abusive Ex,” *Huffington Post*, 2017/04/11,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rosetta-watson-maplewood-missouri-abuse_n_58e4e4b0ca64d91864f0

註62：如金柏利·克倫肖（2012）所示，在近代史中，如同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間的對比，若和白人女性相比，黑人女性的入監率也因為類似的因素而提高。雖然一路以來，女性之間的差距似乎顯著減少，但這個問題不曾受到如前者一般的關注，此為不變的事實。而這很可能是一個症狀，反映了黑人女性如何從整體公共論述中被消除。

註63：此處有個推論值得一提：假如厭男情結可以被理解成厭女情結的類比（而它應該要被如此理解），那麼，如果沒有任何母權意識形態所衍生的母權規範與期待在進行運作，使得違反它們的男性會被人們怨恨，也就不會有任何真實的厭男案例存在。我相信事情完全就應該如此。歷史上這類規範有多常見，並不是我作為一個哲學家有辦法回答的問題；就像我在前言中說的，這是一個留給歷史學家或人類學家的問題。但是讀者可以參考葛爾達·勒納（Gerda Lerner, 1986）針對父權體制的歷史普及度和霸權本質所做的經典論述。

註64：我在第一章開篇時提到一個觀察：如果我們採用譬喻，厭女情結是一個「飽滿」的字眼。但請注意，根據我的分析，從這個詞最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厭女情結並不是一個道德化的概念。然而，有鑑於父權的壓迫體系在道德上是應該被反對的，以及對這類道德事實的標準看法在形上學方面會因為它們所引起的描述性事實而成為必須，關於厭女情結的主張確實仍會有顯著的道德影響，這如果不是概念上的，也是形上學上的必要性。

註65：在此我略略提到到了辭典編纂者蘇．巴特勒（Sue Butler）的說法，我將在下一章就此進行討論。"Misogyny Definition to Change after Gillard's Speech,"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12/10/17, <https://www.smh.com.au/national/misogyny-definition-to-change-after-gillard-speech-20121017-27q22.html>

註66：譯註：替代性攻擊指的是，當個人宣洩衝動與怒氣的管道被阻擋時，他會試圖尋找一個比較可以被接受的出路。

註67：信仰的內涵是呈現這個世界，並且認定世界已經是某個特定的樣貌（或者，若是在進行預測時，認定世界在未來將會是這個樣貌）。因此信仰可以被稱為「由世界所引導」或是「由世界所指揮」的心理狀態。而根據上述對它們的「適應指向」的（粗略）描述，欲望則是一種「指揮世界」的心理狀態。針對這個對比，可以參考安思孔（G. E. M. Anscombe, 1957）的權威性論述。

註68：即使他們會採取不同形式，並提出非常不同的解方。這顯示了一種敏感度，這種敏感度在對待文化差異、不同社會意義，以及所採用的實務與知識姿態可能反映殖民道德主義等議題時是恰當的——然而敏感度並不代表完全不予批評的順從。

第三章 造成歧視行為的性別歧視思考 Discriminating Sexism

「沒有了女人，男人是什麼呢？幾乎什麼都不是啊，先生，什麼都不是。」

馬克．吐溫（Mark Twain）

性別歧視Vs. 厭女情結 Sexism vs. misogyny

針對我對厭女情結的解釋，一個可能的重要反對意見是，在持續確認厭女情結的敵意「氣味」和特質的過程上，我這個解釋仍舊太過狹隘了。我們是否應該從更廣義的層面上來理解厭女情結，好將所有把女性描繪成天生或自然而然就不如男性的信仰、主張，或敘事，全都包括進來？（至少在缺少證據的情況下——因為既然沒有一群長期處於性別平等環境下成長的控制組，這些證據通常不存在。）

我認為，在此關頭，這會是錯誤的舉動。我目前針對厭女情結所提出的改良性解釋擁有一個優勢，亦即它可以在厭女情結和性別歧視之間做出一個清楚而有用的對比^{註69}。回想在前一章裡我初次提出的簡略定義（且我隨後進一步做了細緻說明），也就是：本質上來說，

我們應該將厭女情結主要理解為父權秩序的「執法部門」，其整體功能為監督並執行其中的治理規範和期待。

同樣地，我們也可以指出，本質上來說，

性別歧視應該被看作是父權秩序的「辯證部門」，它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扮演著合理化與正當化父權社會關係的功能。

一個堅固的事實在於，很多時候性別歧視之所以得以運作，乃是藉由自然化性別之間的差異，把父權邏輯下的社會框架給正當化，此舉讓這些差異看似無可避免，或是將試圖反抗這些差異的人描述成在打一場必輸之仗。此處未被說出口的前提，則是某種版本的「應該蘊含能夠」（ought implies can）原則^{註70}——大抵可以被弱化成一種類似「無法則蘊含無必要」（can't even implies don't bother）的心態^{註71}。如果某些男女之間的特定社會差異幾乎不可能改變，那麼，還有必要試圖與之對抗嗎？另一方面，更謹慎地說，如果男性和女性本來就傾向於擁有相當不同的能力和癖性，那麼，最合理的作法（換句話說，亦即一般而言最安全的對策，或是最有效率的預設）可能是去鼓勵（或至少不要阻礙）一種父權邏輯下的分工。最重要的可能是，這樣的分工絕對不會是歧視的證明、不會是結構性阻礙，也不會是造成女性人才被差別性遺漏的所謂「輸送帶問題」（pipeline problem）^{註72}之強力證據。

因此，性別歧視的意識形態通常包含了各種預設、信仰、理論、刻板印象，和廣泛的文化敘事，透過某些方式來呈現出男女大不同，

而如果這些不同為真、被傳誦為真，或是至少可能為真，便會使得理性大眾更傾向於支持、參與這個父權邏輯下的社會框架。性別歧視的意識形態也包括了替父權社會框架搽脂抹粉，將其描述成比真實樣貌更值得嚮往且較不令人憂慮、失望或沮喪的存在。與此同時，便如我所定義的，厭女情結則負責監督與執行父權社會裡的秩序，但卻不一定需要以人們的預設、信仰、理論、價值和其他事物作為中介。厭女情結的功能，在於以直接和或多或少帶有強制意味的方式，來制定和生產符合父權邏輯的社會關係。

在此基礎之上，性別歧視傾向於對男性和女性給予差別待遇，典型手法是透過某些超出了我們所知或可知的性別差異主張，這類主張有時甚至違背了時下最佳的科學證據。厭女情結則通常會區分出「好女人」和「壞女人」，並對後者進行懲罰。整體來說，性別歧視和厭女情結懷有同一個目的——維持或重建父權的社會秩序。但性別歧視僅僅標榜著理性中立，厭女情結則毫無顧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因此，性別歧視之於偽科學，正如厭女情結之於假道學。性別歧視穿著實驗袍，厭女情結則獵殺女巫。

性別歧視和厭女情結之間又是什麼關係呢？在日常情境中，性別歧視的意識形態（以及它的載體，包括了性別歧視的態度、行動、慣習、制度，以及反應或刻劃了性別歧視意識形態的藝術品或其他人造物品^{註73}）可能會被用來服務厭女情結的目的。然而該服務是否成功，以及它是否因此便能稱之為厭女，則要取決於這些性別歧視的表現實際上如何運作。它們是否構成了一個障礙，或某種形式的敵意，使得該環境裡的女孩與女人將有機會遭遇到，並且在遇到時，也自然地將它們詮釋為障礙跟敵意？（假設我們這裡所提到的女孩與女人是理性的，而根據我在前章的討論，這裡指的並非某些過度理想化的狀況。）還是說，某些帶有性別歧視意識型態的物件（如一段文字或一個影像）僅僅會被看作是可笑偽科學以及媚俗的胡說八道，正如今日許多女性在面對一九三〇年代的廣告時所會有的反應？這個問題的答案，將同時隨著物件的脈絡與觀眾的背景資訊而有所不同。而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同樣的思考也適用於由個別主體所擁戴與保護的性別歧視態度。

但首先，回顧我在第一章時討論到的，和競爭對象（也就是所謂的天真式理解）相比，我針對「厭女情結可能是什麼」而提出的（當時還是初期的）改良性分析，至少可能在一組核心的案例內，為女性

所面對的敵意反應提供較佳的心理學解釋，因為我認為，對厭女情結的天真式理解幾乎不可能預測到任何敵意。眼下我已準備好更進一步地去指出，整體來說，我的改良性分析以及我所提出的性別歧視／厭女情結對比，和近期的「草根」（grass-roots）^{註74}語意倡議行動是一致的，這個倡議早已將後者一詞的使用以及它在某種程度上的字典定義，推向了這個更大有可為的方向。若真是如此，那麼便有雙重的重要性了：一來，我的改良性提議和一個尋常的使用模式一致，我稱之為「女性主義」的使用模式。因此，在她們使用「厭女情結」一詞時，天真式理解和這群語言使用者所想要表達的意思並不一致，這進一步削弱了天真式理解獲得我們擁戴的資格。而我的提議則適用於大多數人，只有某些語言使用者會需要進行一些修改。

二來，這說明了女性主義（對這個字彙的）的使用模式具有理論的一致性和根本的理由。這個字彙並非以一種特定的方式被使用，也不是為了一個五花八門的現象而命名。和對厭女情結的天真式理解相比，女性主義式的使用方式闡述了一個重要的統一屬性，一個我們應該要關注的屬性。因此，這些描述性和改良性的思考方向都在最後巧妙地聚集，而且彼此互補。

為了釐清這點，我們可以回想二〇一二年十月，時任澳洲總理的茱莉亞·吉拉德（Julia Gillard）所發表、如今廣為人知的「厭女演說」，批評當時反對黨黨魁東尼·艾伯特（Tony Abbott）的性別歧視和厭女行為。當談到政治中的性別歧視和厭女情結時，吉拉德叫艾伯特去照照鏡子，如俗話說的那樣^{註75}。吉拉德只把某些艾伯特的行為形容為性別歧視，「假如男人在生理和性情上就是比較適合掌權或發號施令呢？」艾伯特曾經在一場針對澳洲女性擔任領導職位比例偏低一事的辯論中若有所思地這麼問。「假如一般說來，男人真的就比女人擁有更多權力，這就是一件壞事嗎？」是艾伯特下一個半真半假的反問句。同樣被吉拉德描述為帶有性別歧視意味的，是艾伯特在討論碳定價經濟學時為主婦所訂做的解釋（「澳洲女性所需了解的是，當她們在燙衣服時……」）。最後，她指出艾伯特在擔任健康部長時將墮胎稱為「輕鬆的出路」，也是性別歧視的發言。

如此看來，所有這些被吉拉德僅僅稱為帶有性別歧視意味的發言，要不就是將身處於陽性領域的女性描述成不如男性的存在，要不就是將她們自然而然地交付給被賦予陰性屬性的勞動形式。因此它們都達到了同樣的效果，將這些框架描繪成天生自然或值得嚮往的，或

是將其他選擇描述成較不令人嚮往的，例如抨擊女性的墮胎決定是「逃避」。只有在吉拉德轉而討論某些艾伯特針對她所發出的攻擊言論時（由他親口所說，或他曾公開表示支持），她才開始專門提到厭女情結一詞：

當我以總理身分坐在此處，而反對黨領袖隔桌對我發出噓聲時，我也因他的性別歧視立場和厭女情結而感到被冒犯。「在政治上來說，如果總理想要當一個誠實的女人……」永遠不會有人對著坐在這個位子上的任何男性說出這樣的話。當反對黨領袖走到國會大樓外並站在寫著「甩掉那個女巫」的標語旁時，我深受冒犯；當反對黨領袖站在把我形容成「男人的婊子」的標語旁時，我深受冒犯；我因為這些東西而深受冒犯：每一天來自反對黨領袖的性別歧視立場、厭女情結^{註76}。

吉拉德的演說得到許多人的迴響，尤其是女人，無論在澳洲還是國際社會上皆同，但針對吉拉德對英語的理解也出現了一些惡意的反應。某些艾伯特的親信抱怨，每一個人都知道「厭女情結」一詞代表「對女性的仇視」，但卻不會有太多人同意吉拉德對艾伯特做出這樣的指控。然而，對許多人來說，吉拉德對「厭女情結」一詞的使用顯然是恰當的，包括某些字典編纂工作者，他們進而在此基礎上修訂了字典。澳洲學校採用的標準字典之一《麥考瑞字典》（*Macquarie Dictionary*）的編輯蘇·巴特勒（Sue Butler）是首位採取此行動的人。巴特勒在一場訪談中說明^{註77}，這個字彙過去的定義並未能確實跟上它在過去二十或三十年間被使用的情況，尤其是在女性主義者的圈子裡。吉拉德並不認為艾伯特需要花時間在「諮商師的沙發」上處理他對女性的病態仇恨，巴特勒補充道。《麥考瑞字典》進而更新它對「厭女情結」的定義，以包含「對女性根深柢固的偏見」，還有其中所含的仇視。其他部字典隨後亦囊括別的描述，包括不信任、鄙視、單純地不喜歡，等等。

然而，我們並不清楚增加「根深柢固的偏見」這個描述是否確實捕捉了吉拉德的用意。讓她選擇「厭女情結」一詞的情況都是針對她本人的卑劣貶低，而它們的用意似乎都是為了要削弱、輕視、羞辱或貶低她——好讓她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論是比喻意義還是實際情況。根深柢固的偏見所促成的，是這種位置或角色的概念（見註釋4）。厭女情結試圖強迫女性回到其中，或是因為擅離職守而懲罰她們；此外，它也可能因為女性占據或試著占據男性的位置而懲罰她們。它藉

著由個人主體、集體或團體活動，以及全然的結構機制所執行的敵意對待，來達到這個結果。它有各種口味，從純粹的惡意與攻擊，到刻意的冷漠和冷酷的沉默，以及各種其他可能性。考量到我們的社會天性，遭遇任何這類敵意的可能性可以是一種有效的威懾，因為對於人類來說，它令人嫌惡。一般而言，人們不會希望失去其他人的尊重和認可，或是遭他人迴避、羞辱或排除，而女性可能尤其如是（因其經常於社會化的過程中變得格外親切友善）。我們也可能在未來需要其他人的幫助、合作與保護，因此，對於女性來說，遭遇廣泛敵意的可能性可以是特別有效的威懾，否則她們可能會投入不好的（或者應該加上引號以示強調，「不好的」）性別行為，或是未能提供某些陰性屬性的好處與服務。

厭女情結與性物化 Misogyny and sexual objectification

瑞·朗頓就兩種性物化所可能呈現的形式做出了區別，為性別歧視／厭女情結之間的對比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解說。這段討論也會澄清厭女情結如何與這個父權思想的重要形式（也就是性物化）產生關聯，並且能夠獲取它的支持，而這是一個對女性主義者來說讓人極感興趣的主題。她的看法是，在性物化的情境中，人格性的一個重要特質——也就是自主性——可透過下列兩個明顯的方式之一被否定：

- （1）使自主性不屬於個體；或
- （2）破壞個體的自主性（Langton, 2009，頁233）

類型（1）的物化情境可能是當一個主體忽略其對象的完整自主性與思想本質，或僅僅可能是不在乎她究竟是什麼（或者說，是誰）所造成的結果。女性可能因此被設想為空洞、天真、不善言詞和愚笨的，她們可能被他人高傲地對待，彷彿她們是幼童，以及用令人痛苦和沒有尊嚴的方式被粗暴地對待與剝削。相對的，類型（2）的物化情境則往往來自於一個主體主動地渴望藉由無視她的意願、使她受苦，或藉由破壞她的身體完整性來破壞她的心靈和平，或是「入侵她的想法」（Langton, 2009，頁234-235）。因此，後者的物化形式看似是預先假定了哪些類型的能力要被刻意地破壞，然後（比如說）對待此人如同對待一個沒有生命的物件，可以買賣、蒐集、使用、耗盡、毀壞、熔接、摧毀，以及丟棄卻不需受罰（Nussbaum, 1995，頁257）（Langton, 2009，頁225-229）。

關於類型（2）的物化情境，幾乎總會被視為厭女的，這件事很合理；與此同時，類型（1）的情境則可能只表現出一種性別歧視的極端形式，只要它們的作用是合理化某些社會安排，包括適當的性關係和色情形式。

從朗頓的區分出發，瑪莎·納思邦（她針對物化這個主題的開創性著作其後也被朗頓援引）近期主張，第二種「自主破壞」式的物化總是帶著懲罰性的要旨，因此它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讓厭女情結在網路上找到出口（2011，頁68-71）。故納思邦提出，在如此的情境中受到討論的這類物化，經常是尼采所說的怨懟的結果，在這種怨懟中，個人感受到他們在社會世界內卑微或逐漸衰退的地位，促使他們

猛烈攻擊那些他們認為較有權力者。（也許無需多說，這些觀感不必多精確，雖然它們有可能是精確的。）

納思邦的這些主張顯然與我的目的一致^{註78}。它們也非常合理，儘管我想要提出幾個補充。這樣的物化在表面上不只可以作為懲罰，也可以減緩某些女性造成的精神威脅。除了怨懟以外，還有一種要思考的可能性是有意的否定和自我吹捧，亦即當主體拒絕看到自己在社會世界裡屈居女性之下，或甚至拒絕面臨這件事情可能發生的任何風險。

這使我可以把主題從我家鄉的前任總統靈活地轉移到現居國度的現任總統：唐納·川普。我將於下一節中展示，我的分析也巧妙地捕捉到了他的行為模式。這是人們樂見其成的，因為他已經成為媒體中最廣被接受的厭女情結案例之一——這也使得儘管川普如此厭女卻仍舊當選一事更令人感到沮喪。

打壓的藝術 The art of the smackdown

上一章簡要地介紹了兩種非常不同的厭女者——亦即那些在執行父權律法和秩序上有著超乎預期貢獻的人。第一種是如艾略特·羅傑般失望的用餐者，他在自己沒有得到（相對於父權規範與價值來說）好的服務時用湯匙敲打餐桌；第二種則是利用他人的敘事者，如拉許·林博，他為羅傑這樣的男性提供了可以針對與責怪的女性，因為她們犯下了那些讓他們在自身狀況裡感到忿忿不平的同類錯事，例如自私、粗心、不負責、不感恩，或對他們不公平。林博在珊卓·福魯克和他的聽眾之間彷彿魔術般地變出一個粗略又迂迴的連結，指出他們繳納的稅金會被用來支付她的避孕處方，即使他們從未在這段（非）關係裡獲得任何「好處」。藉此，林博提供了一個可以符合想像犯罪的罪犯，而福魯克成為未能履行職責的女性代表。

當然還有其他類型的厭女者。想像一個很少或幾乎從不曾失望過的用餐者，而原因是每當服務欠佳時，他就有可能表現出卑劣的舉止。他就此名聲遠揚，尤其是當他還享有其他形式的權力、威望、影響力跟特權時；他精通打壓的藝術，不太需要練習。對女性的模糊威脅總是在暗中潛伏，這份威脅就來自於他本身的人格設定。

這就是川普風格的厭女情結，如許多評論者所言，這是他多年來持久不變所展現出的特點之一；他的打壓形式主要是連續性騷擾、性侵害，以及如小學生般地侮辱那些惹惱或威脅他的女性。蘿絲·歐唐納（Rosie O'Donnell）^{註79}（非常風趣地）質問他有何道德威信足以寬恕環球小姐的未成年飲酒行為，川普給了歐唐納「豬」、「狗」等稱號；卡莉·費奧麗娜（Carly Fiorina）^{註80}和川普一同角逐共和黨的總統提名資格，他暗示她的長相未達總統等級的水準；曾任職於福斯新聞（Fox News）的梅根·凱莉（Megyn Kelly）^{註81}追問川普他侮辱女性的歷史，川普怒氣沖沖地指出有血從她的眼睛和「不知道哪裡」流出來，藉此委婉遮掩自己無話可說的窘況。

根據我的分析，這些例子顯然都可被視為厭女情結，顯示出厭女情結不只適用於失望的厭女者，也適用於跋扈的那種；不只適用於有權力的，也適用於無權的；不只適用於因為父權律法和秩序受到（實際或假設）威脅而作出反應的人，也適用於那些忽略陰性專屬責任的人。這些例子都佐證了我的分析，川普的行為準確地符合此一分析的

事實亦同，有鑑於人們傾向於使用「厭女者」而非「性別歧視者」來形容他。

把厭女情結比作父權秩序下的執法部門，這個比喻在此格外貼切，因為（a）川普以「法律和秩序候選人」的稱號行銷自己，以及（b）他是「有毒男子氣概」的具體化身（我將在第四章深入討論該主題，以及它和羞恥與侮辱的關係）。

回顧我所提出的看法，厭女情結藉由監督和巡視父權的社會規範來維持它們，而性別歧視的作用則是合理化這些規範——主要是透過假設男性和女性在才能、興趣、癖性和愛好方面皆「理所當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在此看法之上，性別歧視之於厭女情結，就像是公民秩序之於法律執行。性別歧視本身相信男性在陽剛的、高聲望的領域（例如知識鑽研、體育、商業和政治等）中比女性優越，同時他們在其中自然而然或甚至無可避免地會處於支配的地位；厭女情結則涉及焦慮、恐懼、維持父權秩序的渴望，以及致力於在它受到破壞時進行重建。因此，性別歧視可以是自滿的，而厭女情結則可能是焦慮的；性別歧視是學究的，厭女情結則是好鬥的；性別歧視坐擁理論，厭女情結則揮舞著棍棒。

此刻，需要留意的是，在個別主體的層級上，被如此定義的性別歧視和厭女情結有可能彼此脫離（與此同時，一個合理的想法是，儘管它們在分析層面上有所不同，但兩者都是父權體制裡合理的必要元素，除此以外還有「同理他心」、赦免敘事，以及其他稍後會提到的文本與資源）。川普展示了在沒有性別歧視運作的情況下，厭女情結存在的可能性（無論是否真為如此，這個可能性確實存在，而對於我的目的來說這便已經足夠），因為在表面上，針對女性是否有（無）能力在商場和政治領域中與他在同樣的層級上（不管該層級為何）競爭，川普並沒有特別明顯地展現出性別歧視信仰。一方面，川普雇用女性在他的公司裡擔任高階職位，這表示他並不低估（所有）女性，而是需要控制她們，並防堵她們可能比他優秀的風險。（「我有很多女性執行長，她們為我賺錢。」川普曾經如此吹噓。）另一方面，在和女性一起角逐某些競爭激烈的獎項或位置時，面對這種可恥的可能性，性別歧視傾向於讓川普這樣的男性相對自得自滿，但是，當川普在二〇一六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和希拉蕊·柯林頓競爭時，他對她展現出來的敵意很快地就讓事情變得難看，尤其是在三場總統辯論會中，他的言辭和舉止都帶有威脅、報復心、惡意與孩子氣。這顯示，無論川普在自己的某些主張裡究竟說了什麼，他那（一般說來很強烈的）

獲勝渴望或許並非伴隨著相信自己可能會贏的自信，也就是通常會源自於性別歧視的自信。例如，川普曾說，假如柯林頓沒有打「女人牌」，或吸引到「不知道哪裡來」的選民，她甚至連5%的選票都不可能拿到。然而，這無疑只是川普單方面一廂情願的想法，顯示出他渴望相信，如果沒有所謂的身分政治，柯林頓確實是一個糟糕的候選人。在這個情況下，假如他贏了，他可以認為自己不過是公平地取得了勝利，再無其他；若他輸了，這場選戰就是個騙局，換句話說，是政治正確的結果。因此，這個一廂情願的想法也有著預先保護自尊心的功能^{註82}。

有時候，這類針對女性的低評價乃是由渴望所驅動，此事甚至是更加明顯的。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執行委員長鮑伯·蘇頓（Bob Sutton）日前聲稱川普當然會在總統辯論中擊敗柯林頓，「我認為，當唐納·川普和希拉蕊·柯林頓辯論時，她會像莫妮卡·陸文斯基（Monica Lewinsky）一樣蹲在他面前^{註83}。」^{註84}（她並沒有這麼做，但這幾乎不重要。）

然而，即使厭女情結和性別歧視可以、也確實會在個別主體上透過其他零碎的方式彼此脫離，一般說來，在維持父權秩序時，它們當然仍舊是緊密的同夥。我們幾乎找不到比生育權這個主題更明顯的例子了，而這便引我談到印第安納州的墮胎法規，通過該法規的是當時的州長，也是川普現任的副總統，麥克·彭斯（Mike Pence）。

此處的討論也將用來強調幾個關於厭女情結的關鍵論點，其中某些已於先前被提及，但是值得我們透過詳細的例子來進一步強調與說明：

（1）厭女情結不只是第二人稱式的敵意（如羅傑和川普，以及立基於前述迂迴關係上的林博的聽眾），也是第三人稱式的憤慨、盛怒、譴責和其他類似的態度。亦即人們可以對女性展現敵意，因為認定她們錯待了其他人，包括那些被認為最弱勢且需要防禦、保護和正義的人。（「難道沒有人想到那些——在此情境裡，尚未出生的——孩子嗎？」）

（2）厭女情結由針對女性的社會慣習與制度，以及個別主體的行動和態度所組成。因為社會結構可以藉由特定的方式支持意義與代表政治實體，進而創造一個帶有敵意、貶低他人，與懲罰性的待遇形式（也就是一個「令人生畏」的環境的概念）。

(3) 厭女情結和種族歧視密不可分，非白人女性（尤其是貧窮女性）在白人至上環境裡所遭受的待遇似乎特別可能包含各種形式的消抹，我將在下段簡短描述，並於第六章再次回到這點。

在某些厭女的情境裡，女性會因為錯待了和她們有著某種模糊而名義上的關係的第二方，進而遭受責怪與懲罰，例如在珊卓·福魯克的例子裡頭是納稅人。在其他的厭女情境裡，設定則大不相同。例如在生育權（以及缺少生育權）的議題領域裡，女性之所以受到責怪與懲罰，是因為她們錯待了一個新興的、甚至在某些方面隨機的人群，一個無法為自己發聲，以及在擁有感知能力之前無論如何似乎都不會有任何意見——也就是利益或權利主張——的第三方。我們也要注意，新教徒是直到最近才將胎兒認可為人。（因此，根據我所承襲的形上學基本假設，就算他們的主張確實是正確的，這個正確立場也是建立在錯誤，且於意識形態層級方面是欺騙性的理由之上。）這份改變發生在一個（相對於草根）的「偽草根」（astroturf）運動降臨後，該運動明確地致力於抑制並擊退女性主義的社會進展。我認為，反墮胎運動是厭女情結反擊的典型範例。

慈愛的母親，抹煞其他 Loving mothers, erasing others

二〇一六年三月，在一場由克里斯．馬修（Chris Matthew）主持，並於後續的總統初選過程中迅速贏得了昭彰惡名的MSNBC電視台訪談中，川普犯了一個錯誤。他（在稍微猶豫後）承認了一件大多數共和黨員至今只敢暗中盼望的事，那就是：依據他們所聲稱對生育權（或再一次的，缺少生育權）的看法，試圖尋求或獲得非法墮胎服務的「女性們將會必須受到某種形式的懲罰」^{註85}。正如一名政治人物隨後以一種不尋常，且在我看來令人印象深刻的坦率態度所言：

川普可能是共和黨員中最無法無天的人，但他說出了他們所有人所相信的事情；他們想要墮胎變得不合法，而且他們想要懲罰女性和醫師。川普犯了罪，他告訴人們〔共和黨員〕在想什麼。

上面提到的政治人物是希拉蕊．柯林頓，這是她於美國紐約布魯克林的一場選舉造勢活動上的發言^{註86}。

柯林頓是對的。雖然這類主張可能並不明智，但提出它們也很重要，而不是繼續假裝這純粹是倫理與宗教上的問題，如同某些哲學家為了辯證而傾向於採納的立場。我相信，就此辯論的整體框架來說，繼續裝模作樣為時已晚（雖然目的並不是為了要在此框架中提出特定的主張）。因為一系列強而有力的作為，墮胎已經變成了一個深刻的女性主義議題，這些作為計畫並試圖執行官僚主義式的社會控制，拒絕給予有需要的女性健康照護，即使這麼做有可能置她們於死地，例如當由共和黨主導的參議院通過了第三五八號法案的時候。該法案允許醫師們基於個人良心，寧可放任女性死亡，也不施行緊急墮胎手術。當時，該法案很顯然會遭到否決，因此，它最重要的目的看似是表達出一種渴望或幻想；此外，當我們如今回顧時，它也構成了一個警告。

那是二〇一一年所發生的事，但如同耶魯法學院教授瑞娃．席格（Reva B. Siegel）所完整記錄的——其中部分內容乃是和普立茲獎得主、《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記者琳達．葛林豪絲（Linda Greenhouse）的合作成果——「反選擇運動」^{註87}的政治根基以及它與主流基督教之間的脆弱關係卻有著更久遠的淵源。葛林豪絲和席格（2010）指出，一個過去僅僅被嚴謹天主教徒所採納的立場，被刻意

地挪用為尼克森「南方策略」的一部分，好協助尼克森於一九七二年（在羅案判決的前一年^{註88}）贏得選舉。在一篇刊登於雜誌《紐約》（*New York*）、名為「尼克森將如何贏得選戰」（“How Nixon Will Win”）的文章中，身為南方策略主要規劃和擁護者之一的凱文·菲利浦（Kevin Phillips）說明了反對墮胎（還有迷幻藥〔LSD〕和赦免逃避兵役者）背後的理由依據。席格（2014）將菲利浦的看法總結如下：「墮胎權……確認了傳統社會角色的崩壞，也就是男性要做好了在戰爭中殺戮和死亡的心理準備，而女性則要為婚姻……和母職守身。」

因此，若希望動員勞工階級的白人男性反對一個對女性解放而言重要且有力的物質手段和文化象徵，就必須刻意地擷取天主教整套教義中的一部分，它們在形上學與道德方面具有高度的指向性，而且錯綜複雜。根據席格對菲利浦的論述所做的重建，這乃是為了獲得犬儒主義式的政治甜頭（2014，頁1371）。

對天主教意識形態的挪用也並未止步於此。「生命乃從受孕開始」的想法是直到近期才為人所宣稱，但是自那以來，隨著多州提倡對人格性進行修訂，已有無數人嘗試把這份想法在法律中發揚光大。無論這些努力最終是否成功，多年以來，生育權在美國遭受了來自共和黨員們系統性的、史無前例的攻擊，這些攻擊在近期又更加劇烈。全國的墮胎診所紛紛因為限制而關閉，墮胎服務提供者經常指控這些限制缺少確實的醫學考量；診所的工作者被要求具有在醫院安置病人的權利^{註89}，而診所本身則必須符合外科手術等級的標準，例如走道必須足夠寬敞，以便讓兩張輪床可以同時並排通過。結果是，在撰寫本書之際（二〇一七年二月）^{註90}，美國國內中部的五個州裡分別都只剩一間墮胎診所，而「停止資助生育計畫聯合會」（Planned Parenthood）則是共和黨在二〇一六年大選後所公布的第一項舉措^{註91}。

因為這些和其他對墮胎服務的阻礙，例如強加等候期、在手術前必須要有多次回診、難以成功及時預約，以及許多州內針對二十週後墮胎的嚴格規定，許多女性因此求助於非法的、由密醫或自己動手的墮胎措施。這樣的結果是，母親的死亡率一路提升——在德州，自從生育計畫聯合會的經費資助於二〇一一年被取消開始，死亡率已然成長兩倍^{註92}。許多女性的經驗相當悲慘，即使那些健康、未受危害的人也是。有一名已經開始流產的女性仍然必須產下胎兒，儘管胎兒還有心

跳，但先前就已因為嚴重的先天疾病被認定一旦離開子宮便沒有存活可能。即使胎兒的雙腳已經開始伸展，死產無法避免，這名女性仍被醫院趕回家數次。這情況持續了四天，直到她自然破水；她曾數次尖叫尋求醫師的協助，但醫院卻不得施行緊急墮胎手術，因為她的孕期剛過二十週，已經超出了德州的「胎兒疼痛法」（“fatal pain” law）所規定可以執行手術的時間點——即使在這類的緊急情況之下。證據顯示，胎兒在第三孕期——也就是第二十七週——之前並無法感受到疼痛
註93。

施行這些限制的同時，某些州也在已經很普遍的重殺人罪外引進了針對殺害嬰兒的法令。在印第安納州，頭兩個因為殺嬰罪而被起訴的人——帥貝貝（Bei Bei Shuai）和泊威·裴塔（Pavi Patel）——是亞裔美國人，住在一個亞裔美國人只占總人口不到2%的州內。一些倡議工作者表示，因為人們對她們家族（或在帥貝貝的情況裡，是她個人）原生國的刻板印象，包括——令人啼笑皆非地——這些國家對女孩與女人的貶低，還有以性別為選擇條件的墮胎行為，導致這些女性特別容易遭受不正當的猜疑
註94。

裴塔的案例登上了頭條。她因為使用網路上購買的藥物自行墮胎與拋棄胎兒而遭逮捕、起訴與判刑。根據裴塔的證詞，胎兒於二十三或二十四週間（在某些州內，此時墮胎仍為合法）出生時已經死亡；本案件的事實在法庭上受到爭辯，該州的專業證人作證指出，其胎兒出生時的週數比裴塔所說的多了一到兩週，而且當時已經開始呼吸。然而，倡議工作者兼學者迪帕·艾耶（Deepa Iyer）表示：「裴塔的判決等於對一個流了產然後尋求醫療照護的人進行懲罰，沒有女性應該擔心自己會因此入監服刑。
註95」因為印第安納州反覆且可能刻意以此法針對亞裔美國女性的舉措，艾耶決定投身此案。

裴塔於二〇一五年三月被判處二十年徒刑，她坐了一年四個月的牢，直到她成功於印第安納州的最高法院贏得上訴。然而，如今有多少女性將會因為擔心被逮捕、起訴和監禁，而在類似情況下（大量陰道出血）、甚至是在流產之後，逃避去急診室就醫
註96？更有甚者，這條法律在執行時隱約帶有種族歧視的本質；隨著褐色身體們被當成用完即丟的物件，作為給其他女性的一個教訓，這生動地示範了性別歧視、厭女情結和種族主義之間的糾結牽連。但，令人感到羞恥的是，這僅僅是眾多例子中的一個
註97。

因此，在保守智識下，女性已經會因為墮胎而受到懲罰。當然，他們是不會這麼說的；當談到懷孕女性和胚胎或子宮中的胎兒時，「愛他們雙方」是一個老套的說法。但這是一種很奇怪的愛，它甚至可能會強迫強暴或亂倫受害者懷胎直到足月；正如女性主義哲學家安·卡德（Ann Cudd, 1990）所說，這是一種很奇怪的愛，它還會強迫女性懷孕。

這是一種很奇怪的愛，它使得三分之一的美國女性犯下殺人罪，並在集體層面上犯下了種族滅絕罪。曾因其道德領導能力而受到另一位共和黨二〇一六年的總統初選參選人泰德·克魯茲稱讚（Ted Cruz）的福音教會反選擇極端人士，特洛伊·紐曼（Troy Newman），清楚地表達了這個針對墮胎女性的灰暗觀點；紐曼在他的著作《他們的血哭乾》（*Their Blood Cries Out*）（2000）裡寫道：

藉由直接將墮胎和其他形式的預謀委託殺人進行比較，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它們原則上並沒有差別。然而，在我們的社會裡，一個墮胎的母親被視為是不可批評的，但任何一個殺害了其他家庭成員的母親都會被指出，她們究竟是什麼：殺人犯^{註98}。

在名為「殺人的媽媽」的章節中，紐曼繼續寫著：

在我們當前的社會氛圍裡，我們可以接受把墮胎的責任歸咎到施行手術者身上、社會上鼓勵墮胎的自由主義者身上，以及允許墮胎、甚至為其支付費用的立法者身上，但母親是唯一一個我們不能指控有罪的人。諷刺的是，她才是那個最需要看見她做了什麼的人……

即使是在「支持生命」運動^{註99}裡，那些採取直接行動拯救生命的救援者想要把墮胎稱為謀殺，但他們對於要當著母親的面稱她為殺人者卻也感到猶疑不定，因為擔憂會冒犯了她與「政治正確」的群眾。但藉由當面質問母親她的罪行，我們的目標在於讓她看見她的行動所造成的邪惡。如果不與她對質，我們便阻止了她導向悔悟和最終修復的機會。

回顧這些觀點，我們可以看見，事實上，川普所提出的給予墮胎女性懲罰的說詞，並非如柯林頓所說的，是保守派對此議題看法中最誇張的版本。川普至少願意接受、甚至假設，即使墮胎被禁止，有些女性仍會試著如此做，就算共和黨人士們宣揚著舉世無雙的愛，就算他們拒絕提供物質上的支持給那些必須在缺少適當的物質、社會和財務資源的情況下仍懷孕到足月的女性。藉著將這些女性從論述中消抹

掉，反選擇運動裡的其他人基本上是在抗拒這股合理壓力，不承認她們將必須受到懲罰。有時候，他們似乎認為，這樣的女性可能會從此停止存在於他們所想像的美國裡——也就是說，當墮胎服務提供者被迫關閉，而支持選擇的意識形態不再被允許引領女性走上歪路之後，無論如何都不會再有任何女性尋求墮胎。她們將會想要為了理想而出借她們的子宮，就算是在被強暴或亂倫的情況下。歷史紀錄強烈地反駁了這個預測。

在書的結尾，特洛伊·紐曼寫到，那些墮過胎，並且在「不曾悔悟」的狀態下死去的「女殺人犯們」：

大概將會帶著殺人罪走入墳墓，她們的靈魂因為被謀殺兒童的無辜血液而腐敗；她們只能期待，在死亡時她們將聽見無辜兒童嚎叫著她們的名字，指控她們，要求復仇。

根據這種意識形態，好母親值得在地球上被讚揚，在天堂上得到無限的獎勵，但對那些可能會選擇墮胎的女性來說，地獄可能都太過仁慈。比不道德更為嚴重，這些女性極度不自然，是名副其實令人深惡痛絕的。這是我們在共和黨人士的厭女情結和性別歧視的毒性交織點上所找到的內容。我們可能會好奇，事實上究竟是誰在嚎叫，又是為了誰。

拒絕（的）女性 Withholding (from) women

於是乎，結果是女性不僅被懲罰，也不被提供可以救命的醫療措施。但她們是為了什麼而被懲罰？而這種拒絕又是為了什麼目的？

一個左派間常見的假設是，右派人士試圖懲罰在婚姻外有性行為的女性，因此反墮胎主要是為了監督女性的身體和控制她們的性。無庸置疑，這些動機確實是這個陰鬱組合的一部分。但如果事情真如此單純，那麼，為何要禁止提供墮胎機會給身為強暴與亂倫受害者的女性？而它卻是一條受到廣大支持的禁令。根據蓋洛普近日所做的一項民調，在二〇一六年，幾乎五分之一的美國人表示，墮胎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是非法的，甚至連「危及母親生命」這樣的例外情況都被包括在內^{註100}。因此，我們很難相信反墮胎是為了拯救生命。然而，如果真是為了反對墮胎而反對墮胎（也就是認為，讓一兩個人死亡比謀殺胎兒或甚至胚胎好），那麼，為什麼不盡全力讓許多的——且往往便宜的——避孕措施變得可及，既然它們能夠使人免於受孕？但如同我們在最高法院對「伯韋爾訴霍比羅比」（Burwell v. Hobby Lobby）（2014）^{註101}一案的判決所見，顯然的，這並沒有發生。

於是問題來了：女性是因為做了什麼或身為什麼，而被認定有罪？

我認為，是拒絕與未能付出；是冷漠、麻木以及無情；是在將一個脆弱生物從其正當的家中、他與生俱來的權利中驅逐的同時，女性無視了她們的天然責任，亦即提供安全港和養育。因此，即使是為了拯救自己的性命，尋求墮胎的女性仍像是一張空白畫布，人們在上頭投射了一套不滿，其中承載著未被滿足的需求，這些需求又承載了一種理所當然的感受。我將於下一章闡述這個想法。

林博反覆說著珊卓·福魯克「不負責任」，而且是一個「典型的自由派」，他的謾罵裡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這是一個樂於表現出自己的不道德、無根基、對自己的生命毫無目標的女人。」但我們可能反而會覺得，問題其實在於她的生命裡有著太多的目標和方向，而非太少。

林博擅於操弄他的目標聽眾——主要是保守白人男性與某些狀況類似的白人女性——之中常見的迷惘、失落和悲傷感受，並將它們轉化成

憤怒，有時候是藉著使用一種合身的道德論述予以妝點，賦予他們受害者的角色。

一方面，福魯克被描繪成破壞了社會契約（因為從林博和他的聽眾身上拿了錢，卻沒有提供相應的性服務）。面對林博和他的聽眾，福魯克是一個妓女——回想林博搖擺不定的態度，他們要嘛是她的客戶，要嘛是皮條客，而這個比喻的重點在於，福魯克應該把自身女性特質中的一部分給予他們。我猜想，把焦點置於性上是自然而然、卻不一定必要的作法。此外，在後續的故事裡，福魯克也不正當地以為自己有資格；她期待從他們身上獲得某物，卻沒有把自己的注意力回報給他們。而掩藏在這一切之下、隱藏在幕後的是，她未能提供照護、拒絕創造生命，或照顧弱勢者。

在結構上，針對這類故事的另一個合理解釋，則有可能指向此類女性惡行裡的另一名對象，並且透過認同感或道德聖戰來激起憤怒。因此，我認為，將懷孕的女性描述成不可靠且不負責、但顯然地或許並不是無可救藥，這種論述的力量在於，她們乃是遭到真正邪惡的墮胎倡議者和手術提供者所誤導，以至於把無助的胎兒從他們的正當庇護所中驅逐。因此，胎兒在此作為一個有力的文化象徵，並代理了某些男性覺得被女性忽視和剝奪的感受。他們的脆弱感可以被投射到胎兒身上，因此讓他們能夠以另一個想像中的人的名義感到憤慨，而正好，這些被想像的人並沒有自己的計畫，而且在他們真的成為一個有知覺的生物前，也無法出聲拒絕別人決定他們作為知覺生物的利益。相較於去承認自身被拒和受傷的感覺，占據道德高地往往比較容易。一位作者寫下：

儘管被母親的子宮圍繞，未出生的胎兒已經是一個人了，而剝奪胎兒它尚未來得及享受的生命，幾乎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如果在我們看來，在一個人的家中殺害他比在戰場上更為恐怖，因為一個人的家是他最安全的庇護所，那麼，在一個胎兒未見天光前就在子宮裡摧毀它，自然就應該被視為更殘暴的行為（Calvin, 1999）。

這是約翰·喀爾文（John Calvin）寫於十六世紀的文字。將母親的子宮類比為一個處於支配地位的男性的家兼安全港——或安全空間——早已是父權意識形態中的一部分，且持續如此。

至少，這是我正在思考的假設。它的優點在於，它可以解釋為什麼保守人士對墮胎的看法如此不一致、隨機，而且似乎從未真能搔到癢處，即使是當他們獲得了自己表面上所爭取的結果時。

厭女情結作為一種反挫 Misogyny as backlash

有一種常見的看法是，厭女情結是過去的事了，或是它的古老形式已經消失，被一種「新厭女情結」所取代（Brooks, 2016; 參見 Manne, 2016d），但我懷疑它的真實性，而且這在思考上反而違背了節約的考量。雖然父權秩序涉及的內涵比厭女情結更廣闊，但後者卻普遍存在，而且只要它是服務於執行父權的規範與期待，它就可以說是一個和前者有著因果關係且不可或缺的面向。這幫助我們解釋了為什麼厭女情結普遍存在於表面上看來高壓的政權之下，而又是為什麼我們同樣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厭女現象浮現於當前的美國。女性主義在很多方面都有著快速而驚人的進展，但這也導致了憤怒、焦慮和厭女情結的反挫。我們看到這股反挫力道披著道德主義的外衣出場，或受到匿名的掩護，例如在網路評論區上。

因為，即使人們已經不那麼遵從性別歧視的思考，也就是說，他們已經不那麼懷疑女性的知識敏銳度或領導能力，也比較不傾向接受那些關於女性過於情緒化或不理性的惡意性別刻板印象，這卻並不表示女性主義的任務已經完成。相反的，當女性的能力變得突出，並因此使人感到喪氣或感到威脅時，過去潛伏或冬眠於文化裡的厭女情結便可能出現，而這可能會導致抨擊、道德主義、一廂情願的想法和固執否認以略為隱晦的形式出現，也會讓某種低等級的怨忿降臨在抗議用的肖像和代罪羔羊身上，並且化膿。

某些時候，女性會被告知，在其他條件都和男性相等的情況下，她們需要表現得加倍優秀，才能夠一樣地受到尊重、成功、被人讚揚等等。無論這是不是真的必要，在任何可能的性別歧視形式下，這都是不夠的；此外，有時候我們甚至不清楚，哪樣才有可能足夠。一名女性的傑出可能會對某些人造成相反的效果，讓她成為一個兩極化的人物。換句話說，女性可能會因為太合格、太有能力了而受到懲罰；人們可能會「反感」，並且不經意地參與一些事後的合理化，以解釋他們一開始的懷疑或驚愕。我將於第八章重回這個主題。

在美國總統大選後，我回顧了一些我在競選期間寫下的筆記。我在二〇一六年三月時寫下：

正如川普的競選活動所充分展示的，在〔當代美國〕這個世界裡，某些過去富有特權的男性正步履蹣跚，並且拖累了因為他們的殞落而失去方向的女性。因此，當女性反轉性別階序並渴求帶有陽性屬

性的社會角色時，厭女情結就有可能被激發。我們可能想不出比（女性）投入政治工作更明顯的觸發因子了，尤其當這麼做可能使敵對的男性政治人物付出代價時.....

如果這大抵上是對的，那麼，這便影響並釐清了針對從政的女性們我們所需要問的問題。即使像柯林頓這樣的女性本身不會服從錯誤的信念或不復存在的性別刻板印象，她們可能恰恰會因為她們所表現出來的能力，而被以帶有敵意的方式看待或對待。柯林頓的政治能力有可能會在某些脈絡裡對某些人造成威脅感。

在此理解基礎之上，比起低等級的憤怒，厭女敵意可能或多或少會更為明顯與強烈，從輕微地不喜愛與懷疑，到理直氣壯地仇視和暴力。男性和女性都有可能表現並操弄厭女情結，有鑑於父權社會結構的崩解可以影響到任何人，這件事應該很明顯。但格倫·格林沃德（Glen Greenwald）卻聲稱，針對所謂「伯尼青年」們的指控太過誇張，因為某些辱罵乃是來自於女性^{註102}。

如今人們通常很願意承認自己受到了隱藏偏見的影響，例如隱晦的種族和性別相關偏見可能在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影響他們的思考和行為。這不是川普般毫無歉意的偏執，這符合對平等價值的追求，然而當談到性別時，隱藏偏見卻似乎在未開化的性別歧視和未開化的厭女情結之間變得模稜兩可，而後者經常可能獲得事後的合理化。這個現象已經在心理學中被廣泛記載了，例如當我們體驗到對某個人的敵意感受、卻不太清楚為什麼時，我們的心智隨即便搜尋理由以解釋我們的負面感受：她的聲音很刺耳；她在吼叫；而且她為什麼不微笑？

我可以想出至少一個理由。因為，不管柯林頓應不應該成為總統，這顯然並不公平，而我擔心這將會影響十一月時的投票率。

不管我們怎麼看待希拉蕊·柯林頓，不管她是不是一個女性主義候選人，這都是一個值得被指出的女性主義成就：一個女性將有可能成為美國的下一任總統。然而饒是如此，卻也是這個事實讓我們在近期目睹了這麼多厭女情結的反挫。諷刺的是，我們確實有可能選出一個女性總統的事實，也是現在阻止這件事情發生的原因，柯林頓的勝選可能會使她及其他許多女性暴露在白人男性所表現出來的憤怒之下，這些男性組成了川普主要的支持群眾^{註103}。

此處的用意並非指出我的先見之明，而是發生的這一切都太容易被預測了。女性政治人物是一個富有吸引力且常見的厭女攻擊出口，因為她們身為公眾人物與集體注意力的對象，還有從道德上來說，她們是羅夏克的墨漬^{註104}。她們幾乎註定要以某種方式妥協，並受制於真誠的道德批評，但問題不僅在於她們是否受到性別歧視或某種程度上明顯性別化的標準所評斷，而是，和她們的男性同儕相比，她們面對了多少道德批評，以及這對她們的道德聲譽造成了多大的損害。

許多左派人士激烈地堅持他們對柯林頓並沒有抱持偏見，但儘管如此，他們仍堅信她是腐敗、不懷好意、貪婪、搞特權而且麻木不仁的。《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的一位投稿人形容自己是一個支持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並喜歡艾麗·高登（Ellie Goulding）（我猜想這是一個相對流行的象徵）的小鎮部落客，他寫到，他因為總統大選而失去了一名女性友人。這名友人指控他對希拉蕊懷有成見，而他表示反對：「我始終不清楚確切原因是什麼，導致她這麼覺得……當我選擇不支持一個候選人時，我試著為這個決定提供非常好的理由。」也就是柯林頓「看似永不滿足的貪婪」，她未經證實但卻廣受揣測的貪腐；這其中必定有某些真實成分吧，他如此推論（但似乎並沒有，例如可參考Abramson, 2016）。還有她的偽善，這表現在她「對血腥的明顯渴望」上，她甚至不惜冒著殺害兒童的風險，而她聲稱自己在乎那些兒童^{註105}。

換句話說，柯林頓被認定比珊卓·福魯克擁有更多的權利，比紐曼口中的殺人母親更加地嗜血與麻木。隨著初選期緩緩前進，對大刀闊斧進行經濟和結構改革的強力呼聲逐漸開始帶有更多摩尼教般的、個人主義的指責意味，某些桑德斯的支持者在美國呼喊著「燒死那女巫」^{註106}，也就是希拉蕊。與此同時，他們不經意地呼應了不久前才在澳洲聽到的吟誦，它們（如我們在此章中所看到的例子）在吉拉德擔任總理的短暫期間內糾纏著她。無論是她們所遭遇到的厭女謾罵和道德質疑，還是後者的龐大數量（我將在最終章就此進行討論），這兩名女性的經歷有著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而這是其中之一。與此同時，餘下的故事便是最近的消息了：希拉蕊在火光中落敗的同時，川普登上了白宮。

^{註69}：在進行一項改良性計畫時，我認為有種作法很有幫助，就是去思考詞彙與概念之間的相對性，並且試圖讓它們得以在最和諧、最有效率的方式下相輔相成。而這通常會涉及語意上的分工：在這個例子裡，便是「厭女情結」和「性別歧視」兩個詞彙的差異。在我聽來，後者這個詞不如前者來得有敵意。事實上，它甚至可以說是缺少任何有效的涵義，僅僅除了

某些時候，當我們指出某件事情帶有性別歧視時，意味或暗示著在一個薄弱的意義上，這件事情某種程度來說是錯的，是帶有歧視意味的。

註70：譯註：「『應該』蘊含『能夠』」是由哲學家康德所提出的原則，指出一個主體如果在道德上被認為「應該」做某件事（X），在邏輯上就表示他「能夠／有能力」做某件事（X）。

註71：譯註：「『應該』蘊含『能夠』」的邏輯其實也就等同於，當一個主體A不可能／無法做到X，則他也就不「應該」這麼做。據此，作者再一次將此邏輯延伸為：如果主體A不可能／無法做到X，那他也就不需要嘗試（因為註定會失敗）。

註72：譯註：此指女性持續不斷地從專業領域中退場，因為相較於男性，她們更容易因性別在不同階段面對外在挑戰。

註73：然而，當「厭女的」這個詞彙被應用於個別主體上時，我們則可能選擇將「性別歧視的」這個與厭女類似的詞語定義為一個「門檻詞彙」，而不是一個有級別之分的形容詞。在我看來，我們似乎比較少討論日常情景中出現的「性別歧視者」，而在本書中我也並不覺得有此必要，因此我將這個術語的問題暫時擱置，讓未來的理論者們可以分頭進行探索。

註74：譯註：作者在此指的是，厭女情結一詞在大眾媒體與社群網絡上被使用的方式並不同於以往字典中的定義。當女性主義者在媒體和社群網站上使用厭女情結一詞時，她們所指涉的攻擊類型往往是更為廣泛的，而並非只是一種「心理上對女性的仇視」。可參考其後澳洲前總理茱莉亞·吉拉德（Julia Gillard）的例子。

註75：譯註：此處作者指的應是叫艾伯特看看自己，因為他是公認的厭女者。

註 76：“Transcript of Julia Gillard’s Speech,”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12/10/10,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transcript-of-julia-gillards-speech-20121010-27c36.html>

註77：當時《雪梨晨鋒報》（Sydney Morning Herald）的一篇報導寫著：「編輯蘇·巴特勒表示，是時候〔厭女情結的定義〕改變成一個當吉拉德女士上週於國會指控反對黨黨魁東尼·艾伯特性別歧視與厭女時，可以反映出她真正意思的詞彙了。他並不需要坐在心理諮商師的沙發上進行對話，他只是單純地對女性持有『根深柢固的偏見』。在本字典下一個更新版本裡，它將會變成這個詞彙的第二個正式定義。『我們決定，我們已有了基本的定義——對女性的仇視，但這並不是過去二三十年間厭女情結這個詞被使用的狀況，尤其是在女性主義者圈子裡。』巴特勒於週三時對ABC電台這麼說。『「性別歧視者」似乎逐漸變成對表面特徵的描述，而「厭女者」則適用於根本的態度。』這個根本的偏見衍生了這些性別歧視的案例，巴特勒說。厭女情結就像性別歧視，但『更為鋒利』。」

“Misogyny Definition to Change after Gillard Speech,”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12/10/17, <https://www.smh.com.au/national/misogyny-definition-to-change-after-gillard-speech-20121017-27q22.html>

另一篇針對字典重新編寫的代表性報導則寫著：「被視為澳洲詞語意義絕對權威的《麥考瑞字典》編輯蘇·巴特勒於週三表示，這些政治上的喧鬧讓她的編輯同僚發現，他們字典內的定義已經太過脫離時代……巴特勒說，《牛津英文字典》早在十年前就把這個詞的定義從一個心理學上的術語加以拓展，將它的現代意義包含進來，但直到吉拉德的演說所引起的辯論才促使《麥考瑞字典》檢視它的定義。『作為字典編輯，也許我們之前就應該注意到這件事情，而不是等到它被粗魯地推到我們的眼前，如同一件我們忽略了的事。』巴特勒對美聯社表示。她提到，這個決定引發了抱怨。」其中一個抱怨是：「看起來比較符合邏輯的作法是，首相應該要改進她的字彙選擇，而不是每當有政治人物破壞英語語言時，《麥考瑞字典》就得一直去改動字彙的定義。」艾伯特的參議員之一，費歐娜·奈許（Fiona Nash）這麼說。Rod McGuirk, “Misogyny Fight in Australia Sparks a Change in Dictionary Definition,” The Star, 2012/10/17,

https://www.thestar.com/news/world/2012/10/17/misogyny_fight_in_australia_sparks_a_change_in_dictionary_definition.html

註78：朗頓也做出下列類似的，引人思考的評論：「值得注意的是，怨懟看似和物化態度一致……當一個人用簡化的態度把女性視為粗野的生物，目的在於滿足男性的性欲時，他也可能表現出對女性的怨懟。厭女情結有時也可能便是呈現出這般的組合，而也許，怨懟和物化態度之間的連結並非巧合，也許它是由恐懼所造成，因為一個人擔心自身的欲望會使其受到這類可鄙生物的控制。」（2009，頁332）這是第一章註釋3裡所提及的、朗頓就厭女情結所提出的一個清晰而重要的主張。我對朗頓所提到的可能性存疑，亦即女性在被視為「可鄙生物」的同時，卻又被怨懟氣憤。我將在第五章說明理由。與此同時，讓我檢視另一個可能性：「怨懟 - 恐懼」的組合並非極端的性別歧視結合厭女情結的結果，而是來自厭女情結本身，或是厭女情結結合了一種較緩和的性別歧視形式的結果。回想我在序言中的題詞，維吉尼亞·吳爾芙因為在牛劍校區內踏上男性的領地而引發了教區執事的恐懼和憤慨。一個針對該段落的自然解釋是，他因她的無動於衷或厚顏侮慢——或者用更概括的說法，她的自由——而怨懟氣憤。無論該規定是否受到一些性別歧視理論的支持，導致草地被視為專屬於男性的領域，吳爾芙確實擅自離開了女性應該要堅守的碎石路。此處的恐懼可能來自於一個社會角色的反轉或破壞，我將在第五章的最後一節討論這點。

註79：譯註：美國喜劇演員。

註80：譯註：前惠普執行長，二〇一六年時加入共和黨的總統初選。

註81：譯註：福斯新聞女主播，曾擔任美國總統大選辯論會主持人。

註82：除此之外，這些主張也構成了對支持群眾的迎合，他們因為所謂的受害者文化而感到委屈，第七章將以此為主題。因此，對於這類的人來說，一個很常見的舉動就是打出「別人打XX牌」，並且在他人抱怨自身因為種族或（尤其是）性別因素遭遇到體制不正義時，自動地予以否定——這是一個在表面上似是而非，且很可能偽善的舉動。可參考史勞伯（2016）的相關討論。

註83：譯註：莫妮卡·陸文斯基曾在比爾·柯林頓擔任總統時於白宮實習，實習期間爆出兩人曾發生性關係，柯林頓坦承陸文斯基為他口交，因此蘇頓在此使用了「蹲在他面前」（going down on him）以暗示口交的動作。

註84：Sara Jerde, “GOPer: Clinton Will ‘Go Down Like Monica Lewinsky’ Debating Trump,” Talking Points Memo, 2016/04/28, <https://talkingpointsmemo.com/livewire/florida-republican-clinton-down-like-lewinsky>

註85：“Donald Trump Advocates Punishment for Abortion,” Hardball with Chris Matthews, MSNBC, 2016/03/30, <https://www.msnbc.com/hardball/watch/trump-s-hazy-stance-on-abortion-punishment-655457859717>

註86：Nick Gass, “Clinton: Trump Said What He Believes on Abortion,” Politico, 2016/04/05, <https://www.politico.com/blogs/2016-dem-primary-live-updates-and-results/2016/04/donald-trump-hillary-clinton-abortion-221594>

註87：譯註：在美國，墮胎議題的討論可分為兩個陣營，支持女性擁有墮胎權者自稱為「選擇支持者」（pro-choice），強調女性應該有權為自己的身體做決定；相對的，反墮胎陣營則被稱為「反選擇」（anti-choice）。但從反墮胎陣營的視角來說，他們則傾向自稱為「生命支持者」（pro-life），表達對未出生的「生命」的支持。

註88：譯註：羅訴偉德案（Roe Vs. Wade）是美國司法史上影響最大的案件之一，當時化名為羅的女性當事人控告美國德州的反墮胎法規違反美國憲法。美國聯邦法院在一九七三年做出裁定，宣告限制婦女墮胎權的法律違憲。此後，地方政府不得立法禁止婦女墮胎。

註89：譯註：也就是說，在墮胎診所工作的醫師必須和鄰近醫院合作，取得「病床數配額」，讓他們在有需要時可以安排病人住院。

註90：Rebecca Harrington & Skye Gould, “The Number of Abortion Clinics in the US Has Plunged in the Last Decade- Here’s How Many Are in Each State,” Business Insider, 2017/02/10, <https://www.businessinsider.nl/how-many-abortion-clinics-are-in-america-each-state-2017-2/?jwsourc=cl>

註91：Tara Culp-Ressler, “Paul Ryan Pledges GOP’s First Legislative Action Will Defund Planned Parenthood,” Think Progress, 2017/01/05, <https://thinkprogress.org/republicans-health-care-3bbcb30f626a/>

註92：Katha Pollitt, “The Story Behind the Maternal Mortality Rate in Texas Is Even Sadder Than We Realize,” The Nation, 2016/09/08,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the-story-behind-the-maternal-mortality-rate-in-texas-is-even-sadder-than-we-realize/>

註93：Brandy Zadrozny, “Texas Forced This Woman to Deliver a Stillborn Baby,” Daily Beast, 2016/03/31,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texas-forced-this-woman-to-deliver-a-stillborn-baby>

註94：“Asian American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are Being Targeted, Says Advocate,” NYT Live New York Times, 2015/11/11, <http://nylive.nytimes.com/womenintheworld/2015/11/05/asian-american-womens-reproductive-rights-are-being-targeted-says-advocate/>

註95：Jessica Valenti, “It Isn’t Justice for Purvi Patel to Spend 20 Years in Prison for an Abortion,” The Guardian, 2015/04/02,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5/apr/02/it-isnt-justice-for-purvi-patel-to-serve-20-years-in-prison-for-an-abortion>

註96：也可以思考其他情況，包括副總統彭斯曾提出對胎兒遺體的強制火化（或說所謂的葬禮），對流產女性進行刑事調查的趨勢增加（Grant, 2016），以及在許多州內，性侵害加害人擁有完整的親權（有時甚至是在被判刑的情況下）。可參考如Eric Berkowitz, “Parental Rights for Rapists? You’d Be Surprised How Cruel the Law can Be,” Salon, 2015/10/04, https://www.salon.com/2015/10/04/parental_rights_for_rapists_you_d_be_surprised_how_cruel_the_law_can_be/

註97：例如可參考安琪拉．戴維斯（Angela Davis, 2003，第四章）針對這個議題和監禁處境之間的關聯所提出的有力討論。

註98：被引用於Miranda Blue, “Anti-Planned Parenthood Activist Troy Newman’s Terrifying, Women-Shaming, Apocalyptic Manifesto,” Right Wing Watch, 2015/09/14, <http://www.rightwingwatch.org/post/anti-planned-parenthood-activist-troy-newmans-terrifying-woman-shaming-apocalyptic-manifesto/>

註99：譯註：見頁139的譯註。

註100：“Abortion,” Gallup, <https://news.gallup.com/poll/1576/abortion.aspx>（資料最後擷取時間：2017/05/12）

註101：譯註：此案原名為「西比劉斯訴霍比羅比案」，西比劉斯和伯韋爾分別為美國前後任衛生部長，霍比羅比則為美國一家工藝品連鎖店。霍比羅比反對健保強制企業雇主提供員工的「事後避孕藥」支出，認為在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之宗教信仰自由條款下，企業可以以信仰為理由免除支付的義務，但美聯邦政府則認為營利組織所有者的個人宗教信仰不應該獲得免除權。二〇一四年時美國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票判決霍比羅比公司可以以宗教信仰為由，拒絕為員工支付事後避孕藥支出。

註102：譯註：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為美國無黨籍政治人物，曾任佛蒙特州的參議員，二〇一五年加入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此處指的是在民主黨初選期間，桑德斯的支持者們

對柯林頓的批評辱罵。

註103：Kate Manne, “What Misogyny Means (Or, Rather, Meant) for Hillary Clinton,” 該文草稿可見於：
https://www.academia.edu/29785241/What_Misogyny_Means_or_Rather_Meant_for_Hillary_Clinton_Draft_of_March_21_2016

註104：譯註：羅夏克墨漬測驗乃是由瑞士精神科醫師、精神病學家羅夏克（Hermann Rorschach）所發明的人格測驗，是最著名的投射法人格測驗。測驗內容由十張有墨漬的卡片組成，受試者會被要求回答他們認為卡片裡的圖案看起來像什麼，測試者根據這些答案判定受試者的性格。

註105：Jason Fuller, “Hillary Clinton May Have Experience but She Lacks Judgment,” Huffington Post, 2016/04/14,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it-is-not-sexist-to-say-h_b_9699060

註106：譯註：英文原文為”Bern the witch”，取桑德斯的名字Bernie和burn（火燒）一字的諧音。

第四章 奪取（抹煞）他的所有物Taking His (Out)

應當長跪乞和的時候，她卻向他挑戰；應當盡心竭力服侍他、敬愛他、順從他的時候，她卻企圖篡奪主權，發號施令：這一種愚蠢的行為，真是女人的恥辱。

凱特於莎士比亞《馴悍記》

第五幕第二場（The Taming of the Shrew, Act V, Scene II）

厭女情結與理所當然的權利 Misogyny and entitlement

在艾略特·羅傑的自白影片裡，他強調他覺得一切都不公平——沒有「辣妹」給予他情感、注意力、讚賞、性與愛，並賦予他在同儕之中較高的社會地位。從道德觀點來看，他的理所當然自然是不正當的，可是在今日美國社會的男性裡頭，我們卻不乏聽到（也很有可能包括美國以外的地區，但我把它留給其他人判斷）這種說法，包括如羅傑在內的年輕男性。這是羅傑的言詞（見第一章）之所以困擾許多女性的原因之一：並不是因為它們的內容本身有多麼驚人，而是恰好相反，它們聽來太熟悉了，而想到羅傑接下來的行動，這是一個殘忍的領悟。

某些男性，尤其是那些高度享有特權的男性，似乎認為女人虧欠了他們各種我將於本章說明的相關個人付出和服務。我並不會宣告這種情形有多普遍，不管是以什麼形式出現；我僅僅會指出（根據本章和我接著在結論裡所提出的討論），（a）在許多聲稱後父權的脈絡裡，這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一部分是因為（b）若其他條件都平等，對女性抱持此態度的男性，比對男性抱持此態度的女性更為常見。但我接下来的主要目的是去探索這些關係的輪廓，因為，如果父權體制存在於此時此地，也就是存在於美國、英國和澳洲的文化中，我相信它主要（雖然絕非全部）存在於這個付出和取用道德兼社會好處與服務的不平等性別化經濟^{註107}之中。

接著讓我們思考，一般說來，理所當然之權利的反面，是義務：某個被虧欠之物。因此，如果一名男性確實在面對女性時覺得自己應該獲得某些權利，那麼，他就很有可能會賦予女性錯誤或偽造的義務，而若女性要求這些她理應提供給他的好處，他也就可能將此視為嚴重的不道德或恥辱。這也類似於（第一章裡的）女服務員在未能為她的客人點單後，還要求他替她服務。這不僅是角色的反轉，也有可能激起一種類似「她以為她是誰？」的感受：最初是怨懟，接著是震驚，如果她沒有以適當的愧疚表情來回應批評，並改善自身表現的話。當一個人不僅毫無羞恥心地規避自己的責任，還在成功地翻轉局勢時顯得歡快且毫無歉意，這是特別令人心生憎厭的；她們不僅沒有做到自己的工作，她們還要求他人還這個不存在的禮，或是要求他人替她們履行職責。她們窩囊、漫不經心、不負責任，諸如此類。

注意，這與拉許·林博對珊卓·福魯克的敘事精巧地共振。表面上，林博認定，如果健保給付她的避孕藥處方，那她便有義務提供他和他的聽眾性服務，作為對他們辛苦賺的錢（亦即他們繳納的稅金）的回報。但是當然了，林博並非真的想要他的說法被認真看待；實際上，他真正提供的是某種歸謬法式的論證，福魯克理論上沒有必要提供他們性服務，所以他們也沒有必要給她「他們的」一毛錢。

即使以這類議題的標準來看，這都是很糟糕的論證：它靠的是把財產和稅務的邏輯扭曲到面目全非的地步。（更別提它洩漏了一個雙重標準，因為如同很多人所提到的，威而鋼——舉例來說——是有保險給付的，而自由派女性也同樣有納稅。）但這裡讓我感興趣的是它所透露的心態，不過這並非一種心理學的狀態（就我們所知，林博有可能只是在演戲，在提供一個憤世嫉俗的表演），而是它洩漏了一個在社會層面上的感受，包括「誰擁有什麼」，以及誰是誰應得的權利——不只是她們的身體，還有她們的心智，也就是她們做決定的能力、意志和主體性。誰被假設有著優先權，可以擁有她的注意力，讓她以他為主，並以他為優先？正如同這裡選用的代名詞所暗示的，在許多領域內，某些男性次群體，尤其是那些享受著相對較高程度的權力和特權的男性，在面對女性時，似乎比女性面對男性時更為強烈地意識到所有權。本書的結論也將會清楚地呈現這點。而當這種意識被挑戰、阻撓、破壞與威脅時，這經常會觸發對女性的厭女情結；或者在某些情況裡，在面對侵犯了自身假定財產的男性對手時，則會觸發暴力。他可能也會奪取他認定她所虧欠的東西，也就是他認為女性應該要給予他，以及理應供他取用的東西。

整個情況中有一個關鍵的複雜問題，如同羅傑和林博的例子所示，那就是可能沒有一個特定的女性讓他們得以主張自己想像上的應得權益，或用以指責試圖詐騙他們的權益（再一次的，這乃是根據他們扭曲的厭女情結邏輯）。相反的，他們各自創造了一個敘事，為他們自己（在羅傑的案例裡）或代表他的聽眾（在林博的案例裡）描繪出一個朦朧迂迴的連結。這個連結與故事的終點是一名女性代表，她的功用是為這個令人氣憤的缺席女性擔任代罪羔羊（或者，在羅傑的情況裡，這實際上是一個雙重缺席，一個並非由任何特定人物所犯下的疏忽之罪）。因此羅傑需要找到一名女性，她大約符合一種女性類型，而在羅傑眼裡，該類型的女性殘忍地剝奪了他的所有物，且根據羅傑的抱怨背後的論點，這個被剝奪的所有物是女性她自己。她不僅僅忽略他，更刻意地無視他；她不僅僅不留心，更太過高傲以至於未

能注意到他；他不僅僅覺得自己不被她看見，她還讓他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是、不存在、不被當成一個人。

因此他將會以同樣的方式奉還，或者應該說，加倍奉還。他會徹底消滅她和她的姊妹們：一整個屋子的人都是世界對他不公的證據，且其中那些犯下了「罪行」（用他的話說）的人活該受到懲罰，她們的罪是使他感到挫敗^{註108}。

請注意到有多少女性可能遭受到這類的暴力，就算暴力實際發生的機率相當低——就一種常見的抱怨來說，羅傑的爆發是格外暴力的反應，但還有一些結果不那麼令人驚恐反感。此外，如果有一個和你差不多的人得以作為代罪羔羊或目標，那麼，你就屬於會遭受一種非典型犯罪的群體：亦即一個徹底來自陌生人的報復行為，而他是專門獵捕你（回想羅傑如何跟蹤他的受害者）。當你為此感到不安，這並不是不理性的^{註109}。

她所能付出的 What she has to give

「女性有所虧欠，或應該有所付出」的這個想法為何持久不衰？除了先前提到的好處和服務以外，它還包含了什麼？

我認為，一個使它持久不衰的理由是這些好處確實非常有價值：它們是真正地良善，而少了它們是件壞事。人們當然想要它們，某些甚至是被需要的，考量到除了愛意、傾慕、縱容等等以外，這類陰性屬性的好處和服務還包括了單純的尊重、愛、接納、照顧、平安、安全感和庇護；還有仁慈與同情、道德注意力、在意、關心與安撫。這些情緒和社會勞動形式超出了有形的生殖與家務勞動，在某些異性戀伴侶關係裡，可能已經較少期待由女性負擔後者，或它們如今已經較為平均地（互相）分配。這種非實體的工作形式仍是工作，但它們並非一種「忙碌工作」，忙碌工作的「非做不可」（ought-to-be-doneness，借用道德哲學家約翰·麥基〔J. L. Mackie〕的用詞）乃是因為資本主義誤導了我們，一個美好、富有意義的人類生活必然是什麼樣貌。陰性屬性的工作確實需要被執行，但就如同那句性別歧視的俗語所說，這也是為什麼它永遠無法被完成。不僅僅在家中如此，在工作場合上亦同；不僅在私領域如此，在公領域內亦同，在許多公民互動中也是——假如這些互動想要顯得文明的話。

因此，當這種工作經常受到道德鼓勵的捍衛，並被女性內化成「待辦之事」時，這並不令人驚訝。接著，倘若這些職責沒有被實踐，那麼社會讚許就有被收回的風險；當它們被樂意且愉快地執行時，則有著愛與感激作為激勵^{註110}。

而假如女性不僅被指派去執行比份內更多的工作，還會在規避這些推定職責時遭遇到更嚴重的負面後果，那麼，這當然使問題變得更加嚴重。當涉及相關類型的陰性屬性照護勞動時（可參考霍希爾德〔Hochschild〕和曼蓉〔Machung〕於一九八九年所出版，針對「第二輪班問題」〔second-shift problem〕的著作），基本上，她將會付出，而他將會取用，不然她就會遭到懲罰。

許多這類公開化的鼓勵被進一步用來執行這個道德與社會勞動的性別化經濟。換句話說，在公共生活裡針對一名女性展現厭女情結，可能有著警告其他人不要模仿她，或甚至不公開支持她的功用。女性也可能會為了男性的利益，並出於嫉妒地守衛與儲藏自身的支持，這

件事與忠誠的規範結合在一起後，女性若對厭女情結受害者展現出團結情感，便可能會變得危險——最後一章將對此有更多討論。

不過，如果她取用了呢？如果她開口要求了呢？我們必須將問題稍做區分好加以戰勝它。此處的答案將取決於她是否要求，或嘗試取用了那些已經被指定為以下的事物：

（i）她必須給予他的事物（亦即從她的角度出發，是「取回」的舉動）；或

（ii）他必須給予她的事物，但她卻沒有給予他（或至少提供他）社會規範要求她提供他的互惠好處與服務；或

（iii）長久來說，僅可以被他取用的事物（在和其他男性競爭的情況下）。

此處，是一個女性可能會因為（i）而遇到的規範：不要要求或取用那類你理應付出的事物，無論是付出給他，或是給這個社會。若你已經對他有所虧欠，甚至也許他已經被其他女性欺騙，或者整體來說生活不順利時，這尤其不恰當。

女性可能會因為上述（ii）而遇到的規範則是：不要要求那類他可能曾經一度提供過的好處或服務——金錢、彬彬有禮，或他們標榜的殷勤（這有時不過就是基本的體貼），當由女性所回饋的好處類型較少受到競爭且更容易到手時。「親愛的，這交易泡湯了」往往會是此處的訊息，基本上，這就是林博對珊卓·福魯克的譴責中的關鍵^{註111}。

最後，我將指出女性會因為（iii）而遭遇到的規範：不要要求或試著取用陽性屬性的好處和特權，至少不要在他仍渴望它們的情況下要求。與此同時，即使他不渴望，第三方也可能以他之名而為她明顯的奪權企圖感到憤怒。

他所能取用的 His for the taking

我們所談及的陽性屬性好處與特權包涵了哪些？它們包括了社會上的領導位置、權威、影響力、金錢和其他形式的權力，以及社會地位、名望、身分與這些東西的標記。此外還有非實體的面向，例如社會「顏面」、驕傲、名譽或聲望，以及其他相關事物的不在（absence），例如擺脫羞恥的自由、不必遭受公開羞辱的可能，這些或多或少是每個人的渴望，但卻只有少數人有資格獲得。

許多陽性屬性好處在某種程度上是缺貨的，即使它們不一定具有零和結構，比方說權力、名望、金錢、身分和競爭優勢。但在這個類別中，同樣重要的是男性驕傲、名譽、尊重等等；這類社會性的好處和地位並非天生就供給不足，理論上它們也並不受限，但當證詞衝突和爭論限制了同一情境下有多少人可以被看成是真誠且可靠時，缺貨的情況就可能出現^{註112}。

女性不應該和男性競爭、不應該剝奪他想要的陽性屬性好處或損害其男性驕傲等，當這樣的規範被破壞時，就會進一步成為厭女攻擊的常見來源。即使這些好處本身並非特別叫座，他可能仍會因為把它們輸給了女性而感到難為情或丟臉。我會在第八章回到這個主題，並連帶討論當男性和女性競爭陽性屬性的權力位置時，會出現哪些偏見。另一個事實是——如同我們將看到的——第三人稱式的偏好和鼓勵有著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勝過於第二人稱式的反應型態度，以及表達這些態度的行動。

在建立了一個初步且略為粗略的理論，以說明厭女情結如何透過道德勞動的性別化經濟而穩固地運作後，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之上提出一些具體（而且重要的是，可以被否證）的預測。它們無疑地將會需要一些細微的補充和修飾，好捕捉到不同社會環境、次文化、特定社會關係等等之間的差異。我並無意指出在這些以外，再無其他規範——很可能有，而我也在後續的章節裡記錄了些其他父權社會結構的遺跡，但某方面來說，基於我當下的目標，此刻少說為妙。我能夠根據上述（i）-（iii）的規範提出越多正確的預測，就越有助於呈現這個圖像具有令人信服的預測力和解釋力。

儘管更讓我感興趣的是這個現象的型態而非其普遍程度，然而，在此表明立場可能是有所幫助的：我個人的整體看法是，儘管社會確實有許多進步，但厭女情結在許多我所關注的脈絡裡仍然普遍。但我

也相信，一直以來，社會進展是分布不均且非線性的，而要求她給予他陰性屬性的好處，並限制她從他身上拿走陽性屬性好處，這個規範（再一次的，因為這樣的分布不均和非線性，它被零星但時不時嚴格地執行）持續有著重大的影響；或者可以說，我大致傾向於認同這個發展中的假設，一部分乃是因為它能夠預測和解釋以下現象：

右派女性（一個反預測）：這個模型預測了，當女性行使權力是為了服務父權利益時，例如保守的右派「家庭優先」政治運動，她們的權力會比較能夠被接受。過去幾個世代間，在政治領域內相對順利地取得領導位置的右派女性貌似已經證實了這點，例如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以及至少某段時間的莎拉．裴琳（Sarah Palin）和澳洲的寶琳．漢森（Pauline Hanson）^{註113}。

街頭口頭騷擾（Cat-calling）：這個模型建議將此類行為看成男性對女性注意力的索求，這份注意力被（錯誤地）認定是她虧欠他的，而他也能夠（再一次，錯誤地）理所當然認為，自己可以公開地針對她的吸引力以及她因此被社會所賦予的價值，做出評分。在其他情境內，這個對（女性）注意力的索求更著重於不允許她的心智（a）轉向內在（也就是思考自己的想法），（b）藉由搭起情緒的「高牆」，由他身上轉移（根據我個人道聽塗說的印象，這經常會使她獲得「賤人」一族的稱號），或是（c）對他那股猛烈，且有時像侵略或威脅般地強加於她身上的注意力表示反感。事實上她一定很喜歡這樣。這是街頭口頭騷擾者的一個常見回應。同時她可能需要看起來「開放」或「透明」^{註114}；「甜心，笑一個吧。」是一個表面上比較不無禮的說詞，但它表達了同樣狡猾的命令，也就是：一名女性臉上的情緒應該要清晰可讀。對於任何懷疑這些情境的父權本質或社會意義的人來說，此處有一個具有啟發性的現象，在於反轉了性別關係的社會慣習乃是相對少見的。問題不僅僅是它們所造成的傷害（而它們是很不同的），而是它們揭露並延續了一個深層的「誰虧欠了誰什麼，以及誰可以提出要求」的判斷^{註115}。

羞辱與「要塞軍事學院」（The Citadel）：在蘇珊．法魯迪（2000）針對位於美國南卡羅萊納州、過去專收男性的要塞軍事學院的討論中，男性軍校學員對招收一名女性學員的想法高度反感——事實上是勃然大怒。因為她的加入會剝奪他們的隱私，以及隨之而來的，免於在女性眼中遭受羞辱和侮辱的自由，尤其是考量到存在於他們之

間的作弄新生儀式和激烈競爭時。他們相當惡劣地對待該名女同學，導致她只在那裡就讀了一星期。

對於男性學員來說，具有特別涵義的情境包括（a）在有她的場合裡被更高階的軍官訓斥，（b）必須從事陰性屬性的家務勞動，儘管有她可以接手這些事情，以及（c）不僅要在她面前情緒崩潰與哭泣，還安慰彼此——這顯然很常見——並且是溫柔的安慰，在殘酷的霸凌回合之間。

因此，若她身處於那高牆之內，便會剝奪男性學員們原本覺得自己理當擁有的東西，亦即不會在她眼中丟臉的保證^{註116}。「女性的不在場，讓我們更可以理解她們，從一種美學的角度來說，因為她們不在這裡，我們更珍惜她們。」一名資深團長，諾曼·杜希特對法魯迪解釋（2000，頁114）。

因此，即使許多明顯的父權社會結構逐漸衰落了，我們卻仍可以看到男性支配如何持續存在於這類互動和慣習中。根據付出的差別性規範，最理想的情況是，女性會被認定虧欠了某些男性典型的陰性屬性好處，或至少虧欠了社會，而一名男性會被認定有權利主張從某些女性身上獲得它們。更進一步來說，如果他沒有被給予他所應得之物，他就會被允許索取這類好處，亦即從她身上強制拿取，卻不用受到懲罰，如我們將在第六章所看到的情況。就像付出一樣，針對取用亦有差別性的規範，於是女性基本上可能被禁止和他競爭，或被禁止從他身上搶走某些具有陽性屬性的獎勵，而他也會被認定有權阻止她這麼做。最後，依據她在「他們自己的比賽裡」（而這確實是如此）嘗試或成功擊敗他們的程度，她可能會被認定作弊，或從他們身上竊取了什麼。

某方面來說，她確實這麼做了，只是她所「竊取」的其實是一直以來他透過不正當方式所獲致之物，而非他的正當財產。她很可能完全有資格做出她所行之事，也許她甚至有義務這麼做，或至少，她做了某件有價值的事，因為她取用了一直以來只有男性可以不公平地取得之物。但儘管許多人在理性上會如此辯駁，我們的道德感受和注意力習慣卻經常落後於我們的道德原則。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往往可以被自行原諒，但是我們可以，且我們必須做出適當的調整，而非在它們可能的因果基礎上太過於仰賴我們的性別化社會直覺。我會在第八章重回這個主題，在那之前，我會先檢視全美國最受通緝的女人：希拉蕊·柯林頓，與她因為自身惡行而受到的遭遇。

現在，我們必須發問：這類（她的）付出和（他的）取用的規範在何時運作呢？如果女性並未和一名男性親密伴侶處於一對一的關係中呢？如果她，比方說，處於一場女同志親密關係裡，或單身，或有伴侶無子女，或處於多偶關係中呢（Jenkins, 2017）？在此，一個可供提出的初步觀察是，有些強度不等的異性戀霸權相關壓力，它們規範了關係並同時協助維持白人至上主義，而這些壓力又和父權規範互有交織，創造出專門反同志（anti-LGBTQ）的厭女形式。它們也可能和用來管理德行與性格的規範互有交織，這些規範經常鼓勵女性將能量和注意力導向外部，而非導向內部、投入自己的「個人計畫」（personal project）——若用伯納·威廉斯（1981）的話來說。社會偏好亦同，它們有可能會在女性照顧了男性而非女性、照顧了一人而非多人，以及照顧了具有種族優勢，並對她的喜愛表示或懷有渴望的男性時，獎勵她們（再一次的，請注意其中有著廣泛的差異，而我的動機僅是在此列出可能性，而不是做出於我能力所及之外的實證主張）；反之，她可能會受到譴責，例如被批評為自私或自戀，或是因為恐同或反多元的偏執仇恨而成為一個「種族叛徒」等。除此之外，女性經常面臨嚴格的要求，她們必須盡其所能讓他人一方面相信她的誠心和誠實，另一方面相信她的忠誠和決心。厭女情結不僅常會因為她沒能展示心智的「開放」或易讀性而懲罰她，也會因為她沒有表現出堅貞的注意力或決心堅守承諾的力量而懲罰她。這顯示，當女性作為一名「偉大女性」站在一位偉大男性身後時，她的權力、力量和主體遠非受到禁止，反而被高度珍惜^{註117}。

基於緊密相關的理由，關於真心和忠誠的規範在此可以被看作是很重要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它們確保了上述某些好處確實被視為如此。如果沒有在心中惦記著受益人的最佳利益，那善良就不是善良，因為那是主要的動機之一；愛如果太無常或太易變，那可能也就不是愛。此外，這種規範防止她掌握她可能可以擁有的權力，也就是可以（更）自由地離開他。最後，息息相關的是，這些規範確保了她能夠被允許靠近他，卻不會顛覆他的地位，或阻止他追求更多陽性屬性的特權。於是，她是支持的來源，而非對手。假如律法也透過可以反映這些偏見的方式被執行，那麼，一個使他身為有權方的絕對權力差別待遇亦可滿足同樣的目的，而且他不一定需要刻意為之。

為了防止女性從身處支配地位之男性身上剝奪陽性屬性好處，或甚至只是威脅這麼做，堅貞與忠誠的規範在此也變得十分重要。他需要確信他所說的話是真心的，他也需要知道她不會突然改變心意，並

在沒有前兆的情況下形成新的、帶有威脅性的意圖——例如離開他，或透過讓他「戴綠帽」來羞辱他^{註118}。

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來，她本身可能就構成了一種陰性屬性好處^{註119}。親密伴侶暴力的統計數字即鮮活地證實了這點：如果她離開，也就是威脅從他身上，有時候也包括從他的子女身上，奪走她這個人，親密伴侶謀殺的風險便大幅提高^{註120}。

家庭消滅者的現象，以及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感到）羞恥時的資格」（entitled shame）也證實了這點，正如同以下這個令人不安的個案研究將要說明的。可以預料：「他所能取用的」事物，可能包括了他的女性伴侶及其子女的性命，當有另一種可能性是在他們眼中失去顏面，並且目睹他們在不尊重他的情況下繼續生活之時。

剝奪生命：羞恥感和家庭消滅者 Taking lives: shame and family annihilators

人們常說，厭女情結是羞恥感的表現，尤其當它被個別男性執行時最為明顯，但也許甚至不只如此。理論上來說，那有可能可以在執行者和受害者之間，為同理心或團結建立一個基礎；厭女攻擊經常會將一種羞恥感慢慢地灌輸到它們的受害者身上，部分是藉由以噁心為基礎的「汙衊」機制來達成，如同第八章所討論的。這類反應也並不一定非理性：羞恥具有社會意義，它通常會形成一種渴望，想要切割自我與他人之間的視線。我們這裡所說的，是把自己的臉孔隱藏起來的渴望，以及典型的羞恥樣貌——垂下的頭與低下的眼光，但那並不是唯一一個達成這種切割的方法。與其躲躲藏藏，也可以把旁觀者擺脫掉。「感到羞恥的他會想要強迫世界不看他，不去注意到他的暴露，他會想要破壞世界的眼睛。」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名句這麼說道（1963，頁277）。此處使用的陽性代名詞可能無意中點出了問題。

因為，在我看來，恰好就是在此面向之上，厭女情結（及其他壓迫形式）的受害者所感受到的羞恥感與上述有所不同，至少和那些最富有特權的施行者所感受到的羞恥相比時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種普通的羞恥感，它的對象並不指望自己得以不被迫感受它（或至少不是經由這種形式受到羞辱），而且它通常會使人表現出試圖掩藏或逃離曝光的意圖，而不是想要「摧毀其他人的眼光」。後者這種「（感到）羞恥時的資格」則會導致這類的摧毀傾向，且它經常會被社會羞辱的可能性或誕生所引發。「（感到）羞恥時的資格」是本節的重心，我將討論它最生動的表現形式之一：家庭消滅者。我將點出，這個現象使我們看到特定家父長和他們的女性親密伴侶與子女之間的所有權關係，裡面的重要特性。

直到最近，家庭消滅者才從其他類型的大規模殺人者中被區分出來，並開始獲得研究。其中一個案例是一名英國男性克里斯·佛斯特（Chris Foster），他發明了某種用於油井鑽探時的安全閥。這是最優秀的安全閥，他大賺一筆，買了一整隊的豪華房車以及一間位於施洛普郡的豪宅，將他的妻子吉兒和女兒克莉絲蒂安置在那裡。他和許多女性有婚外情——金髮女子很顯然是他的菜——但妻子容忍他的行為；

他並非一個好看的男人，但金錢給了他自信，他的小姑在由記者約翰·榮森（Hohn Ronson）所撰寫的一篇報導裡這麼說^{註121}。

佛斯特蒐集了許多槍枝，且是一家飛靶射擊俱樂部的成員；俱樂部其他男性成員所認識的他是關愛妻子的丈夫，以及溫柔的父親。某個看來平凡無奇的下午，他前往俱樂部的烤肉聚會進行射擊活動，當天晚上在家中，他對著妻子和女兒的後腦勺開槍，殺死了她們。接著他澆上汽油，放火燒了他所有的財物和豪宅，然後在最後的篝火中自殺。

你知道原因後會很驚訝嗎？我大膽假設你不會。他已經因為一連串錯誤的商業決策而破產，即將失去一切，他燒掉的財產預計將於隔日被當地官員收回。

在試著理解他的罪行時，榮森最初覺得很不可思議，但某一刻他突然不再這麼覺得，而其中的邏輯變得清晰。當榮森坐在克里斯的友人伊恩陳設講究的廚房時——他就住在美麗、維護良好的梅斯布魯克鎮郊區，那裡住了其他許多像克里斯一樣白手起家的富豪——他不只懂了為什麼克里斯這麼做，還明白了他為何以那種方式這麼做。榮森寫道：

當我坐在伊恩的廚房裡時，克里斯·佛斯特選擇從後腦勺開槍射擊吉兒和克莉絲蒂這件事情突然變得合理了。他彷彿因為太過羞愧而無法直視她們。也許這起殺人案是某種類型的榮譽殺人，佛斯特彷彿無法忍受他有可能失去她們和友人的尊重這件事（2008）。

許多克里斯的友人也覺得他的行為——不只是自殺，還殺害他的家庭成員——是相當可以理解的。榮森：

聽到佛斯特的朋友們談論他們如何同理他的行為是很令人震驚的。我不會想到，當生活出問題時、當他們的男性氣概和財富標誌受到威脅時，住在施洛普郡這個飛地裡的人們有多麼可能且多麼容易就讓整件事情崩解（2008）。

崩解是一種說法，也請留意這個說法將誰放在故事的中心。

佛斯特犯下罪行不到一個月後，另一個家庭消滅者出現在南安普頓：他打電話給分居的伴侶，告訴她，他們的小孩已經「長眠」。將他們悶死之後，他上吊自殺^{註122}。

榮森的文章中引述了犯罪學家大衛．威爾森（David Wilson）的說法，家庭消滅者和大規模殺人者不同，他們在過去通常並不為犯罪司法體系或甚至精神衛生體系所知。威爾森對記者凱蒂．柯林斯（Katie Collins）解釋道：

從各方面來說，這些都是深情的丈夫和好父親，他們經常有著受人矚目的工作，並在眾人眼裡看來非常、非常成功^{註123}。

威爾森和其他研究者區分出四種主要的家庭消滅者類型：自詡正義的、迷惘的、失望的，與偏執的。自詡正義的類型為了自己的沒落責怪他人，通常是他們的妻子或分居妻子；迷惘類型則因為如破產之類的外部事件而感覺被羞辱；失望類型覺得他的家庭令他失望，彷彿社會秩序正在崩解；而偏執類型則認為他的家族受到來自外來者的威脅，因此為了擊退威脅，他擅自決定由自己來殺害他們。

一個猜想是，這些類型並非彼此互斥，每一個類型都展現了可以被適切地稱為「有毒男子氣概」的面向之一，因為他們在受到威脅或羞辱時，都會傾向於進行暴力的攻擊。威爾森告訴柯林斯：

很明顯的，通常是男性會訴諸這樣的暴力，而這四種特質和男性如何看待性別角色與他們在家庭中的位置緊密相關。男人有許多當男人的方式，但是在家庭消滅的狀況裡，這些男性通常會因為各種事件走到臨界點，而這些事件符合我們所指認出的特定家庭消滅者情況之一。若單單將這件事情看作和女性〔在現代社會〕有著較重要的角色有關，可能會變成在試圖暗示女性必須為其負責；但事實上，關鍵一直是男性（2013）。

這個提醒敏銳且正確，但問題仍有可能在於男性無法接受女性逐漸提高的社會地位，而正如同威爾森的許多發言中近乎明示的，幾乎所有的家庭消滅者都身處於異性戀親密關係，而非酷兒關係裡。這同樣也說明了，他在身分認同上所遭遇到的存在威脅之本質為何物。

針對美國脈絡裡的家庭消滅者的典型特徵，《家庭殺手之心》（*Familicidal Hearts*）一書的作者奈爾．韋伯斯戴爾（Neil Websdale, 2010）也做出了類似的結論。記者凱薩琳．史基普（Catharine Skipp）摘要韋伯斯戴爾的研究發現如下：

絕大多數的消滅者是男性（他估計為95%），而且多為白人與中年男性。他們覺得自己不是稱職的男性，且經常於童年遭受虐待。基於在幼年時感到無助的經驗，許多人試著對自己的家庭執行嚴格的控

制，並試圖創造一個他們從未經驗過的理想家庭願景。當經濟衰退、工作機會稀少、精神緊張，這些男性所追尋的控制就變得更難以維持。

根據韋伯斯戴爾的看法，這些男性落入一個介於被他稱為「發怒高壓」殺人者和「文明可敬」殺人者之間的連續體中。前者由憤怒所驅動：他們有控制欲，且有時有虐待行為，從他們在家中所行使的權威獲得自我價值。但那樣的行為通常會使得婚姻陷入危機，促使妻兒試圖離開，這所造成的失控感激發了羞辱的感受，最終導致父親以爆發暴力來再次確認自己的權力（Skipp, 2010）。

根據本議題的另一位先驅研究者理查·蓋勒斯（Richard Gelles）的看法，後者這類家庭消滅者——「文明可敬」類——則由一種「自戀的沙文主義」（narcissistic chivalry）所驅使，且很明顯地表現在這類殺人案的驅動因子、動機和本質上。蓋勒斯告訴史基普：

父親幾乎總是把自殺當成逃離某種財務危機的唯一出口。於是，殺害他的家人變成一個方法，將其從破產和自殺將帶來的艱困與羞恥中拯救出來。

在許多這一類行為人處決受害者的方式上，都有很明顯的自戀的沙文主義認知。職業拳擊手克里斯·班瓦（Chris Benoit）於二〇〇七年時殺害妻兒並隨後自殺，一般相信他在勒死兒子前曾餵食他鎮靜劑（2010）。

大多數家庭消滅者（超過80%）也試圖在殺害他人後自殺（Collins, 2013），但相較於另一種由普通卻慢性的羞恥感所導致的自殺傾向，兩者似乎不可能相同，這裡的深層動機不可能是為了逃避他人，因為其他人的目光已被闔上了——永遠地闔上。

某些家庭消滅者可能會因他們如今缺少的不僅是自尊，更是絕對自我，而被驅使如此做（Richard Gelles: “His entire identity is in his family”; Skipp, 2010）。鬆開從羞恥感逃離的閘門讓他感到放心了，但卻孤獨、失去了目的；他的殺人行為移除了那無法背負的壓力，還有存在的目的；他不再被羞辱了，但他也失去了那些付出讚賞的他者，而那些讚賞對他來說就像存在的必需品。歸結起來，那確實曾是存在必需品，那正是他過去一手打造的。

這一切和當代美國的政治局勢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可能可以主張，家庭消滅者處於有毒男子氣概光譜上最極端的那一邊，而川普和

史蒂夫·班農也在此光譜上，而最終，此處只有程度上，而沒有類型上的差別。我不會針對這個可能性做出推斷（參見Hurt,1993；位碼4236與5631），我想要從此脈絡討論中發展的論點是，它為「（感到）羞恥時的資格」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圖像。讓我們看看川普如何煽動一種理所當然的渴望，希望能夠免除掉來自他者的、令人羞恥的凝視，比方說墨西哥人和穆斯林，而在川普想像的美國中，他們分別有可能會被高牆或檢查機制排除在外（參見我對憂愁的白人身分之討論；Manne，即將出版）。個人不再需要因為無視那些有需要之人而感到羞愧，對於飽受某些人婉轉稱為「同情心疲乏」之苦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恩惠。另一種同樣強烈或更甚的渴望，則是想要擊退來自自由派圈內的菁英們那令人羞恥的凝視，那些人擁戴反種族主義、女性主義，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政治正確——那是最令人痛恨的信條。（把她關起來、控制她、阻斷視野、阻止她獲得優勢。）

所謂的政治正確——我立刻想要這麼說。因此，正為了這個原因，你可以約略發現，一直以來，一旦川普支持者們的怒氣被點燃，是什麼讓這些怒氣得以延燒。我們的行動是政治矯正的行動。無論我們喜歡與否，他們經常批評我們站上了道德高地，無論我們是以多彆扭的姿態站在那裡。我們可以談論如何去愛罪人但仇視罪惡，但我們要如何愛那些如此恨我們的人？

在川普當選前的那段期間，我覺得很難想出我應該跟川普的支持者們說什麼——那些人在柯林頓的看法裡要嘛是可憐的，要嘛則是一群「可悲的烏合之眾」、是「無可救藥」的（她這個評語並不明智，而她隨後也為此道歉）。言下之意是她瞧不起他們所有人。這對於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看來明顯是一個不正確的立場，但怎麼樣才會是正確的？我將在結論該章回到這個問題。

無論哪種情況，當我們致力於譴責那些人的種族歧視和厭女情結時，我們幾乎不能指望他們會因為一個自身永遠都無法獲得的道德頓悟而感激我們，而且他們往往會變得戒備、怨懟，並比以往都更加深陷於他們的態度之中，最終淪落到困在丟臉和消音之間。當然，如同我剛剛指出的，他們有一些逃生門可用。

如今，我已從幾個不同的記者處聽到相同的理論，關於他們認為川普是在哪一個瞬間決定競選總統。那是當歐巴馬總統在二〇一一年的白宮記者晚宴上，藉著回應川普荒唐、直白又充滿冒犯地要求歐巴馬出示出生證明一事來羞辱他時（認真的嗎？你從哪裡來？這是種族

主義者的月經題啊)。歐巴馬大度地在他的演講中說到他可以提供更好的回應：他願意公開他的出生影片。他放了電影《獅子王》(*Lion King*) 的一個片段，賓客爆笑出聲。

顯然，有一名賓客例外。他抬起下顎、噘起雙唇，臉色轉為深橘——當觀眾愉快地看向川普的方向然後再轉開視線時。當我聽到《紐約客》(*New Yorker*) 記者大衛·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 的描述時，我心想：那真的是羞恥的表情嗎？我試著回想，我的舊心理學教科書裡，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 那一組關於普遍情緒表現的代表性黑白照片。我好奇著，和艾略特·羅傑的羞恥感相比，川普的情況是什麼樣子。

但接著我意識到，川普的表情是羞恥感的內外翻轉——他所表現出來的是羞恥的外牆。羞恥被拒絕了，以憤怒取代，因為他和他的同類習慣在任何場合都被致以最高的敬意。那個表情來自於某個人徹底期待並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應該獲得其他人的讚賞凝視，這些人地位較低，必須抬頭仰望。因為如此，再佐以自戀情結，結果就成了他需要如此。川普的表情是艾略特·羅傑原本有可能擁有的表情，如果羅傑有更多社會好運的話，如果他當初能夠成功成為一名他宣稱要成為的真阿法男。但他並沒有，因此他選擇拿下其他人。

展望 Looking ahead

在第二章裡，我針對厭女情結提出了一個一般的本質性說明，這告訴我們，作為社會環境裡的一種屬性，厭女情結究竟是什麼。也就是說，當一個社會環境裡，某個特定類別的女孩與女人面臨著一種敵意，其目的是監督和執行某些一直以來且如今某種程度上仍然存在的、父權秩序下的性別化規範和期待時，這個社會環境就可以被視為是厭女的。同樣的，如果一個行動是一個社會環境的厭女情結產品，或對其有所助益，那麼，該行動也是厭女的。我同樣指出，伊斯拉維斯塔殺人案為此論點提供了一個明確的例子，即使該案毫無疑問地也具有其他意義，但這絕對無損此論點。

這解決了伊斯拉維斯塔案發生後，飽受爭議的女性主義回應所遇到的兩個問題其中之一，但卻沒有回答到另一個問題，亦即：美國是一個格外厭女的文化嗎？倘若真是如此，艾略特·羅傑可能如何接收到相關的社會力量？（換句話說：無論他個人特定的心理狀態或生命故事細節為何，哪些機制使得厭女情結得以不朽？）

在二〇一六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後，隨著厭女情結從水深處浮現並靈動地升上水面，顯然很少人會否認厭女情結就存在於水中。但我認為，持平而言，即使是對那些因為競選活動和十一月的大選結果而感到震驚、進而改變看法的人來說，這仍是一個晦暗而令人迷惘的現象。我們要如何同時理解這兩個事實——今日美國社會裡厭女情結程度之普遍，以及與過去任何一個時刻相比，本地女性確實擁有更多的權力和機會（參見Mac Donald, 2014）？我希望本章所提出的「付出／取用模型」可以提供一個可能的解釋。

這個模型也說明了另一個憂慮，亦即在使用「厭女情結」一詞時，女性主義者所指涉的情境包含了各種四散而雜亂的頭條事件組合。如果情況確為如此，那麼我的改良性計畫則有可能會被歸類成雜亂的一部分，或是在釐清這個雜亂現象的同時卻未能掌握女性主義者的使用習慣。因為，總結來說，厭女情結看似包含了：

- 極度不同的傷害（從微小傷害到謀殺皆有，並包含了許多不同類型的口語和肢體攻擊）；
- 在普遍的相關敵意之中各種不同的心境和模式，常見的主題因而範圍廣闊，包括了報復、斯特勞森所說的「反應型態度」（例如責

怪、怨懟、罪疚)、懲罰、背叛、不信任、位階競爭，以及其他形式的羞辱、噁心和「驅逐」行為；

- 在各種領域內的監督和執行手段，包括了性、母職、迄今為男性所有的空間、位置，以及傳統上屬於老男孩們的俱樂部。

面對這一團明顯雜亂的想法，「付出／取用模型」提供了一個出乎意料的簡單方式，得以統一上述現象並創造出一個理論，它可以在此提出良好與具體（並且重要的是，得以被否證）的預測，因為，如前所述，這個模型區分了什麼是：

她所能付出的（陰性屬性的好處和服務）：注意力、情感、讚賞、同情心、性和子女（換句話說，社會的、家庭的、生殖的，和情緒的勞動），以及綜合性的好處，例如安全庇護、滋養照護、安全感、安撫和安慰。與此對比的是：

他所能取用的（陽性屬性的好處和特權）：權力、聲望、公眾認可、身分、名譽、榮耀、「顏面」、尊敬、金錢和其他形式的財富、位階、向上流動，以及因為擁有身分高尚的女性的忠誠、愛、和奉獻等等而獲得的地位。

由此出發的結果是，大多數目前已提到與之後將提到的厭女情結案例，都可以被歸類至下列兩個針對女性的互補社會規範其中之一：

（1）她有義務給予某個人陰性屬性的服務，此人最好是一個在社會位階上與她相當或高於她（考慮到許多脈絡下的種族、階級和異性戀正典價值）的男性，至少在他想要從她身上獲得這種好處和服務的情況下是如此。

（2）她被禁止擁有或從身處支配地位之男性身上（此為最低限度，可能也還包括其他人）拿走陽性屬性好處，至少在他想要，或是渴望獲得或保存它們的情況下是如此。

某些必然的推論結果則是：

- 如同第二章提到的，厭女情結發生在監督和執行這些社會規範，以及保護它們不被破壞之時。

- 至少就許多相關的陰性屬性好處來說，一名身處支配地位之男性必須能夠「讀她的心」，以確保這些相關的個人服務是真誠的。比方說，如果沒有對他人的好意作為主要動機，那善良就不是善良。

- 他也會需要確保（a）她的誠實、（b）她的忠誠，和（c）她的堅貞，以確保（再一次的，比方說）安全感、穩定感，和持續的安全庇護等這一類好處。如果她可能已經準備落跑，或她只是因為他的世俗成就、好名譽、聲望或類似的原因而有條件地愛他，那這對他來說就不是一個安全的空間。

- 他將會經常因為各種工具性的目的而必須比她有權力，以及為了權力本身的緣故而想要擁有各種形式的權力，或是在某些情況下，不想要權力。（再一次的，這似乎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某些厭女的主體並不想要伴隨著某些社會權力和特權而來的責任，如同「巨嬰」一詞所傳達的概念）^{註124}。

而現在，掌握了本章所提出的概念區別後，我們得以辨別下列的後續提問：

- 如果他無禮地奪取了理論上她應該要給予他的東西呢？我會認為，我們傾向於原諒、遺忘並赦免這類由支配性男性所犯下的罪行，並且將我們的同情心擴展到他們身上，而非那些受害的女性。（因此第六章「赦免男性」就討論到了強暴文化，以及我稱之為「同理他心」的議題。）

- 如果她要求或試著取用理論上她應該要給予他的東西呢？當她尋求陰性屬性好處，例如道德注意力，或為她個人所受的道德傷害而爭取注意力時，我認為我們傾向於懷疑她不誠實並裝腔作勢，就算我們沒有證據支持任何一種不誠實指控。（第七章「懷疑受害者」便探討所謂受害者文化的意識形態。）

- 如果她要求或試著取用理論上他所能取用的東西呢？我認為，在以這種方法尋求陽性屬性好處時，她有可能會被描述為貪婪、腐敗、資格不符以及脫序的。（第八章「落敗（給）厭女者」討論到二〇一六年間希拉蕊·柯林頓角逐白宮未果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厭女汙衊。）

但在那之前，讓我稍事暫停，先討論並駁斥一個論點，它和本書目前所發展出來的厭女情結解釋相對，它是一個廣受歡迎但並非總是發展完善的論點，亦即：厭女敵意源自於未能認可女性的完整人性。

我會指出，受制於本章所提到的〔厭女〕動力的女性，其實更應該被看作是占據了一個特定的社會位置，也就是說，她被定位成一個人，事實上是一個富有太多人性的人，她是一個付出者，而因此，他

作為一個特權者，她的人性是一個他覺得自己有權可以使用、剝削，或甚至在不受懲罰的情況下摧毀之物。令人傷心並時而羞愧的是，很多時候，我們任其擺布。

註107：參見培德曼（Pateman, 1988），尤其是第六章。

註108：這是羅傑在他的「宣言」中，對他如何身處於「我的扭曲世界」常見的描述。

註109：參見史蒂芬·平克在伊斯拉維斯塔殺人案後紆尊降貴的評論。回想第一章裡他的推特發文：「要說發生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謀殺案屬於一個仇視女性的固定模式，這想法在統計上來說是不準確的。」然後附上了海瑟·麥可唐納於六月一日刊於《國家評論》上的文章連結。次日，平克於推特上發文：「災難的不可控制性讓世界看似一個危險的地方，不論客觀的風險為何。」並附上一則網址，連結到盧爾曼於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刊於《紐約時報》、名為「我們畏縮的心智」的文章：
<https://www.nytimes.com/2014/06/01/opinion/sunday/luhrmann-our-flinching-state-of-mind.html>。

沒錯，從一種描述方法來看——也就是由跟蹤被害者的陌生人所犯下的多重謀殺案——像艾略特·羅傑這樣針對女性的暴力犯罪，在統計上的機率仍是低的。但若從另一種描述來說，這卻是一種讓女性太常為此犧牲的暴力形式，卻鮮少在媒體上獲得注意：因為性嫉妒，以及企圖控制那些拒絕——或試著拒絕——男性的女人而產生的暴力。比方說，在美國平均每日約有兩到三起發生於親密伴侶間的殺人案，這些案件經常都是因為這個原因而發生。

在《人性中的良善天使》（*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書中，平克（2012）更坦白地對女性主義者針對性和性別暴力的看法表示了輕蔑。「如今我們都是女性主義者。」他貿然地宣稱。在平克的自由發揮下，他表面看來公平：「雖然女性主義運動確實有所貢獻，促成了讓美國國內強暴事件降低的措施，」這方面他表示認可，「但女性主義者一路以來使勁攀上權力位置，並重新平衡政府工具，以滿足她們的利益。」最終，這主要變成了一個「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般的結果，因為「勝利來得很快，不需要杯葛或烈士，而〔社運人士〕沒有遇到警犬或憤怒的群眾。」尤其是在性暴力改革上，「整個國家很明顯地已經準備好了。」平克這麼認為。女性主義者僅僅讓這個勢必會發生的快樂結局加速到來。這些進步也多虧了掌權男性們越來越了解女人在性方面的細微差異，例如，女性迄今仍令人不解地傾向於「認為和陌生人之間唐突的、不請自來的性令人反感，並不吸引人」。儘管「強暴並非完全是男性性慾裡正常的一部分」，但也相距不遠了。平克指出：

如果允許我提出一個反女性的建議，認為強暴和性無關的理論可能對於某個性別來說較為可信，因對這個性別來說，想和不願意的陌生人發生不帶個人感情的性行為，這個欲望太奇怪而無法理解。常識從來無法阻擋一個神聖的社會慣習，這慣習伴隨著暴力的減少，而今日強暴防治中心一致堅持「強暴或性侵並非出於性或欲望的行為，而是關乎侵犯、權力和羞辱，將性當作一個武器。強暴者的目的是支配。」（針對這點，記者海瑟·麥可唐納回應：「在酒桶派對上硬上女人的男人只為了一個目的，而那並非恢復父權體制。」

麥可唐納又出現了，扮演平克的反女性主義代言人。

註110：對三種可能性做出區別，在此是有所幫助的：男性（a）比起同居的女性親密伴侶來說，實際上較少從事這類工作；（b）在這方面面對較不嚴格的規範和期待；以及／或（c）就類似的疏忽或不負責，受到較不嚴重的懲罰。

註111：以下內容來自「王者回歸」（Return of Kings）部落格上的一名社群成員在論壇裡的發文，該文名為「如何覺察一個女孩是付出者，而不只是索取者」：

我終於理解到我對美國女性的主要不滿是什麼了：她們大多數是索取者。她們索取你的注意力，她們索取你的時間，她們索取你的認可，她們索取你的錢，她們索取你的屌。但她們回

報了什麼呢？（一個拉丁女孩告訴我）她們的陪伴所帶來的歡愉。

上一次某個你認識的女孩幫你按摩或煮飯是什麼時候？上一次一個女孩為你做件事情，但卻沒有為她自己帶來好處是什麼時候？上一次一個女孩在你沒有為她做任何事的情況下，為你做件事卻不期待回報，是什麼時候？上一次一個女孩在你沒有先付出的情況下，真正地為你付出是什麼時候？.....

.....所以，測驗在此：為一個女孩做件事情或給她什麼，可以是幾杯飲料、晚餐、你幫她看某篇報告等等，如果她沒有辦法真心誠懇地謝謝你，那你不會從這個女孩身上獲得太多東西：她是一個索取者而不是一個付出者，事情就這麼簡單.....

.....一個付出者不僅對於一段像樣的關係來說很重要，她們也是我在床上最喜歡的女孩。一個付出者在床上會更顧慮到你的歡愉，一個索取者只會考慮到她自己，而大多數的美國女孩在床上都是這樣。根據我的經驗，我可以告訴你，不要想著和一個不是付出者的女在情感上有牽連，你會後悔的。

Nomad77, RooshVForum, 2014/09/27, <https://www.rooshvforum.com/thread-40795.html>

註112：我在第六章詳細討論了這點，並且說明，在其他條件都相等的情況下（也就是基於相關的交織性考量），證詞不正義如何用來保護身處支配地位的男性不被女性奪走這類陽性屬性的「臉面」。

註113：見德沃金（1988）。

註114：可參考最近《美國眾生相》（*This American Life*）（譯註：由芝加哥廣播電台WBEZ製作，並由其他公共廣播電台聯合播放的一齣廣播節目）針對街頭口頭騷擾所做的一集節目中提供的證據，其內容說明了在女性明確表達自己的感受和偏好的情況下，男性仍改寫女性想法的現象。Eleanor Gordon-Smith, "Hollback Girl," *This American Life*, 第六〇三集："Once More with Feelings," 2016/12/02, <https://www.thisamericanlife.org/603/once-more-with-feeling>

註115：想想「蕩婦」這個稱號，它粗略的意思是，一個女性把自己的注意力給予太多的男性、錯誤的男性，以至於不正當地排除了「他」，但他理應才是正當的接收者。和參考一個短暫的、半編造的幻想或非自願的角色扮演相比，這應該或多或少反映了社會現實。

註116：參見「LA Pussy Posse」（洛杉磯妹妹群）現象，法魯迪於著作《僵局》（*Stiffed*）中在同一章節裡比較了此現象和要塞軍事學院（2000，第三章）。在此，和一名新女孩發生性關係是一個得分遊戲，可以在床柱上又記上一筆，而聲望與昭彰惡名是這項活動的最終目標。有趣的是，這是川普的個人人格和厭女歷史的兩面。儘管法魯迪將它們標記成不同類型的男子氣概，但它們可能只是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脈絡裡變得重要；一個是類似於封閉的、私人的訓練活動，另一個則是後續的公開比賽，在觀眾面前，為了粉絲而打。

註117：單就這個厭女情結的動力進行考量，這類特質的反向互惠義務——在異性戀關係裡便是由男性給予女性——將會分布較為不均。它們當然可能是特定關係裡道德觀的一部分，並且某種程度上被當地習俗所珍視，但幾乎不變的事情是，總會有些一般性義務帶著其他類型的父權秩序內涵以這個方向流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養家者和持家者的關係。

註118：可參考被稱為「玩家門」（Gamergate）的事件所引發的爭議。在一篇由其前男友所撰寫的部落格文章中，獨立遊戲開發人柔依·昆恩（Zoë Quinn）被不實地指控提供性服務給遊戲記者，好為她的遊戲《憂鬱自白》（*Depression Quest*）換取正面評價。由「柔依文」出發，此案例接著涉及了雙重劑量的（被假定的）不忠誠、不可信賴，和「女性詭計」。此外，昆恩打敗了許多男性遊戲開發者，她的遊戲在網站（由另一位記者所撰寫，與前述的短暫關係無關）上獲得了相對正面的評價。根據我的分析，這個「在男孩的比賽裡擊敗男孩」的結果和滲透一個高度由男性主導的次文化，就有可能成為一個完美風暴，結合各種因素，得以引起遊戲社群成員們不合比例的強力、密集和漫長的厭女反應，而情況也確實如此。玩

家門事件至此與後續的相關細節相當複雜，而且仍然有可能引起辯論，因此我會引用麥特·李（Matt Lee）近日在英國《衛報》上針對主要議題所提出的摘要：

玩家門是一個線上行動，基本上起始於一名男性想要懲罰他的前女友。它最值得留意的成就是騷擾了許多進步人士——其中大多數是女性，到了使她們感到不安全或考慮離開遊戲產業的程度。遊戲開發者柔依·昆恩是最初的目標，在這之前，安妮塔·撒奇席安（Anita Sarkeesian）將基本女性主義理論應用到電玩遊戲上的影片就已經使她成為目標對象（因為太多人無法區分文化批評和言論審查），但這股仇恨被玩家門事件有力地放大了，導致了死亡威脅、強暴威脅和公開洩漏個資。

Matt Lee, “What Gamergate Should Have Taught Us about the Alt-Right,” The Guardian, 2016/12/01,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6/dec/01/gamergate-alt-right-hate-trump>

如同李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單單透過史蒂夫·班農和他的新聞網站《布萊巴特》（Breitbart），玩家門在另類右派運動的發展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李繼續指出：

玩家門事件和極右派線上運動——也就是所謂的另類右派（alt-right）——之間的相似性是巨大、令人震驚的，而且絕非巧合。畢竟，這場在遊戲中開始的文化戰爭如今有一個資深代表在白宮裡。作為網站《布萊巴特新聞網》的創辦成員和前任管理人，史蒂夫·班農在創造媒體怪獸米羅·雅諾波魯斯一事上推了一把，後者藉著對玩家門表示支持和加油而打造他的名聲和推特追蹤人數。這個標籤是煤礦裡的金絲雀（危險的先兆），而我們忽略了它。

我在第六章裡也會討論這個案例和證詞不正義與男性支配間的關係。

註119：這也進一步解釋了墮胎和「支持選擇」立場所引發的道德恐慌（如同第三章所討論的）——也就是，一個女性意圖自私或放蕩地拒絕生殖和照護勞動（偏離了正道），以及將胎兒從他們正當的家庭或安全港中驅離。與此同時，有色人種可能遭受剝削，好給所有女性一個教訓，例如在印第安納州，當涉及自我施行墮胎和殺嬰罪法規時，亞裔美國女性似乎就會被特別針對，如同泊威·裴塔的例子所示。

註120：根據一些估計，在離開親密關係後的兩週間，女性被前任親密伴侶殺害的風險高出於其他任何時間點大約七十倍。例如可參考：“Domestic Violence Statistics,” <https://domesticviolencehomicidehelp.com/statistics/>（資料擷取於2017/05/12）

註121：Jon Ronson, “I’ve Thought about Doing Myself in Loads of Times...,” The Guardian, 2008/11/21,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2008/nov/22/christopher-foster-news-crime>

註122：如榮森所指，家庭消滅者在美國也很常見。他引用的研究指出，家庭內的謀殺伴隨著丈夫後續自殺，這樣的案件平均每星期發生一次（2008）。後續由傑克·李維（Jack Levin）所做的研究則主張，這個比例在經濟蕭條發生後的月份內可能會增加——這是很令人驚訝的，畢竟失業率和謀殺發生率之間並沒有普遍相關性。Catherine Skipp, “Inside the Mind of Family Annihilators,” Newsweek, 2010/02/10, <https://www.newsweek.com/inside-mind-family-annihilators-75225>

註123：Katie Collins, “Family Killers Are Usually Men and Fit One of Four Distinct Profiles,” Wired, 2013/08/16,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family-killers>

註124：此外，某些做法看起來比較像是為了取得比她更優勢的地位（從知識面來看，比如男性說教），或他理所當然地認為他應該比她擁有更多空間（比如在大眾運輸工具上男性開腿〔manspreading〕的情況）。

第五章 人性化仇恨Humanizing Hatred

班尼，你知道最讓我生氣的是什麼嗎？這些該死的賤人看我的目光彷彿我天殺的是一塊肉，你知道嗎？彷彿我是一個該死的性玩具。但我是人啊！我是一個人，你知道嗎，有感情和情緒的.....我就坐在這裡不是嗎？沒錯，我存在啊！她們認為我這麼高，我就不會覺得受傷。

喬治．「小鬍子」．曼德茲（Geroge “Pornstache” Mendez）
《勁爆女子監獄》（*Orange Is the New Black*）
第一季第十一集，「有感情的高大男子」（Tall Men with Feelings）

我經常無法察覺到男人內在的人性。

路得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文化與價值》（*Culture and Value*）

當代的道德論述中，有一個反射反應非常常見，無論在哲學領域內外都很明顯；它出現在許多關於種族暴力的道德心理學討論，以及針對厭女威脅和暴力的討論中。「整體來說，這是一個文化問題，也就是我們教導男性，女性是要被『賺取』、被『贏得』之物，是一座獎盃，而非把女性看作是，你知道的，人，有自己故事的主角，如同我們（男性）有自己的故事。」文化評論者亞瑟．朱（2014）在伊斯拉維斯塔殺人案發生後這麼寫道^{註125}。女性主義作家琳蒂．魏斯特（2015）描述她在網路上和「她最殘酷的騷擾者」對質的經驗時，亦提出同樣的疑問：「是什麼讓女性變成輕鬆的目標？為什麼傷害我們令人感到如此滿足？為什麼他沒有自動自發地把我們看作人類？」出乎她意料地，在她與他對質後，魏斯特的騷擾者悔悟了，並為他的厭女行為而道歉（可回顧本書第一章討論中魏斯特與這名男子的訪談）。但根據魏斯特的報導，這是唯一一個她提出、但他卻無法回答的問題，儘管他盡了全力。

在本章裡，我要指出這樣的問題——例如說「為什麼他沒有自動自發地把我們看作人類？」——乃是基於一個常見的錯誤：反射性地將「男性對男性的不人道行為」^{註126}歸因於某種去人性化的心理態度。我將把它稱為一種「人道主義式」（humanist）的解釋，提供給那種理當被描述為「非人道」（inhuman）的人際舉止，這些舉止不僅在道德上遭到反對，從某種角度而言也是殘酷、暴虐、羞辱或貶低人的^{註127}。而根據這個接下來將被我稱為「人道主義」（humanism）的道德

心理學看法，這種去人性化很常被認定為對這類非人道舉止的最佳解釋（雖然並非總是如此）。換句話說，從人道主義的觀點看來，這類行為經常源自於人們無法將他們的某些同伴認可為人類同伴；相反的，前者可能將後者視為次人類的生物、非人的動物、超自然的存在（如惡魔、女巫），或甚至只是物品（也就是無心智的物件）。只要人們能夠珍惜他們共享或共同的人性，那麼，他們就不會這麼輕易地錯待其他同族類的成員。

這個意義下的人道主義是一個受歡迎、熟悉而且在許多方面都具有吸引力的觀點。然而儘管如此——或說正因如此——它並沒有總是得到清楚的闡明，也沒有在面對敵對解釋模型時獲得辯護。除了一些著名但短暫的例外以外，它亦沒有經歷太多批評^{註128}。然而，我有些懷疑，作為一個關於偏見的一般性命題，它是否站得住腳，尤其當我們談到厭女情結時。但我最終將會嘗試性地提出一個驚人的結論以供討論，亦即：我們並不清楚人道主義路線在許多情境中是否有效，儘管這些情境看似是為了它而量身打造的，也就是當人們因為受到去人性化的意識宣傳影響而犯下大規模暴行時。他們的行為經常說明一個事實，他們的受害者對行為者來說勢必是像人的，甚至太像人了。當我們記得去留意男性對女性的非人道態度時，我們尤其會注意到這點——在種族清洗屠殺的事件中，女性經常遭受大規模的暴力強暴。

運轉中的人道主義思考 Humanist thought in action

在瑞．朗頓（2009）討論對女性的性壓迫時，「性唯我論」（sexual solipsism）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古典意義上的唯我論，乃立基於對其他任何種類的心智存在抱持懷疑（也或者是純粹的否定）；而性唯我論則視男性心智為唯一的人類心智，相對的，女性則被視為「區區東西」或物件來看待與對待。根據朗頓的觀點，這與色情的道德缺失緊密相關。在以下段落中，朗頓藉由閱讀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和凱薩琳．麥金儂的論述來說明她的看法：

〔波娃〕說，在被確認為「物件」的生物陪伴下，「男性仍舊是孤單的」。性壓迫是唯我論成真的結果……〔波娃〕認為，對許多人來說，它是「比起和一個人類有著一段真誠關係，更具吸引力的經驗」。近代女性主義者們補充，我們可以在色情作品中看到把一個人「當成物件」對待的獨特方式之一，並指出在色情作品中，「人變成了東西」。〔麥金儂的〕驚人用語中的歧異，一方面昭示了在色情作品裡的人類——女性——被當成東西對待，另一方面，東西——色情物件——也被當成人類對待（2009，頁2）。

朗頓接著捍衛麥金儂對色情作品的看法，也就是藉由以這種方式將女性物化，色情作品（起碼是暴力的、貶低人的、異性戀的那種色情作品）把女性消音並將她們置於臣屬的位置。這份主張不僅應該是一個可信的因果（因此是實證性的）主張，朗頓的中心命題更是一個本質性的命題（第一章）^{註129}。

根據雷蒙．蓋塔（Raimond Gaita, 1998）的看法，種族主義經常牽涉到一件事：在面對受害者或攻擊目標時，對他們完整的內在生命感到不以為意或無動於衷。在名為「種族主義：對共通人性的否認」章節中，蓋塔描述了一個自傳性的花絮片段，故事裡是一名喪親的母親M，她不久前失去了她的孩子，且仍為此深陷於悲傷之中。蓋塔和M正看著電視上播放的一支越戰紀錄片，當節目內容進行到一名悲傷的越南母親——她不久前也因戰爭而失去孩子——的訪談時，一開始，M的身體往前傾，彷彿想要捕捉到這個同樣失去孩子的人所說的每一個字，但M隨即又立刻傾身往後靠，平板地說：「但對她們來說是不一樣的。她們很容易就可以有更多（孩子）。」（1998，頁57）蓋塔明確地指出，M的評論並不是從一個單純的社會學脈絡出發，也就是

單純指出越南人有著相對較為龐大的家庭組成；M的評論的意思也並非是指越南人於此時期受到戰爭的重創，導致他們對悲傷的感受力因創傷而變得遲鈍。更確切地說，M的評論表達的是，她認為越南人作為越南人有一種特質，使他們的情緒經驗無法跟M自身的相同、如此「深入」^{註130}。蓋塔寫道：

在M的眼中，越南人並非偶然地無法符合那些在追求深厚的內在生命可能性時必要的條件，如同某些人在經歷過巨大的艱苦後可能會有狀況。對她來說，他們本質上就是如此（1998，頁59）。

因此，M無法理解，她有可能可以和越南人對話並學習到對他們而言，結婚、愛他人，或為他人悲傷，代表了什麼意義（xxxv）。

蓋塔接著指出，在M的道德心理狀態中，針對那些她懷有種族主義偏見的人，她抱持著一種截頭去尾的主觀性，而在許多受到種族主義意識型態影響的人中，這個觀點是很典型的：

種族主義的受害者經常說他們被當成「次人類」對待。在許多情境裡——也許是大多數的情境裡——那一點都不誇張。我們可以從我對M的描述裡看到，她的態度是多麼極度地貶低人、多麼實實在在地去人性化，因為這個態度否定了它的受害者們得以有任何可能對人性情境中的關鍵特性提出有深度和清晰的回應。就「人類」一詞的自然定義來說——當它不單單被用以指稱人類這個生物物種時——那些被認定無法達到一種具有深度和複雜度之內在生命的人，理所當然就可以被當成比較不完整的人、被當成次人類對待（1998，頁60）。

當談到參與了大規模暴行的主體的道德心理狀態時，大衛·李文斯頓·史密斯（David Linningstone Smith）採納了一條類似的路線。不過，李文斯頓·史密斯（2011）採取的是更明確的政治和歷史路線，並且宣告「去人性化」（他將此理解為把一個非人的、動物的「本質」當成某個相關類別的人的所有物）可說是為政治領域內的同理心問題提出了解答，因為：

為了認可某個人是一個人——是一個人類同胞——你必須有人類的概念，而一旦你將某個人歸類為人類，這就會影響你如何回應他……多虧了我們的同理本質，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很難對他人施行暴力，這種抑制作用促成了團結人類社群的強力社會連結，並且解釋了我們這個物種為何達到如此的非凡成功。但這造成一個謎。自古以來，男性便彼此結盟，殺害與奴役他們的鄰人、強暴他們的女性〔等等〕

.....我們怎麼能夠做出這種暴行？這答案中有一個重要的部分是清楚的，這乃是藉由援引我們的概念想像力，將其他族群想像為非人類的動物。透過這個作法，我們能夠釋放出毀滅性的力量，這個力量通常因為我們的同胞感而受到抑制（2011，頁127）。

換句話說，當某些人在一政權底下被賦予任務，得對他人施予暴行或處決他人時，除非同情他者的天生傾向消退減緩，否則他們將會遭遇困難。此時，普遍性的去人性化，尤其是去人性化的政令宣導，可能會有所幫助。

此處我們已可留意到，人道主義立場在面對性別時的某個狀況，亦即它忽略性別的程度。比如說，M思緒中的越南人，同時也是一個女人和母親——因此，一個越南女人和越南母親——的事實，儘管在分析上並不重要，卻可能具有一些社會和心理學意義，但在蓋塔的討論裡卻顯得只是一樁偶然。以我們被告知的所有內容而言，M的思考對象也完全有可能是一個越南父親。

而儘管李文斯頓·史密斯在其說明中明確地排除了性別壓迫，與此同時，他也承認在他舉例提到的歷史暴行中，〔什麼〕對女性的大規模強暴所扮演的角色，而我們並不清楚這兩種態度如何互動。同樣的論點也適用於大屠殺期間被當成性奴隸的猶太女性命運，直到近年前，她們在歷史紀錄中仍被大大地遺漏（Hedgepeth & Saidel, 2010）。同時，在道德哲學領域內，針對大屠殺的討論往往圍繞著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在《倖存於奧斯維辛》（此為美國版書名 *Survival in Auschwitz* 直譯）一書中精采但必然不完整的描述，然而，本書的另一譯名——《如果這是一個人》（*If This Is a Man*），此為英國、澳洲和歐洲版本的譯名——卻在不經意之中要求我們把焦點拓展開來。

假如這是種族主義和族群仇恨的道德心理學特徵，那麼，我們可能會期待，若要克服它，某類的人性化過程有其必要。在諾米·阿帕麗（Nomy Arpaly）對《哈克歷險記》（*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的討論中（2003，頁75-78），我們可以找到針對這類過程細緻入微的分析。故事的發展是，哈克和吉姆一起逃家，並靠著一艘脆弱的竹筏順流而下（這是馬克·吐溫所設計的一個毫不隱諱的比喻，指出兩人「同在一條船上」）^{註131}。儘管哈克是一名白人男孩，而吉姆是一名黑人奴隸，但兩人之間的相處早已變得友善而自在。當奴隸獵人逼近，而吉姆差點被抓住時，哈克聰明地攔阻了他們，在此事上採

取了適當的行動。然而，此處有一個謎團：考量到哈克的作為與他明確的、被誤導的道德信仰乃互相對立，也就是他其實應該要交出吉姆，哈克是否值得因為他的作為而獲得讚賞？若是，原因為何？另一個謎團則是在於：為什麼哈克做了他所做的事？阿帕麗認為，哈克的行為在道德上確實是值得獲得讚賞的，因為此行為源自於哈克在道德上的啟蒙，他對吉姆抱持著越來越人性化的看法。阿帕麗寫道：

在哈克和吉姆共度的時間中，哈克經歷了一種知覺上的轉變……他和吉姆討論他的希望與恐懼，並與其密集地互動時，哈克不斷地接收到新的資訊（儘管從未深入思考），這構成了一個訊息——吉姆是一個人，就如他自己一般。吐溫讓哈克非常輕易地就覺察到他自己和吉姆之間的相似性：兩人同樣無知、共享同樣的語言和迷信，且從各方面來說，就算不是約翰·史都華·彌爾這般的天才，一個人也能夠看到，並沒有任何特別的原因去假設一人不如另一人。儘管哈克從未反省過這些事實，但它們卻使他對待吉姆的方式和他對待任何其他朋友的方式越來越相像。當哈克驚訝地發現自己對吉姆道歉時——在一個把黑人當作某種不如人的東西來對待的社會裡，這是一種無法想像的行為——哈克開始將吉姆視為人類同胞一事遂變得明顯……當哈克有機會可以把吉姆交出去時，他體驗到了一種強烈的不情願，很大程度上，他的不情願是他終於把吉姆視為人的結果（2003，頁76-77）。

這應該足以為我在此處所考量的那種人道主義思考提供一個初步的體驗^{註132}。我們該如何理解它呢？我認為我們可以同意，看不見其他人類同胞的人性，這可能會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至少在具有某種一貫性，或沒有好理由的情況下）^{註133}，但把人當作人看，或是認可其他人類作為人類，真的就是我們所能獲得的唯一領悟嗎？它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我們有分寸地對待他人？「去人性化」又在多大程度上必須為人們對彼此最殘酷的對待負起責任？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應該將其視為一個確實的心理現象，尤其是在厭女情結議題方面？這些是我在本章中會試著回答的主要問題，但首先，讓我先釐清人道主義的主要主張。

釐清人道主義 Clarifying humanism

自始以來，「人道主義」一詞對不同的人代表了不同的意涵，直至今日仍是如此。藉由提出前述的例子並介紹某些理論家，而（我認為）這些理論家的觀點可能會使他們質疑某些我在此提出的最終結論，我已指出了我所傾向的路線。然而，與其試著在細節上釐清他們的不同立場，為了追求清晰與簡潔，一個有益的作法將是對特定理論者的觀點做摘要，並嘗試從人道主義立場中提煉出一些關鍵的信念。這包含了描述性的主張（概念性兼知覺性的、道德心理學的，和歷史性的），以及一個規範性的主張（道德兼政治的），而藉由結合兩者，我試圖將前一節裡所蒐集到的各種（在我看來）互補的人道主義思考，彙整成一個自然且吸引人的組合。我們將清楚看到，每一個主張都能夠相當合理地引導——但並非推論——到下一個主張^{註134}。我們可從下述論點開始：

（1）概念兼知覺主張（Conceptual-cum-perceptual claim）：人類有能力將其他人類看作或認可為人類，而不僅僅是將他們看作這個生物物種裡的其他成員^{註135}。這包含了以一種同時帶有觀點主義與豐富認知維度的方式來思考他人，將他們視為「人類同胞」、和自己同類的成員，或（類似）「我們的共通人性」中的一分子。這同樣涉及到，不僅單單認可他們屬於人類（智人）這個生物物種（假如在此這個認可確實是思考的一部分），更是一個人^{註136}。

這代表什麼呢？將他者認可為人類同胞通常應該包括（尤其是）將他人看作擁有，或至少曾經擁有某個潛力，能夠^{註137}

- 以和自己類似的方式運用心智（認知上、意圖上、情緒上和現象學上等等）；
- 發展並運用各種典型的人類能力（human capacity），包括複雜形式的理性能力、主體性、自主性等等，以及判斷價值和反射性地形成與修正至少某些這類價值的能力；
- 進入並維持各種典型的人類社會關係（human social relation），包括婚姻、親職、手足、友誼和同儕關係；以及
- 成為他人或也許自身（至少潛在的）深層情緒依附（deep emotional attachment）的對象，且是可以被理解並刻意被選擇的對象。

掌握了這個概念兼知覺主張後，人道主義者如今即可提出他們的第二個關鍵主張，此乃以前一個主張（或極類似的內容）為前提：

（2）道德心理學主張（moral psychological claim）：當我們根據主張（1）的意涵而認可另一個人類為人類時，這不僅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條件，好讓我們在人際互動脈絡裡人道地對待她，更給予我們如此做的強烈動機和意向^{註138}。

但為什麼應該如此呢？是什麼機制連結了對個人人性的認可和（比方說）對她仁慈的動機，以及反感於對她殘忍的作為？對於我們之中那些同意在道德心理學領域裡被稱為休謨派動機理論（Humean theory of motivation）的人來說，這是一個特別急迫的問題。根據該理論，信念和其他「由世界所引導」的心理狀態本身並不會給予主體動機；一個人也需要假設一個合適的渴望或其他「想要引導世界」的心理狀態，才能夠解釋個人採取行動的意向。

藉由思考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所提出的例子，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對此連結的可能解釋；不只一個人道主義者曾經就此連結引用該例（參見Cora Diamond, 1978，頁477；Gaita, 1998，頁48）。歐威爾回憶著西班牙戰爭期間的某天早晨，他在壕溝裡試著狙擊法西斯分子，此時：

一個可能是要傳遞訊息給長官的男人從壕溝裡跳出來，然後在眾人眼前沿著女兒牆的上緣奔跑。他的衣服穿到一半，在跑步時雙手提著長褲。我忍著沒有對他開槍。我確實不是一個好射手，不太可能擊中一個在一百呎外奔跑中的人，而且我那時主要想著，要在法西斯分子們專注在飛機上時回到我們的壕溝。但終究，我沒有開槍，一部分是因為那條長褲所透露的細節。我是來這裡對「法西斯分子」開槍的，但一個提著長褲的男人不是一名「法西斯分子」；他顯然是一個同胞生物，和你自己類似，而你並不想對他開槍（1981，頁194）。

如柯拉所指出的，歐威爾談到這名軍人以一個「同胞生物」的身分出現在他的雷達上，而不是一個「人類同胞」。但儘管如此，她認為，對一個可能的攻擊目標的人性化視角特別容易引發憐憫，並因此讓身歷歐威爾處境的主體不願意扣下扳機^{註139}。

我們可以進行歸納。從主張（1）前進到主張（2），最有前景的路徑大概會訴諸一個類似於同理心、同情心、惻隱之心或同胞感的概念，而有鑑於我們認可到某個人和自身的相似之處，接下來的想法可

能會是我們將能夠，並傾向於認同她，或（某種程度上較為審慎地）採納她的觀點。接著，我們會經常感受到，在我們的想像裡她擁有的感受，或至少體驗到適宜的、有利社會的「助人者」情緒（例如憐憫）^{註140}。在這種情境裡，我們將傾向於想要對她仁慈而非殘忍，或甚至想要幫助她，而非更過分地傷害她，由此便大幅度地推展至：我們將會願意在人際脈絡中以人道方式對待她，這樣的結論。如今她將不僅會被認可，還會被欣然接受成為我們的共同人性中的一分子、一個道德關懷、互惠和類似感受的對象。因此，我們如今可以說，認可某個人是人類同胞具有一個動機性的結局，至少在典型的情境中是如此（例如當某些特定的心理狀態不存在時）^{註141}。

故主張（2）便自然而然、甚至是不可避免地跟隨著主張（1），並伴隨著其他與同理心和類似後續能力相關的主張，以及通常會接續其後的利他意向^{註142}。

再一次的，在主張（2）的基礎上，一系列的主張如今變得可能，即使它們不是邏輯上必然會導致的結果。

（3）類對調的道德心理學主張（Quasi-contrapositive moral psychological claim）：為了使人們以最道德敗壞的方式錯待他人（例如謀殺、強暴，或在相對不受到懲罰的情況下施以酷刑），無法將他們視為人類同胞是一種強而有力的心理潤滑劑，且甚至可能是必要的^{註143}。

（4）歷史性主張（historical claim）：當一類長期受到壓迫的人群開始被處於支配地位的社會群體中大多數成員以及整體社會視為人類同胞時，道德和社會進展就變得更為可能，甚至也許幾乎是無法避免^{註144}。與此相關的（或者再一次，具有類對調性質的）是，當屬於特定社會群體的人們成為目標，被道德上最為敗壞的廣泛或武器化惡行所攻擊時（例如種族屠殺、大屠殺、大規模強暴、系統性酷刑），這通常是因為他們一開始就沒有被視為完整的人類同胞，或是在那之後他們很快就被去人性化，通常是在去人性化的政令宣導影響之下。

（5）道德兼政治主張（moral-cum-political claim）：當特定社會群體的成員透過上述方式被錯待時，其中一個最關鍵的立即政治目標應該是讓他們的人性在其他人眼中變得可見（不管那具體內容包含了什麼），而在此過程中，對那些前景得以轉變的人而言，這也會構成一個關鍵的個人道德進步。

人道主義的問題 The trouble with humanism

將人道主義理解為前述五個主張的結合後，我們應如何看待人道主義？人道主義的診斷能夠多貼切地捕捉到那些深陷於各種壓迫意識形態——尤其是種族主義和厭女情結——的人們的道德兼社會前景？

根據以下假設，當談及厭女情結，人道主義看起來彷彿已陷入頗為嚴重的麻煩之中（第八章將提出證明）：和男性一樣，女性也可以執行厭女情結。若此事為真，那麼，要不就是被內化的厭女情結有可能如此深入，導致對一名女性而言，她自己不能被視為人——且因此侵蝕了一個人得以加入人類同胞群體的「認同」基礎；或者要不就是，她必然將其他女性視為和自己在根本上有所不同的生物類型。而在表面上看來，這兩種可能皆並不可信。

上述的反對觀點尤其駁斥了人道主義對厭女情結所提出的解釋，然而我們並不清楚，這個反對意見是否如開頭看起來那般嚴重。一種可能是，身處支配地位之男性確實對女性抱持著上述去人性化的態度，但是他們的看法孕育出一個針對特定女性的意識形態，而其他人隨後予以學習。事實上，雖然我反對這個連結裡的前半部（亦即，身處支配地位之男性的厭女情結通常包含將女性去人性化），但我自己最終也會提出某個類似於「意識形態感染」機制的說法（見第八章）。女性和特權男性分別扮演付出者與取用者的角色，這會被女性與男性內化，因此，身為陰性氣質俱樂部合格會員的女性同樣可能會執行這些規範，至少在某些脈絡裡是如此。事實上，比起第二人稱式的反應型態度，當涉及第三人稱式的道德主義時，她們更有可能這麼做，因為那些粗心、自私或疏忽，並顯然規避了自身責任的女性為其他「善良」或勤懇的人創造了更多工作量。更有甚者，這類女性可能侵蝕體制，而許多女性為了這個體制押上了自身的未來、身分，和自我價值，諸如此類。我將在第八章中提出這個看法，並於結論中再次回到這個主題，但我預期結論將是如此。與此同時，在處理了將人道主義立場專門應用在厭女情結之上時會遇到的問題後，我們應該看看這個立場可能會遇到哪些更一般性的問題。

我們可從思考上述的主張（1）開始，亦即有一種看待他人的方式，超越了將他們視為人類物種裡的另一個成員。相反的，它涉及了感受到和他人之間足夠的共通性，以至於可以激起某種類似同理心的感受，而如我們所見，此概念將可能可以被自然而然地援引，以便從

主張（1）過渡到主張（2）。我認為某些版本的主張（1）是相當可信的，而且在其後的段落裡，我將會為了論證之便而接受它。但問題在於，它極度不完整，因為對於你和你周遭的人物來說，一個人類同胞不只是一個可以被理解的配偶、父母、子女、手足、朋友、同僚等等；他們也是一個可以被理解的對手、敵人、篡位者、不服從者、背叛者……除此之外，因為他們具有理性、主體性、自主性和判斷能力，故他們亦是某個可能會強迫、操縱、侮辱或羞辱你的人；因為他們有抽象關聯性思考的能力和一致的道德情緒，故能把你想得很惡劣並輕蔑對待你；因為他們有著形成複雜渴望和企圖的能力，故能懷抱著惡意並密謀反對你；因為他們有著判斷價值的能力，故可能會重視你所憎惡的，並憎惡你所重視之物。因此，他們有可能對你所珍惜之事物形成威脅，而——你可能意識到了——你可能反過來對他們所珍惜之事物造成威脅。這只給了我們更多的理由去擔心其他人表現殘忍、輕視、惡意等等的的能力。

基本的結論是這樣：在甚至只是稍微不理想的情況下，比如說，當涉及可被耗盡的資源、為人所渴望的有限地位，或相衝突的道德與社會理想時，某些人的人性對他人而言，有可能代表著雙面刃。因此，當遇到將某人認可為人類同胞的情況時，你們所共享的典型人類能力並不會就此讓她變得可以共感；那些能力，讓她以人類才有的方式——至少就人類本身獨特的覺察能力來說——變得是潛在有危險且具有威脅性的。舉例來說，她有可能會顛覆你的權威^{註145}。

由此，我們可以延伸到什麼？考量主張（1）的極度不完整——以及整體而言，它僅僅說出了一半的事實——如今主張（2）可以被視為是有問題的主張。同理心和相關傾向仍舊有能力形成利他意向，但這些意向將必須和涉及各種敵意立場的意向彼此競爭，並且有可能會被它們抵銷^{註146}。舉例來說：對待聲稱的敵人時，個人的立場伴隨著試圖摧毀他們的意向；對待表面上的對手時，個人的立場伴隨著試圖擊敗他們的意向；對待當下的篡位者時，個人的立場伴隨著試圖扭轉局勢的意向，亦即試著削弱與再次超越對方；對待那些被視為不服從者時，個人的立場伴隨著試圖讓他們再次安分守己的意向；而對待被看作背叛者的人時，個人的立場伴隨著試圖懲罰他們的背棄的意向。很明顯的，這其中，有許多屬於厭女情結最典型的操作方式。

這是主張（2）的部分，這個主張可以被理解為對一個主體整體動機的側寫。由於主張（3）和主張（2）的對調相近，它將有可能隨其

被一同顛覆，而剩餘的主張（4）和（5）如今便缺少了它們迄今以來的辯護理由。（技術上來說，我們仍可觀察這些主張是否能夠被一個獨立的根據所支持，但就我來說，我很懷疑它們是否有其他的論據。）

截至目前為止，在本節裡，我主要針對人道主義的關鍵主張提出了概念上的批評，而簡略地檢視具體例子將有助於強調這些批評的適切性。人與人彼此之間最骯髒、惡劣的事蹟中，似乎有許多仍在持續發生，即使在他者表現出共享或共通人性的情況下，而且事實上，它們可能就是受其所觸發^{註147}。

以艾略特·羅傑為例，他（回顧第一章）宣告他有意對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阿法斐姊妹會中的「金髮辣妹蕩婦」們施行報復，因為她們未能付出他如此劇烈渴望的愛、性、情感與注意力。事實上，羅傑抱怨她們根本未能注意到他，因為她們全神貫注於「倒貼」那些她們所偏好的「討人厭的畜生」、「高人一等的紳士」。「她們不喜歡我哪裡？」羅傑在他自製的影片中自憐地問。回想一下，情緒上與文法上的氣氛接著如何轉變。「我將會為此懲罰你們所有人。」羅傑向這些女性保證。如今他以第二人稱的語氣對著她們說話，而非談論她們。

這些情緒的驚人之處在於，它們不僅預先假定，甚至似乎仰賴於認定女性有著符合前文定義下的人性（見「釐清人道主義」一節中的主張〔1〕）。羅傑給予了這些女性主觀性、偏好，以及形成深層情緒依附（愛與情感）的能力，並且認為她們擁有主體性、自主性，以及與他對話的能力。但這種認可絕非治療厭女情結的萬靈藥，事實上，那似乎是它的根本前提^{註148}。羅傑想要這些女性沒有給他的東西；她們因此控制了他。他沒有否認女性的力量、獨立性和心智的存在，相反的，他仇視並試圖懲罰她們，因為他認定自己有權利獲得她們的好處，但她們卻用了使他感到挫折的方式來表現出這些能力。

一個社會脈絡下的替代選擇 A socially situated alternative

然而，假如在某些應該要訴諸人道主義解釋的情境中，人道主義卻無法順暢運作，我們能夠以何作為替代？若從我先前對厭女情結的分析進行歸納或延伸，還有什麼其他解釋，能夠說明人們對彼此施予的不人道對待？

在此我們可以先從深入探究人道主義者想要處理的謎團開始：假如一個人類主體A理解人類主體S和A是很相似的，那麼，A為什麼能夠如此不正當地對待S，或是無視或轉身迴避受苦的S？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A缺少對S的共通人性的認可，但這便否定了開頭條件句的前提。這會排除一個看似牽強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某個人有可能殘酷地錯待其他人類同胞，即使他認定他們為人類同胞。但為了解釋人們對彼此的不人道行為，另一個從結構上來看很合理的探究方向則是某種額外的表述，亦即某種看待他人的方式會引發某些對抗，或甚至抵銷初始利他傾向的動機。政治意識形態、權力階序，和因此而生的理所當然感——以及由此而生的需求，還有當需求受阻時所產生的憤怒——可能會居中進行協調，而這表示，人們可能會在將他者視為人類同胞的同時，卻仍舊惡劣地對待他們。這並不是一個牽強的可能性，它只是需要某種背景故事；若缺少了背景故事，在實務上主張這個連結就會顯得反常。

這些看待他人的其他方式，可能會是哪些？我們已經提過部分，例如，把某個人看作個人的敵人會引發試圖摧毀他的動機，而將某人視為個人的對手會引發試圖擊敗他的動機^{註149}。在以下段落中，我將繼續著重於這些概念，以及篡位者、不服從者和背叛者的情況，以讓討論維持聚焦。但某種程度上來說，無限延伸這張（或多或少祕密的）敵意社會立場列表——亦即從某個特定社會世界內的特定某處出發，對他人所採取的立場——並不是一件難事。回想如「暴徒」（thug）、「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城市青年」（urban youth），或甚至「打劫者」（looter）這類的詞語，與它們在當今美國國內的政治論述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些都是白人用來輕蔑指稱美國黑人的詞語，這便是為何如傑森·史丹利（Jason Stanley, 2015，頁158-160）所說，這些詞語都能夠作為有效的種族主義「狗哨」。但在表面上，去人性化似乎不能貼切地形容這些詞語所表達的任何概念。

沒錯，某些詞語反應並幫助形塑了一種「我們」和「他們」的心態，但這個「我們」無須是被放大過的人類群體，他可能是身處特定社會位置，或在眾多的人類內部權力階序（包括那些立基於假想道德價值的）其中之一，占據了某個身分的人類^{註150}。

這些和敵意立場相關的動機，可以促成某些非常醜陋的行為（儘管它們當然有著巨大的差異）。它們經常隨身攜帶了抨擊、貶低他人，或試著（重新）建立支配地位的誘惑，而這些看待他人的方式不必然被某種與他們共享人性的認知所阻擋；事實上，它們可能正好仰賴這種認知，因為只有另一個人類才能夠合理地被看作敵人、對手、篡位者、不服從者、背叛者和其他類似對象，至少從這些詞語最完整的意義上而言是如此^{註151}。相反的，被人類施以暴力的非人類動物會被想像為被捕食的對象、獵物，或掠奪者，也就是野生的，而且會對我們造成危險。或者，在家畜的情境中，亦即當我們可以教導牠們回應複雜指令時，牠們被視為不聽話的。但是，難以控制的狗或馬會被認為是暴動者。當談到人類與非人類動物的對比時，我們所使用的不同詞語有其涵義，亦即這暗示了我們通常只有在面對被認可為人類的對象時，才會採取一些專屬於人際之間、但無疑帶有敵意的姿態。（無論我們是否應該這麼做——別忘了這是一個描述性的道德心理學練習，而不是規範性的。）

這裡值得我們為敵人的概念稍作暫停，因為某些人道主義者似乎並不認同這個概念能夠在對共享人性的認可情況下受到維持^{註152}。例如，在討論到先前引用的歐威爾所撰段落時，柯拉·戴蒙（1978）寫道，敵人的概念和「人類同胞」的概念在那裡處於某種緊張的關係^{註153}，然而，是什麼樣的緊張關係？她又為什麼覺得在此處和其他的情境裡，這個說法是有效的？確實，後者這個表達語有著前者所沒有表現出來的一種友善語調，但這可能只是語用論的問題。這個表達語的任務是為一個想法提供決定性的內容，亦即，他者和我們之間的相似性裡有著某種內涵，而若察覺到該內涵，會讓我們難以將他們當成敵對戰士對待。但我卻不這麼認為。如果這確實有任何影響，那麼，隨著這些他者和我們自身有著越多的相似性，我們越有可能需要提防他們，以防他們和我們競爭權利主張或利益^{註154}。

當然，我並不主張這個辯論到此結束。也許「同胞」的概念裡仍有某些意涵是我沒有蒐羅到的，而這在此處可能可以執行一些重要的任務，而不會單單迴避這個問題，或省略女性「同胞」的概念。但

是，和至今文獻已經討論到的內容（至少就我知識所及）相比，我認為需要提出更多的討論才能達到有說服力的效果。而與此同時，這個辯證的重點要落在人道主義者的肩膀上。

是什麼原因讓軍人的身分對歐威爾來說變得不再顯著，還有一個對立的解釋，而這也讓事態對人道主義者而言變得更加艱困。再一次，這和階序關係有關。當歐威爾看到敵方軍人提著褲子跑過戰場時，那不只強調了軍人同樣是人類，或也許僅僅是脆弱的生物體；相反的，或者除此之外，歐威爾還捕捉到了那個男人最可笑的模樣，而這件小事便可能暫時改變了歐威爾如何看待他們的相對社會位置。正如同歐威爾的作為那般，以憐憫——一種親切但仍舊彎腰躬身的、有時帶有優越感的態度——來看待對方，變得再自然不過。我們很難將一個身處這類難堪位置的「同胞生物」看成公平的競爭對象，或者，我們甚至會因此完全無法將對方看成敵人，在前者的意涵對於後者來說是有意義的情況之下。儘管參與戰爭的士兵可能有信心能夠獲勝，但通常還不至於把敵人看得如此無助且毫無防衛，以至於可以製造埋伏。

這些社會脈絡下想像他人的方式——也就是作為敵人、對手、篡位者、不服從者和背叛者等等——似乎顯然已成熟到能夠為不人道的行為提供有用的解釋。那麼，為什麼在此處的哲學脈絡裡，它們沒有更常被用來進行這樣的任務？據我揣測，原因之一是它們沒有詳細說明主體引發問題時的位置，因為很多時候，主體沒有被描繪成堅定地身處於人類世界，並捲入複雜的社會慣習、角色、制度和（在此脈絡裡是很關鍵的）壓迫性階序關係裡。相反的，在描繪中，主體僅僅試圖評估他人並評價他們的優點，而這比較像是神會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前面提到的這五種立場基本上都是位置性的，而且本質上，其中有許多是階序性的。它們包含了試圖保護、改善，或重新獲得個人相對於他者的社會地位；它們涉及了（用那個有用的詞彙來說的話）「爭奪地位」。

除了敵意以外，這些爭奪形式中有許多涉及了某種對抗，而一個人並不需要看不起他的對手才能夠把他當成對手，或甚至是勁敵。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如果一個人沒有對他者在某些相關面向的優點懷有某種程度的讚賞，那麼，與其競爭就有可能會失去大部分的內在（甚至外在）利益。而儘管競爭可以是健康的，它也有可能是帶有惡意的；對抗可以是友善的，但也能夠是苦澀的。它可以促使我們對我們的對手感到怨懟和敵意，使我們嚴苛地看待他們（最主要是因為目的性的推論所造成的效果），並進而惡劣地對待他們。因此，從主體

A對對象S的能力給予高評價——至少在內心深處——再推論到主體A會傾向於仁慈地對待S，基本上並不是一個好的推論（重要的是，反過來亦同，見註13）。

但是，為什麼這個推論一開始被認為是可信的？特別是，為什麼我們會認為，認可在歷史上屬於臣屬社會階級成員們的人性——亦即認可他們作為人類、有能力達到同樣的卓越表現——對於迄今仍身處支配地位的團體成員而言，會是好消息？再經考慮之後，這便顯得過分樂觀了。在當代西方社會裡，近來（舉例來說）非白人和白人女性進入了聲望最高的位置，這代表白人男性如今面臨了激烈競爭，再加上競爭經常導致迄今的支配者被他人超越，且是被那些他們心照不宣地期待社會位置低於他們的人所超越，於是你就得到了一份食譜，烹調出怨懟和——用社會學家麥可·基梅爾的話（2013，頁18-25，第一章）來說——「忿忿不平的理所當然」（aggrieved entitlement）感^{註155}。

當我們謹慎地將主體描述成鑲嵌於社會世界之中，而不是憑空地形塑了其他人的優點時，這點就變得很清楚。即使如此，我們仍須小心謹慎，以適當地描繪社會景觀。另一個（在我看來）經常使體制不盡完善的行為是，把相對有特權的主體放置於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2011）所說的「關懷圈」（the circle of concern）中心，以至於在終結壓迫的對抗過程中，他們的核心道德任務僅僅只是張開雙臂、擁抱人性，或者也許僅僅只是覺察到剩下的我們這些人。這個圖像把（理應相關）的主體置於世界裡面，卻忘了這個世界所包含的所有垂直結構——也就是為了達到社會正義所必須被拆解的特權堡壘。這些堡壘經常受到良好的防衛，也很難被挑戰，因為不令人意外的，人們往往深深致力於將其延續下去。雪上加霜的是，這些結構對於受其維護與支撐的特權位置人士來說經常是隱形的，因此拆解它們不僅感覺像是一種衰落，也像是對特權者的一種不正義。在這段過程中，他們將可能感到自己被夷為平地，而非只是和他人齊頭並進。

根據這點，我會認為，在解釋歷史上身處臣屬地位、被視為對現狀有所威脅的人們所受到的不良對待時，我們往往並不需要任何特別的心理敘事，例如「去人性化」；相反的，這份不良對待可以被目前與過去的社會結果、階序關係、規範和期待所解釋，也可以被它們受到高度內化、難以根除的事實所解釋。如同我所發展出的厭女分析，我們不需要補充說明去人性化的範例；相對的，此心理敘事可以被看

成當人們內化了這個（不正義且太過真實的）道德兼社會景觀之意識形態和特點後的，一個結果。

如我們所見，人道主義者認為某種特別的心理敘事在此是必要的，其中的假設乃是對於主體來說，針對他人施予暴力行為或攻擊弱勢與無辜的一方通常相當困難，因此，為了改變主體對即將成為受害者的對象的觀感，就必須採納某些作法。但這個假設未能領會到一個事實，亦即身處支配社會位置的主體通常一開始就沒有抱持這種中立或有益的觀點；針對他們相對於他者的社會位置，以及他們相對的義務、許可和權利，支配主體始終深陷於某種錯覺之中。因此，從支配者的觀點來看，他們錯待的對象通常絕非無辜。相反的，他們經常被心照不宣地——並且錯誤地——認定為是犯下大罪的^{註156}；尤其當事涉厭女情結，我們一再地看到這類情況。但我相信這個觀點是概括全面的，事實上，在某種意義上它必須如此，好公平地對待種族主義和厭女情結的交織，比方說，在厭黑女（misogynoir）的情境裡。

根據麥可·基梅爾和大量白人男性的訪談內容指出，當一名黑人女性擊敗了一名有類似資格的白人男性並受到雇用時，後者傾向於抱怨前者奪走了他的工作。基墨提問：為什麼是他的工作？而不是一份工作（2003，第一章）？我認為答案相對直接明瞭。在這個不正義的父權和白人至上的階序裡，與一種亟需被彌補的理所當然感之下，這個女人的確奪走了他的工作。這份幻想並不是一個心理學狀態，而這個狀態促成了一種徹底的道德錯誤，於是只要偏執者能夠更清楚地認知到誰才是先來後到，這個狀況便有可能會停止運作。恰恰相反，這裡所討論的是一個普遍而天生的道德錯覺，因白人異性戀父權秩序底下持續不斷的有毒遺產而形成。

支配他人 Dominating people

那麼，這一切把我們帶往何處？我已經指出，總的來說，一個主體把另一個人類對象認可為人這件事，可能無法讓他強烈地——或者可以說根本無法——傾向於以人道的方式對待這個對象（亦即在人際脈絡中給予合適的體貼、尊重、關心和道德關懷）。這並非因為我認為人道主義者是錯的——當他們指出在其他條件都對等的情況下，對個人人性的認可將可能促使人道的行為。問題在於我認為，其他條件經常是不對等的。事實上，它們可能極度地不平等。在相關主題上，我認為人道主義者並沒有充分地考量到這類認可有可能會被蓋過的事實，競爭表現和它們所激發的意向可能會壓倒或甚至抵銷利他的意向，因為我們可能會將他者看作對手、不服從者、篡位者、背叛者和（尤其是）敵人，卻從未忘記這些人的完整人性。而接下來，我們可能會傾向於試圖擊敗、懲戒、斥責、懲罰、摧毀那些人並永久地闔上他們的雙眼，而我們清楚地知道他們就和我們一樣。

謹記這點，讓我們回到開頭的例子，並看看既然如今社會脈絡觀點和人道主義立場共同存在，我們可以如何解讀它們。在某些被人道主義者視為範例的主要情境裡，這些模型中的哪一個——如果有的話——最具有解釋力？

阿帕麗將哈克的道德善行（以及根據她的觀點，他在道德上值得讚賞的行動）解讀為：因為他迅速認可到吉姆的人性而生的產品。我曾在他處指出，阿帕麗僅順口提到了促成哈克在道德上徹底轉變的關鍵原因：哈克和吉姆建立了一段真誠的友誼（Manne, 2013）。這使我們理解到，在故事的這個階段，哈克其實正因為吉姆產生了超出自身身分——亦即他作為奴隸的身分，並因此是他主人的財產——的想法而怒氣翻騰。當哈克深陷於自己持久的、怨懟的種族主義觀念，他怒氣沖沖地說：

當我自言自語時，吉姆一直大聲地說著話。他說當他抵達一個自由州時，他第一件會做的事情就是存錢，然後一毛都不花，等到他存夠了錢時，他就會買下他的妻子，她屬於一個鄰近華生小姐住所的農場。然後他們兩個都會工作，以買下他們的兩個孩子，而如果他們的主人不願意賣，他們會讓一個廢奴主義者去偷走他們。聽到這樣的談話，我幾乎全身凍僵，在他以前的生活裡，他永遠都不可能敢說這種話。看看，一旦他判斷他即將自由，他有多麼不同。就像那句老話說

的，「給一個黑 一寸，他會前進一尺。」我心想，這就是我不思考的結果，這是一個我基本上協助逃跑的黑 ，他直截了當地說出了他會去偷他的孩子——這些孩子屬於一個我根本不認識的人、一個沒有對我造成任何傷害的人。聽到吉姆這麼說，我覺得很遺憾，他變得如此低下（Twain, 2010，頁99-100）。

接著哈克決定去糾正這些他認定錯誤的事情，並藉著告密來發洩他的怒氣：

我的良心開始前所未有地熱烈鼓動著我，直到最後我對它說，「放過我吧——現在尚且為時不晚——我會在露出第一道曙光時把船划到岸邊，然後說出這件事。」我立刻感到輕鬆，而且快樂，而且如羽毛般輕盈。我所有的煩惱都不見了（2010，頁100）。

於是，哈克打算告發吉姆的計畫不僅僅出於一種真誠的責任感，而這份責任感因為同情心或良心而減緩，但最終獲勝；這個計畫至少也同樣表達出了哈克怨懟的、自詡正義的、想要給吉姆上一課，並且讓他再次分安守己的渴望，因為吉姆逐漸變得「高傲」了^{註157}。

那麼，在故事裡，是什麼改變了哈克的心意呢？正當哈克往（正巧）現身的奴隸獵人方向前進時，吉姆說出了這段話：

我馬上就會因為喜悅大喊，然後我會說，這都是因為哈克。我是一個自由的人，而如果不是因為哈克的緣故，我永遠都不可能自由。哈克辦到了，吉姆永遠不會忘記你，哈克；你是吉姆有過最好的朋友，而且你是老吉姆如今唯一的朋友了（2010，頁100）。

作為敘事者，哈克繼續說道：

我正划著船，急著想要告發他，但當他這麼說時，似乎把我的力氣都抽乾了（2010，頁100）。

因此我認為，主因是哈克認知到了他和吉姆之間的友誼，加上他抱持著的背景認知是一個人不會告發他的朋友，而這份認知勝過了他的明確信仰，亦即一個人應該歸還盜取物，包括像吉姆般的逃跑奴隸在內。我樂於同意阿帕麗的觀點，也就是，對吉姆人性的認可在此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可能就是這份認可，使得哈克在一開始和吉姆變成朋友。但在此脈絡裡，這正好對我的觀點有所幫助（而這對阿帕麗試圖透過此案例說明的觀點則較不重要）。認可吉姆的人性並無法阻止哈克企圖殘酷地背叛他，但這個認可構成了友誼意識，而這層意識最終完成了這份概念上兼心理學上的重要工作。哈克經歷了

一種整體形態上的轉變（gestalt shift），從將吉姆描繪為一個「不服從者」及「低下的人」，到在關鍵時刻成為一個「朋友」，而看起來便是這份轉變把因為前者這組觀感而產生的意圖「抽乾」了。哈克對吉姆人性的基本體會在整個事件中持續作為一個常數。

那麼，在蓋塔案例裡的角色M是什麼情況？假設我們認同蓋塔對M的看法，亦即她只給了紀錄片中的越南女人一個截頭去尾的內在生命，這個形式的種族主義似乎確實有其可能，事實上甚至很常見。但蓋塔似乎假設了這是M對越南人所持有的，一種相當一般性的看法——亦即她一貫賦予他們的一種特定天性或本質。這是一種可能性，但這絕不是唯一一種。一方面來說，在人們當代的記憶中，越南人曾多年都被許多澳洲人視為敵人，而這支紀錄片乃是關於越戰，這有可能幫忙喚起了這份聯想。因此，就所有我們所聽到的資訊來說，我們似乎無法回答在一個不同的社會脈絡裡，若M知道對方的國籍和種族，但他們往昔的敵人身分卻變得比較不顯著時，M是否仍有可能會對一名越南人有著相同的反應。

此外，還有性別化的可能性特別需要被納入考量。某些社會規範允許或鼓勵「俯身取用」非白人女性的照護和家務勞動，而不幸的是，這些社會規範在種族歧視的白人澳洲文化中殘留的程度，就跟它們在美國某些特定產業內的普及程度一樣高。而大約在此時間點，越南移民（通常是難民）所占的相對高比例使得她們格外容易遭到這類剝削。因此，再一次的，這可能是一種意識形態和心理上的權宜之計，為了在內心否認這名女性有資格因為這種對待而感到怨懟。對其他人類感覺同理的能力可能對我們造成挑戰，甚至難以承擔，進而使我們不願意面對它們。

這指出了一個可能性，而蓋塔（1998）在針對種族主義的發展整體論述時（頁62-66）頗為簡要地駁斥了該可能性——亦即當一個像M這樣的人想要極小化外圍群體成員（至少在某些情境裡）的主體性（subjectivity）時，這份傾向近似於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或者更準確地說，近似於任性的否認。這不必是一種針對相關人性本質的直接信仰，或甚至不必是一種隱晦的描繪，至少在一開始的情況裡不必是；相反的，任何相關的描繪可能都只是某種類似於動機原因的結果，它們源自於一種初步渴望，想要極小化這些人的主體性。此外，這樣的渴望也可能是因為，若不這麼做的話，個人可能會感受到內疚和羞恥感，或被令人虛弱的同理心所淹沒。另一個較為不討喜的可能性則是，那或許源自於（再一次，經常是初步的）一種想要攀附某種

特權的渴望，這些特權通常仰賴於（和內圍團體成員相比）用一種比較不認真的態度來看待外圍群體成員的偏好和計畫。

最終的結局是，有些方式可以用來填補M的故事，但這些方式可能會使她相對膚淺地否認越南人的人類完整主體性，並且最終仰賴她不自在地覺察到，他們當然和她享有同樣的能力，能夠感覺到同樣的受傷與悲傷。於是，在一個較不帶有種族主義的情境裡，能夠讓M得以有所不同的，會是更強大的情緒力量和道德清明，而非將他人人性化的經驗。

接著，朗頓對色情本質的觀點又是如何？從某方面來說，朗頓顯然是對的，也就是有一種異性戀色情類別是將女性描繪成空白的、睜著大眼的，並相對無心智的生物（女性主角總是渴望他想給她的東西，而光是小聲肯定便已經差不多用光了她的字彙）。但我認為，去假設這類色情作品引發或反映了這種對女性的字面觀點是錯誤的；我覺得更可信的作法反而是把它看成一個可供行銷的幻想，它為痛苦和迎面而來的現實提供了一個逃避出口。只要一個人不是充滿妄想，或只要他有網路連結（這是酸話），那麼，對他來說，女性的主體性和性自主已經越來越難以遭到否認，因為女性的聲音在網路空間裡太大聲而清晰了^{註158}。因此，從父權價值的觀點而言，女性可以是人——有時候太像人了。色情作品可以為令人擔憂而難以承受的現實提供一份受人歡迎的寬慰；因為女性有能力可以使男人感到羞恥，或在性上面羞辱他們，在想像層面上減緩女性人性可能造成的心理威脅，便得以安撫人心。這和表達或甚至形塑男性對女性的字面觀點有所不同（一段引人省思的討論可參考Bauer 2015）。

截至目前為止，這個以社會脈絡為基礎的模型進展得相當順利，但若將它大幅延伸，則會遇到一個明顯的挑戰，特別是針對那些因為政令宣導的影響，而被明確的去人性化意識形態所牢牢控制著的主體，我們可以提出什麼看法？如果這情形無法被這個社會取徑所解釋，那麼它就有機會規劃出一個重要的場域，在其中，人道主義的模型顯然是比較具有優勢的。

然而，即使是在此主題上，我也不確定這個社會脈絡取徑是否該如此快速地就擱置一旁。這顯然是一個廣大的議題，對其進行直接討論的文獻十分豐富且仍在增加（例如，可參考Tirrel〔2012〕和Stantley〔2015〕，以及David Livingstone Smith〔2016〕），因此，在

此我將嘗試只針對此主題提出一點初步看法，並將更完整的討論留待以後。

一個簡單的觀點是，去人性化的言論可以有著威嚇、辱罵、貶抑、藐視等功能（Manne, 2014b），因為它幫助自己獲得某些被有力地轉譯了的社會意義。而有鑑於人類普遍（可能是錯誤地）被認為比其他非人類的生物優秀，否認他人的人性可以作為一種特別羞辱人的鎮壓類型。當一名佛格森市^{註159}的白人員警稱一群黑人政治抗議者為「該死的動物」時（在當地警察射殺麥可·布朗後，我將於第七章討論這起案例），他運用這個修辭貶抑與降低抗議者的地位，並重新確認他自身的支配地位。這類鎮壓的庫存品隨時可供取用，而白人至上的意識形態受惠於此。當對象是真正的非人類動物時，這類鎮壓鮮少是適用的，因為這些動物既不能理解這種侮辱，也不會因為被正確指出牠們的非人類地位而被成功鎮壓。這需要人類的理解力，更別提一開始就存在的人類地位，好讓一個人可以從該位置被降級。如果你事實上是一隻老鼠，那當你被稱為老鼠時，你並沒有什麼好反對的^{註160}。

有人可能會回到另一個觀點，認為去人性化的意識型態最適合用來解釋參與大規模暴行之主體的道德觀，如同大衛·李文斯頓·史密斯的討論焦點。但即使在此處，我們也有理由擔憂從去人性化政令宣導的字面內容（或人們機械性的重複）讀取道德心理的作法^{註161}。很有可能的是，對去人性化政令宣導的理解是錯誤的意識，至少在許多例子裡並不正確。我懷疑這種情況發生的頻率比我們所意識到的更高。

為什麼這麼想呢？在此脈絡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戰爭、種族屠殺，以及所謂的種族清洗，經常包括了對女性的大規模強暴。對我來說，這似乎引發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需要人道主義者來回答，也就是：如果大規模暴行的施行者經常將他們的受害者去人性化，為什麼施行者這麼常強暴女性受害者？一方面，人類與非人類動物之間的性一般而言是禁忌，且相對不尋常——這可能是部分的原因^{註162}；另一方面，大規模強暴通常傾向於傳達報復、懲罰、洋洋得意，而且專橫跋扈的精神。因此，這些行動帶有所有人際之間暴力的標誌，它們表現並發洩出了典型的人際反應型態度，例如怨懟、義憤填膺、嫉妒等等^{註163}。

人道主義者能夠如何處理這個挑戰？一個李文斯頓·史密斯（2016）所追求的有趣可能性是，去人性化的受害者同時被描繪成人類和次人類。具體來說，他們被認定為有著人類的外表形象，但和某種非人類動物共享著一種本質，這個本質通常對人類代表了威脅或危害（例如蛇、老鼠、蟑螂）。他認為，大規模暴行的受害者因此傾向於被看成是「怪異」和可怕的。

談到知覺的型態改變，以及主體隨後在面對那些被交代要處決或摧毀的人們時所會產生的矛盾心理，我認為李文斯頓·史密斯提到了重要的一點。但我擔心，如果他的具體敘事確實具有任何影響，那麼反倒會讓大規模強暴變得更難被解釋。和那些被視為怪異並因而激發恐懼和反感的人有性接觸，至少應該像是與他們做出其他互動時那般地令人嫌惡，或甚至更甚才是。

第二次大戰期間惡名昭彰的蘇聯政令宣導部長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urg）本人便確信這點。根據歷史學家安東尼·畢佛（Antony Beevor, 2003）近期的說明，德國政令宣導部長指控愛倫堡煽動蘇聯紅軍於占領柏林期間強暴德國女性。愛倫堡鮮少在被他人指控殘酷和冷酷時退縮，儘管如此，他卻主張蘇聯軍人「對Gretchen沒有興趣^{註164}，我們有興趣的是那些侮辱了我們的女人的德國青年」。蘇聯政治部呼應了愛倫堡的意見，並說：「當我們在一個軍人心裡餵養出真正的仇恨感時，這個軍人不會試著和德國女人發生性關係，因為他會覺得噁心。」

愛倫堡的政令宣導是一種包含了去人性化修辭和具體化敵意的經典組合。在本章的脈絡中，前者的面向格外令人吃驚，它是在名為《殺！》（*Kill!*, 1942）的小冊裡的主要內容，這本小冊發送給超過一百萬名紅軍軍人，開頭寫著：「德國人不是人類。」在另一本更為追根究柢的《仇恨的正當理由》（*The Justification of Hatred*, 1942）中，去人性化修辭也很關鍵；其中愛倫堡費盡苦心地強調蘇聯人民富有同情心的天性，而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裡的行為應該很清楚地表現了這點，這使他面臨了以下的謎團，更別提辯解的重擔：

那麼，這是怎麼發生的呢？蘇聯人民怎麼會以如此難以平息的仇恨憎惡著納粹？

仇恨從來都不是俄國人的特徵之一。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我們的人民如今所表現出來的這份仇恨是從苦痛中所生。最初，我們之中許多人以為這場戰爭就和其他戰爭一樣，我們所對抗的只不

過是和我們穿著不同制服的人。我們在人類友愛和團結的偉大理念下長大，我們相信文字的力量，而我們之中許多人並不了解，我們所對抗的不是人類，而是令人害怕與厭惡的怪物，人類間的同胞情誼原則迫切地要求我們不顧一切地對付法西斯.....

俄國人民有一首歌，在歌裡人們表達了他們對正義和不正義的戰爭的態度是：「獵狼犬是合理的，但是吃人肉不是。」摧毀一頭瘋狂的狼是一回事，但威脅另一個人類是另一回事。如今每個蘇聯男人和女人都知道，我們被一群狼攻擊了^{註165}。

這裡的說詞和李文斯頓·史密斯的主張意外地一致，遭到去人性化的對象被描繪成披著羊皮——或更準確地說，人皮——的狼，而「令人害怕與厭惡的怪物」之聯想，同樣有利於李文斯頓·史密斯的論點，或至少，如果我們認為這段政令宣導成功地幫助了十九軍^{註166}用文中描繪的方式來看待德國人民的話，事情確實是如此。

但蘇聯軍人對德國女性的大規模強暴，還有他們並非單純聽從指令一事，使我們對此假設產生懷疑。事實上，情況正好相反，當時包括史達林本人在內的高階軍官們十分憂慮軍人們的殘酷行為（包括了洗劫，以及在柏林的大規模破壞）可能會損害他們在軍事上的努力——更別提破壞了如工廠在內的寶貴資源。因此，蘇聯軍人其實違抗了命令。但縱然如此，大規模強暴德國女性的情況仍持續了數年，在這段期間，至少有兩百萬名的女性遭到強暴，而許多——若非大多數——人是被反覆強暴；輪暴非常普遍。紀錄中，遭強暴的女性最年輕的只有十二歲，最年長的則為八十歲，無人倖免——修女、醫院裡的孕婦，甚至正在生產的女性，都沒能倖免。這些女性中有很多人被我們所能想像到最殘暴的方式強暴，當某些軍人因為喝得太醉而無法照他們所想的進行下去時，他們會用玻璃瓶插入女性，有時候是破掉的玻璃瓶。不用說，這造成了嚴重的傷害，許多女性因此喪生，還有許多自殺（Beevor, 2003，頁24-38）。

在試著理解這類恐怖情事的同時，我被交付的問題是：如果去人性化的政令宣導確實滲入了軍人們的道德觀深處，那麼，他們對這些女性（這些母狼們）的後續行為要如何被解釋？但，假如在這麼強力的推送之下，去人性化的政令宣導都沒有滲透進人心深處，那它通常是能夠滲透的嗎？它有滲透進去過嗎？

這給了我們一個儘管有些顛覆、但卻重要的可能性：在一種錯誤的意識或多或少輕薄地掩飾之下，人們可能清楚知道，這些被他們殘

酷地貶抑和以不人道方式對待的人們是人類同胞，但在某些社會條件下——我在本章僅稍微粗淺地討論了一些——他們仍有可能集體地屠殺、折磨和強暴他們^{註167}。

女性，她們太像人類了 Women, all too human

所以，是什麼讓許多人——顯然地，包括許多政令宣導者——相信人道主義是正確的？在本章的最後一節中，且讓我提出兩個與前述內容相比稍微不那麼明顯的可能性，在其他功能以外，它們似乎也能夠引發去人性化地看待和對待女性的方式。但是，這兩者都不會削弱我的揣測，亦即「無法將他人認可為人類」的情況是少見的，尤其是當女性受制於第四章所描繪的那類動力時。相反的，這兩者都再一次地假定了她的人性。

第一點涉及某類因為他人的反常行為而導致的觀感，但僅是因為這些行為被視為反常，它們包括了對他們平日人性化——甚至太人性化——的社會角色、關係或義務的翻轉。第二點則涉及對女性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就是，那些覺得自身被她或她的同類當成不受歡迎的人或甚至次人類對待的人，嘗試對她進行報復——通常是錯誤且不公平的報復，因為他的傷痕可能來自一種不正當的感受，他覺得自己理應成為她的凝視對象、注意力的焦點或體貼對待的受益者。而和他認為自己理應獲得且期待獲得的感受相比較之下，他所受到的待遇讓他覺得自己比較不像人，或者更好的說詞是，比較不被當作人，因此他（不只）還（無）禮，作為復仇。

我將依序討論這幾點。

關於第一點：要被認可為人，其內涵包括了能夠憑藉個人的團體成員資格或身分（以及其他因素），而在社會劇本中具有被賦予特定角色和關係的潛力^{註168}。我們已經看到，這可能會如何引發殘酷的（不良）對待形式，然而，未能成功在劇本中盡到本分，或嘗試某種角色翻轉，則可能會觸發驚嚇的反應——一種「出乎意料」的感受。這些人於是可能被視為「不合宜」的、令人厭惡、奇怪且詭異的；她們甚至可能被視為可怕的，或像機器人一樣，彷彿她們冒名頂替了這個角色，且她們僅僅是「做做樣子」。但這並不表示她們不被當成一個完整的人；這表示，看待她們的眼光伴隨著當個人行為顯得異常於社會時，可能會出現的那種猜疑，甚至是憎惡或恐懼。她沒有盡到她在劇本裡的本分，因此我們對她的性格或人格有了嚴重的懷疑，或甚至懷疑她是否擁有性格／人格。

比方說，讓我們回想在卡繆的《異鄉人》（*The Stranger*）（1946）中，莫梭分別於兩個不同場合裡遇到的「嬌小機器人女

子」。他第一次見到她時，她正在一間餐館裡點餐，她的行為很慎重，她的主體性引他注目，且對於我們讀者來說，她高度似人——而且高度社會化——的行為可能也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她正做著和莫梭同樣的事：獨自用餐。以下是他對她的描述：

侍著送上了開胃小菜，她開始狼吞虎嚥。在等待下一道菜時，她從她的包包裡拿出了另一支鉛筆，這次是一支藍色的，以及下週的廣播雜誌，然後開始在每日節目表裡幾乎每一個項目上打勾。雜誌有幾十頁，而她在用餐的過程中不間斷地仔細研究著它們。當我用完餐時，她還在同樣專心致志地打著勾。然後她起身，以同樣突然、機器人般的姿勢穿上外套，並迅速地走出了餐廳。沒有別的事好做，我跟著她走了一小段距離。保持在人行道的邊緣，她直直地往前走，不曾轉向或回頭看，而考量到她嬌小的身型，她的速度使人驚奇。事實上，她的步伐對我來說太快了，我很快就看不見她，於是轉身回家。有段時間這個「小機器人」（我是這麼看待她的）讓我印象很深刻，但我很快就忘記她了。（1946，頁30）。

這個女人不僅沒有和侍者互動、進行人際交換，甚至還表現出了其他大量的心智力量跟自主主體性：她有偏好、據此點餐、閱讀雜誌、計畫（她讀的是一本廣播節目表）、書寫、計算，並且以一種「驚人的速度」行走，甚至超越了莫梭。這兩個人基本上先後在同一個社會劇本裡扮演著同樣的角色，但在一名女性身上，這行為顯得奇怪，甚至好笑。她因此顯得不在狀況——她的狀況——裡，而且在這角色上不知怎麼地沒有說服力、虛假，甚至可以稱得上如同機器人。當希拉蕊·柯林頓於二〇一六年參選總統時，她獲得了許多相同的評價（包括「如機器人一般」的指控）（見第八章），而同樣的，柯林頓扮演了一個以往都只為男性保留的角色，並且要求了她可能被期待要給予他的東西，也就是：支持和注意力。在她的情況裡，許多在其他情況下可能會被期待要給她這些支持和注意力的人們（最主要是因為他們強力反對川普）卻有所保留。

莫梭再次遇見這名「嬌小機器人女子」時，是在法庭上。那時莫梭已經槍殺了那名對他怒目相視、使他覺得自己不像人而只是一個物品或障礙的「阿拉伯人」——具體而言，他覺得自己像一顆石頭或一棵樹，一個可以被移動、沒有獨立意志的物品。莫梭和他的朋友雷蒙外出時，第一次遇到了「阿拉伯人們」；在描寫中，他們僅僅是以一種他覺得難以捉摸的目光看著他，這個凝視就對我們的敘事者造成了一

種輕蔑的、使人僵硬的，甚至去人性化的影響——至少在他的心中如此。亦即：

他們沉默地盯著我們看，用一種這些人特有的方式——彷彿我們是一堆石頭或枯樹。雷蒙悄聲說著左邊第二個阿拉伯人是「他的傢伙」，我覺得他看起來有點擔心。但是他向我保證這一切都已經是過去式了……沒有必要在此流連。往公車站走到一半時，他轉頭向後看，說阿拉伯人沒有跟著我們。我也回頭看，和之前完全一樣，他們正對著我們剛剛站的地方投以相同曖昧的視線。

再一次的，我們看到了，我們必須從和道德心理學常規相反的方向來思考去人性化：去人性化作為一種心理表現形式，展現出一種不正當的資格感，亦即個人認為自己應該是觀察者或評斷者，或應該是收到關懷與讚賞，而非猜疑、輕視、敵意或冷漠的對象。對於那些被認定目光不善的人來說，當他們的目光投射對象可能被近似於被害妄想症的心態牢牢控制時，這種感受可以是極度危險的。當「雷蒙的傢伙」再次出現在海灘上時，就出現了類似的情況；這一次他是獨自一人，彷彿要強調他的弱點一般。以為事情已經解決了的莫梭大吃一驚，這個男人的臉被一顆石頭遮住，而朦朧的熱氣使他的身影模糊。莫梭從雷蒙的口袋裡掏出他的左輪手槍，然後對著帶有威脅性的幽靈開槍；他對著屍體又開了四槍，它們在屍體上「沒有留下可見的痕跡」。他同時看著並聽著槍聲落到了屍體上，如此就解決了一個阿爾及利亞的異鄉人。這一刻結束了，莫梭在監獄時才重新獲得他對自身人性遲鈍卻真實的感受。

現在這名「嬌小機器人女子」正在旁聽他的謀殺審判。根據描述，她穿著一件「男款」大衣，並將視線對準了他。莫梭尖銳地感受到她的存在，她評價著他（在他的想像中），儘管她只是法庭旁聽席上的眾多人之一。而從小說開頭起，每當莫梭一覺得自己被評價時，他就會感到迷失方向；他失去了對自己主體性的感知，彷彿遇到了所謂的「築牆」（stonewall）行為（或者，同樣類似的情況是結論中將會提到的「冷臉」〔still face〕範例）。可能不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一切發生之前，莫梭的母親才剛剛過世。當他們同住時，她的雙眼總是跟隨著他到房間四處，「儘管我們鮮少對話」；他覺得她「總是看著我」，而他似乎並不介意（1946，頁5）。事情就該如此，這是我們在此的感受，也許她就此做了一個母親應該要做的事：她照顧著他。

除了源自於因缺少同情關照而產生的戒斷症狀以外，我們現在可以思考去人性化行為的第二個來源，這個來源同樣不太明顯。當女性沒有在一個主體所採納的社會劇本裡扮演自身角色，並因而扭曲了他對現實的認知時（他卻未理解到這個認知只是單純的希望或幻想），復仇行為便會針對她們出現。艾略特·羅傑沒有及時地從匹配的「辣妹」那裡收到他想要的注意力、情感、讚賞和性，他的社會劇本如此死板，而他是如此徹底地安居其中，導致他覺得這些他所跟蹤的女性無視了他——儘管他從未自我介紹過。她們的故事沒有把他納為角色之一，直到他施壓。

但如同我所展示的，羅傑並不認為女性是無心智的東西、物品、非人類或次人類生物，這也不是父權秩序裡一般女性的真實情況。相反的，女性的人類能力被視為虧欠特定他人，通常是同時維持著白人至上主義之異性戀關係裡的男性或他們的子女，而反過來，他們則被認為理所當然可以獲得她的服務。這可能可以被看成已婚婦女法規的現存殘留——一名女性的父親為她發言，之後是她的丈夫、然後女婿，等等。這也可能是讓女性更為概括地成為某個人的母親、姊妹、女兒、祖母的原因之一：她永遠是某個人的某個人，而鮮少是她自己的。但這完全不是因為她不被認定為人，而是因為透過勞動服務、愛和忠誠的形式，她的人格性被認定是歸屬於他人的。

此外，對那些身處她的關懷軌道內、被認定為她的注意力歸屬之處的人而言，她的個人服務有著一種人性化的心理影響。因此，當她未能提供那些他認定有權獲得的東西時，包括各種形式的照護、讚賞、同情心和注意力，他可能因此覺得自己不那麼像人——而是像「一隻不重要的小老鼠」，正如同艾略特·羅傑一度對自己的描寫一樣。他的復仇可能是反過來將她去人性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她感覺自己不是人。以下是羅傑所謂的「宣言」（其實更像是自傳——主角是那個有先見之明的、可憐的，而且永遠屬於中心的自己）開場白：

人類.....我在這個世界上所受的苦都出自於人類之手，尤其是女人，這讓我理解到，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是多麼的殘酷與扭曲。一直以來，我唯一想要的是融入人類並過著幸福的生活，但我被放逐與拒絕，被強迫去忍受一種孤獨和無足輕重的存在，只因為人類物種裡的女性無法看見我的價值。

隨著《我的扭曲世界》推進——或者說展開，事情越來越清晰，這場性別之間的戰爭對於羅傑而言不只是一個譬喻，但這份敵意乃源自於他感到需求未能滿足，以及後續因此而生的脆弱感受，而某些時候，這份敵意煽動了人際間的侵犯。羅傑對這類女性的恨意，就如同情感依附不安全的兒童們（至少在廣受歡迎的依附理論裡），在母親（通常如此，而且顯然如此）把他們交給陌生人時，對母親的恨意和憤怒。他們因為她讓自己感到無助與孤獨而恨，他覺得自己理所當然應該獲得她的時間、焦點、注意力和關懷，而且可能濃烈地愛著她——但視其如一種個人所有物地愛著，她必須被飽含妒意地守衛著，而且她不能背叛他，不能違背她的諾言或使他失望。同樣的邏輯適用於羅傑對那些拒絕他求愛的女性所產生的仇恨；從一種社會孤立和遺棄感上而言（再一次，是他所認定的），她們讓他感到自己不是人。他做出結論：

我不屬於人類這個種族。人類拒絕了我，人類物種中的女性從來不想要和我交配，那麼，我怎麼有可能覺得自己屬於人類？人類從來沒有接受我成為他們的一分子，而現在我知道為什麼了，我不只是人類，我比他們所有人都更優秀。我是艾略特·羅傑……偉大的、光榮的、至高無上的、卓越的……神聖非凡的！我是世界上最接近於神的存在。人類是一個令人作嘔、墮落且邪惡的物種，我的目的是要懲罰他們所有人，我將會淨化這個世界上所有有問題的東西。在復仇日當天，我將會真正成為一個強大的神，懲罰每一個我認定為不純潔且墮落的人。每當我想到，假如女性能夠在性上受我吸引，我可以擁有多麼驚人與令人滿足的生活時，我全身都因為仇恨而發燙；她們拒絕給我一個快樂的人生，那麼，我將會奪走她們所有人的生命作為回報。這只能說是公平。

他還沒有說完，他在結語中繼續：

女人代表了這世界上所有的不公平，而為了要讓這個世界變成一個公平的地方，她們必須被消滅。但少數女性會被饒過，為了繁殖的目的。這些女性會被保留，並被培養在祕密實驗室裡。在那裡，她們將會接受人工授精，以繁衍後代，她們的墮落本性會隨著時間而消失。

這聽起來像是電影《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1964）^{註169}的另類不歡樂結局。如果不是羅傑確實取得了槍枝並且採取行動，我們恐怕很難不發笑。

羅傑對公平（或者說不公）的感受是建立在一種自戀的錯覺上，這個錯覺囊括了某些父權體制的瘋狂與方法。父權的意識形態經常把女性安置為一個道德和社會生活裡的人類付出者，而這並不與她的人性有所衝突，反而是以其為前提，但它也導致了索求她的注意力、觸碰她的身體部位，以及在她猶豫或拒絕效勞時壓制她（或者更糟）的行為，而就其社會意義和它們傳達給接收女性的方式而言，這些行動可能帶有或不帶有一種去人性化的特質。無論情況為何，我相信它們最根本上源自於一種意識，認為她作為一個女人（在此）的目的為何，並因此將她當成道德好處和資源的提供者（最重要的是，對他來說如此）而安置在社會脈絡中。很合理的，隨著女性主義社會進展降臨到理應為後父權的情境中，我們可能會看見一些剝削心態的症狀。當對女性注意力的需求遠遠超過了供給時，那麼，不令人意外的，我們會發現男性採取手段——藉由街頭騷擾、吹口哨和各種形式的網路騷擾（從公然辱罵到表面上看來合理的理性辯論要求，但不幸的是，這有時候會導致她被藐視、侮辱或被男性說教），好試圖讓這些他們未曾相識的女性們轉頭。在公共情境裡，她被告知要微笑，或被許多（男性）陌生人詢問她在想什麼，尤其是當她顯得「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或「在自己的小世界裡漫遊」時，亦即當她看似在思考自己的事，她的注意力專注於內在而非外在之時。這些姿態意在迫使她注視，抑或，迫使她築起石牆——這是一種有所保留的反應，而不是全然的缺席。所以，她的沉默成了冷冰冰，她的中立表達是惱怒，她的不注視是怠慢，她的被動是侵犯。

但一個冰雪女王、一個賤人、一個妖婦——或者她也可以是一個天使，她們每一個人都有著一個共同點：她們都是富有人性的，甚至富有太多人性的，女性角色。

註125：可和前一章提出的假設進行比較，也就是她被賦予了任務，要在父權社會關係的核心情境裡扮演丈夫的「夥伴」（參見該章開頭的題詞）。

註126：這個有名的說法乃由詩人羅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所創，他寫出了不只一首啟蒙運動頌歌。又，伯恩斯此言可能是改寫自重要的啟蒙思想之父塞繆爾·馮·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的一句話。

註127：不可否認，對不同人來說，「人道主義」和它的同源詞可以代表很多不同的意思，但我想不到更好的詞彙可以表達出我所將討論的主題箇中韻味。

註128：分析哲學領域中，廣泛的人道主義思考長期所面對的批評之一，主要來自於一些人認為這樣的看法帶有令人反感的「物種歧視」意味。我逐漸能夠理解這些批評的內涵，儘管對於如何能夠最適當地理解它們和其他政治解放運動間的關係，我仍帶有疑問。但無論如何，這類的批評和我在這章所發展出的論點大多是相互獨立的，因為根據我的描述，人道主義

（在我看來）並未致力於含糊地主張人類相對於其他生物來說具有著更優秀的價值或更大的權利。

註129：麥金儂（2006）為色情提出了一個約定俗成的定義，色情主要涉及暴力、貶低、異性戀正典的素材（雖然這個定義的確切範圍是有辯論空間的）。此定義對麥金儂（與安德莉亞·德沃金共同）在草擬反色情公民權法令時的企圖有所幫助。

註130：很可惜，假如我沒有搞錯的話，我們並未被告知M本人的種族或族群身分。但在蓋塔的討論脈絡中，可以很自然地想像她和作者一樣，是一名澳洲白人。

註131：針對這個情境的描述，我援引了我先前的著作（Manne, 2013，第二部分）。

註132：我所理解的人道主義觀點各個面向也曾受到包括克莉絲汀·歌絲嘉（Christine Korsgaard）、瑪莎·納思邦、史蒂芬·達沃（Stephen Darwall）和茱莉亞·馬可維茲在內等學者的辯護。

註133：我之所以說「具有某種一貫性」，是因為跟隨斯特勞森的看法（以及回顧序言中的討論），我認為，我們必須為和其他人類間的「參與張力」創造間歇性的「舒緩」和「逃避」空間（[1962] 2018，頁10、13和18），這可能包括了和其他人的人性在某種程度上的分離。而我之所以說「沒有好理由」，是因為可能在某些情況下，為了讓某些工作得以完成，這類的分離是重要的，例如當一名外科醫師的病人躺在手術檯上時，醫師必須要將他們單純視為一具具的身體或複雜的系統。

註134：但必須說明的是，我並無意暗示前述每一個理論家都完全支持上述每一個主張，更遑論這些主張的這個具體版本。

註135：某種程度上，在此「看作」一詞帶有譬喻意味，因為某些這類認可經驗裡的專屬視覺面向不應該被過度概括。這一部分是基於健全主義的考量；另一方面，就整體主義（holism）來說，某種知覺性或半知覺性的說法似乎是有爭議的。幸運的是，就我此章目的而言，我可以保持中立，不評論從人道主義者的角度來說，什麼才是對（所謂的）社會知覺的適當敘事。

註136：當然，如果生物物種的概念在某個脈絡中並不重要或尚未變得重要，那麼，把某人指認為同個物種的成員也就沒有必要。

註137：之所以納入關於「潛力」的條款，是為了要讓以下條件能夠包含那些因為特定疾病、傷害或障礙等原因，而在過去或未來以一種非典型路線進行發展的人們。許多人道主義者堅持不應排除那些目前無法，且可能永遠無法符合以下條件的人們。就我來說，這是人道主義思考中最具有吸引力（而且最人性化）的面向之一。

註138：為了進行論證，我將會接受（2）中所包含的必要性主張。考量人類對人際認可的深層渴望，這個主張初步來說是可能的，而且就我的目的來說，我並沒有堅定的理由拒絕這個主張。但我想要使它得以和另一個主張相容，也就是人類並無任何特別之處，因為非人類的動物就和人類一樣有價值。（儘管有人可能仍會主張，深層的差異存在於不同類別的動物之間，包括人類和非人類，以及不同的非人類物種之間。）

註139：歐威爾個人比較慎重。在回憶這起事件前，他警告讀者，此事「並沒有特別證明任何事」，而且他隨即重申：「這起事件說明了什麼？沒什麼，因為這是在所有戰爭中隨時會發生的那種事情。」（1981，頁194）

註140：見尼可斯（Nichols, 2004，第二章）的討論，他談到觀點採納在各種同理心的候選形式下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各種同源和非同源的壓力與憂慮形式。

註141：比方說，這些包括了精神病態、社會病態、自閉、憂鬱……？這是個敏感的議題，而在此我並不想多做揣測。我並沒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公平地討論這個議題，而且延續刻板印象的風險太高——更別提具體化會錯誤地病態化某些人的概念。

註142：一個從主張（1）前進到主張（2）的另類路徑會涉及將人類同胞的觀念建構成一個基本上道德化的概念——例如，非常粗略地說，建構成一個我們應該要以自身和親密伴侶能夠合理要求的同類尊重、仁慈和關心來對待的人——並且也要支持某種版本的動機內在論。然而在此脈絡裡，這有可能會引發疑問，我們無法獨立說明，為什麼這個人類同胞的概念具有這個道德內涵。換句話說，這條另類路徑僅僅有可能會包括被上述思考路線所解釋（或廢止）的利他意向。

註143：我之所以說「類對調」，是因為這些相關的主張都不該是一個絕對的條件句。相反的，它們比較是跟隨「若P，則很可能為Q」原則的概論。

註144：此路線下特別有力的歷史兼目的論主張，可以參考平克（2012，第七章）。

註145：見琳奈·提瑞爾（2012）發人深省的說明。她談到在盧安達種族屠殺發生前，圖西族人如何被胡圖族描述為「具有威脅性」（以及其他特質）的，這一部分便是仰賴於去人性化仇恨言論的新興形式。胡圖人稱圖西人為「Inyenzi」（蟑螂）和「Inzoka」（蛇），而提瑞爾令人信服地指出，這些詞語有著激發行動的功能，因為人們對這類生物——也就是具有破壞性的生物——會採取一些特定的行動。提瑞爾也富有洞察力地強調了壓迫性社會脈絡裡的鑲嵌性，這些脈絡使得此類帶有高度貶意的詞語（她如此稱呼它們）比起其他如「香腸臉」（sausage face）之類的隨機詞語（這是提瑞爾所提出的例子之一，是一群孩童在玩遊戲時隨機發明的詞）來說更為有害。

註146：如果我們接受後者這個可能性，也就是有點類似於約翰·麥可道爾（John McDowell, 1995）針對動機理由遭到「消音」所提出的觀點，那麼主張（1）就肯定是錯誤的，因為它受制於一連串重要的反面例子。但即使情況並非如此，也就是說，假如我們堅持採納前者的觀點，那主張（1）將會遺漏一半的情況——人道主義者將會需要這一半，以合理地進行從主張（1）到主張（2）的關鍵過渡階段。

註147：除了這些觸發因子相當奇怪之外，假設個人無法將他者認可為人類同胞的症狀也經常看似不太正確，因為它們往往包含了展現典型的人際「反應型態度」——用斯特勞森（[1962], 2008）的話說。我在序言中介紹過這個論點，而稍後我將會在本章中再次回到這點。

註148：針對種族屠殺，亞當·高普尼克（Adam Gopnik, 2006）和克瓦米·安東尼·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 2006; 2008）提出了類似的觀點。阿皮亞（2008）寫道：

最糟的〔群體間的衝突〕情況可以導致種族大屠殺。怎麼說呢？熟悉的答案是：藉由說服我們，某些外來群體的成員完全不能被稱作是人。這並不是很正確，它並沒有對這種巨大的殘暴——我想說，這種惡毒的殘暴——提出解釋，而這是它們的典型特徵。迫害者可能將他們的敵視對象比作蟑螂或細菌，但正好是透過侮辱、汙名化、辱罵和折磨受害者的行為，他們承認了對方的人性。這類對待——以及迫害者為合理化這種待遇所提出的，一成不變的、滔滔不絕的理由——乃是被保留給那些我們認定為擁有意圖、渴望和計畫的生物。

在後續註釋中，阿皮亞（2008）亦指出，種族屠殺者（genocidaire）經常「告訴你為什麼他們的受害者——猶太人或圖西人——活該經歷他們所經歷之事。」（頁247第25行）。在其他著作中，阿皮亞（2006）提供了一個稍有不同的論點（頁151-153），他寫道，問題並不在於被邊緣化的人們被認定完全不重要，問題是在於隨機的合理化過程之中，他們被認定為不如支配群體成員重要。

註149：此處這些相關表現和動機之間的關聯性是什麼？既然我先前曾揭露我支持休謨式的動機理論——至少就某個形式來說，這對我而言，就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我認為此處關鍵的觀察是，我們討論到這些由世界所引導或「從心智到世界」的描述，它們乃致力於符合一種世界的狀態，該狀態本身是引導世界或「從世界到心智」的，因為，你的敵人（在其他身分之外）是世界上一個具有心智的生物，處於一種從世界到心智的心理狀態，也就是一個想要摧毀你的人。同樣的，你的對手是世界上一個具有心智的生物，處於一種（不同的）從世界到心智的心理狀態，也就是一個想要擊敗你的人。因此，把某個人描述成你的敵人或對手，

這個行為含有準確性條件，涉及他人對你的渴望，而這自然會引發你的某種反應。亦即，你自然而然地會以同樣的方式回應這些他者對你的（傳說中的）渴望，至少在（通常是安全地）假設你並不想被前面提及的主體摧毀或擊敗的情況下是如此。在其他情境裡，所需回應並不是對稱的；從將某人描述成（比如說）不服從者，到產生試著重新占據優勢的動機，這之間，仍然有著一個自然的進程。再一次，這涉及了一個不服從者被描繪成一個具有心智的生物、有著「超出她身分該有的想法」，或是某個試圖顛覆你權威的人。假設你不想要這件事情發生，你將必須採取行動。

註150：和斯特勞森的立場類似，我認為這些立場應該被看成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可以產生的整體全面性「反應」，包括了情感面向。它們限制與促使了個人可能會和她、對她與為她所做的事情，在前述的動機結果以外。儘管後者與我此處的目的最為相關，但我並無意指出這是它們唯一的超認知面向。

註151：根據個人如何理解亞哈船長（編按：《白鯨記》中的主角）和他面對白鯨時的愚行，「合理地」在此可能可被理解為「可以被理解地」，或是「合乎理智地」，但在此脈絡裡，我並不需要在兩者間作出選擇。

註152：這個方式得以有效解釋我的看法，而我必須將此方式歸功於大衛·李文斯頓·史密斯。

註153：在本章所依據論文的前一版中，我錯誤地指出，戴蒙認為這些概念無可避免地處於一個緊張的關係裡；我現在認為，戴蒙想要強調的看法只是它們「在那個脈絡裡處於某種緊張關係」（「那個脈絡」乃是我的強調）。我並不清楚為什麼這些概念在此脈絡中有可能會處於緊張關係，而在他處卻不會，但我把針對這個細微差別的進一步討論留到之後的場合。我要為戴蒙教授就她此處的觀點所提供的信件幫助，向她致謝。

註154：若我們認為，在把一個人看作是人和把一個人看作是某件財產之間有著根本上的衝突，則也可以進行類似的思考。若以本章開頭所引用的亞瑟·朱的說法來看，我們完全不能如此假設，它需要經過辯證。無可否認，在某些概念（例如康德的某些概念）上，把一個人看作人包含了把他們看作在道德上自主的存在，不能被買賣或擁有，而且就和其他人一樣有道德價值，並與他們具有同樣的權利等等。但是，就我了解，此處的人道主義必須行走於鋼索之上，才能達成它的解釋野心。如果認可某人為人類同胞的想法包含了這所有的道德內容，那麼，我們便很難理解這份想法如何能夠成為一個有前景的道德心理學解釋要素。（若將這類認可歸功給主體，幾乎太過近似於贊同地說：「她懂它！」，而且我們對這裡的指示對象「它」進行了大量描寫。）另一方面，如果認可某個人為人類同胞的想法被縮減到成為一個合適的潛在解釋要素，那麼，我們就不清楚它是否將能夠如此經常地為有待解釋的目標詞提供最合理的解釋。感謝諾米·阿帕麗在這個論點上督促我，以及在此提供我有價值的討論和意見。

註155：在本段落以及這一章中，我援引了我之前出版的著作（Manne, 2014b）（參見序言）。

註156：具體來說，根據父權和白人至上的意識形態，非白人和白人女性經常被認定為犯下了某些嚴重的不敬、恫嚇、不服從和粗心等行為；而由於這些強烈不正義但又極度被內化的社會秩序，這些歷史上身處臣屬地位的人們單單出現在有名望的社會位置上，就已經可以構成攔路搶劫的行為。

註157：根據強納森·班奈特（Jonathan Bennett, 1974）針對這個例子的獨創性討論，我對這個情境的解讀也與阿帕麗（2003）的主張背道而馳，也就是，哈克一開始「不斷希望可以找到某些藉口，讓他不要告發吉姆……〔但是〕卻沒有辦法找到一個漏洞。」然而，就動機理由在某些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例子中所扮演的角色，阿帕麗提出了極具啟發性的說明，這代表著，她（不像其他許多理論者）可能擁有資源，可以在此處容納我的觀點（頁98-114）。而且正如同她所提出的，就哲學目的來說，正確地解讀小說裡的這個事件並不是非常

重要。一個餘下的問題是，根據班奈特和阿帕麗的解讀，我們要如何評估哈克這個因為同理心而發生的大轉變，既然哈克從未在事後質疑過自己的種族主義意識，而且事實上一直為了幫助吉姆而感到內疚的話？（Manne, 2013）這是否會顯示，他的道德指南或多或少壞掉了？或者這暗示了在此處運作的道德評估面向不只一個？儘管這些問題很有趣，它們卻和我的目的並無交集。

註158：這裡一個明顯的諷刺是網路色情的崛起，它和網路整體而言提供了讓女性主體性得以被表達的平台之間，兩者似乎並非毫無相關。因此，反撲與消音。

註159：譯註：美國密蘇里州佛格森市，二〇一四年時一名黑人青年在未持有武器的情況下遭到白人員警的射殺，該事件隨後於當地引起一連串抗議行動，甚至暴動。

註160：因為內圍團體的成員和彼此對話時，也會以這些方式談論外圍團體的成員。李文斯頓·史密斯（2016）指出，去人性化的言論不可能單單只有支配、威嚇、侮辱等功能，這點顯然是正確的。但也有一個簡單的觀點是，內圍團體的成員可以懲惡彼此，並藉由反覆使用這些詞語來批准某些針對外圍團體成員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在過去是被禁止的。在其他脈絡裡，這些詞語的中心目的仍可能是去羞辱外圍團體的成員。

可參考提瑞爾（2012）討論的另一種情況：最初，這些貶損詞語（如註21中所描述的）主要是被內圍團體成員在彼此對話時以一種類似的、激發行動的方式所使用，只是隨後才被用來表示對外圍團體成員的嘲弄。提瑞爾也指出，藉由威脅那些理解這份侮辱的「好成員」（而受到侮辱的「壞成員」則不理解），如果他們不乖乖聽話，就會被類似的方式貶低，這些貶損詞語可以達到監督外圍團體成員的功能。我認為，在這個社會脈絡模型裡，這些可能性與去人性化言論是完全相容的，記住這些可能性將對我們有所幫助，尤其是在試圖了解某些厭女的表現形式時。

註161：可參考強森·史丹利（2015，第二章）。他針對一種他稱之為「真誠狀況」（the sincerity condition）的情形提出了發人深省的討論；在他看來，即使去人性化的修辭經常很明顯是譬喻性的，它們仍可能為真。

註162：可和伯納·威廉斯的說法進行比較：「以起草《權利法案》的奴隸主們為例，這裡有很多錯誤的意識，因為當這些奴隸主在占女奴隸便宜時，他們其實並不覺得他們正在進行人獸交。他們很清楚知道，他們在幹一個人類！」威廉斯接受艾利克斯·佛胡（Alex Voorhoeve）訪問，未校訂版本，2002/12，出版於作者過世後。

註163：如同李文斯頓·史密斯（2016）在提到盧安達種族屠殺期間強暴女性的羞辱本質時，他自己所提出的看法。

註164：譯註：此為一常見的德國女性名，在此應是對德國女人的泛稱。

註165：“The Justification of Hate,” Stormfront Russia: White Nationalists in Russia, <https://www.stormfront.org/forum/t107725-2/>.

註166：譯註：蘇聯紅軍的一支地面部隊。

註167：有趣的是，畢佛（2003）強調蘇聯軍人面對柏林人時感到羨慕，因為後者的生活比起前者所曾夢想過的來得更加舒適。他提供了一個驚人的例子：憤怒的蘇聯人摧毀了很多枕頭和床墊——典型的物質享受——以至於柏林街道經常看起來像是在暴風雪中，因為它們被羽毛覆蓋。在近代針對一九三三年前德國國內反猶太主義加溫一事所提出的歷史性解釋中，對猶太人的羨慕也是相同重要的主題。例如可參考：阿默斯·埃隆（2013）的“The Pity of It All: A Portrait of the German-Jewish Epoch, 1743-1933”和高茲·阿里（2014）的“Why Germans? Why the Jews? Envy, Race Hatred, 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註168：感謝喬·薩蒂（Joel Sati）在我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演說時，針對這點所提出的寶貴意見。

註169：回憶一下奇愛博士想要在豎井裡打造一個地下育種實驗室的計畫：

特吉森：博士，你提到了每一個男性對上十個女性的比例。但這不就會迫使我們放棄所謂的單偶性關係嗎？我的意思是，至少就男人來說？

奇愛博士：很遺憾，是的。但你知道，為了人類種族的未來，這是必要的犧牲。我也要趕緊補充，每一個男人都將需要從事這一類巨大的.....服務，女性則將必須根據她們的性特徵而接受篩選，她們必須要是極度令人興奮的。

第六章 赦免男性Exonerating Men

尊貴的布魯特斯

已經對你們說過，凱撒是有野心的；

要是真有這樣的事，那是一個重大的過失，

而凱撒為它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在此，在布魯特斯和他的同志們的允許下——

因為布魯特斯是一個正人君子；

他們都是正人君子——

我來到這，在凱撒的葬禮上說幾句話。

他是我的朋友，忠誠與公正地對待我；

然而布魯特斯卻說他有野心，

而布魯特斯是一個正人君子。

他曾經帶著許多俘虜回到羅馬來，

他們的贖金充實了國庫：

這樣的凱撒看起來像是有野心的嗎？

窮苦的人哭泣時，凱撒也曾流淚；

野心應該是由更嚴厲的內涵組成的。

然而布魯特斯卻說他有野心，

而布魯特斯是一個正人君子。

在盧柏克節的那天你們都看到了，

我把一頂王冠獻給他三次，

他三次都拒絕了；這是野心嗎？

然而布魯特斯卻說他有野心，

而布魯特斯確實是一個正人君子。

我並不是要推翻布魯特斯說過的話，

我只是說出我所知道的事實。

你們都曾經愛過他，那並非沒有理由的；
那麼是什麼阻止了你們為他哀悼呢？
唉，理性啊！你遁入了野獸的心中，
而人們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

就在昨天，凱撒的一句話還可以
抵禦整個世界；現在他卻躺在那裡，
沒有一個貧賤的人向他致敬。
啊，諸君！若是我企圖攪亂
你們的內心與心智，引起叛亂與憤怒，
那我會對不起布魯特斯，對不起凱撒，
你們都知道，他們是正人君子。
我不會對不起他們；我寧願選擇
對不起死人、對不起我自己和你們，
而不願意對不起如此正人君子。

馬克·安東尼於莎士比亞著作《凱撒大帝》
第三幕第二場（Julius Caesar, Act III, Scene II）

如何逍遙法外 How to get away with murder

在本章中，我將以兩起謀殺案開場。它們的受害者都是女性，主嫌都曾經是她們的男性親密伴侶，而在兩起案件中，男性的故事都被改寫——以至於其中一個表面看來是謀殺的情況變成了她精心計畫設計他。在其中一起案件裡，他最終被證明是無辜的；在第二起案件中，故事情節被一個疑問所推動：他是否有可能逃過懲罰？（祝他好運。）

這兩則故事都是虛構的，但它們仍為普及的文化敘事提供了實例，而我們應該仔細觀察。上述的故事反映並延續了一種奮力的、但尚未獲得公認的集體努力——也就是，試著維持特定男性的清白、捍衛他們的名譽，並且提前或在沒有適切資格的情況下寬恕他們。在許多案例裡，這種努力一開始涉及了將「善意的信任」（benefit of the doubt）延伸到那些被指控的犯罪者身上，而不是他的指控者兼受害者，無論那些針對她的懷疑言論基礎是如何淺薄。我於是接著把這些「赦免敘事」（exonerating narrative）（我這麼稱呼它們）和米蘭達·弗里克（2007）、何賽·梅迪納（2011）與蓋樂·博豪斯二世（2012）所提出的證詞不正義理論作出連結。再來，我將參考克莉絲蒂·道森和瑪莉塔·吉伯特（2014）針對「奇怪的消失」（curious disappearance），以及在公共論述裡某些主體的參與隱形（attendant invisibility）所提出的見解。

在提出我的論點時，我將把主題局限在那些享受到大多數主要特權形式的男性^{註170}，而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奇觀是，這如何使我們無法留意到，女性在這些故事裡「被消失」了。我們可以把這看作一種黑暗藝術，如同魔法：一個把女性變不見的把戲。

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們必須承認當我們這麼說時，擁有較少特權的男性也經常會被上述的動力所傷。事實上，這正是重點之一。極端摩尼教的語言（也就是黑與白的二元說法）可能會把「壞男人」和「好男人」區分開來，將前者描述為怪物、心理變態、性掠奪者和戀童癖者——透過儘管忽視了細微差異但基本上正確的手段，以及深層兼之系統性的不正義。再一次的，這屬於同一組連鎖且動態的社會機制一部分：這些怪物的誕生，為享有高度特權的未來英雄們提供了一個對比，為他們增添了光彩。

我引用了當代的例子，因為我在本章與下一章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屬於哲學上的拾荒者，一個蒐集閃閃發光零碎物件的人，用它們為自己築巢。在接下來的篇幅中，我將引用電視、政治事務、新聞事件、小說、社會科學和民族學誌中的例子，它們大多都發生在同樣的時間和地點，並因此構成了我所度過的文化時期的一部分。但本章描述的動力就如同父權體制本身一樣古老。好人不可能做錯事，因此我們不會聽到任何有關他們的壞話。我將此稱為「正人君子布魯特斯」的問題（the honorable Brutus problem）。當我就相關台詞進行刪減與改寫：

她是我的朋友，忠誠與公正的對待我——至少就我所知是如此。然而布魯特斯卻說她在說謊，而布魯特斯是一個正人君子。

此處這個含蓄的肯定前件（modus ponens）太少被後件否定。換句話說，在這類「他說」／「她說」或「各說各話」的情境裡，我們從他是一個「正人君子」或「好男人」的假設，推導到她一定在說謊或她歇斯底里的結論，而在強力證據指出她才是說真話的那方時，卻沒有適當地回應。接著，我們終究無法質疑他可以被信賴的假設，更遑論馬克．安東尼對布魯特斯的殘酷背叛所表現出的苦澀怒意。

馬克．安東尼在他那段知名演說的最後情緒崩潰了，在揭露「正人君子布魯特斯」其實是一個叛徒和騙子後，「請原諒我，」他說，「我的心和凱撒一同躺入棺材內了，而我必須稍做暫停，直到它回到我身上。」在二〇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局後，寫下本文時，我必須說：我懂那種感覺。

男孩殺死女孩 Boy kills girls

吉莉安·弗林（Gillian Flynn）的暢銷小說《控制》（*Gone Girl*）（2012）就從好男人那一方的故事開始並結束。用托爾斯泰的話來說，結婚五年的尼克與艾咪在一種日常的生活裡感到不快樂（也許這對不快樂伴侶的修辭就是這類情境喜劇的產物）；他們都在經濟蕭條時遭到紐約的公司解雇，他們因此遷居到尼克長大的平凡中西部小鎮，以照顧他生病的父親。艾咪仍舊待業中，她感到無聊、惱怒並孤獨。尼克開了一間酒吧並和一個他的寫作學生有染，他把剩下的時間都花在打電動和沉思上。

讓我切入正題。故事的結構是這樣的：男孩認識了女孩；男孩和女孩結婚；男孩辜負了女孩；女孩因為男孩失望；男孩殺害女孩——至少看起來如此。但這原來是一場騙局：這個案例裡的女孩是瘋狂的。

她設計了他；她製造了一本假日記，紀錄他們五年來的關係；她甚至花費心思取得血液，並假造陽性的驗孕結果。在她逃跑、投入到富有前男友的臂彎後，女孩改變主意了（因為她善變又不懷好意）；男孩並沒有那麼糟，她如此判定。她在性愛過程中謀殺了有控制欲的前任，如同一隻螳螂。女孩和男孩重聚。

這本出版於二〇一二年的作品雄踞在《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上，二〇一四年時根據本書改編的電影也有著很好的票房。弗林（她同時也是電影的編劇）因為她對女主角艾咪的描述所含有的厭女情結而廣受批評，弗林在電影上映後寫下：

大約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我縮在被子底下想著：「我殺死了女性主義。我為什麼要這麼做？真要命，我並不是故意這麼做的。」然後很快地，我某種程度上又可以接受我寫出來的東西了^{註171}。

的確很要命——不管時間多短暫。但弗林絕對不是唯一一個沒有重新整理此處連結的人。因為我們在維持男性支配一事上的集體投資過剩，我們經常不會留意到，我們願意為了它付出多少心血。當中心點維持不變時，我們既不會注意到支點，也不會注意到餘波。

促使我撰寫這本書的最初動力之一，是我對自己感到很沮喪：因為針對此處我希望你們思考的第二起謀殺案例，我幾乎什麼都沒說。此處我要討論的是，改編自柯恩兄弟一九九六年執導的電影《冰血暴》（*Fargo*）、於二〇一四年首播的同名電視影集，柯恩兄弟也被列

為該影集的共同製作人。不同於電影版的主角，這個升級版的對應角色——很刻意地被改名為萊斯特·尼加德^{註172}——並沒有計畫綁架他的妻子，她在電視版裡的新名為珍珠（在原本的電影版裡為「珍」）。所發生的一切都是他的主意；一切早已伺機而動，卻又隨機。這個暴力的爆發乃是源自於被閹割的羞恥感。

故事開始於萊斯特遇到了他的老勁敵，高中時與他同班的惡霸山姆·海斯，海斯就如同過去一般地羞辱萊斯特，但如今還有了海斯的兒子如夥伴似地作為旁觀者。海斯告訴萊斯特，高中時珍珠曾幫他打過手槍。海斯讓萊斯特搖搖欲墜，不僅是實際層面，也是在譬喻意義的層面；萊斯特被絆倒後，臉朝下地撞到了一面玻璃窗上，而撞擊力道太過強烈導致他摔斷了鼻梁。

萊斯特在急診室的候診間遇到了一名神祕陌生人——或者更正確的說法是由演員比利·鮑勃·松頓化身的角色——羅恩·馬佛。當萊斯特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後，馬佛提議幫他報仇，殺掉海斯。萊斯特一開始因為這個提議而不知所措，他試著拒絕，但拒絕得不夠快，導致看來不夠有說服力，因此馬佛決定索性放手做了再說。他前往海斯的脫衣舞俱樂部，從海斯的背後攻擊他，他在海斯和舞者用後背式做愛並一邊呻吟時，用螺絲起子敲擊他的頭骨。我們看到海斯的血飛賤到無名女子的肩膀和脖子上，彷彿早洩，然後我們看到海斯倒下，重重摔到她身上。隨著攝影鏡頭轉開，她大聲嚎哭、尖叫。

當萊斯特得知他的歌利亞為他殺了人時，他既焦躁又充滿膽量；他決定要修好家裡的洗衣機，好一陣子以來，壞掉的脫水功能都是婚姻裡爭吵的主題——連同萊斯特毫無生氣的職涯，以及與他野心勃勃的弟弟比起來相對微薄的薪資。讓事情更糟的是，萊斯特在臥房裡也令人失望；他無法生育，而珍對性生活並不滿意。在接下來的爭執裡，她開始奚落他在做愛時無法看著她的眼睛。

這場戲開始於萊斯特驕傲地領著珍珠來到地下室，向她展示他已經成功修好了洗衣機，但萊斯特的勝利時刻並未到來——事實上恰恰相反，脫水功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失控地罷工了。珍珠對著他的失敗冷笑，更糟的是，她並不為此感到驚訝。

他們故事的結構是：男孩辜負女孩；女孩譏諷男孩；男孩感到受傷；男孩憤怒；男孩用榔頭反覆猛擊女孩的臉^{註173}。

一個嘮叨並閹割（某些人可能會想在此插入「可憐的」這個形容詞）丈夫的女性因此永久地「被閉嘴」了。我們看著她的臉上有越來越多的血跡，直到它在我們很有可能一眨也不眨的眼前變得不再是一張臉——變成了一團毫無特色的、破爛的生肉組織。珍珠的雙眼已經不在那裡了，或至少，我們看不到它們。如我在第四章時提到的，根據艾瑞克·艾瑞克森（1963）的說法，羞恥感「想要摧毀世界的眼睛」。但接下來我想要主張，似乎只有在某些羞恥者身上情況才會如此，他們覺得自己應該獲得某種程度上更好的對待——亦即來自對象的讚揚與認可，而他們因為這些對象用了錯誤的方式看著他們或完全沒有看著他們，想對其施以懲罰。我們之中的其他人則只要把自己的臉埋起來、逃離，或僵在原地，便已足夠。

當萊斯特抬頭，驚嚇地意識到他做了什麼時，他的眼光落到了一張貼在牆上的勵志海報上（如今有明顯的血跡飛濺到上面）；海報中有一群藍色的魚與一隻單獨的紅魚，紅魚逆著海潮而行。標語寫著：「假如你是對的，而他們是錯的呢？」這並不是太隱晦的暗示，這張海報是如此受到觀眾歡迎，最後被一名創業者複製並在亞馬遜網站上販售。該產品說明寫著：

《冰血暴》第一季中反覆出現的魚主題開始於這張出現在尼加德地下室裡的海報。這張可愛的、卡通般的海報用意在於激勵人心，但在殺害了妻子後，它很快變成了萊斯特·尼加德的座右銘。和萊斯特很像，我們也在這張濺滿血跡的海報上找到靈感，但和他不同的是，我們成功地抗拒了我們的黑暗衝動……希望你也能夠做到！

可愛；希望；一個真正的激勵。

從某方面看來，當觀眾們想要在二〇一四年間觀賞這齣故事時，對我們和這個時代的精神而言，這說明了什麼？當我在一位友人家過夜，與她和她的丈夫一同觀賞這齣戲，而這場戲在表面上卻沒有令我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覺得有什麼值得注意或感到困擾時（我們要不要爆米花？想要再看一集嗎？），這說明了什麼？這整部影集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也就是觀眾們將會同情萊斯特，並且希望他可以逍遙法外，至少一開始的設定是這樣。假如你覺得，這並無法說明我們傾向於饒恕那些迄今以來身處支配地位的人，尤其是當他們正走楣運時，那麼，試著反轉性別。類似的性別反轉例子並非不存在，但它們似乎相對稀少，而且就暴力程度來說，它們有著更令人驚嚇的特質。

《陌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當然立刻浮上心頭，但那是二十五年前的電影了^{註174}。

從維持父權秩序的觀點出發，當遇到一個「他說」／「她說」或「各說各話」的情境時，我們有明顯的理由給予他證詞上的優先權。因為，如果她是對的怎麼辦？那麼他就有可能會被證明是錯的；當她的話更可信時，她將可能有權力用她的話語把他拿下。而在支配群體面前，那份權力通常不會被拱手讓給歷史上身處臣屬地位的人們。基本上，這類性別化階序的翻轉，是厭女情結應當會避免的事情之一。

這引領我們檢視厭女情結和證詞不正義之間的連結。

證詞不正義作為階序維繫 Testimonial injustice as hierarchy preservation

在當代的分析哲學領域中，證詞不正義是一個突出且頗具成果的主題。米蘭達·弗里克對此現象的描述吸引了分析哲學家的注意，隨後包括派翠西亞·希爾、柯林斯、查爾斯·米爾斯（Charles W. Mills）、凱倫·瓊斯（Karen Jones）、何賽·梅迪納、蓋樂·博豪斯二世、克莉絲蒂·道森和蕾秋·麥金儂在內的學者再將其進一步理論化（根據對此現象的不同描述）。

證詞不正義乃是因為存在於「信用經濟」（economy of credibility）——此乃弗里克（2007）所發展出的巧妙稱呼——裡的系統性偏見而出現。它對特定社會群體的成員造成困境，尤其是當這個群體在歷史上，並且至今某種程度依舊不公平地在社會上處於臣屬地位時^{註175}。於是一般而言，證詞不正義指的是，當身處臣屬位置的群體成員針對特定事務提出主張，或針對特定人物提出指控時，他們經常會被認定為比較不可信，因此他們身為臣屬群體成員一事會被當成理由，使他們不被給予知者（knower）的知識地位。

在《知識的不正義》（*Epistemic Injustice*）一書中，弗里克（2007）一開始針對證詞不正義所舉的例子是在《天才雷普利》（*The Talented Mr. Ripley*）裡，瑪姬·謝伍被未婚夫迪奇·格林立夫的父親所打發。當瑪姬說出她擔心迪奇可能被他最好的朋友，亦即本書的同名反派主角湯姆·雷普利所傷害時，老格林立夫並不願意傾聽。「瑪姬，女性直覺是一回事，但事實是另一回事。」他實事求是地說，同時駁回了瑪姬恐懼的合理性，以及她表達它們的資格（2007，頁9-17）。依照這個時代裡（也就是一九五〇年代）所運作的正確（言下之意：性別歧視的）客觀標準而言，她只是一個不理性且歇斯底里的女人。

根據弗里克的架構，一個人可能以兩種方式受制於證詞不正義。首先，她的能力可能會被小看，也就是在不夠合理的基礎上認定她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或使她自己這麼以為。其次，一個人的可信度可能會被小看，也就是（再一次的）在不夠合理的基礎上，以聽眾的觀點而言，認定她的主張較不誠懇或不誠實。根據這個論點，在此例中，老格林立夫看來是因為他低估了瑪姬的能力而駁回了她的謀殺懷疑。然而，我們很容易可以想像，這單單就只是在表面上粉飾

（或者說，無意識地合理化）真正發生的事。也許老格林立夫習慣性地懷疑女性有控制欲或有心機，且她們會戴上擔憂的面具以阻止男孩們自由地做自己、享受他們應得的玩樂；例如，他可能會想像，他的兒子迪奇正和他最好的朋友湯姆享受「定下來」前的單身生活最後的喝采，而他想，瑪姬喋喋不休的憂慮只是為了要破壞他們的玩樂。每個人都說謊，但女人是說謊者。

儘管瑪姬·謝伍的例子提供了對證詞不正義的生動描述，但這個現象往往是更難以捉摸的，並因此更不知不覺地潛伏其中。就我的目的來說，很重要的一點在於人們可能被視為較不可信的，且不公平地加以屏除，即使沒有任何明顯原因，更別提和相關社會類別有關的原因。更準確地說，他們被詮釋為女人或非白人的事實，預測並解釋了他們會如何被看待與對待，即使他們的社會身分在聽眾的意識裡並未占有一席之地。聽眾們可能會發展出事後的合理化解釋，或完全不基於思考上的原因便覺得他們的證詞是出自猜測，或他們的主張不具說服力。

證詞不正義的現象便是如此。但，它為何持久不衰？它的社會和心理學基礎是什麼？它最有可能在什麼時候、在哪裡，並因為什麼原因運作？

更精準地說，我們應該要區分四個問題：

（1）歷史上處於臣屬地位的群體成員可能會在什麼時候遭到信用赤字的傷害？

（2）歷史上處於臣屬地位的群體成員可能會因為什麼原因而遭到信用赤字的傷害？

（3）事實上，歷史上處於臣屬地位的群體成員是否可能會全面性地遭到信用赤字的傷害？或者，這些赤字會發生於特定的領域或脈絡，有時候則因為相隨的信用過剩而生？

（4）這類信用赤字和過剩是否有任何意識形態功能，若有，是什麼？

讓我依序針對每一個問題進行說明。

（1）歷史上處於臣屬地位的群體成員可能會在什麼時候遭到信用赤字的傷害？

詳細回答這類與統計盛行率相關的細緻問題顯然超出了我作為哲學家的專業範圍，弗里克也沒有處理這類問題。我們可以指出的是，在我於本章所自行提出或借用自弗里克的許多虛構案例，以及隨後的其他真實世界案例中，證詞不正義是一個或許明確，或許高度可能的爭議。即使有人反對我對某些案例的分析，但考量到我的主要目的，這一切也並非徒勞無功。此處的重點是去蒐集這個現象的形貌，才能夠精準地針對某些候選案例是否真的屬於這類例子，提出有內容的反對意見。同樣的，我的用意是，能夠在不同類型的情境出現時指認出它們以及它們的普及程度，而非先驗地決定其普及程度。

（2）歷史上處於臣屬地位的群體成員可能會因為什麼原因而遭到信用赤字的傷害？

弗里克對本題的答案是，有些對特定身分存有偏見的負面刻板印象，在她看來會「維持特定社會群體和某個或多個特質之間的貶抑關聯性，而這個關聯性體現了一種概化，展示了某些（通常是在知識上有過失的）抗拒，亦即因為道德上不良的情感投資而拒絕反面的證據」（2007，頁35）。

這看來是有道理的，但弗里克對於此處這種情感投資的本質並未說得太多（在隱性偏見的相關文獻中，類似的缺漏有時候也很明顯）。針對這類刻板印象的進一步問題仍舊存在，包括了為什麼它們會抗拒相關的反面證據？我們也可能會好奇，為什麼臣屬團體的成員經常被認為是沒有能力和不可信賴的？這兩種刻板印象的目的經常互相矛盾，但這類認知的共病絕非前所未聞。事實上，這似乎很常見，而第八章內所討論的實證證據將會證明此事；有什麼原因可以解釋這點？

（3）事實上，歷史上處於臣屬地位的群體成員是否可能會全面性地遭到信用赤字的傷害？或者，這些赤字會發生於特定的領域或脈絡，有時候則因為相隨的信用過剩而生？

在提出其中一個例子時——哈波·李的（Harper Lee）《梅岡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1960），故事中黑人男子湯姆·羅賓森被白人女性梅耶拉·艾薇誣告強暴——弗里克本人很快地指出，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弗里克寫道：

我們已經談論過這類導致證詞不正義的成見對於脈絡的依賴：在和湯姆·羅賓森的農作收成相關的許多其他議題上，梅岡鎮的陪審團成員是會信賴他的；而和愛人失蹤這樣的問題相比，在其他比較不會

因為瑪姬的女性直覺而受扭曲的議題上，賀伯·格林立夫也會願意相信她（2007，頁135）。

弗里克並未針對這點提出明確的解釋，但她曾於稍早主張：

在某些議題上，湯姆·羅賓森的知識有可能被仰仗且信賴，甚至是對梅岡城裡最徹底的白人種族主義者居民來說——毫無疑問地，這包括了那些和他每日工作相關的議題，以及許多有著實務意涵的日常議題，只要它們不會挑戰到白人的意見，不會被看作暗示了他和白人在思維能力上的並駕齊驅，同時這些主題不會在任何層面上暗示這名黑人自以為是。人類成見有著不連貫的傾向，它們透過心理上的區隔得以維持，而這個傾向得以讓裝載了知識信賴的重要容器相對不受影響，甚至在強而有力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前亦同。儘管在無數其他脈絡裡，它可能會侵蝕同樣的信賴（2007，頁131）。

於是，在此我們看到，弗里克同時指出了階序和意識形態的角色。雖然她並沒有在這些論點上延伸說明，而我也不想要為她代言，但我相信它們很關鍵，而且至關重要地彼此相連；它們使我們能夠為此處提到的情感投資捕捉一個可信的政治基礎，例如那些強化了相關社會刻板印象的情感投資，它們一方面被證詞不正義所維持，一方面也維持著證詞不正義。

何賽·梅迪納（2011）在此則更清楚地呈現了階序的角色，他並且主張，有鑑於知識評估的比較性與對比性——以及暫時被延伸的——本質，支配團體成員所享有的過剩信用會對臣屬群體成員造成證詞不正義。梅迪納指出：

一整套的信用假設階序在《梅岡城故事》的審判過程中運作著：白人女性比黑人可信，而白人男性比白人女性可信。在故事裡，〔阿提克斯〕芬奇和檢察官都用一種比梅耶拉本身更為可信的聲調為她發聲。在被告和審問者互動時，我們也可以從觀眾對他們的觀感中體會到信用評估的比較和對比特性，因為他們的威信隨著他們一前一後的往來，同時縮小又成長……湯姆的證詞不足以被採信，這並非發生於真空，他的可信度並非獨立於周遭其他人的可信度而遭到質疑；事實上，他的證詞威信乃是隨著質問者被含蓄地賦予了知識權威而消失：檢察官被假定為比證人更適合對情緒和它們的真實程度進行評量的人（2011，頁23-24）。

在蓋樂·博豪斯二世（2012）對這個例子的討論中，她進一步闡釋了社會階序和證詞不正義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兩者如何透過意識形

態和查爾斯·米爾斯（1997）口中的「無知的知識論」（the epistemology of ignorance）互相連結。博豪斯指出，湯姆·羅賓森的案例不只涉及到人們無法蒐集到誰可信賴，並藉此得知湯姆和梅耶拉之間真正發生的事（亦即她向他求歡但他斷然拒絕，且她父親才是毆打她的人），而是人們拒絕承認證據所顯示的事。這是「對世界有系統性並成套的錯誤詮釋」，以及對堅固多樣性的無知^{註176}。

為何拒絕呢？一方面，正如同梅迪納前面所主張的，要宣告湯姆·羅賓森無罪，意味著得採納一個黑人男性而非白人女性的證詞，而這便和現行的社會階序有所矛盾（即使考量到和其他白人相比，艾薇極度貧窮且地位低落）。另一方面，博豪斯的討論則進一步釐清一點：若採信了湯姆·羅賓森的故事，人們隨之必須承認，一個白人女性有可能對黑人男性懷有性渴望，而這是白人異性戀父權秩序所深惡痛絕之事。白人女性的凝視屬於白人男性，因此在白人至上的社會裡，吸引到這種注意力的黑人男性就被認定為帶有威脅性——而且也會活生生地受到威脅。

湯姆·羅賓森的肢體障礙清楚表明了他不可能有辦法攻擊梅耶拉，但就維持現行種族秩序的目的來說，這也讓他的身體更為無足輕重，可以用完即棄。梅耶拉和她的父親並沒有受到信賴，他們的故事也沒有被相信；事實上，兩人在鎮上徹底喪失了信用，這對後者來說是極大的羞辱（回想一下小說是如何結束的——不過我並不打算透露給新讀者）。但是，艾薇一家的謊言隱藏了一個許多人決心不承認的事實，那就是：白人女性可能受到黑人男性的吸引，而他僅僅是可憐她而已。維持這種無知的代價是判決一個顯然無辜的——就像一隻沒有傷害任何人而只是用歌聲帶來歡樂的知更鳥——男人有罪。湯姆·羅賓森沒有被誤會；他是被追獵、擊落，犧牲了。

綜上所述，梅迪納和博豪斯為弗里克的架構所補充的資源，提出了一個可以用來思考證詞不正義的方式，該方式自然地與我對厭女情結本質的論點一致；讓我先暫停來解釋為什麼，並稍做整理。

截至目前為止，我在本書中主要聚焦於女性面對的敵意反應。（對一本談論厭女情結的書來說，這應該是合適甚至必要的——你可能會問，不然這本書還能是關於什麼？）但回想我在第二章中的論點，亦即我們需要記得此處硬幣的反面，或者說，我對厭女情結的說明提出了兩枚我們必須要翻面的不同硬幣——一個關乎否定性，另一個則關於性別。

根據我的分析，厭女情結的主要功能和基本表現形式是對「壞」女人的懲罰與對女性行為的監督。但是，懲罰與獎勵——以及定罪和赦免——的體系經常一同全面性地運作。因此，這份說明的整體結論特性預測了我所分析的厭女情結有可能會和其他體系與機制攜手合作，以執行性別上的遵從^{註177}。對當前社會現實的一點點反省也鼓勵我們繼續思考這點，亦即把女性所面對的敵意看作是大型父權體制冰山的突出尖角。我們也應該思考，當女性遵從性別化規範和期待、強制他人展現「良好」表現，並藉由投入某些父權體制內常見的美德宣示形式——比如說，參與蕩婦羞辱、責怪受害者，或網路版本的焚燒女巫行動時，對她們的獎勵和定價。另一個關注點則在於，當男性藐視了陽剛氣概規範時，對他們的懲罰和監督——這是一個相對廣泛被認同並接受的論點。還有一個討論程度遠遠不及於前的議題，則是支配女性的男性們，經常受益於正向與赦免的態度與手段。這個和厭女情結偕同運作的系統，是我在本章的重點。

在繼續之前，也讓我暫時回到在開頭幾章討論過的，由艾略特·羅傑所犯下的伊斯拉維斯塔殺人案。眼下我可以證實幾個預感，也就是為什麼女性主義的厭女情結診斷會面對這麼多的抗拒；縱使你不同意，它們也不應該得到這麼多的敵意。我認為有兩個因素在此發揮了作用：艾略特·羅傑的「柔軟」和脆弱，以及我們傾向於同情男性的痛苦勝過於女性的，除非直到一個有特權的男性可以被賦予英雄或救世主的角色。在下一章裡，我們將很清楚地看到這兩點緊密相關。我們傾向原諒特權男性所犯下的罪——表面上是因為他們在我們眼前的弱勢，或我們在他們眼前的弱勢，這使他們立於不敗之地——而這和我們對女性受害者的敵意相關。我們會保護他的利益且因此懷疑她，並代表那些身在她的照護圈內的人——通常是由某些身處支配地位的男性所組成的——表達妒意。（讓我簡單預告一下接下來的重點：對什麼的妒意？在一個真實或名義上的觀眾眼中，成為同情道德注意力的中心。）

我稍早針對證詞不正義所區分出的問題中，還剩下一個，也就是：

（4）這類信用赤字（和過剩）是否有任何意識形態功能，若有，是什麼？

我們可以注意到，上述許多證詞不正義的例子之間都有著一個有趣的共通點。它們都涉及讓一個人的說詞和另一個人的對立。更具體

地說，它們都涉及在相關的社會脈絡裡，一個於歷史上處於臣屬地位的群體成員，試著對一個處於支配地位的社會行動者做出不利的指控。或者較為隱晦地，它們涉及了臣屬社會群體的成員試著將自己置於某一領域中，在那裡，支配群體成員習慣被認定為擁有所有的答案，且大多數時候得以自由地和彼此對話。

因此，我的主張是，信用赤字——以及信用過剩——的功能經常是支撐支配群體成員目前的社會位置，並保護他們不至於從現行的社會階序上跌落，比方說，因為被指控、被抨擊、被定罪、被糾正、被貶低，或單單被那些他們一直以來總是得以支配的對象所超越。如果這個假設的方向正確，那麼我們將可以預測，在衝突情況中，例如「他說」／「她說」的情境裡，以及當人們的認可或注意力是一種受歡迎且限量的好處時（不論在此以外，這是否是一個零和局面）^{註178}，相對於歷史上處於支配地位者，一直以來處於臣屬地位的群體成員將可能會受信用赤字所苦。

這個預測已被本章所提出的許多例子以及其他章節裡提到的幾個情境證實。也就是：

- 《控制》——在最後我們發現她非常有心機之前，他為自己辯護時的言詞令人難以相信。

- 瑪姬．謝伍——她試圖告發有才華的雷普利。

- 湯姆．羅賓森——除了前面提過的因素外，和白人女性對比，一名黑人男性的說詞是完全無用的。

- 玩家門事件——這場大火起始於獨立遊戲開發者柔依．昆恩的前男友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尖刻地怒罵她、指控她不忠。接著火上加油的是，他指控（最後發現是不實指控）昆恩利用和記者發生性行為，為她開發的遊戲《憂鬱自白》換取正面評價。昆恩入侵了遊戲產業這個傳統上由男性所支配的世界，同時在他人眼裡，她不當地對待與出賣了裡頭的特定男性，這導致了一場猛力撲向她的厭女暴力海嘯；昆恩收到許多死亡威脅、強暴威脅，還有鼓勵她自殺的訊息（見第四章，^{註12}）^{註179}。

- 茱莉亞．吉拉德——推翻了前任澳洲總理凱文．路德後，吉拉德隨後便很快地被指控她背棄了同意讓路德繼續擔任領導人的約定，是一個叛徒與不誠實的人，因為她違背了選舉時的承諾。吉拉德獲得了「茱騙子」（Ju-liar）的綽號，始終無法擺脫。她的信賴度民調結果

也是前所未有地低，而她的紀錄並無法合理化這個結果。（我將在第八章回到吉拉德的例子，以及針對希拉蕊·柯林頓所提出的類似——以及同樣特大號的——質疑。）

- 在性侵害案件中，女性的說詞和男性的對立——我們想要相信誰？

不幸的是，最後這個問題並非反問句。帶著一顆沉重的心，並藉由討論一起近日在媒體上獲得了許多關注，且人們似乎比以往更為嚴肅思考的案例，我接下來將回到這個主題。因此，你可能曾希望這會是打擊強暴文化的一個分水嶺，然而我們並沒有這樣的好運，我將在描述這起事件後解釋其中的原因。這指出了一個可能性：不少人對以下的案例有著正確的反應，但卻是為了錯誤的理由。

同理他心 Himpathy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歲的史丹佛大學學生布洛克·透納（Brock Turner）因為把一名二十二歲的年輕女性當成一塊肉般地對待而接受審判——一場校園派對之後，他在一台垃圾車後方性侵了她；他侵犯的這名女性正好來拜訪自己的妹妹，被發現時已不省人事。在布洛克被捕後以及整個審判期間，他父親的主要擔憂之一是他的兒子再也無法享受一塊美味、剛剛烤好的肋眼牛排，因為他失去了進食胃口。閱讀丹·透納寫給法官的信時，我們之中許多人也胃口盡失；在信中，他沉痛地感嘆，他的兒子不再是過去那個「隨遇而安」、「好相處」的大學運動員。他應該是嗎^{註180}？

本案法官艾倫·裴斯基（Aaron Persky）也同樣擔憂有罪判決會對透納的未來有「重大影響」，因而判了他就一般標準而言非常寬大的刑期（於郡監獄中服刑六個月與三年緩刑，他最終只服刑三個月）。在整個審理與判決過程中，布洛克·透納的高超泳技被大幅強調。而丹·透納仍舊不滿意，認為他的兒子根本不應該坐牢；他描述他兒子的犯罪僅僅是二十年的良好表現裡，「二十分鐘的行為」（網路媒體「世界女性」（Women in the World, WITW）員工，2016，見註10）。

但是，就如同殺人犯不能因為那些他沒有殺害的人而邀功，透納也不會因為那些他沒有侵犯的女性而改變他的強暴犯身分。我們也必須說：當有了一個受害者，往往就有其他更多受害者。因此他父親所估計的比例可能偏低了^{註181}。

這個案例生動地闡明了一個厭女情結的鏡像，但卻經常受到忽略，我稱它為：同理他心。它被忽視的程度之高，使得它成了一個「沒有名字的問題」——借用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出自《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 1963）一書的知名用語來說，但這並不是因為同理他心的問題很罕見，相反的，正因它是如此常見，導致我們將其視為日常。（參見Manne, 2016，我在其中也提出了「男性戀」〔androphilia〕的標籤。）

同理他心在此所展現出的特定型態是一種偶爾會針對男性性暴力行為人所表現出的過度同情。在當代的美國社會裡，這經常被延伸到白人、身心健全，以及其他方面具有特權的「黃金男孩」，例如透納，他是史丹佛游泳獎學金的獲獎人。跟隨其後的是，人們不願意相

信作證指控這些男人的女性，或甚至不願懲罰那些罪行已經被確實證明的黃金男孩——再一次的，例如透納。

造成這種否定心理的原因之一是一種錯誤的認知，亦即認為強暴犯必然是某種模樣：令人發毛、怪異，並且明目張膽地表現出他們缺乏人性。布洛克·透納不是一個怪物，他的一名女性友人在信裡寫著，並指責他的有罪判決乃是為了政治正確。他是「夏令營般的校園環境」下的受害者，在這裡，事情因為酒精和「被蒙蔽的判斷能力」而「失去控制」。透納的罪行「完全不同於一名女性前往停車場取車時遭到綁架與強暴」的情況；「那是一個強暴犯，」她寫道，「而我很肯定地知道布洛克不是那種人。」^{註182}

她認識布洛克很久了，她補充，而他總是非常關心、尊重她，並且對她很親切，因此布洛克不是一個強暴犯，他的友人再次堅持。法官裴斯基同意她的評價，「這在我聽來很有道理。這和相關證詞中對他在事件發生前的性格描述某種程度上是一致的，都很正面。」

布洛克的友人與本案法官似乎都依照以下的推論模式進行思考：一名黃金男孩不是強暴犯，一名黃金男孩是如此這般的樣貌，因此如此這般的樣貌不是一個強暴犯。這就是正人君子布魯特斯的問題。

是時候讓我們放棄黃金男孩的迷思了，拒絕這個主要假設，然後學著在適當的時刻以後件否定前件。透納在垃圾車後的小巷裡被人發現，他正在侵犯他的受害者，她因為酒醉而失去意識。這是強暴，而強暴他人的人是一個強暴犯，故透納是一個強暴犯——他也是一名黃金男孩。因此……

我們太常移開目光，拒絕去面對性暴力在美國整體社會，尤其是在大學校園內的普及程度和特性。我們跟自己保證，真正的強暴犯會以帶著觸角和乾草叉的惡魔樣貌，或如同怪物那般——也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生物——出現在我們的雷達上；怪物無法被理解、怪異，而且在外表上令人害怕。強暴犯的可怕之處之一就是在於除了他們絕大多數時候皆為男性這點以外，他們缺少可以被辨識的記號與特徵，強暴犯是人類，太像人類的人類，而他們就在我們之中。藉由誇張的描寫，強暴犯如同怪物的想法達到了赦免的功效^{註183}。

另一個相關的迷思則是強暴犯是精神變態，他們被描繪成無情、沒有感覺、殘酷成性的；這個描述對兩方群體而言都不正確（並不是說兩者之間並無重疊，因為在現實中確實有）。許多性侵害之所以發

生，並不是因為性侵者對他人沒有任何掛念或覺察，而是因為侵略、挫折、控制欲望，以及再一次的，一種理所當然的權利感——無論是已經受到侵害了的，還是仍在期待中的權利。這也表示，儘管酒精與其他影響意識的物質，還有兄弟會文化毫無疑問地促成了性侵害的普及程度，但它們比較像是啟動機制，而非動機。

即使是在那些已準備好承認性侵害有多普遍並同意上述這類迷思的人之中，也存在著一種隱約的、非常常見的一廂情願，亦即認為大學校園內的性侵害主要由青年的經驗不足和無知所造成，而排除了厭女侵略、連續性的性掠奪，以及鼓勵並保護犯罪者的規範——也就是強暴文化。丹·透納說，他的兒子承諾全心投入教育其他人「飲用酒精和亂性的危險」，法官裴斯基贊同這個計畫，但所謂的亂性並不是問題，暴力才是。而值此時間點，認為布洛克·透納有可能是一個反對性暴力的恰當代言人，這個建議，用最客氣的說法來說，是令人感到屈辱的。他需要先自己上一堂道德課才能夠擅自幫別人上課，而在透過性暴力占上風之後，他就這麼急著想要站上道德高地，這強烈說明了在此事件上，他還沒有學到關鍵的一課，也就是：在任何權力階序裡的卓越位置並不是他與生俱來的道德權利。

然而，對他的父親、法官和友人們生氣很容易，某種程度上也是適切的，但一個錯誤的作法是認為他們身處於一個不同的道德愚昧水平上，而非僅僅是同理心光譜上的極端，而我們之中大多數人都在這個光譜上。為布洛克·透納辯護的那些人展現了原諒的傾向並打造了赦免敘事，且這些敘事太常被延伸到與他處境相同的男性身上；這種傾向主要源自於鮮少被我們批判的能力和特質，例如同情心、同理心、對友人的信任、對子女的奉獻，以及在和證據相容的情況下，對他人的良善性格抱持最高程度的信心^{註184}。

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這些都是重要的能力和特質，但當其他條件並不相等時，它們也可能有不好的一面，比方說，當社會不平等仍舊廣泛存在時，天真地挪用它們，將可能使那些已經不合理地比他人擁有更多特權之人更進一步地獲得特權，而如此做的代價可能是不公平地抨擊、責怪、羞辱，進一步危害以及消抹了他們的受害者中較不具特權的那些人。在某些情況裡，意識到這一點的犯罪者會根據此基礎來挑選他們的受害者。我將在本章最後回到這個主題，連同丹尼爾·霍茲克洛一案中清楚展現的厭黑女情結型態一起進行討論。

對布洛克．透納這類犯罪者的過度同情心可以歸咎於——同時也成就了——在面對他們對受害者所造成的傷害、羞辱和（某種程度上歷久不衰的）創傷時，我們的關懷不足。同時，它來自並促成了一種傾向，而這種傾向讓歷史上處於支配地位的主體在面對他們一直以來的臣屬者時，得以逍遙法外——從譬喻意義上或實際層面上皆是如此。在男性支配的情境裡，我們會先同情他，基本上，這就讓他成了自身犯罪的受害者。因為如果一個人在一開始先同情強暴者，只因為他失去了食欲或游泳獎學金，那麼他將會在故事裡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而我將於下一章裡談到，一名受害者的敘事裡需要一名反派或一名加害者（至少在沒有自然災害的情況裡）。現在，讓我們思考一下：誰是造成強暴者落入這個境地的「要不是」（but-for）原因？除了那名作證指認他的人之外，別無其他，他的受害者因此便可能被重新賦予反派的角色。

我懷疑這是一種經常促成責怪受害者現象的機制，而它之所以有害，一部分是因為它完全改變了敘事，並促成這個邪惡的道德角色反轉^{註185}。

在此案例裡，法官和父親都沒有責怪受害者（布洛克的友人則有，儘管她否認了）；然而他們採取了一種同樣的、甚至可能更狡詐的作法：他們把受害者從敘事中徹底消抹了。在他們的故事裡，她完全不扮演任何角色。

但於此案例裡，受害者拒絕了無聲離去。她被允許在法庭上讀出她強而有力、撼動人心的聲明，她以一種費盡苦心的清明思路揭露了布洛克．透納的犯罪對她的影響。他不僅違背她的意願，還在事後改寫她的心智；在他的行為於她記憶中所留下的空白之上，他套上自己的故事，伴隨了許多省略和編造。（「根據他的說詞，我很享受。我很享受。」她恐懼且不可置信地在一篇報導裡讀到這件事——她也從同篇報導裡得知她被發現時的狀態，也就是，半裸與無意識的。）於是，在那場入侵裡，無論是關於她的身體，還是她身體的故事，這名受害者都被奪去了她正當的發言權威。她接著說明：

我收到了警告，因為他現在知道我不記得了，他將能夠撰寫劇本；他可以說任何他想說的，沒有人可以抗議。我沒有權力，我沒有聲音，我毫無防禦。我的失憶將被用來攻擊我，我的證詞薄弱、不完整，而我被說服相信，也許我不夠好，無法贏得這場官司。他的律師

不斷地提醒陪審團，我們唯一能夠相信的人是布洛克，因為她不記得了。那種無助感使我受傷。

我沒有花時間在療傷上面，因為我把時間花在回憶那一個晚上令人痛苦的細節，好準備回答律師那些帶有侵入性與攻擊性，意圖使我偏離主題、自相矛盾，並牴觸我妹妹證詞的問題，他們的用詞將試著左右我的答案。他的律師沒有問：「你有注意到任何瘀傷嗎？」而是說：「你沒有注意到任何瘀傷對吧？」這是一個戰略遊戲，彷彿我可以被哄騙而忘了自己的價值。這場性侵是這麼鐵錚錚的事，但我卻在審判庭上，回答這類問題：

你年紀多大？你體重多少？你那天吃了什麼？你晚餐吃了什麼？誰煮的晚餐？你晚餐時有喝東西嗎？沒有？甚至沒有喝水？你什麼時候喝的？你喝了多少？你用什麼容器喝？誰給你飲料的？你平常會喝多少？誰載你去派對？幾點？但具體是哪裡？你穿什麼？你為什麼要去那場派對？你到了之後做了什麼？你確定你那麼做了嗎？但你是什麼時候做的？這則簡訊是什麼意思？你在和誰傳簡訊？你是什麼時候排尿的？你在哪裡尿尿？你和誰一起在外面尿尿？你妹妹打電話來時，你的電話處於靜音模式嗎？你記得你把它調成靜音了嗎？真的嗎？因為我要指出，在第五十三頁時你說手機是調到鈴聲模式的。你讀大學時喝酒嗎？你說你以前常常參加派對？你曾經喝醉到失去意識多少次？你參加兄弟會的派對嗎？你和男朋友是認真的嗎？你有和他發生性關係嗎？你們從什麼時候開始交往？你是否有可能會偷吃？你曾經偷吃過嗎？當你說你想要獎勵他時，你是什麼意思？你記不記得你是幾點醒來的？你還穿著你的羊毛衫嗎？你的羊毛衫是什麼顏色？針對那晚你還記得什麼？不記得了？那好的，我們會讓布洛克來補充。

我被狹隘尖銳的問題連環轟炸，這些問題剖析我的私生活、愛情生活、過去的人生、家庭生活；空洞的問題，累積著不重要的細節，試圖為這個甚至沒有問過我的名字就把我脫到半裸的男人找藉口。在一場身體侵害後，我被用來攻擊我的問題侵害，好讓他們可以說，看吧，她的說法前後不一致，她頭腦不清楚，她基本上是一個酗酒者，她大概想要發生一夜情，他是一個運動員對吧，他們兩個人都醉了。無論如何，她記得的那些在醫院裡的事情都是之後的事了，為什麼要納入考量呢？布洛克目前正處於一個重要的關卡，他因此感到非常難受^{註186}。

這最後一句話清楚說明了同理他心的問題：當我們把自身的忠誠給予了強暴犯時，我們便在他加諸於受害者身上的傷害之外，還增添了深刻的道德侮辱。我們也可能會忽略，在法律的眼中，理論上來說，他的罪行乃針對人民，也就是我們所有人。而針對這名挺身而出、為他的犯罪作證的強暴受害者，問題卻太常演變成：她想要從中得到什麼？人們不認為她在一場犯罪審判裡做著辛苦的工作，反而認為她試著尋求個人的復仇和道德懲罰。更有甚者，她可能會被看作是不知寬恕的，她試著從她的強暴者身上拿走什麼，而非在對維持法律和秩序做出貢獻^{註187}。

當我們詢問，「這是為了誰呢？」與「她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我們便侵蝕了一名強暴受害者作證時的立足點：這個人的身體上被犯下了對社會的罪行。而這也明白承認了，她的身體，儘管是她的且是她一個人的，卻同時也屬於另一個人，而我們集體致力於保障那個人的利益。或者至少應該是如此：一個道德抱負。

更衣室對話 Locker room talk

有鑑於對布洛克的輕判，以及（最重要地）這背後的理由在社會上引起了激烈抗議，許多人曾希望透納一案可以成為轉捩點，使我們看見性侵害受害者。我必須承認，我自己也一度短暫體會到一種不常出現在我身上的樂觀心情，但目睹了幾個月後所發生的事情，以及在那之後所未能發生的事情，這些希望很快地被擊碎了。我所指的是川普一段無心被錄下、如今惡名昭彰的對話錄音受到公開一事；在錄音裡，川普向比利·布希（Billy Bush）透露：

我會自動被美麗的〔女人〕吸引——我就不管其他開始親吻她們。跟磁鐵一樣。我就親下去。我一刻都不等。一旦你是明星人物，他們就會讓你這麼做。你什麼都可以做……抓住她們的陰部。你什麼都可以做。

在接下來幾天與幾週間，這些和其他類似的吹噓反覆在媒體上播放，但卻沒有削弱川普的競選活動。不過區區一個多月之後，他當選了總統。

為什麼這段（當時來自十一年前）的錄音沒有對川普造成更多傷害？但某方面來說，在錄音帶曝光後，更值得被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它只對川普造成了這樣的影響？川普的言語幾乎沒有透露出任何新資訊。川普有著一段漫長、廣為人知、被大幅宣傳的性騷擾與性侵害歷史，無數針對川普的可靠指控中，包括了他的前妻依凡娜，她針對強暴指控的證詞並不是祕密（如前言所述）。而就算我們把厭女攻擊惡行的範圍局限在其他家庭裡的女性——我們可能得補充是白人女性，因為在川普那幾乎壓倒性的白人支持者中，許多人都愛著他們的母親，而穆斯林和墨西哥人則自始至終都被視為他者——這個主題也不算新聞。前文中提到的，川普針對梅根·凱莉、蘿絲·歐唐納、卡莉·費奧麗娜還有希拉蕊·柯林頓的發言（見第三章）往往很快地被原諒，或巧合地被遺忘，例如後者在十二月的總統大選辯論時，於廣告休息時間如廁的行為對他來說「噁心到無法開口談論」（儘管是川普自己提起了這個話題）。事實上，正因為他表現得毫無羞恥心，這種厭女情結對許多川普的粉絲來說反而很可能是個賣點。對於厭倦了所謂政治正確的美國人而言，尤其是對那些在提到性別化的貶損和表達對女性身體的看法時，被困在沉默與羞恥之間的男性而言，看著川普

發洩他卑劣的惡意，卻不用擔心在事後感到尷尬，想必是快意且有時鼓舞人心的場面。

因此，為什麼川普定義裡的「更衣室對話」（他試著如此宣稱）具有如此的爭議性？他發言裡的哪些內容讓某些共和黨員們終於考慮和他切割？儘管他們最後並未這麼做。

正如同《紐約客》雜誌的亞當·高普尼克在事後立即一馬當先所指出的，我猜測主要的因素是川普的發言裡有種純粹的怪異感：它們那種令人坐立難安、令人撇嘴的特質^{註188}。不只一位評論者用了「發自內心深處」一詞；保羅·萊恩（Paul Ryan）則說「令人作嘔」。這不是因為被描述的行為本身——任何人只要願意傾聽與採納女性的說法，就會知道這是每天都在發生的事——而是因為川普的用字遣詞，他隨後也為此道歉。「『我跟個禽獸一樣往她身上爬！』這種說法存在嗎？」高普尼克好奇地問；對於如今聲名狼藉的那句「抓住她們的陰部」，我持有同樣的疑問。高普尼克認為前者讓川普聽起來像個不是以英文為母語的人，我則根據後者想像了一幕電影裡的滑稽畫面，劇本裡一個有性欲的（或也有可能是無性欲）的外星生物必須假扮成一個血氣方剛的美國男人。男人會談論抓住乳房、奶子和屌——也許還有睪丸。但陰部？我懷疑，我的情報提供者也有同樣疑惑。

誠然，男性確實會以這種方式性侵女性，但他們是否會認為自己正在這麼做？抓住這個地方是很奇怪的，因為這麼說吧，它並沒有握柄。同時我們也要思考，性侵害往往不只是違背受害者的意願，也是改寫受害者的心理；（「你很享受吧，不是嗎？」就是一個假問題。）這種改寫傾向於賦予攻擊者優異的性能力，而非性無能。最後，即使這些攻擊者確實在內心承認他們用了這種方式撲向女性的下體，他們會在之後這麼厚顏無恥地向其他人吹噓嗎？他們是否會像川普一樣，在一輪未經同意的強吻之前先停下來，然後過分講究地嚼一顆薄荷糖？就一個有著強暴設定的人來說，這舉動多麼體貼。

然後在這句話裡，我們可以聽到其他用語的回音。（「我直直往他臉上揮了一拳」、「我直直幹進她的屎裡」是近期專業鄉民們在針對女記者和女性體育播報員時愛用的說法。）結合以上所說，且冒著太過仔細研究某些人類歷史上最不具文學素養的用語的風險，這修辭的效果是很不真實的。這莫名地前後不一致。川普聽起來不合宜、粗俗、令人發毛，而且虛偽。甚至是虛假的。

先不論這可能是因為什麼原因，就社會大眾的抗議來說，這代表了什麼？

我很遺憾地說，不是好事，因為這說明了那些最終以此事為基礎、決心拒絕川普的共和黨員們，並不是因為他表現出的厭女情結而感到困擾，儘管他們可能告訴自己這是問題所在。相反的，我懷疑是這個奇特的用詞選擇、令人厭惡的自大吹噓，以及整體來看很是笨拙的社會應對令人們感到不安，勝過於任何其他原因，勝過於已經有豐富的證據顯示川普慣常對女性所做之事。

而確實，自我在錄音帶公布數天後做出這個診斷以來（Manne, 2016g），幾乎所有一開始因此事而決定要拒絕與川普合作的共和黨員們又都改變了心意，因為這符合他們的政治利益。儘管可以預料，卻仍舊令人憂鬱。我完全贊同，我們應該在適當時候放手，在個人已經表達出某種真誠的悔意後，不過這顯然不存在於川普的概念或道德劇目裡^{註189}。但是，在短短一個月內寬恕了一名總統候選人的如此行止，請原諒我這麼說——這在我看來是無恥到不可饒恕的。

接著，讓我們回到前述問題：為什麼布洛克·透納的性侵受害者被不尋常地認真看待？我認為有兩個因素，兩者都不是對我們集體道德敏感度的褒獎，而且考量到隨後大選結果的重要性，我們可能也希望它們不是，好維持此刻在道德上有必要的壓抑現實感。

（1）布洛克·透納的受害者強而有力地發聲，且她的衝擊性聲明在網路瘋傳。但這不是一種被具體化的發聲；她依舊保持匿名且未曾露面，她因此沒有被懷疑是在「扮演受害者」。而根據我們對她的全部了解，她基本上有可能是任何人——尤其是任何男人——的某個人，例如他們的姊妹、友人、女友、妻子，或他們（現實或想像的）子女的（再一次的，現實或未來）的母親。除此之外，

（2）她被兩名史丹佛的研究所學生所救。這兩人來自瑞典，是典型的主動旁觀者與道德上吸引人的角色。兩位年輕男子的表現英勇而恰當，我絕對無意對此輕描淡寫，但正如他們自己也不自在地察覺到了（因此他們在一開始時拒絕接受媒體訪談），他們後續在故事裡被賦予了英雄的角色，而相對於一個就讀菁英大學、享有太多好處，甚至在某些人的暗示裡是令人作嘔地被「嬌慣著」的有錢孩子，他們獲得了讚揚。

於是，儘管針對布洛克．透納的憤怒仍強烈而持久，我們接下來必須好奇詢問：這是因為他的行為，還是因為他是誰，以及他所代表之事物？

在下一章裡，我將探索其中某些問題，連同所謂「受害者文化」的概念，以及覆蓋其上的惡性道德主義。我將會主張，基於一種針對同情注意力和道德優先順序而進行的，心照不宣的默契——以及，經常是錯誤的競爭，一名女性越過一名與她擁有相等或甚至更多特權的男性去要求道德聚光燈的注目，這大約就跟她作證指控他一樣地令人焦慮。我認為，這構成了一個不正義來源，和提供證詞時的情況相比之下，它較少受到認可，但卻同樣深層，且這包括了責怪受害者的慣習，卻又不僅止於此。

但首先是另一個案例研究，以顯示厭女剝削、同理他心及被我稱為「消她」（herasure）的情況如何以一種自成一格的方式合作，對美國脈絡裡的黑人女性造成傷害。因此，這個結論案例之目的是要喚起關注「厭黑女情結」——這乃是由黑人酷兒女性主義者莫亞．貝利所發展的詞彙與概念^{註190}。

運轉中的厭黑女情結 Misogynoir in action: the Daniel Holtzclaw case

「誰是丹尼爾·霍茲克洛？」（Who is Daniel Holtzclaw?）這篇文章在緊接著的副標題中自己回答了問題：東密西根大學的足球隊後衛^{註191}。他也是奧克拉荷馬市的一名員警，因為犯下十八起性侵害案件而遭判刑，其中包括性毆打、強暴和強迫口交，受害女性全都是非裔美國人。霍茲克洛本人有一半白人（父方）和一半日本人（母方）血統。陪審團在上述罪刑上判決他有罪，但同時針對另外的十八起指控則做出了無罪宣告，最後判處他二百三十六年的刑期。這些有罪判決只代表了十三位指控者中的八人。

這篇由傑夫·阿諾德（Jeff Arnold）撰寫的文章於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七日刊登於體育新聞網站《SB新聞》（*SB News*），文章幾乎只專注於霍茲克洛友人與家人的觀點上。每一個阿諾德提及並引用的人都說，他們無法相信霍茲克洛做出了他所被指控的事，儘管一位受訪的前任足球隊友確實憶起了以下事件：

霍茲克洛試著打破團隊裡蹲舉重量的紀錄，放了約莫六百磅在槓上；霍茲克洛完成了這個驚人的上舉，然後，不知道該拿這壓抑在心口的情緒怎麼辦，他開始反覆地用頭撞舉重槓，一再用他的頭撞擊金屬。

「每個人都在想，『喔老天，...這人天殺地瘋了。』」

但其他霍茲克洛的前隊友就比較正面，唯一的警訊是在沒有根據的情況下指控他使用類固醇，而上述這樁唯一的例外僅僅同意以匿名方式接受阿諾德的訪問。

第一個出面舉報霍茲克洛的女性是當時五十七歲的詹妮·李貢（Jannie Ligons），她是奧克拉荷馬市一間托育中心的管理人。李貢作證指出，二〇一四年時她因為臨時轉彎而被攔下，這名員警為她搜身檢查是否攜帶武器，然後要求她脫下衣服。在那之後，他強迫她為他口交。李貢抗議：「警官，你不能夠這麼做.....你不能做這種事。」

陪審團同意李貢的說詞，認為霍茲克洛確實這麼做了，而且也在其他無數宗他被指控犯下的類似罪行上判決他有罪，其中有部分是根據和另一位指控者相符合的DNA證據。霍茲克洛逮捕她、搜索她，再

提議開車送她回家時，她只有十七歲；她作證指出，霍茲克洛在她自家的前門廊上強暴了她，然後才開車離去。

霍茲克洛的辯護人指出，在他的長褲內側所發現的一塊液體痕跡之所以含有受害者的皮膚細胞，可能是因為「DNA轉移」，比方說來自於他的雙手，因為他在脫衣服或上廁所之前曾經搜過她的身。丹尼爾的姊姊補充，我們並不確定那些液體確實來自於陰道。

他的父母也同樣確信兒子無辜，並且計畫就判決結果上訴。他的父親艾瑞克說：

這非常的艱難，因為這不是丹尼爾。他只是一個男人，他不是那個他們所描述的反派人物。目睹這一切真的非常非常艱難，他們把他寫成這樣。對每一個認識他的人來說，他就不是那樣的人。

但問題是，在認識自己的人眼裡，尤其是在家人與朋友眼裡，基本上，沒有人會看起來像「那個人」。（回想布洛克·透納的友人堅信他不會是強暴犯一事：「我肯定地知道布洛克不是那種人。」）

「那種人」被描繪成不討人喜歡的、刀槍不入的，而且在他們犯罪以前沒有過去，至今為止沒有自己的生活，也沒有寶貴的未來可以錯過。「那種人」不是一個屬於社會、在道德上具多重面向，且有時富有才華的人類；相反的，他們是誇張的漫畫人物，或者再一次的，是個怪物。

厭女暴力和性侵害一般由不起眼的、不像怪獸的人所犯下，我們必須要接受這個事實，特別是，如果我們要在這場域做出改進的話。若借用漢娜·鄂蘭的知名用語，我們必須接受厭女情結的平庸性。這是一個經常被中傷的想法，但在我看來，無論鄂蘭在觀察到阿道夫·艾希曼並不像一個怪物的過程中，推斷出什麼樣的結論，她對邪惡的平庸性所提出的基本道德論點在此刻不僅是前所未有地正確，更是至關重要且應該受到認可的。艾希曼看來平凡，甚至有點愚蠢——或具體來說，在他的例子裡，便如小丑一般，鄂蘭這麼寫道。（「不管檢察官多麼努力，每個人都能看到這名男人並不是一個『怪物』，但卻確實很難不去懷疑他是不是一個小丑〔1963，頁54〕。」）那時對許多人（尤其是某些猶太美國人）而言，鄂蘭的描繪太虎頭蛇尾、太冷靜了，令人難以勇敢面對。多希望我們那時有這麼做^{註192}。

負責調查的刑警金·戴維斯（Kim Davis）說，霍茲克洛只犯了一個策略上的錯誤，那就是以李貢作為攻擊對象；她沒有犯罪紀錄、沒

有仍在有效期間的逮捕令，或者其他任何他可以用來威脅她、讓她不願意挺身而出的原因。戴維斯和其他調查員警表示，霍茲克洛挑選對象時很謹慎，他會針對那些因為有犯罪紀錄、身為藥物使用者或性工作者，並因此被邊緣化而最不可能被相信的人。戴維斯認為霍茲克洛的想法是這樣的：「她們是完美的受害者，沒有人會相信她們。如果你相信她們，那又怎樣？一個妓女是不能被強暴的。」她如此總結嫌犯可能的推論過程。她接著敘述自己的想法：「是的，她們能；是的，她們能。這就是為什麼他會挑選這類女性，因為她們是完美的受害者。」

而霍茲克洛的辯護確實聚焦在這十三名控訴者上，其中許多人因為不同的原因導致在法律上站不住腳——因此，從赦免其攻擊者的角度來看，她們是較佳的受害者。就連李貢也不是那麼完美，在被判有罪後，霍茲克洛於二〇一六年四月接受電視節目《20/20》（20/20）訪談時指出這點。霍茲克洛說：

讓我們把事實攤開來。她並非如人們所想的這麼無辜，她在八〇年代有被逮捕過.....但我們不能把這件事呈現給陪審團。這不是一個那樣的女人，你知道的，一個足球媽媽或在社會裡可靠的人^{註193}。

霍茲克洛提到的這起指控最後被撤銷了，且李貢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就沒有被逮捕過。李貢的說法是：

情況是這樣的，他攔下很多妓女和用藥者，然後他用某些事情威脅她們，例如逮捕令。而我猜，很明顯地，他以為我跟她們一樣，但這是一個天大的錯誤；那晚他攔下了一個不對的女士（Diaz et al., 2016）。

李貢說，她很為自己與其他受害者感到高興，她們獲得了公道。在太多這類的情境裡，結果並非如此收場，而陪審團皆由白人組成的這件事，更是一個凶兆。

但在丹尼爾．霍茲克洛被判處有罪一年後，他和他的辯護律師獲得了一個重要的支持與鼓舞：保守派記者蜜雪兒．瑪爾金（Michelle Malkin）釋出了一部共分為上下兩集的紀錄片，紀錄片主張霍茲克洛無罪，他是因為當時在密蘇里州佛格森市的抗議行動^{註194}而被犧牲；丹尼爾．霍茲克洛同意這個判斷，「如果他們沒有判我有罪，當時在奧克拉荷馬市就會再發生一次佛格森發生的事。」

我們反正不清楚這是不是真的。和——比如說——由艾略特·羅傑所犯下的伊斯拉維斯塔槍擊案相比，霍茲克洛一案獲得的關注很少；很多時候，白人女性主義者針對非裔美國女性所經歷的犯罪持續保持沉默——一種令人痛苦的沉默，蜜雪兒·蒂妮斯·傑克森（Michelle Denise Jackson）（以及其他）強烈地抗議（Jackson, 2014）。對某些人而言沉默是金，但對受害者來說，它卻是漫不經心與敵意。

自由派白人對女性困境的同情程度，反映了我們在道德注意力上的種族主義習慣，克莉斯蒂·道森和瑪莉塔·吉伯特（2014）在討論納菲薩杜·迪亞洛（Nafissatou Diallo）對（如今是前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多明尼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提出的性侵指控時曾如此主張。道森和吉伯特（2014）指出，我們之中許多人將會記得他的名字，卻忘記了她的——或一開始就不會記住。她們所發展出的「易感性不平衡」（affectability imbalance）理論於是促成了黑人女性「奇怪的敘事消失」（curious narrative disappearance），例如霍茲克洛就有效地試著操縱並濫用這一點以滿足自身利益。他曾經有可能輕易地成功做到這件事情，而這應該為像我這樣的白人女性主義者——當然包括我在內——構成了恥辱的自我反省基礎，關於我們如何和厭女情結共謀，並促成了黑人女性的「消她」現象——以及「俯身取用」的剝削和（白人）女性主義中其他這類的種族主義痕跡。

傑夫·阿諾德撰寫的「誰是丹尼爾·霍茲克洛？」一文探討了各種可能赦免霍茲克洛的解釋，甚至是在他的指控者沒有說謊的情況下^{註195}。阿諾德寫道，然而他（霍茲克洛）有可能是因為踢足球時遭到頭部創傷而受到影響（這確實是常見的狀況，但在此案例中，法庭上並沒有出現證據。同時，這和自我控制力降低或甚至連續性侵之間分別的關聯性，完全都是出於推測）。不過，也許霍茲克洛受憂鬱症所苦，因為他沒有在大學畢業後被職業足球聯盟徵召——這讓他感到苦澀與失望；也許，一名專家認為，這有可能是一種性失調，並不屬於他平日的道德觀；也許，當他這麼做的時候，他是反常的。

於是我們便看到了一系列相當完整的理由，它們說明了，為何我們可能會對霍茲克洛這種人採取一種被斯特勞森稱為「客觀」的立場，而不是將他當成一個負責的成人同類、一個我們可以和他建立一般人際互動和道德關係，並讓他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人。相反的，轉移到客觀模式的意涵在於，我們必須抑制自己，不為了主體的行動責怪

他，或者甚至不把這些行為歸咎於此人。「他不是他自己」（He wasn't himself）是一個特別有趣的「答辯」，用斯特勞森的術語來說。斯特勞森建議，我們應該盡可能（也就是非常）認真看待這個「極具暗示性」的語言風格，儘管它帶有「邏輯上滑稽」的特質（[1962] 2008，頁8-9）。而霍茲克洛的名聲——人們對他這個人的看法——在此有著顯著的影響。我們的身分一部分取決於其他人怎麼看待我們，亦即我們的社會名聲。就如我們所看到的，如果一個男人有著「好男人」的人物設定與足夠的物質和社會資源——或一個令人心碎的「落魄」故事——那麼我們經常就會用盡力氣捍衛他的名譽、維持他的清白。

哪些證據有可能說服霍茲克洛的支持者他是有罪的呢？就算我們可以理解他的家人的忠誠態度，且某些人（儘管並不包括我）也許認為那是合理的，但為什麼阿諾德如此同情霍茲克洛，以至於他寫下了一整篇如此一面倒的報導，讓刊登它的網站必須在文章發布的五小時後就將其撤下？網站編輯稱此文為「一次徹底的失敗」，並且令人讚賞地承擔了內部編輯流程崩壞的責任。但這個崩壞是怎麼發生的？麥特·邦史提爾（Matt Bonesteel）於《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中指出，這是一篇長達一萬兩千字的文章，勢必耗費了數週、甚至數月的時間來完成，那麼，至少應該有一位編輯大幅度地投入其中，這不是一篇倉促上線的部落格文章。然而，似乎仍然沒有人預期到這篇文章會遭遇到的反彈，它幾乎完全是根據基本上不可信的理由來否定一名連續強暴犯的罪行，這名強暴犯專門以社會或法律資源不足的非裔美國女性作為對象，且已被判決有罪。他們也沒有留意到，受害者幾乎被消抹——她們在文章最後的兩個簡短段落中方才出場，因為文章引用了她們在法庭紀錄中的發言；沒有證據顯示傑夫·阿諾德曾試著和這些女性中的任何一人談話。

阿諾德是否學到了教訓？各種跡象顯示結果並不令人看好。他隨後（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推特上提到一篇「必讀報導」，正好是關於一名足球員據稱因為國家足球聯盟（NFL）過度漫長的調查過程而受到的不公平對待；這名球員是伊齊集爾·艾略特（Ezekiel Elliott），他被指控家暴。這篇由提姆·羅漢（Tim Rohan）撰寫的報導主張艾略特的指控者很可能都在說謊^{註196}。

讓丹尼爾·霍茲克洛被判有罪的罪行和這個案子的其他面向強而有力地描繪了厭女情結如何有系統地運作，儘管在社會結構與慣習

（回想第二章裡的討論）之外，它確實也涉及了一些個別的老鼠屎。連環性侵犯者只構成男性的一小部分，但這個系統庇護與保障了他們不受法律規範。除此之外，還有各種不同的社會文本、道德許可和物質剝奪，它們的作用是從她身上提取陰性屬性的好處——例如注意力和關懷，以及其他類型的社會與性勞動——從反選擇運動到街道騷擾，再到強暴文化；也有一些部署和機制阻止和警告她，不得試圖占有陽性屬性的地位、權力和權威，包括了證詞不正義、男性說教、責怪受害者，以及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的，其他抨擊受害者的手段。

注意，我們不需要知道像霍茲克洛這類男性的動機為何，也可以看到其行為的社會意義對他的受害者來說具有深厚的敵意，且這些行為的發生條件是她們在一個迄今都屬於男性的世界裡作為女性，並屬於某個特定的種族和階級——尤其是在這個案例裡。無論他僅僅是對著典型的受支配對象「打沙包」，或是他明確地怨懟女性有所保留，或女性取代了他，或是他有著某些類似的性別化牢騷，情況都是如此。當男性被賦予了特權或一直以來都享有特權，他們可能接著便會認定，自己不僅在法律上免責，也在道德上有著理所當然的權利——他們確信，他們所攻占的事物是自身應得的，而某些時候，當女性未能如實履行這場一直以來都不正當的性別化交易時，他們便會試圖懲罰這些女性。

如果這類犯罪的受害女性試圖將她們的攻擊者繩之以法，她們就必須對抗結構性的阻礙和路障，同時也會遭到懷疑、責怪、怨懟，諸如此類。對於承受其他弱勢條件——例如種族主義、貧窮、有犯罪紀錄、身為性工作者，以及它們以各種方式交織後的天然成果——的女性而言，情況更是如此，而她們的攻擊者可能深知這點並無所顧忌地挑選他的受害者，趁機利用她們相對之下的無能為力。

對厭女暴力受害者的排除行為也可能以知識的形式發生，通常是當她們被認定說謊之時；但另一種可能是，她們可能被歸為愚蠢、瘋狂或歇斯底里之列，並遭到排除。或者，它可能以道德形式發生，當一名女性主張自己是受害者身分的資格受到質疑，並因為她的抗壓性不足——或在某些情況裡，因為她不夠寬容——而受到輕視之時。她甚至可能在知識和道德基礎上同時遭到抨擊，例如被指控妄想，而且還是個騙子。霍茲克洛採取了另一種敗壞他人名聲的典型行動，他聲稱他的受害者們試圖撈他一筆，她們實際上希望藉此變成「億萬富翁」。我客氣地說，這是一個高風險低報酬的陰謀。

我並不認為，光是藉由討論那些經常被用來為女性與非白人男性的證詞不正義奠立基礎的刻板印象，我們便能夠解決這些互相連結的問題。對厭女情結受害者的抨擊和弱化通常是隨機的，比如說，我們很能想像，許多人不相信或不信任霍茲克洛的指控者，但卻可能信任李貢這樣的人作為保姆，讓她在托育中心照顧他們的子女。（回想本章稍早曾討論到的，弗里克在證詞不正義的主題上對湯姆·羅賓森提出了類似論點。）這類刻板印象的本質與使用是隨機的，此乃因為證詞不正義經常高度地具有目的性。我們已經在本章中看到一種強大的、儘管通常無心的意向，好讓我們去保護支配性男性的利益並維持他們的名聲，因此，許多人會感受到一種道德必要性，並出於本能，千方百計地尋找任何理由去說明他為何無辜，而所有作證指認他的女性為何不能夠被信任。或者另一種可能是，為什麼挺身而出不符合她們的利益，彷彿在特定情境和脈絡裡，她們不能夠被信任可以對此做出決定，儘管這些情境與脈絡相當不同。

因此，問題不只是基於資訊不正確的錯誤，以及從社會想像中所擷取的錯誤聯想——這是弗里克所提出的主要判斷。更善良高尚的傾聽——弗里克提議，就此問題來看，它是個儘管不完全卻有所助益的解決方式——不是一種人們一開始就有動機去使用的技能；企圖進行直接的社會改革也不一定足以解決這個顯然是結構性的問題。我相信，改變主體態度、忠誠和注意力習慣也是必要的，但是我們是否能夠（如何）做到？又是否能夠（如何）勸說足夠的人去嘗試？

最後，為了要處理這種嚴重的不正義形式，必要——但遠遠不足夠——的一點，是當女性指控身處支配地位之男性有厭女暴力行為時，阻止人們聲援這些男性，也阻止人們對抗這些女性。這個問題的本質暗示了此事有多棘手；要去說服別人他們其實懷有著極度醜陋、不正義且在道德上邪惡，並因此（只）會出現在特定社會脈絡中的偏見，這件事並不容易，尤其因為這種偏見影響著我們的道德注意力習慣，故而從內在來說，它們的運作可能感覺起來像是純粹對那些被指控的男性抱持公平的態度，而不是對提出指控的女性有什麼不公平。她有可能顯得不誠實、有可能看起來是一個名聲不好且沒有同情心的人；或者，如果她太引人注目，也可能會有一些試圖脅迫她保持沉默不去作證的舉動。

另一方面，他相信自己是被虧欠的。他錯了，但我們的忠誠度經常與他——這個最不值得也最被期待的人——同在。丹尼爾·霍茲克洛說：

我內心絕對百分之百〔知道〕，在我的家庭裡，每一個人都站在我這邊。他們都說：「你根本不應該被判有罪。」我看著〔陪審團成員〕，我看著他們每一個人的眼睛，我跟他們說，「我沒有做。」我看著那些男人，然後我看著那些女人，然後我看到女人們在哭。

陪審團裡的白人女性認定霍茲克洛有罪——基於證據，這是值得讚賞的。即使如此，她們仍然為他和他在執法部門的光明未來而哭泣了，在他的受害者面前。

註170：儘管，我最終想要透過展示重要的道德和政治關懷如何能夠遞補成為用以不正當地求取男性救贖的手段，以探索一種典型的糾葛。我們可以比較，在一個我懷疑（但沒有足夠篇幅進行論證）是赦免敘事的討論裡，對隱性偏見的關懷所扮演的角色；這段敘事經由廣受歡迎的播客節目《連載》（*Serial*）廣傳（該節目由莎拉·柯尼〔Sarah Koenig〕主持，芝加哥WBEZ電台共同製作，第一季，2014，<https://serialpodcast.org/season-one>）

此處，我的論點局限於：對這類偏見的表面關懷，鮮少能夠合理化對阿德南·席耶（Adnan Syed）的同情，以及有時明顯想要赦免他的渴望。席耶因為謀殺前女友李海明（Hae Min Lee）而遭到起訴；案件發生於約十五年前，當時兩人仍在就讀高中。儘管種族偏見有可能曾對阿德南不利，因為他身為穆斯林，但它們也同樣地不利於作證指控他的主要證人——阿德南的友人傑，一名同齡的非裔美國男性。然後還有針對李海明的敘事消抹——這是某種形式的厭女情結，而亞裔美國女性似乎特別容易受其傷害，如同我在第三章提出的論點。本章意在處理該播客節目中所提到的，另一個看似有理的一般性問題：赦免和開釋「黃金男孩」與「好男人」。在謀殺案發生當時，認識阿德南的人們都曾在《連載》節目中使用這兩個標籤形容他。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李海明是遭勒脖致死的。如前言裡討論到的，勒脖行為顯著地提高了男性親密伴侶犯下殺人案的可能性。

註 171：Cara Buckley, “Gone Girls, Found,” New York Times, 2014/11/19, <https://www.nytimes.com/2014/11/23/arts/talking-with-the-authors-of-gone-girl-and-wild.html>

註172：譯註：作者之所以說刻意，是因為Lester這個名字的涵義是「顯赫之人」，但影集裡的主角在一開始是個各方面都不成功的落魄男性。

註173：電影版中並沒有可比擬的事件，而且故事情結大不相同。傑瑞·隆德加德——萊斯特的大螢幕對應版本——急需用錢，因此試著安排他的妻子遭到綁架，好讓他可以獲得大部分的贖金。但是其中一個他花錢雇來執行任務的殺手因本性難移而殺害了珍。他的理由是她太吵了。

註174：承蒙我的編輯彼德·歐林提供，另外兩個例子包括：珍妮佛·羅培茲在電影《追情殺手》（*Enough*）裡和茱蒂·佛斯特在《勇敢復仇人》（*The Brave One*）裡的角色。

註175：相反的，弗里克（2007）談到了「社會身分力量」，並同意某些形式的證詞不正義較為局部、較不具歷史性，比方說，當一個特定的方法論或專業的擁護者被賦予負面的刻板印象時（頁28-29）。但和弗里克一樣，我在此專注於更為系統性的形式，例如基於種族、性別、階級、身心障礙、年齡、性歷史（包括曾經是性工作者），以及它們之間的交織性而造成的證詞不正義。

註176：針對這類無知為何特別不知不覺，博豪斯提出了兩點原因：「第一，在道德和政治論述裡，它阻止了知識的傳遞；這個傳遞本來應該就此知識的針對對象提出一個規範性的主張，卻反而因此呈現了一個因為錯誤的知識資源而產生的扭曲圖像。第二，這容許了一種對

世界的共同體驗，且這個體驗是由知者們在沒有自覺的情況下所決定的，因為一旦一個人培養出了一種使用知識資源的能力，這些資源就能夠成為習慣，也因為知識資源可以協調知者們和世界及和彼此之間的關係。」（2012，頁731）

註177：請注意，在厭女情結的書名標題下，我偏好不將它們的非敵意表現形式納入，例如藉由父權意識形態對「好」女人的獎賞與激勵，以免讓這個標籤失去其情感內涵。「軟性厭女情結」會是比較好的說法，但我仍舊渴望一個更簡潔、特出的標籤。「墊高」是一個可能，而我喜歡它如何使人們注意到，女性們認為，聖母和天使是一個不穩固的位置，一旦她們犯下最細小的錯誤，她們就有可能會被擊落墜毀。但反面來說，這個標籤不包括有遠見的機制，例如對優良行為的鼓勵，以及透過符合父權體制利益的方式來抽取女性的能量。

註178：我在此採納何賽·梅迪納（2011）的看法，她就弗里克的觀點提供了一個細緻的批評。弗里克寫道：

表面上我們可能會以為，信用赤字和信用過剩都是證詞不正義的案例。當然，某種「不正義」感可能可以自然而然且頗為適當地被應用到信用過剩的情境裡，例如只因某個人說話時帶有特定口音，他的說話內容便收到了過度強烈的可信度時，我們即可能會對此不正義提出抱怨。誇大點說，這有可能可以算是一個分配不公平的不正義案例——某個人獲得了比他應得的份量更多的好處——但這會是對此用語的曲解，因為信用並不是一個隸屬於正義分配模式的好處……那些最符合分配模式的好處之所以符合，原則上是因為它們乃是有限的，而且有可能缺貨……這種好處面對著，或可能很快會面對著某種競爭……相對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信用通常並非有限，因此並沒有需要進行分配的類似需求（Fricker, 2007，頁19-20）。

感謝蕾秋·麥金儂讓我注意到梅迪納的重要作品。

註179：我們應該要注意，很不幸的是這類暴力對所有在網路上活動的女性來說不成比例地常見，尤其當她們冒犯了父權價值時（如今經常以輕微程度重新包裝在「男性權益」、男權倡議者和「另類右派」運動的標題下）。然而，昆恩也被「人肉搜索」，她的住家地址被公開在網路上，所以這些要懲罰她的威脅確實有可能真正地傷害到她。這個傷害的目的是讓她害怕他們，與此同時，一則論壇發文則指出頭部傷害可能會使她失去知覺能力。最終昆恩因此被迫離開住所。這是一樁再明顯不過的復仇，因為她使某些男性遊戲開發者失去了他們神聖且——再一次的，容我大膽地說——安全的空間。Simon Parkin, “Zoe Quinn’s Depression Quest,” The New Yorker, 2014/09/09, <https://www.newyorker.com/tech/annals-of-technology/zoe-quinn-depression-quest>

註180：WITW Staff, “Victim’s and Father’s Statements in Campus Sexual Assault Case Draw Strong Reactions online,” New York Times, 2016/06/06, <http://nytlive.nytimes.com/womenintheworld/2016/06/06/victims-and-fathers-statements-in-campus-sexual-assault-case-draw-strong-reactions-online/>.

註181：後來具體證據出現，揭露了布洛克·透納過去和女性相處時的行為並非那麼耀眼：“Members of Stanford Swim Team Not Surprised by Brock Turner Arrest,” Inside Edition, 2016/06/16, <https://www.insideedition.com/headlines/17021-members-of-stanford-womens-swim-team-not-surprised-by-brock-turner-arrest>

註182：可和紐約布魯克林轄區警局指揮官彼得·羅斯（Pete Rose）的意見相比較。他於二〇一七年一月時指出，大多數在該區內發生的強暴案件「並不是陌生人在街上被拖走的那種完全令人憎惡的強暴。」羅斯接著說：「如果有一個真正的陌生人強暴案，也就是一名隨機男性在街上挑了一個陌生人，這種才是真正令人憂慮的，因為這個人好像完全沒有道德標準。」羅斯激起群眾廣大的抗議之後隨即致歉。Graham Rayman, “Certain Sexual Assaults Are ‘Not Total Abomination Rapes,’ Brooklyn NYPD Commander Reportedly Claims,” New York Daily News, 2017/01/06, <https://www.nydailynews.com/new-york/nypd-commander-sex-assaults-not-total-abomination-rapes-article-1.2938227>

註183：可參考在《後果：暴力和自我重建》（*Aftermath: Violence and the Remaking of a Self*）（2002，第一章）中，當蘇珊·布里森描述一個相對罕見、但確實有著許多「樹叢中的怪物」敘事特點的性侵害案例時，她引人注目的第一人稱描述。同時也可以比較布里森後續的敘述，在她說出被熟人性侵的經驗時，她面對了另一個不同——而且某方面來說更重大——的挑戰。Susan Brison, “Why I Spoke Out about One Rape but Stayed Silent about Another,” *Time*, 2014/12/01, <http://time.com/3612283/why-i-spoke-out-about-one-rape-but-stayed-silent-about-another/>

註184：參見保羅·布魯（Paul Bloom, 2016）針對同理心作為一種道德萬靈丹所提出的批評，而我贊同他的批評——主要基於上述理由，也就是，同理心可能讓我們選擇站到歷史上的支配者那方，進而對抗較不具有特權的那方。布魯也正確地指出，把同理心光榮化，可能會從女性身上要求和索取得太多。這呼應了我對被宣稱為「後父權」脈絡裡的許多厭女情結內涵所做之診斷，我已於第四章中討論過這部分，並將於結論「付出的她」一章中再次回到類似主題。

註185：你可能會好奇，這些敘事是否是問題所在；我認為它們是一個問題，但我懷疑我們是否有辦法完全放棄它們。我希望我們能夠更適切地認知到，一個人可以同時受到威脅，也對他人造成威脅；可以同時受傷也傷人；可以同時脆弱，但也有敵意。我相信我們需要認真思考，我們該如何好好處理道德角色的二元性和模稜兩可，也許是藉由針對摩尼教的道德敘事提出更為細緻的其他可能；摩尼教的敘事目前被我們作為詮釋惡行的主要文化資源，但它卻是相對粗糙的。至少同樣重要的是，我認為我們需要學習更適當地認知到，有許多彼此重疊的敘事經常彼此衝突，如同安思孔（1957）知名的論點所指出，所有行動都是描述下的行動。我們也可以補充，如果對某個行動有多個適切的描述，那麼該行動可能構成多個真實故事的一部分，它們分別以不同班底的角色作為主角，描述他們在不同的關係裡，和彼此以及與我們作為聽者的關係。這些是我計畫在未來著手的主題。

註186：Katie J. M. Baker, “Here Is the Powerful Letter the Stanford Victim Read Aloud to Her Attacker,” *Buzzfeed*, 2016/06/03,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katiejmbaker/heres-the-powerful-letter-the-stanford-victim-read-to-her-ra>

註187：參見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知名論文《兩種規則概念》（*Two Concepts of Rules*）（1955），其中指出了一名法官和一位立法者在觀點上的區別。冒著把羅爾斯美好而細膩的討論過度簡化的風險：法官必須要考慮到法律的維持並據此提出問題，例如被指控者是否真的犯下了罪行、他們的動機、犯意，以及他們是否應該為此被懲罰、如何懲罰。與此同時，立法者可能，而且可以說僅僅只需要涉入到廣泛的效果論上的考量。例如，談到某些候選的刑法條款時，同時就它們的內涵和違反時的具體懲罰而言，將它們納入法律並當作一名法官或陪審團（以及其他對象）的判決與量刑基礎，會有哪些成本和好處？考量到它們將會在那些被懲罰的人身上加諸的成本，這種威懾手段是否會有效且正當的？

簡短地說，根據以上內容，我主張，一起犯罪的證人觀點應該要被當成類似於法官的非效果論角度來看待，就算我們認為法律的邏輯和目的是威懾而非懲罰。儘管我不認為自己針對這個意旨提出了恰當的論證，就羅爾斯提出的法官與陪審團情境，我認為這是自然的預設立場和歸納。同時，即使是對那些在此可能會採取不同路線的人來說，基本問題仍不變：在這方面，為什麼我們應該以和對待財產犯罪不同或相同的方式對待性犯罪？比方說，當一個人被闖空門時，他報警的權利鮮少受到質疑。

註188：Adam Gopnik, “Donald Trump: Narcissist, Creep, Loser,” *The New Yorker*, 2016/10/09,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donald-trump-narcissist-creep-loser>

註189：“Trump Has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God,” *CNN*, 2016/01/17, <http://www.cnn.com/video/politics/2016/01/17/sotu-tapper-trump-has-great-relationship-with-god.cnn>

註190：利寫道，她構思出「厭黑女情結」一詞以「描述在美國的視覺與流行文化中，針對黑人女性的一種特殊仇視」。貝利：「我在找尋一種精準的語言，好解釋為什麼瑞妮莎·麥可布萊德的臉上會被開了一槍，為什麼《洋蔥報》（*The Onion*）會覺得用那種方式討論葵雯贊妮是沒有問題的，或是黑人女性在實境節目裡的高能見度，夏妮莎·泰勒的被捕、西西被監禁，拉弗恩和露琵塔被排除在《時代》雜誌的名單之外，針對瑪麗莎·亞歷山大的持續法律行動，推特上以傷人的標籤對黑人女性的強力攻擊，以及好像應該很好笑的Instagram圖片，還有黑人女性在音樂中如何被談及。這所有的事情都讓我聯想到厭黑女情結，而不是普遍針對有色女性的一般性厭女情結。」（Bailey, 2004）

譯註：瑞妮莎·麥可布萊德〔Renisha McBride〕，一名時年十九歲的黑人女性，於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日凌晨在底特律市郊區發生車禍，當她前往附近一戶住家敲門求助時，該戶的男主人對著她的頭部開槍。開槍男性表示他以為住家遭到入侵。

葵雯贊妮〔Quvenzhané Wallis〕是美國女演員，二〇一三年時年僅九歲的她獲得奧斯卡提名。美國諷刺報紙《洋蔥報》當時在一則推特發文上用了「賤貨」〔cunt〕一詞形容她，隨後在社群網站上引發爭議。

夏妮莎·泰勒〔Shaneshia Taylor〕，二〇一四年時，這名黑人母親因為在面試工作時，將兩名幼子（當時分別為二歲和六個月大）留在車上而遭檢察官以兒童虐待罪名起訴。在引起廣大討論後，該起訴最後被撤銷。

西西〔CeCe McDonald〕，一名非裔跨性別女性、同志權益倡議工作者。二〇一二年時，西西和友人在一間酒吧外遭到攻擊；西西的證詞指出，攻擊者對他們使用種族歧視和恐跨的言語，他們試圖離開卻未能成功，一名攻擊者將玻璃杯丟擲到西西臉上，西西則持刀刺傷了其中一名男性。西西因此被起訴，最後被判處四十一個月的有期徒刑。

拉弗恩和露琵塔〔Laverne Cox, Lupita Nyong'o〕，兩人皆為美國女演員，前者為跨性別，後者則為非裔黑人。二〇一四年時，時代雜誌舉辦線上投票，並結合編輯意見，選出當年「最具影響力之一百位名人」，而儘管兩人的線上得票率都很高（拉弗恩為第五名），最終卻都沒有入選。

瑪麗莎·亞歷山大〔Marissa Alexander〕，二〇一二年時，居住在佛羅里達州、三十一歲的亞歷山大被當地檢察官以「持械重傷」罪起訴，並因為佛州對該罪的最低刑期規定而被判處二十年有期徒刑。亞歷山大於家中遭到有暴力傾向、曾經虐待她的丈夫威脅，聲稱要殺死她；試圖逃離未果後，亞歷山大取出手槍對空發射，表示警告，但並未造成任何人受傷。

註191：Jeff Arnold, "Who Is Daniel Holtzclaw?," 2016/02/17, 存檔於：<http://archive.is/O3Gub>

註192：這個「小丑樣貌」乃是由於艾希曼陳腐且反覆的用詞、持續而毫無掩飾的謊言、無意義的宣示和後續的變卦，以及整體的毫無羞恥心與自戀心態。艾希曼極度在乎他的職業生涯以及與某個團體的緊密關係（根據鄂蘭的觀察，他明顯是一個「加入者」）。而因為他在那之前的職涯毫無光彩可言，一旦艾希曼加入了納粹黨，他就決心要在黨內獲得陞遷。但艾希曼卻對別人勢必是如何看待他毫無概念，例如面對他典型的自吹自擂時，以及舉例來說，當他對猶太員警描述他在納粹黨裡未能攀升到他所想要之位階的倒楣故事，並自憐自哀時。那不是他的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等待戰爭罪審判的時候，對逐漸表現出懷疑的員警這麼說。

我把找出當代社會裡可比擬的對象這項作業留給讀者。

註193：Joseph Diaz, Eric M. Strauss, Susan Welsh, Lauren Effron, and Alexa Valiente, "Ex-Oklahoma City Cop Spending 263 Years in Prison for Rape and His Accusers Share Their Stories," ABC News, 2016/04/21, <https://abcnews.go.com/US/oklahoma-city-cop-spending-263-years-prison-rape/story?id=38517467>

註194：這些抗議最初乃是針對白人員警戴倫·威爾森（Darren Wilson）射殺了黑人青少年麥克·布朗（Michael Brown）一事的反彈。根據數位證人的說法，威爾森在布朗舉起雙手投降

後仍持續對他開槍，但威爾森並未因此被起訴。我會在下一章談到受害者敘事時討論這個案例。若想要了解「黑命亦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歷史，可參考克里斯多夫．勒布朗（Christopher Lebron, 2017）的著作。

註195：編註：亦即文章一開始便是基於受害者說謊的預設上。

註196：Jeff Arnold @JeffArnold_17 Dec 2016

傑夫．阿諾德轉發提姆．羅漢的推特發文：「這裡是一篇來自@TimRohan的必讀報導。」

<https://twitter.com/JeffArnold/status/810195406894362624>

這則推特發文連結到提姆．羅漢的報導，“The Anatomy of an NFL Domestic Violence Investigation,” <http://mmqb.si.com/mmqb/2016/12/14/ezekiel-elliott-domestic-violence-nfl-investigation-process>.

第七章 懷疑受害者Suspecting Victims

一場審判就像一部劇作，其中雙方的焦點都在行為者身上，而非受害者。為達效果，一場戲劇性審判甚至比一場一般性審判更急迫地需要針對行為者做了什麼及如何做的有一個有所限制且被清楚定義的大綱。審判的中心只能是犯了事的人——由此來說，他就像劇作裡的英雄，而如果他受苦了，他必然是因為他所做的事而受苦，而不是因為他對他人造成的苦痛。

漢娜·鄂蘭

《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關於所謂的受害者文化 On so-called victim culture

我們和受害者與受害身分（victimhood）之間的關係緊張，這並非新聞。在艾莉森·柯爾的著作《對真實受害者的崇拜》（*The Cult of True Victimhood*）（2006）中，她追溯了自從一九八〇年代後期到九一一事件後的數年間，反受害者情緒在美國國內的崛起。這段期間，受害者的身影——或者說，一個自我認定與自我指定、餵養，或可能偽造自身傷害，並展現出習得或捏造無助感的受害者——在保守意識形態中扮演了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一個忿忿不平、情感脆弱、戲劇化的角色被描繪出來了，它們發表不公平的毀謗，要求第三方的同情和注意力；主角往往不成比例地是學生、千禧世代、女性、女性主義者、進步分子、性侵受害者——或者在艾瑪·蘇克維茲（Emma Sulkowicz）的例子裡，是上述所有身分的集合，我稍後將加以說明。而或許無須多說的是，這樣的描繪並非讚美。

儘管這絕非新現象，但是對受害者所展現出來的敵意似乎在過去幾年間逐漸增長^{註197}。在「微歧視與道德文化」（Micro-Aggression and Moral Culture）一文中，社會學者布萊德利·坎貝爾與傑森·曼寧（Bradley Campbell & Jason Manning, 2014）將一種新興的「受害者文化」（culture of victimhood）與老式的「自尊文化」（culture of dignity）以及甚至更古老的「榮譽文化」（culture of honor）做出對比，並指出在當代西方社會裡，它們彼此互相取代。他們以所謂受害者文化的展示方式來舉例，其中大多數都帶有一種殉難的意味，例如古羅馬時期積累個人髒亂的行為，以及印度的靜坐抗議（sitting dharna）。這些行為被類推為指出或公開宣傳「微歧視」（micro-aggression）的舉動——也就是相對微小的輕蔑與敵意，它們經常是無意中造成的，但卻能夠以侵蝕性的方式積累，並進而對一直以來身處臣屬或邊緣地位的社會群體造成損害^{註198}。

坎貝爾和曼寧（2014）主張投身於一種純粹描述性的社會學操作，一個可信度多多少少受到限制的主張，考量到他們在詞語選擇上明顯的道德意味，以及他們看似帶著懷疑口吻的提問習慣：「但是，為什麼要強調一個人的受害經驗呢？」^{註199}。整體來說，保守人士一向急於援引他們所認定的、符合中立性規範的研究，以支持其道德與政治結論。對於受害者敘事的質疑，除了保守勢力以外，有時也來自

女性主義者和進步人士（例如可參考溫蒂·布朗〔Wendy Brown〕出版於一九九五年的《傷害的狀態》〔*States of Injury*〕一書），而儘管以一種較溫和但類似的方式質問受害者敘事的作法已有頗為漫長的歷史，但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近來卻在他部落格的文章中專門討論上述兩人的研究發現，並兩次讚揚這篇論文「超乎尋常」^{註200}。海德特將受害者文化的想法大幅延伸，用來解釋觸發警告（trigger warning）^{註201}、安全空間（safe space），以及將微歧視的理論架構運用於大學校園內的作法如何崛起（以及從他的角度來看，帶來了什麼災禍）。很顯然的，對所謂「自封受害者」的反感正大當其道^{註202}。

然而，坎貝爾與曼寧的提問應該也要激發進步人士的興趣。是什麼動機促使了歷史上身處臣屬與邊緣地位的人們挺身而出，尤其女性，並驅動人們關注她們如何被傷害？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明顯。有鑑於她們極有可能不被相信、被打發無視，並反過來受到指控（及其他可能的狀況），人們其實有非常強而有力的理由選擇不從一個臣屬的社會位置中挺身而出。但是，倘若從這樣的一個位置中挺身而出很有可能會白費力氣或受到反挫，於是無論在個人取得自身需要或爭取應得的物質資源和社會正義時，這都變成一條高度不確定的路徑，或在最好情況下，變成一個令人驚恐的、取得同情和注意力的方式，那麼，坦白說，為什麼還要自找麻煩呢？然而，越來越多女性（及其他群體）正在挺身而出，指認出厭女敵意的存在。為什麼？如何解釋此事？這僅僅只是希望戰勝了經驗嗎？或者這些行動還有其他目的，無論它們是否有效？它們確實有其他目的，我會指出來——而且我認為，在某些脈絡裡，它們可能是有效的，因為挺身而出可以是一種主體性的表現，與顛覆的行動；因為，它們使道德敘事脫離原本占優勢的、被默認的版本，並使得個人的遭遇在那些原本繼續漠視的人面前變得醒目。第三方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寄予同情，事實上，他們的敵視與怨懟可能會更強，而非減弱，但至少他們會知曉傷害的現實，或持續中的支配事實。而這件事對於曾經受害的人而言，可能是相當重要的。

受害者為何？道德敘事的角色 What is a victim? The role of moral narratives

身為受害者是什麼意思？主張受害身分又代表了什麼？我們將看到，這兩個問題並沒有如此直接明瞭，而根據受害者一詞在其意涵方面實際上具有什麼樣的索引性或觀點性特徵，它們彼此之間也並非明確相關。因此，主張某個人是受害者——該主張通常簡短，或甚至某種程度上是隱晦的方式——遠不止於主張A是一個受害者，而某個人剛好是A；在此之外，該主張還涉及了某種對於該角色的表演或假設。

但首先，身為一名受害者，通常並不只是遭遇某些不幸；我相信其核心是一個道德概念。身為受害者的典型案例涉及了在道德層面上遭到另一個主體的錯待，並因此被傷害、羞辱，或以其他方式受到創傷。通常，個人會被放置到一個相對於過去而言較低落的道德兼社會位置，同時，相對於那名透過某種道德錯誤行為而使得自己成為受害者的主體來說，個人會受到貶低^{註203}。

我認為這是受害身分的核心情境。然而，沒有加害者、霸凌者、壓迫者的受害者是否存在？這個主張可能難以成立。我們可以、也確實會簡明清晰地談論天然災害以及某些時候疾病與病痛（雖然在我聽來，稍微不那麼天然）的受害者，但我的預感是，這類情境乃寄生於上述的核心情境之上，而它們之所以簡明易懂，是因為我們傾向於人格化這類具破壞力的天然肇因，或至少將它們想像為主體。（回想一下對颶風命名或稱呼癌症為「賤人」的行為，便可以提供一些範例。）若事情確實如此，那麼，我們對受害者的概念主要取決於某種特定的道德敘事是否存在於背景之中，而在此敘事中，一個主體被另一個主體以一種羞辱性或貶抑性的方式錯誤對待。她是受害者，而他是霸凌者或壓迫者。

我認為，受害身分的核心情境堅守著這個文本，因此，若要依照此份典型範本去作為一名受害者，便涉及了自身或他人被丟進這個敘事的某個版本中。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作為觀眾成員的反應也被寫入了文本裡頭。受害者是那個我們理應同情的人，他們是注意力的焦點，他們是主角，也許是英雄／英雄；而霸凌或壓迫者則理應是那個我們為了受害者而怨懟的人，或者更詳細地說，他們是被斯特勞森稱為「替代式」反應型態度的指定焦點，這種態度乃因為他者，而對他

者產生。在此脈絡中，這些態度包括憤慨、不贊同、懲罰傾向等等（[1962] 2008）^{註204}。

假如，至少概略來說，事情確實如此，那麼，這就開始解釋了為什麼個人將自身描述為受害者——或者，再一次的，當個人被認定這麼做時——是如此令人憂慮的作為，因為主張受害身分基本上牽涉到將個人放置於故事的中心。該舉動甚至比一般的自我投射更令人憂慮，它有可能立刻被視為裝腔作勢和自以為重要，並且與此同時，是病態或脆弱的。人們覺得這個人憑藉著想像力去專注（與沉溺）於她自己的故事裡，而不是迅速地向前進；但是為了要前進，她不可能真的像（如上述所說）那般地淒苦、破碎。這樣一來，就強化了偽善、虛偽、算計和自我中心的猜忌與指控^{註205}。

我提出了對受害身分的思考方式，亦即那在本質上和受害者／加害者道德敘事相關，這也可以幫助我們解釋幾個運用這些概念去思考和討論事情的方式。自然，我們談到了扮演受害者，也談到把自己和他人放置到這個角色上；更重要的是，我們傾向於將受害者想像為天真無辜、沒有過失，以及（更糟的是）非如此做不可。這經常伴隨著以下結果：當某些人犯下了，或甚至只是被人懷疑犯下了某些微小的不誠實錯誤時，人們便不情願或無法將其認可為受害者；同樣的，當我們認定某些人是某個大型犯罪的真正受害者時，我們往往傾向於否認他們所犯下的微小欺瞞。當個人所使用的劇本是一齣基本上簡單直白的道德童話，不容許太多變異或細微差異時，這是合理的；如果你是強盜，你不可能扮演一個警察的受害者^{註206}。

針對這個主題，麥可·布朗（Michael Brown）的案例是具有啟發性的。二〇一四年八月，麥可·布朗在密蘇里州佛格森市死於一名警察手下。佛格森警察局長公開了監視器影像，顯示在案發的幾分鐘前，布朗很明顯地正在一間便利商店內偷竊一盒小雪茄，影片中也可以看到布朗在離開商店前推了店員（彷彿在說「少管閒事」）。幾分鐘後，涉案的警察戴倫·威爾森（Darren Wilson）以槍射擊了布朗至少六次，其中兩槍在頭蓋骨上。數位證人表示，布朗並未攜帶武器，並且在威爾森「不斷開槍」的同時舉起了雙手作投降狀；同時，根據勘驗報告，布朗是面對著威爾森倒地的——這便得以解釋，那兩槍為何以朝下的角度進入布朗的頭骨（Manne, 2014b）。案發六天後，在初期的媒體喧鬧中，佛格森警察局長公開了便利商店的監視器影像，這

個策略——看來可能是刻意為之——在許多媒體平台上發揮了期待的功用^{註207}。

為什麼有用？用途又是什麼？理性的反應顯然應該是這樣：布朗遭控的輕微犯罪，和他是否身為國家機器下的受害者、遭遇了一種不比謀殺輕微的嚴重公民權侵害，這兩者毫無關聯。部分原因在於，某類種族主義傾向於一味地把犯罪與暴力歸咎於黑人男性，導致發生在威爾森和布朗間的種種最終遭到扭曲，並錯誤地呈現了。布朗未能被描繪成一個典型的青少年，儘管事實上他很明顯就是，而且這份假設也是於此情況下最低程度的寬厚；相反的，他最後被重新詮釋為一名「暴徒」（thug）——這是在當代美國社會裡帶有固定種族主義意味的一個概念。相比之下，威爾森則變得貌似無助^{註208}。但這個意識形態手段似乎也造成了一個知覺上或至少半知覺上的阻礙；一旦布朗因為他在便利商店內的影像而被描述成任何一類的罪犯或暴力者（不論多麼微不足道），許多白人就無法或不願將他看作警察暴力或不當執法的受害者。這兩條敘事——布朗犯下了小錯，以及布朗作為重大公民權受侵害、甚至也許是謀殺的受害者——似乎在彼此競爭，儘管這兩種可能性明明可以共存。

因此，對受害身分這個概念的敘事說明有助於我們解釋，為什麼責怪受害者（victim-blaming）的作為被認定是有道德問題的，而且光憑直覺上來看就是如此。一旦焦點從對加諸於某人的行為，轉移到她（或許為真）的輕率魯莽，或甚至她有道德問題的行為如何在因果上促成了對她的惡行，她在敘事裡作為受害者的角色就可能受到影響，於是人們便可能完全難以將她看成受害者（也可參考第六章，特別是「同理他心」的段落）。

對受害身分概念的敘事說明也有助於解釋，黛安娜·提嚴·邁爾斯（Diana Tietjens Meyers）根據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章程而指認出的兩類受害者為何存在：一方為「可憐的」受害者，另一方則為「英勇的」受害者（2011）。兩類受害者都是具有可辨識性的角色：受困而需要救援的不幸少女，對照了大膽的當代卡通英雌。邁爾斯指出，她們都被認定為天真無辜，但理由卻非常不同——可憐受害者是因為，她的被動與徹底無助排除了她被懷疑有道德錯誤的可能性；而英勇受害者則是因為，她的主體性必須被用來為有道德價值的目標服務，好讓她得以符合資格。於是，基本假設是

她正在為公義奮鬥；換句話說，她因為她的敘事身分的功用，而不會受到責備^{註209}。

看輕（扮演）受害者 (Down) Playing the victim

為什麼過去或當下被放置於邊緣或臣屬地位的人們，會想要用那樣的方式讓別人注意到他們所遭受的道德傷害，就算他們可能因此被認定在「扮演受害者」？如今，我們終於可以開始探討這個問題。說到底，我對這問題格外感興趣，是因為它關係到遭受厭女攻擊傷害的女性們，而傷害則來自於特權位置不下於她們的男性們。

一個有所助益的作法是，讓我們先思考一下，想想個人從一種過去或當下的臣屬社會地位挺身而出時，會有哪些令人氣餒或甚至可能的反對意見^{註210}。這會讓我試著解決的謎團變得更為明確。

坎貝爾和曼寧指出，強調個人自身的受害經驗——或完全造假，如同兩人在其論文四個不同段落內提及的仇恨犯罪騙局——經常是一種取得「第三方注意力、同情心和干預」的花招。他們在論文副標裡宣告，受害者們將自身的「受害經驗當作美德」，更有甚者，「人們越來越常要求來自他人的幫助，並將其所遭受的壓迫當成他們值得尊重和協助的證據來宣傳。因此，我們不妨把這種道德文化稱呼為受害者文化，因為受害者的道德地位已經從榮譽文化的最低點上升到新的高度了，」他們這麼解釋。相反的，「藉由公開抱怨來宣傳或甚至誇大個人的受害經驗以及對同情的需求，對一個有榮譽感的人來說，會是種詛咒——這相當於在展示一個人完全沒有了榮譽。」（2014，頁714）

回顧截至目前為止我在本書中——尤其是在第四和第六章——所提出的論證，有另一種可能存在：這可能是一個嘗試，企圖平衡道德受害者們所身處的競賽場；亦即當女性特別挺身而出「發聲」，這會破壞道德鎂光燈屬於誰的默認假設。如果女性被認定要把她們的同情注意力和道德焦點給予身處支配地位之男性，而非為自己索求，那麼，女性聲稱自己曾經受害的主張就會格外地顯著，並吸引到嫉妒與羨慕。這些女性幾乎會被當成吃醋的年長手足眼中搶奪父母注意力的嬰孩（回想一下「新巨嬰症」這個概念），但在這裡的情況中，新生的嬰孩與父母是同一個人，故而怨懟、甚至暴怒亦有可能出現，因為作為代理家長的人正藉由翻轉關係而背叛了她們的角色。

這些感受都源於一種不正當的理所當然感，而那是父權規範與價值的遺產。但因為它們根深柢固，甚至同時被男性和女性深深地內化了，導致它們經常沒有被注意到。藉由榮譽文化一詞的運用，坎貝爾

和曼寧可能只是描寫了一個文化情境——根據當代的想像而生，至少充滿了懷舊情懷，指向一個可能從未真正發生的過去——而在其中聲稱受到傷害是被自然期待的事，於是往往不需要被刻意指出來，因為在父權秩序下，一名身處支配地位之男性經常會被他的妻子、母親、情人或其他這類女性安撫與修補，卻無需開口索求這類溫柔的服侍。他會自動從她身上獲得它們。

反之，若你在某種程度上明確地主張受害身分，可能的結果是（a）就針對道德傷害的同情與補償而言，你不會被自動給予你所需要的東西；及（b）你透過某些方式主張自己有權利獲得同樣的東西，且對於在歷史上被認定較無權利的人來說，這些方式是較為突出的，但反過來你卻被要求要確保其他人的權利能夠獲得滿足^{註211}。

接著，當我們覺得一名女性正在「扮演受害者」、「打性別牌」，或表現得過於戲劇化時，我們有理由批判與懷疑我們的直覺（Schraub, 2016）。她的行為可能引人注意，但並不是因為她索求太多，而是因為我們並不習慣於女性在這些脈絡裡主張她們的應得權益。相反的，女性被期待要為支配性男性的受害者敘事提供觀眾，提供道德關懷、傾聽、同情和安撫。

換句話說，一個典型會被認定是女性應該給予支配性男性的好處，就是她們的道德焦點和情緒能量；反過來看，身處支配地位之男性經常覺得自己極度理所當然地該獲得這些東西，並且也許迫切地渴求著它們。

我們也理當思考，和大量監禁相比，黑人女性在美國社會內的不良待遇所吸引到的注意力和道德關懷少了多少；前者經常被白人自由主義者含蓄地描繪成一個或多或少專屬於黑人男性的問題。當然，之所以這麼說，並非是為了小看這種針對黑人男性的不正義的嚴重性與強度，而是要指出，首先，黑人女性也遭受類似形式的結構不正義，例如被驅逐，但這有時在（再一次，白人自由主義者的）公共論述裡遭受了相當的忽視，如同社會學家馬修·戴斯蒙（2016）所指出的。此外，和黑人男性相比，黑人女性也遭遇到類似的警察暴力，並且擁有比白人女性更高的入監率（Crenshaw, 2012），而自由派白人（表面）支持者在討論「黑命亦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時，經常無視該運動乃是由三位黑人女性所發起，這件事更為我這一類人（包括我在內）在此要面對的羞恥諷刺添上了一筆^{註212}。

更有甚者，坎貝爾和曼寧似乎沒有留意到的是，強調（或單純地指出）一個人的受害經驗，充其量往往只是用來獲取第三方同情心的不確定手段。事實上，他們的文章正好證明了，那些將他人注意力吸引到自身所遭受的道德傷害的人們，可能會遭遇到什麼樣的敵意和怨懟。對於身處臣屬地位的團體成員們來說更是如此——尤其是女性，但絕不僅只於女性。

回想迪阿奎·尼爾（D'Arcee Neal）的經驗；他是一名患有腦性麻痺的黑人男性，在一趟從舊金山飛往其所居城市華盛頓特區的五小時航程後，下飛機時，他沒能獲得他所需要的輪椅協助。他反覆地尋求空服員的幫助，卻只被告知他應該保持耐心，以及他們「只是在做分內工作」；在等候了整趟航程後，尼爾得使用廁所——飛機上的廁所無法光靠輪椅到達——然後又為了比較狹窄的、機上用的輪椅而等候了額外的四十五分鐘（機上走道無法容納標準輪椅）。最後，尼爾不願意再等待了，他用手肘支撐著爬下飛機，此舉震驚了周遭聚集的空服員；他取回了在飛機旁等待他的、他自己的輪椅，使用了機場的廁所，然後返家，沒有告訴任何人發生了什麼事。然而這起事件被一位對尼爾受到的待遇感到不安的空服員通報了，這是這樁新聞開始登上頭條的原因。

幾乎從每一個方面來看，尼爾都是個完美的受害者——他沒有抱怨，因為他「不想小題大作」；他說這起事件「令人惱怒」、「令人感到挫折」，也令他「憤怒」，但也說他「習慣了」，畢竟他曾在過去三四個不同場合中都經歷過這樣的事情。接著，航空公司在一封提供給CNN電視台的新聞稿中公開承認了這起事件，尼爾和藹地接受了他們的道歉。

坎貝爾和曼寧的說法理當會預期，像尼爾這樣清楚明確的案例——而且牽涉到的是像美國聯合航空這樣一個毫無同情心的壞傢伙，我們可以進一步補充——可以獲得幾乎全面的同情心，而這些同情心的源頭正好被他們認定是個人在網路上發牢騷的動機。但事情並非如此；事實上，遠非如此。儘管許多人確實表達了同情，卻也有許多負面的、責怪受害者的回應，這促使一名記者撰寫報導仔細描述了尼爾經由電子郵件和線上評論受到的二次羞辱（這篇是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當日《華盛頓郵報》上閱讀量最高的文章）。尼爾被指控假造他的身體障礙（假如他不能走路，他怎麼有辦法爬行？），以及試圖為黑命亦命運動（尼爾支持該運動，但並未親身參與）吸引注意力；他也被

指控為自戀者，不正當地自以為理應獲得協助。從不同新聞網站的評論區中所揀選的發言包括了：

你想要多少錢？多好笑，你正好就在飛機降落然後每個人都試著下飛機時得要去廁所。

他得等多久？五分鐘？十分鐘？半小時？我們都得等，這是我們的平等之處。然後他剛好是從一個在談無障礙交通工具的座談回來，這可真諷刺。我打賭他有著「我優先」的心態！我比你更有價值！你難道看不出來我很特別嗎！

為什麼航空公司得負責協助他上下飛機或前往廁所？他上飛機之前就知道自己行動不便了，為什麼他沒有讓護理人員或家人隨行，好在這類事情上幫他一把？在現今的世界裡，我們必須事先並根據自身需求作計畫，我們不應該期待他人為我們的需求服務。

謝天謝地飛機沒有墜毀！我打賭他會期待空服員揹他下飛機。自給自足的概念去哪了？接下來，遺失假牙的老人是不是會期待空服員嚼碎他們的食物，或是盲人會期待有人讀書給他們聽？假如你知道你將要搭飛機旅行，就像我們知道某些特定大小的行李箱可以帶上飛機，假如你知道走道會很狹窄，那麼可能是時候買一個旅行用大小、可以在狹窄走道上移動的輪椅了。這是獨立的代價，各負其責！^{註213}

除了極端的、事實上也滑稽的惡意以外，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評論展現出一種對先來後到和誰得為誰負責的強調之意。有種普遍的觀念是，人們必須為了某些事物「守序」或排隊，而且無論在美國或澳洲，都存有一種明確的恐懼，圍繞著某個人正在不公平地插著隊的想像——尤其是針對移民，這個針對尋求政治庇護者或所謂插隊者的偏見，具有一段相當漫長的，非理性道德焦慮的歷史^{註214}。

但是，隊伍的目的是什麼呢？我最主要的猜測是：女性的情緒和社會勞動，這些事物如今正逐漸短缺中。這將得以解釋針對這項道德資源的嫉妒囤積、對女性的怨懟情緒，當她們保留了被認定應該要由她們給予身處支配地位之男性的事物，或甚至——更糟糕的情況是——為了自身而索求。這也解釋了對和尼爾同類之人的憤怒感受——這些人是完美受害者，並同時處於多個邊緣性的社會地位之上；在尼爾的狀況裡，他是黑人、身障與男同志。於是，這個「守序」的觀念吸引了很多人，儘管這顯然是非常執迷不悟的。但一名完美的左派女性受害者——或者說，受害者之中因為特別弱勢而享有道德優先順位的人——

將會是某些右派男性最糟糕的惡夢；後者可能會懷念父權體制贈與他們的預設優先權，那讓他們得以主張自己被當成受害者照料。於是他們兇猛地捍衛著這個主張，即使並未言明，但一定程度上是藉由拒絕給予他人受害者的地位——然後在某些情況裡，又同時扮演著受害者。

報導尼爾所受到的雙重羞辱時，記者急著告訴讀者們，在我們過於嚴厲地批判尼爾之前，「有兩件事情我們應該要知道」：他的生活不易，而他不想被憐憫。如果他確實有著這種渴望的話，他勢必會因為許多人的反應而大大失望^{註215}。尼爾對那些針對他的指控表達了不可置信與受傷的感受，「你怎麼有辦法把這個故事變成負面的？」他納悶，「我沒有做錯任何事，尤其聯合航空公開承認了一切都是他們的問題。他們已經發表了道歉和聲明，做了一切可以做的事。」（Miller, 2015）

我希望在此我已經稍微回答了一點尼爾的好問題。

故而，作為一個臣屬群體的成員，在公共領域裡使他人注意到自己所受的道德傷害，似乎並不是一個特別適合用來吸引注意力的方法，即使是在最直接明瞭的情境裡，例如尼爾的情況，似乎都仍可能激起許多人的敵意——而在受害者並不完美的情境裡，情況便可能更是如此了。

那麼，其他使個人公開自身不平的原因是什麼呢？再一次的，那些明顯的答案顯然不足以解釋女性越來越強烈的、挺身而出的意願。若臣屬群體的成員做出這類主張，希望能夠爭取正義和認可，他們將可能面對多少的結構性障礙，這是很驚人的；比方說，若女性試圖控告（字面上或象徵性地）身處支配地位之男性，說他們以應該受到道德譴責且明顯厭女的方式傷害了她們，她們就很有可能會遭遇到：

- 一開始不被相信，並且被懷疑在騙人或「瘋了」、歇斯底里等等（如在證詞不正義的情況中；例如《控制》的女主角艾咪所示範的，女性被認為懷有殘酷的報復心）；
- 因為所發生的事情而受到責怪（如同責怪受害者的整體概念；詢問她當時穿什麼；在家庭暴力和性侵害的案件中皆有的，挑釁的概念）；
- 犯罪未能被妥善調查（例如許多涉及知名運動員的案例，以及某些員警未能認真看待家庭暴力和／或性侵害案件）；

- 犯罪的證據遭到摧毀（例如強暴蒐證工具被破壞，以及其他我們所知道的，警方系統性的忽視和／或掩護）；
- 她們的指控被輕視或不屑一顧（例如說服女性不要對她們的伴侶和前伴侶提起家庭暴力訴訟；對男性大學生判處就其指控而言較為輕微的刑期，且通常是在受害者未同意或事前不知情的情況下）；
- 犯罪被認為是隨機且無法解釋的，而不是被認同為廣泛的厭女暴力形式中的一部分，或是藉由在其因果論述中置入可能是個人的或怪異的因素，例如心理疾病，使得指控完全被撤銷（回想在許多近期由白人男性所犯下的大型槍擊案中，正式與非正式的「精神障礙抗辯」）；
- 面對反向的指控，包括自私、好鬥、虛偽，以及操縱人心（它們經常會被當成特定原因來擔心強暴指控可能不實，儘管很少有什麼證據顯示這裡確實——而非假設——有此特定問題，也可以回想「社會正義戰士」的概念）；
- 被輕視（例如被看成「幼兒」、太敏感、無法用成熟大人的方式來處理自身的問題）；以及
- 被受指控者的粉絲和辯護者騷擾、威脅，以及可能被（再次）傷害（例如在「強暴屏障」〔rape shield〕法規問世前對女性的交叉詰問）。

有鑑於這類例子俯拾即是，以及在性別反轉的情況下很少有可供類比的情況，這類預測——也就是說，試圖將身處支配地位之男性繩之以法的女性將有較高的風險遭遇到如此這般的阻礙——初步看起來是相當可信的。我也在第六章中針對以下命題提出了進一步的證據：支配女性的男性不僅僅享有特權，更與失去自身特權社會位置的可能性高度絕緣，至少在許多例子中是如此。

因此，如我們可見到的，倘若女性挺身而出，並在面對那些享受對她們進行社會支配的男性時，試圖針對其厭女行為提出控訴，她們會遇到許多潛在的絆腳石。同時，如上述證據所示，有些理由明確地反對她們這麼做。在那些缺少司法或公民補償手段的情況裡，例如微歧視，情況又是如何？我們更難以理解為什麼會有人願意自找麻煩。

因此，如果我們認為目標是將加害人繩之以法，並在吸引同情心和注意力之外，也獲取物質資源和好處，坎貝爾和曼寧的疑問便仍未

得到回答；倘若我們假設這些是鼓勵她們的動機，那麼，女性的挺身而出似乎並不理性，甚至難以被理解。

但它們可能並非如此。瑞吉娜·蕾妮（Regina Rini）曾指出，使他人注意到自身作為臣屬團體成員的被錯待之處，有時候，可能是使處於類似位置的其他人團結一致的最好方法，或者，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方法^{註216}。個人可能因此得以使自身傷痕受到正視，或至少因為它們被其他同樣弱勢的人認可了，而獲得安慰^{註217}。當然，假如社會約束體制——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致力於維持父權價值和利益，那麼，這份力量本身就並不一定總是可以被廣泛發現，但有時候，這類的「群眾參與力量」（也確實是這麼一回事）似乎的確有效，而在社群媒體的時代裡，這也逐漸變得可能。

無可否認的是，隨著群眾參與力量增加，與這股力量抗衡的暴力，以及針對運用這股力量之人的藐視與懷疑，也可能會跟著增加，但是，社會支持本身以及增進對其模式的認可，也有著重要的價值。對於女性來說，被預先警告厭女情結如何運作，等於為了防禦煤氣燈操縱及其他狀況（回顧前言）而提前做準備。

因此，我完全同意蕾妮的解釋，公開討論微歧視的價值在於，比方說，為了培養團結意識。但我認為，這塊拼圖裡可能還有在本質上相當不同的一小片必須被補上，而接下來的討論也會揭穿一個不實指控——它不只來自於右派、也來自於左派人士——亦即聲稱受害身分是關於被動接受了現在和未來，而不是關於以一種仰賴與顯示主體性及其勇氣的方式，承認過去與當下所發生的奪權與羞辱^{註218}。藉由接下來的個案研究，我將討論這個論點。這個討論也將展示出相關的傾向與動機在美國以外的脈絡同樣很明顯，並遠遠早於網路、社群媒體等等。最後，這個個案說明了在反擊力量已經出現後，於某些脈絡中半刻意地扮演受害者，和重視自給自足與獨立，兩者並不相悖。相反的，前者可能展示了後者。

獨立的人：一個個案研究 Independent People: A case study

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哈多爾·拉克斯內斯（Halldór Laxness）的小說《獨立的人》（*Independent People*）（[1934] 1997）中，主角是不久前剛被解放的佃農畢亞圖，他正試著以獨立之人的身分在冰島一小塊荒涼的土地上牧羊維生（畢亞圖將這片產業的舊名「冬季小屋」改成一個較為樂觀的版本：「夏日小屋」）。小說初始有一幕令人難忘的場景，當畢亞圖出外趕羊時，畢亞圖的新婚妻子蘿莎，懷著另一個男人的孩子，被獨自留在家中與一隻母羊為伴。飽嚙飢餓又因孤獨而幾乎發瘋的蘿莎說服自己母羊被惡魔附身了，她隨意地割開了牠的喉嚨，然後將其製成肥美的香腸，放在火上烤，最後無意識地狼吞虎嚥吃下。

當畢亞圖返家時，蘿莎一如預期般地對母羊的去處含糊其詞，畢亞圖因此出發前往山裡尋找失蹤的牲口。與此同時，蘿莎開始分娩，隨後於生產過程中死亡，畢亞圖返家後發現了新婚妻子僵硬的屍體，而他的狗提提拉正用長滿蟲子的身體蜷繞著他剛出生的女兒，盡其所能用腹部的溫暖照料她。畢亞圖必須試著獨自一人讓嬰孩活下去，他為把這樁任務視為「有著最高的重要性」，並感到高尚（他想把孩子如親生般扶養，儘管她的生父另有其人，在此刻，他已對此事認命），但由於他對維持自身獨立這件事情賦予了至高價值，他也發現，自己遇到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他是否必須索求他人的幫助？」他自問。「他命妻子牢記的最後一件事就是不要向其他人索求幫助——一個求助於他人的獨立男人便是讓自己臣服於惡魔的力量，而如今這同樣的羞辱要發生在他——夏日小屋的畢亞圖——身上了，但他決心要付出任何代價。」（1997，頁100-101）

眼下畢亞圖大膽地——痛苦而不自在地——前往鎮長和其身為詩人的妻子家中討取一些牛奶，好讓嬰兒活下去。到達目的地後，他立刻決心要吹噓自己的解放身分；當他吃著管家給他的粥時，管家問到蘿莎的健康情況，他回答：「龔薩拉絲，我取悅我自己；你知道，我如今是自己的老闆，不需要對任何人說明，尤其是你。」他懷著反抗意味地把珍貴的馬肉丟給狗兒們，儘管他感到飢餓。

鎮長的詩人妻子「抬頭挺胸，踏著優雅的步伐」走進來，畢亞圖對她說，他對開口索求感到很羞恥，但他需要一點幫助——「當然，不

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而是絕對不會造成鎮長煩惱的「瑣事」。走進三人打算談話的起居室後，旁白一如往常呼應了畢亞圖自身的反省：「在服裝和整體外表上，夏日小屋的畢亞圖遠比這個流浪漢般的鎮長優秀。」然而，「即使是第一眼看到時，也沒有人會懷疑，這一定是個統治著其他人、將他們的命運操之在手的男人；他的雙唇因咀嚼菸草而皺起，無意識地象徵了在他從中榨取所有的有價值之物前，他不會吐出任何東西。」（1997，頁104）

畢亞圖一試再試，用盡所有他可用的方法來維護他相對於鎮長與詩人的獨立身分；他拒絕坐下，他高傲地與他們閒聊許多事，他試著表現出寬大雅量，告訴鎮長如果有需要，他可以提供冬天用的乾草。（徒勞無功地，唉：「照顧好你自己，老弟。」鎮長回應，以一種「自滿而憐憫的語氣」，「儘管並非明確帶有侮辱意味，卻絕對是將他人歸類為可憐的廢物。」^{註219}）畢亞圖解釋，他只是為了「一點點資訊」而來；他用哲學語言討論死亡，他用最迂迴的方式——藉由神祕的詩句——傳達蘿莎早逝的訊息，彷彿不只要展示他的智慧，也要展示他有能力 and 女詩人在她所擅長的領域上競爭——甚至擊敗對方。他暗示這對夫妻應該要幫助他，但並不是基於慈善或好意，而是因為這個嬰孩是他們的孫女。（此事確實為真，他們也知道蘿莎懷了自家兒子的小孩——而儘管兩人很喜歡蘿莎，但她的社會地位卻低於他們，因此他們才急著安排她嫁給畢亞圖。）

畢亞圖不認為自己的價值低於這些人，相反的，他對待鎮長和其妻的態度是輕蔑的；他也不羨慕他們的社會位置，他想要獨立，而不是取代他們^{註220}。但他深深地怨懟著他們對他的權力，以及他們操弄權力的方式——前者是專橫的，並帶有優越感；後者則是氣量狹小與控制的^{註221}。

但當畢亞圖走投無路時，他終於叩頭了。女詩人打斷了他，並要求用「直白的英語」（這是不當翻譯後的說法）得知蘿莎是否死於生產。當他證實此事時，她說：

也許我們會試著幫助你，就像在你之前我們已幫助過許多人一樣，不要求回報。但我們確實有一個要求，那就是你或任何其他人都^{不應該帶著關於我或我的家庭的隱晦影射而來。}（1997，頁108）

「一直到畢亞圖徹底並清楚地消除了她的懷疑，說明他此行意圖並非調查夏日小屋裡的嬰兒生父是誰之後，她才完全冷靜下來。」

隨著她逐漸明顯地冷靜了，畢亞圖突然徹底變得恭敬。「您知道，我的口舌較習慣用來談論羊而不是人類，」他抱歉地說，「而我的想法單純只是問問您是否並不認為倒幾滴溫牛奶到它的喉嚨裡、看看它是否無法撐到天明，這樣的行為是值得的。當然，我會支付任何您要求的代價。」

最終，畢亞圖成功地使自己充分屈服，好滿足他的前任女主人。據此，女詩人宣告，即使是在這樣艱難的時刻，為弱者伸出援手、去支援衰弱者、去養育新生的生命，仍是她「最大的喜悅」。她的心總與他同在，不論面對喜悅還是憂傷（1997，頁108）。

然後，她補充，她是真心的。

但是，鎮長與女詩人是否明確地在任何有意義的層面上（或者，再一次的，就畢亞圖個人的價值來說）獲勝了呢？不，這幕的效果是讓他們看來荒謬可笑。最終，畢亞圖表演了——甚至可以說過分強調了——他的臣屬地位，好為讀者揭露他們的跋扈、小心眼和卑劣行為有多深重^{註222}。他們寧可讓孫女的生命之火熄滅，也不願讓畢亞圖維持某種程度的驕傲與獨立，而那是大人物們（我們會這麼說）永遠也不會想到要羨慕的東西。

一般而言，那些決心要占上風的人經常可能會失去他們對觀眾的吸引力。在羞辱他人時，他們將動輒擔任霸凌者的角色；他們可能會開始顯得可悲，我們會開始為弱者打氣。

從這個悲喜劇事件中，我們可以學到什麼？我認為，這說明了，扮演受害者——藉由接受或甚至擁抱自己如此這般的身分——有時候可能可以是一種抗議或抵抗的行動，而非只是被動地臣服於自己的受害身分。在主動地表演一個人作為受害者的角色，或試著吸引他人關注時，事實上個人並不是被動的^{註223}。根據溫蒂·布朗（1995）的看法，以此方式接受受害身分的人被一種尼采式的怨懟所掌控，那是「一種反覆重申無能的支配效果，是行動、權力、自我肯定的替代品，再次刻寫著無能、無力與拒絕……〔這〕源自於反應——替代了理性、規範和行動倫理。」布朗不贊同地這麼寫道。但在畢亞圖身上，這描寫顯然不恰當；他並沒有懷著怨懟接受，而是具有顛覆性地表演著他自身與壓迫者相對的臣屬地位。

我認為，在這種情境下，從規範上而言，如此的表演可能是合理並具有價值的。雖然畢亞圖可能只是在扮演一個角色，某種程度上來

說是刻意為之，但他的表演乃是對他們之間的真實社會關係的戲劇化重現。（我們可以說，他只是遞給了鎮長和其妻一根橄欖枝。）此外，正如同前面所討論到的，這是一個最後的抵抗行動，因為在維護自我一事上，他已經窮盡了其他所有可能的選項，基本上，他的態度建議了一些方式，讓同樣處於絕境和感到無力的主體們可以用來實踐一種具有成效的被動攻擊。假如我們如此解讀這一幕，透過被動的抵抗，這帶著某種公民（社會？）不服從的意味。一個典型的思考方式類似於：算了，我就讓你羞辱我，當作對這些社會規範與權力關係的一種抗議，它們結合起來使得這種抗議得以成為可能。盡情霸凌我吧，揭發你自己，人們都在看著，而人們有著長遠的記憶力。

如果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真的，那麼，它就解釋了為什麼這個來自於臣屬者的舉動可能會使（尤其是）保守人士分心。藉著讓當權者看來荒謬可笑、受威脅與小心眼，它有揭露不正義權力關係的潛力。

在針對希拉蕊·柯林頓於二〇一五年時因班加西（Benghazi）事件而前往特別委員會作證的反應中，我們可以看到這類的憤怒。《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她和柯林頓之間長遠的對峙關係廣為人知，但這並不是此處的重點——寫道：

沒有人如希拉蕊這般扮演著受害者。

她可以如操縱鐵球般操縱這個標籤。

若她的丈夫用總統辦公室內的女友羞辱她，希拉蕊便轉過身利用被激起的同情來開展政治生涯；若她的共和黨對手在辯論賽中以一種專橫的姿態靠她太近，她便轉過身利用被激起的同情贏得了參議員席次；若保守人士以眾議院特別委員會的聽證會為名進行獵巫，她便轉過身利用被激起的同情鑽進高速公路上的高乘載車道，開往總統參選人的位置^{註224}。

多德在此敵意驚人。希拉蕊做了什麼讓她承受這樣的狀況？說到底，她其實什麼都沒做；她僅僅只是在難堪的情況令人驚豔而已。

「希拉蕊·柯林頓最有魅力的時刻，莫過於當一群臉色蒼白、言詞傷人的白人男性霸凌她的時候。」緊接著上述的段落，多德這麼抱怨著。她接著說：「而在週四與共和黨侏儒們的馬拉松會議中，她相當有魅力，他們完全不知道，希拉蕊總是在某些尼安德塔人試著讓她安分守己時，最能展現出她的能力。」雖然多德的語氣並不贊同，然而在此之上，這可能是一個正確的描述。但是再一次的，此處似乎有邏

輯上的跳躍，而這顯示出了問題所在。藉著較為高尚的道德表現或當「房間裡的大人」，希拉蕊·柯林頓揭露了他們的惡意與跋扈，與其稱此為「扮演受害者」，我們其實也可以說這是「揭露霸凌者」。是的，這有可能會改變觀眾的同情心，但問題是：為什麼不應該改變呢？

當然，讓一個人被如此看待可能是過火的。可能太過拖延、太失敗主義、太自討苦吃，或太有心機。這看待也可能並不公平，或是奠基於錯誤的理由。無須否認，這些都是確實存在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有利的操作，並且我認為是一個合理的操作。那些認為不可能如此的人們則需要說出為什麼不可能，以及，對於那些已經窮盡了其他可能方法，試圖將霸凌者和壓迫者繩之以法的人來說，其他選項應該是什麼？

一個不久前發現自己面臨這類困境的人是艾瑪·蘇克維茲，彼時她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蘇克維茲試著對涉嫌攻擊她的人提出性侵害告訴未果，她認為是校園警察和紐約市警方的失敗使得案件未能成功起訴；在那之後，她根據自身經驗設計了一場表演藝術行動「背負其重」（Carry That Weight）：無論去到哪裡，她都在校園內拖著重達五十五磅的標準單人床墊而行。她主動地使勁力氣拖行著這個可見的提醒，說明了被攻擊當下以及事發之後，她是如何被不公正地剝奪了自身的主體性。這顯然很耗費精力——不單是情緒上的，也是肢體上的。

就我的目的來說，蘇克維茲後續的另一項作品也同樣有趣。她錄下一場表演，演出一段一開始為合意、但在後續變得暴力的性互動，並由她本人扮演受害者——字面上來說——扮演襲擊者的演員臉孔則被模糊處理。這支影片名為「Ceci n'est pas un viol」，這不是強暴。這場藝術演出正是透過表演與呈現，把被看作是被動和羞辱的經驗，轉化成一個主體的行動；其創意行動似乎是要說：這些事情確實發生，它們發生在藝術家的身上，因此，出現了這個藝術作品。

在蘇克維茲的創作計畫的網站上（<http://cecinestrapasunviol.com/>），她邀請潛在觀眾們在觀看影片前先思考幾個問題——關於「搜尋」、「渴望」和蘇克維茲本人（「我」）的問題：

- 你覺得你和我多熟？我們見過面嗎？
- 你覺得我是一個完美的受害者，還是這世上最糟糕的受害者？

• 你是否拒絕把我看成一個人或一個受害者？如果是，為什麼？是為了要否認我的主體性並因此進一步傷害我嗎？若是如此，儘管我才是那個一開始冒著險將自己置於脆弱位置上的人，你卻有著對我這麼做的能力，你如何看待這件事？

• 你恨我嗎？若是如此，恨我的感覺如何？

令人滿足，我猜，這會是最主要的答案。而有鑑於所謂的受害者文化，也就是怨懟和責怪某些受害者的情況，這應該讓我們感到憂慮。

因此，最後讓我們回到坎貝爾和曼寧的問題：為什麼要強調一個人的受害經驗？有時候是為了促進團結，如瑞吉娜·蕾妮所說；有時候是為了讓個人成為敘事的中心，可以主動地（重新）塑造敘事，而這個敘事能夠和占有優勢並被默認的版本相互競爭，我這麼認為。作為臣屬團體的成員，個人藉此有了機會——可能是一個很獨特的機會——得以揭示，相對於支配方來說，什麼才是自己對這件事的自然觀點，什麼才是自己這一面的故事；個人有可能得以揭露，誰以霸凌者和侵略者的身分使自己成為受害者，就算我們無法仰賴這麼做可以重新引導同情心的慣常流動方向，那通常——如同熱空氣一般——會往社會階序的上層流動。

這類顛覆性的操作可能會使人們產生敵意與怨懟，尤其是當涉入雙方分別是女性以及在社會上支配她的男性時。截至目前為止，我已經在本書多處指出，作為女性，索取同情心和注意力往往是一種令人焦慮的嘗試，可能會在許多方面造成道德上的錯誤或社會反挫。但是，我想說，這就是道德生活。試圖破壞現存的權力關係充滿了道德危險，而面對那些堅信這麼做從來就不合理的人，我的問題是：為什麼？更進一步來說，假如「扮演受害者」無可避免地會遭受譴責，那麼是為了誰呢？對誰有害？許多時候，面對實踐厭女情結的男性們，受制於厭女情結的女性理應要將注意力引到她們所受的道德傷害上。不令人意外地，這種揭露並不受歡迎，而這麼做的嘗試則帶有威脅性。

註197：可以「受害身分」（victimhood）為關鍵字搜尋，並參考Google的趨勢圖表。
<http://www.google.com/trends/explore?q=victimhood>（於二〇一五年十月進行最後一次搜尋）

註198：坎貝爾與曼寧（2014）一開始列出了各種社會控制的手段，包括種族屠殺、私刑、恐怖主義、人際暴力，以及公開宣傳微歧視。「公開宣傳微歧視是一種類似的社會控制手段——對他人異常行為的一種反應，也是某種形式的異常行為——這是一個被許多人譴責的行為。」

（頁693第一段）因為其他同夥們如此罪惡，這份名單上的最後一項似乎引人質疑。我們也可以回想他們針對「暴力自殺」（aggressive suicide）的看法，這被描述為是妻子們的一個「社會控制手段」，在其他家庭成員沒有符合她們的標準而認真看待其丈夫的「單純」毆打時被採用。

註199：可參考：Conor Friedersdorf, “Is ‘Victimhood Culture’ a Fair Description?,” The Atlantic, 2015/09/15,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5/09/the-problems-with-the-term-victimhood-culture/406057/>

註200：Jonathan Haidt, “Where Microaggressions Really Come From: A Sociological Account,” Righteous Mind, 2015/09/07, <https://righteousmind.com/where-microaggressions-really-come-from/>

註201：譯註：在展示可能會引起他人不適的素材內容前所提供的警語。

註202：也可參考喬治．威爾，其煽動性的言論使他失去了《華盛頓郵報》上的專欄。威爾寫到：

大專院校受到來自華盛頓的教育，並覺得這個經驗難以忍受。他們正了解到，當他們說校園受害無所不在（儘管在無知的人眼裡難以被察覺，「微歧視」四處可見），以及當他們讓受害身分變成一個賦予個人特權而令人夢寐以求的身分時，受害者便激增。

George Will, “Colleges Become the Victims of Progressivism,” Washington Post, 2014/06/0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eorge-will-college-become-the-victims-of-progressivism/2014/06/06/e90e73b4-eb50-11e3-9f5c-9075d5508f0a_story.html?utm_term=.76718e0d369f

欲了解針對大學校園內性侵案案件以「受害者為中心」的處理方式有何疑慮，可以參考由珍妮．蘇克．格森（Jeannie Suk Gersen, 2014）和珍妮特．霍利（Janet Halley, 2015）所提出的論點，它們至少表面上看來較為謹慎周密（這兩位都是哈佛法學院教授）。

註203：有一個問題是，受害經驗（victimization）是否是一個「成功」詞語？也就是說，B試圖傷害A的行為是否需要被完成或有所成果，才能讓A被看成是B的受害者（或單單是一個受害者）。我認為我們可能應該把可能性放寬，儘管標準範例確實可能指涉了完整的行動。

註204：參見保羅．布魯（2016），他討論到當同理心成為憤怒的反面情況，也就是，面對那些和我們傾向同理的對象所相對立的人時，我們會感到憤怒的心理傾向。

註205：難怪如今真正的受害者們如此急於擺脫「受害者」之名，並且越來越以「倖存者」（survivors）自稱。透過一種針對現在與未來的樂觀焦點，以及將關鍵鎂光燈從施以行為的主體身上移開（該行為正是當事人之所以成為倖存者的原因），可以減緩一種情況，讓當事人不致被懷疑以一種令人反感的方式沉湎於過去。我擔心，有時這可能源於錯誤的道德指示，以及在一個「富有同理他心」的文化裡，對相對有特權之男性加害者的錯誤予以輕描淡寫——基本上藉由免除敘事來赦免他們——的壓力。但我絕對無意抨擊或藐視「倖存者」這個標籤；如果對某些人來說，這是最有益的做法，那麼，他們就能據此擁有更多力量。我的論點僅是，當你是一名受害者時，主張自己的受害者身分基本上是沒有錯的，因此我的論證目的在於建立一種許可或權利資格，而不是禁止或（相反的）義務，這是我一直以來在道德哲學上的典型態度。

註206：參見蓋瑞．華森（Gary Watson, 1987）針對羅伯．哈里斯（Robert Harris）所犯下的殘酷殺人案的知名討論。哈里斯自身曾於童年遭到嚴重虐待，這顯示了，在這樣的一個敘事內部，同情心的觀點轉移是很難被執行的。因此，要認知到在另一個脈絡，或也許正是在同一個脈絡裡，犯錯者本身也是一名受害者，這件事情也很困難。這想法在概念上並無任何困難之處，同時，受傷之人轉而傷害他人，或虐待他人招致了虐待反撲，這些都是人們往往會有的直覺想法，但要將這些想法納入敘事中、進而決定我們如何回應錯誤行為，就並不容易了。我們只有一雙眼睛，因此很合理地一次只能採取一個視角。同樣的，我們的觀點通常是

整體而非局部的，因此，如果同理心需要一種相對字面上（儘管當然不一定是視覺上）的觀點採納，這就可能限制了在一個故事裡我們能夠同時同理多少角色——尤其當他們某種程度上相互誤解時。

註207：警察局長如此著急地公開這段影像一事說明了問題所在。他聲稱已有多位記者根據「資訊自由法案」對其提出要求，藉此合理化自己的作為，但對公開紀錄進行搜尋後，並沒有發現任何這類的要求，故這份聲明可能（雖然無法確定）是假造的。但倘若如此，原因何在？最重要的理由是，公開影像讓保守人士和政治人物皆得以將注意力重新轉移到布朗所被指控的犯罪行為，而非他的受害身分。甚至連《紐約時報》都在報導中指出，「預計將於週一下葬，十八歲的麥可·布朗並不是天使，公開紀錄與親友訪談顯示了他年輕的生命裡同時有著問題與希望。」

John Eligon, "Michael Brown Spent Last Weeks Grappling with Life's Mysteries," New York Times, 2014/08/25, <https://www.nytimes.com/2014/08/25/us/michael-brown-spent-last-weeks-grappling-with-lifes-mysteries.html>

註208：就此主題，我們可以回想在佛格森事件後戴倫·威爾森的發言；他談到，在面對布朗時，布朗如摔角選手浩克·霍肯般的身形讓他覺得自己像個小男孩。這兩人其實有著相近的體重與身高，更別提布朗並未攜帶武器，而威爾森則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員警。

註209：我們可能會好奇，有多少遭受壓迫犯行的對象流失於這兩個概念間的巨大縫隙中？邁爾斯分享了這份擔憂，並且用性販運與死刑為例子，以極為發人深省的方式對此進行討論（2011，也可參考Meyers, 2016）

註210：我在此迴避了對動機性和規範性原因做出可能至關重要的區分，因為就我的思考方式（我在其他場合裡已充分辯護過，如Manne, 2013; 2014a）而言，這兩者間有著親密的關聯。此外，如果沒有好的（規範性）原因，那麼，我會假設，除了某些特別的心理敘事以外，有著同樣內涵的動機性原因也將不存在。換句話說，我假設，在面對那些支持或反對她們採取特定行動路線的原因時，這個脈絡中的女性基本上是理性，並會予以回應的。

註211：我的想法是，當身處臣屬社會位置的人們使他人注意到自身所受的道德傷害時，通常會更為驚人或顯著；相反的，當掌權者做出類似抱怨時，我們比較不會注意到，我們單單只會同情。海德特及艾德華·史洛瑟（Edward Schlosser）——「我是一個自由派教授，而我的自由派學生嚇到我了」一文的作者筆名——所提出的辯論是極度諷刺的，當他們基本上聲稱自己逐漸因為學生對他們的抱怨而成為受害者時（在我看來，其證據並無說服力）。這個想法中，同情心確實如同商品（我大致上認為這種想法是狡詐且執迷不悟的，我稍後將會指出這點），它比較可能被擁有更多特權貨幣的人所享受。

參考：Edward Schlosser, "I'm a Liberal Professor, and My Liberal Students Terrify Me," Vox, 2015/06/03, <https://www.vox.com/2015/6/3/8706323/college-professor-afraid>

註212：見克莉斯蒂·道森（2016）與克里斯多夫·勒布朗（Christopher Lebron, 2016; 2017）對此主題的重要討論。

註213：上述評論乃是摘錄自Michael E. Miller, "D'Acree Neal: Disabled Activist Who Had to Crawl Off United Airlines Flight Reveals the Humiliation That Followed," The Independent, 2015/10/28,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the-disabled-gay-activist-who-had-to-crawl-off-his-united-airlines-flight-and-into-even-more-a6711626.html>；以下節錄自該報導：

但是你可能還沒聽說，後來發生了什麼事：無知、網路評論、瘋狂指控，以及在公開場合用手爬行的羞辱——在網路上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被經歷。

「網路上有一群人認為我在假裝，或認為我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且我只是想要撈錢。」尼爾說，「有人甚至說我這麼做是為了要幫黑命亦命運動打知名度，我為此深受冒犯。」

關於尼爾，你首先要知道的是，他的人生至今過得相當辛苦。土生土長於華盛頓特區的他是個非裔美國人、已出櫃同志與身障者——三重弱勢。

「我出生便患有腦性麻痺……」

但第二件你應該要知道的事是，他絕對不想被憐憫……

註214：參見亞莉·羅素·霍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所提出的「深層故事」（deep story）概念，她也援引了「隊伍」（line）的譬喻，以試圖更清楚呈現她最新的民族誌著作《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2016）中，其研究對象們的政治世界觀。霍希爾德花了五年與路易斯安那州鄉間及小鎮內的保守白人相處，他們最初為茶黨黨員，且大多在共和黨初選後成為川普的支持者。霍希爾德寫道，在這些社群裡，

場景早已為川普的崛起搭建好了，如同聖火在比賽前被點燃起來。三項因素互相結合。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幾乎所有我訪問過的人都感受到不穩定的經濟處境，這個事實讓他們擁抱了「重新分配」這個想法；他們也在文化上感到被邊緣化：他們對墮胎、同性婚姻、性別角色、種族、槍枝和南方聯盟旗幟的看法都在全國媒體上被嘲笑是落後的。然後他們覺得自己屬於正在衰退的人口，「像我們這樣的白人基督徒越來越少了。」瑪多娜和我說。他們開始覺得自己像被圍攻的少數，而在這些感受以外，他們又加上了一個文化傾向——威爾博·凱許（W. J. Cash）在《南方之心》（*The Mind of the South*）裡描述了這個概念，但在南方以外的地區，這個概念卻以一種較為溫和的方式被共享著，會去認同屬於社會階梯上層的殖民者、石油巨擘，並疏離那些社會階梯的下層者。

這些都屬於「深層故事」。在那些故事裡，陌生人插你的隊，使你感到焦慮、怨懟與害怕；總統和插隊者結盟，使你感到不信任與被背叛；隊伍裡排在你前面的人侮辱你是個無知的鄉下人，使你感到被羞辱與憤怒。經濟上、文化上、人口上、政治上，你突然變成了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路易斯安那州的整體脈絡——它的公司、政府、教堂和媒體——強化了那個深層故事。故而，這——這些個深層故事——在比賽開始前就已經存在了（頁221-222）。

註215：同情心和同理心是重要的道德能力，甚至也許是核心的能力（儘管我個人對此延伸說法有點猶豫），這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但是，當人們索求同情心和同理心時，經常有可能會引起敵意和怨懟。這些論點可能是緊密相關的——也許，對同情心的渴望被理解為情緒勒索或道德主義的情感類比。概略來說，我認為我們經常隱約地將同情心視為一份商品，個人必須為它排隊、根據個人傷害依比例獲得，而不是考量其他更需要的人是否必須獲得優先處理，或它對提供者造成負擔的程度。但這是錯誤的。同情心並沒有一個中央儲藏室，也沒有一個機制可以公平地將它分配給每個有需要的人。此外，同情心並不是一種具有嚴格限制的資源。當然，它也不是無盡的，但是理論上，至少長時間來看，我們都可以對彼此懷有更多同情心，以一種互惠的方式。（更多相關討論可參考Manne, 2016c）

註 216： Regina Rini, “Microaggression, Macro Harm,” LA Times, 2015/10/12, <https://www.latimes.com/opinion/op-ed/la-oe-1012-rini-microaggression-solidarity-20151012-story.html>

註217：一方面來說，得知你並不是唯一一個有過某種難以被歸類，但卻顯然可以被看作是某種暴力、剝削、或一段權力太過不平等的親密關係等經驗的人，這可以帶來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輕鬆感。相關討論可參考曼恩（2017）。

註218：我在此從和奎蒂芮·古諾（Quitterie Gounot）的討論裡，以及閱讀她在性侵害案件這個主題上針對「工具化主體性」（instrumentalized agency）所撰寫中的著作受惠良多。

註219：「這總反過來作用到畢亞圖身上，彷彿將某些犯罪傾向歸咎於他。這些年來，這培養了他天性中的暴力傾向，他對自由與獨立的熱情。」

註220：整體來說，拉克斯內斯的小說在許多方面證明了畢亞圖渴望獨立的深刻和誠懇程度，儘管小說其他部分可能僅表現出他如此宣稱時的自大傲慢。我曾經聽過有人說，畢亞圖是二

十世紀文學作品裡最固執、殘忍、令人憤怒的角色。

註221：這是對某種尼采所謂的「怨懟」的精采——且因此罕見——內在描述，但進一步檢視後，我們發現，從許多方面來說，畢亞圖對鎮長和女詩人的態度都和典型尼采式的、弱者對強者的怨懟有所不同。然而這可能可以被理解為，在尼采的看法中，有時候強者可能對弱者產生的那種怨懟，因為即使他們之間的社會關係如此，這個組合鮮少是值得讚賞或高尚的。他們的靈魂乃是「偏斜的」，不同於畢亞圖的高尚猛烈。

註222：隨著我們來到以下描述畢亞圖返家的段落，表演屈辱——一個不幸的狀況被化作如此！——變得更為誇張。當古德尼——鎮長的管家——試著幫助嬰兒恢復精力，並請他離開，好讓她可以繼續時，畢亞圖想著：

這是畢亞圖第一次被趕出他自己的房子，如果情況不同於眼下，他絕對會對這種滔天大罪提出抗議，而且會讓古德尼牢牢記住，他一毛都不欠她。但如此情境下……他被賦予一條尾巴，在雙腿間搖晃著，因為在絕對的恥辱中，他走上了和狗一樣的路並爬下階梯……他拉出了一捆乾草，將它們鋪在地板上，像一條狗一樣趟在上面（1997，頁109-110）。

畢亞圖「累極了」且感到「多餘」，「從未如那晚一樣地在他心中感到如此不獨立」。但隔天上午當他醒來時，他的孩子活著。他為她取名阿絲塔，並告訴自己「有許多事情得做」，要照顧羊群、要安排蘿莎的葬禮，並且要為所有參加的賓客提供一餐有煎餅、聖誕蛋糕和美味咖啡的「盛宴」。「我不會容許任何人在我妻子的葬禮上飲用任何舊洗碗水。」這個男人沒有忘了他的驕傲以及對他來說最重要之事——也就是他的獨立，他也沒有反對生命和行動，或沉溺於自身的屈從；正好相反。這符合了我的直覺，也就是這是一種強壯的、激發行動的怨懟，即使其形式只是對他們所被迫展現的那類服從的顛覆性表演。就此主題，可以參考史蒂芬·達沃（Stephen Darwall, 2013）針對怨懟所提出的、發人深省的討論。

註223：參考茱蒂·巴特勒（Judith Butler, 2016）針對展示身體弱勢和（或，幾乎是，作為）一種政治抵抗行動的細緻探索。

註224：Maureen Dowd,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New York Times Sunday Review, 2015/10/24, <https://www.nytimes.com/2015/10/25/opinion/sunday/the-empire-strikes-back.html>

第八章 落敗（給）厭女者 Losing (to) Misogynists

若一個女人不夠合宜，便視她為贗品；若不夠端正，便視她為不正派；若她體格健壯，稱她為腫塊；若纖細，則榛樹枝；若皮膚黝黑，稱她如烏鴉；若氣色合宜，則如粉刷過的牆；若她悲傷或害羞，便視她如小丑；若歡快與愉悅，則她可能是蕩婦。

約瑟夫·史威南

《對淫穢、懶惰、冒失與無常之女人的指責》（*The Arraignment of Lewde, Idle, Forward and Unconstant Women*）

她被稱作女巫、潑婦、騙子，以及兩害相權取其輕下，比較不爛的那一個。「她有許多面具，但誰看過她的臉？」一個名嘴誇張地詰問，藉此對她的真誠度表達了廣泛流傳的深刻懷疑。她的可信賴度評比異常低分，儘管她的過往紀錄在政治人物中高於平均不少。她是茱莉亞·吉拉德，我的家鄉澳洲的第一位女性總理。

吉拉德遭遇了惡意的厭女圍攻，這最終在她（面對黨內挑戰時）輸掉領導地位一事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如今此事已經是一樁廣受公認到毫無爭議的事實^{註225}。就我的目的來說，有趣的議題是為什麼、如何，以及在此之上，我們是如何地沒能學到教訓。

因為在二〇一六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歷史以一種驚人的相似方式重複了——就修辭和機制而言，儘管這兩者在目標和社會脈絡上有著重大差異。而我相信，在唐納·川普擊敗希拉蕊·柯林頓這個令人沮喪的故事裡，厭女機制和更廣泛的性別化動力是重要的一部分^{註226}。撇開其他不談（而我承認這是一絲非常微弱的慰藉），這個結果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反省厭女力量能夠如何嚴重地扭曲我們的思考，並使我們的推論帶有偏見。

當男性與女性競爭：相對性別偏見 When a man competes with a woman: comparative gender biases

我們經常把性別偏見想成某種針對個別女性的扣分項目，進而在那些我們懷有偏見的領域中，我們會比其他時候更為負面地評量她們^{註227}；我們傾向於低估她，使她較難成功和男性對手競爭，面對後者時，我們傾向較公平地進行評量（這個思路進而延續下去）。比方說，在極端的例子裡，她可能得要加倍優秀才能打敗他。

但是，當我們對男性和女性進行排序時，則有一種明確用來概念化性別偏見的方式，促使我們在其他條件都相等的情況下——亦即在其他可能造成偏見的因素都固定的情況下——偏好男性勝過於他的女性對手。這些偏好可能透過不同形式表現，比方說：支持、推銷、喜歡、相信，或把票投給他而非她。這可能導致我們高估了他，並懷著敵意去反對她，且低估她的優點。再一次的，在極端的情況或完美的風暴情境裡，不管她有多麼優秀，我們可能都會找到某個原因、任何原因，去懷疑或不喜歡她。

我們可能兩度在競選活動中發現自己身處於這一類情況中：男性和女性為了一個自始以來由男性所支配的權力和威權位置而正面競爭對決。在三組相關文獻裡，以下是幾則最為驚人的發現，它們每一則都指向了在這些情況中普遍想要維持性別化社會階序的強烈傾向。

（1）研究者大衛．保羅與傑西．史密斯（2008）約於二〇〇八年大選的兩年前對俄亥俄州將近五百名選民進行調查。受訪者被要求評估五名可能的總統候選人——三名共和黨員、兩名民主黨員，其中三位男性、兩位女性。選民將兩位女性列為五人中最無法勝任者，儘管從客觀角度上來看，她們都高度符合資格（根據研究者的意見）。而在可能出現的六組全國大選對決組合中，男性候選人在每一場個別競爭中都擊敗了女性對手。

和來自敵對政黨的另一名男性相比，每位男性在面對女性被提名人時的表現也都比較好。也許最有力的發現是，和相反的情況相比，選民們從自身政黨的女性被提名人叛逃到敵對政黨的男性被提名人的比例高出了好幾倍。研究者做出結論，「在競選總統時，女性對手的存在，可能會幫助〔男性〕競爭」（2008，頁466）。

這項調查中的三位男性政治人物是約翰．馬侃（John McCain）、約翰．艾德華（John Edward）與魯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其中一名女性政治人物是伊莉莎白．多爾（Elizabeth Dole），另一位女性呢？希拉蕊．柯林頓。

但你可能會說：等等，和十年前相比，二〇一六年時希拉蕊的政治經驗多出許多。由於無可否認的是，處在她位置上的女性面對著更嚴格，或雙重的標準，假如她的勝任資格不再有遭人疑慮之處，這種性別偏見就不再是問題嗎？

不會不是——或最低限度來說，不盡然會。事實上，根據如以下這般的研究（還有兩組研究者分別提出的一致發現）顯示，在一般大眾的層級上，這似乎不太可能。他們指出，當女性在一個由男性所支配的角色上參與競爭，且其適任性不受質疑時，她們普遍不被喜歡，而且遭受社會懲罰和拒絕。

（2）心理學家麥德琳．海曼（Madeline Heilman）進行了一組研究，她尤其致力於回答以下問題：當有明確證據顯示一名女性能夠勝任受男性所支配的領域時，她們是否仍會遭遇到性別歧視^{註228}？看來似乎是的，事業高度成功的女性經理人獲得晉升的機率仍舊遠遠低於她們的男性對手。這是為什麼？

在一個特別驚人的調查中，海曼與其合作者提供參與者們幾組資訊，它們描述了兩位在一名男性主導產業裡就業的高階員工：他們都是一間製造飛機組件公司內的銷售部助理副總。其中一名為男性，另一名則為女性——只有他們的姓名「詹姆士」和「安德莉亞」透露出這件事；在預試中，兩個名字受喜愛的平均程度相類似。至於哪組資訊會被指定給兩人中的哪一人則會有所調動，因此在兩組情境中，分別有一組員工資料被以詹姆士之名提供給一半的參與者，而另一半則以安德莉亞之名。

在「成功不明確」情境中，針對詹姆士和安德莉亞是不是傑出的助理副總一事只有模稜兩可的證據。在要求將兩人進行比較時，絕大多數的參與者（86%）評價詹姆士比安德莉亞更有能力，但是兩人受到喜愛的程度差不多。

在「成功明確」的情境中，剩下一半的參與者收到了一組額外的資訊，清楚地展現了兩位員工的能力：一份年度表現評價，其中說明了兩人都是「表現傑出者」，位在這類公司所有助理副總的前5%。在

此情境中，參與者評價兩人能力相當，但有差不多同樣多數的人（83%）認為詹姆士比安德莉亞更討人喜歡。在其他所有情況裡，安德莉亞也被認為在人際上比較不友善——這個測量指標包涵了惱人、有心機、不懷好意，以及特別是，不可信賴。海曼等人（2004）形容此結果「戲劇化」。

記著，這乃是奠基於相似（平均來說，考量到資訊被交替著給予參與者）的資訊，因此這些迥然不同的評價並沒有任何理性基礎。就算參與者們覺得自己有理由，他們必定是用臨時的標準，並在事後將其合理化。

但是為什麼呢？為什麼他們如此不喜歡安德莉亞，儘管她的能力無可否認？

（3）心理學家勞麗·洛德曼（L. A. Rudman）提出了以下答案：人們（經常不自覺地）被鼓勵去維持性別階序，藉由對爭取晉升到高地位、陽性屬性的位置，或用其他方式威脅要這麼做的女性們施以社會懲罰。這個「地位不協調假設」（status incongruity hypothesis）和前述調查的結果一致，並有助於對它們做出解釋。一項引用該假設的近期研究（Rudman, Moss-Racusin, Phelan, & Nauts, 2012）以及海曼、洛德曼與合作者的其他著作顯示了，這份結果受到所謂「社會支配懲罰」（social dominance penalty）的居中影響，這類位置上主體性明確的女性（亦即有能力、有自信並堅定）被看作在陽性屬性特質方面有極端表現，例如傲慢和有侵略性。她們經常被描述成「頤指氣使的」和「閹割男人的潑婦」。（聽來熟悉嗎？[註229](#)）

這些也剛好正是女性不被允許擁有的特質（如洛德曼等人〔2012〕針對這些主題，透過實驗所證實的結果）。因此，由於這些機制，那些主體性明確、在受到男性支配的角色方面與男性共同競爭的女性加倍有可能受到懲罰和拒絕。和有著同樣描述的男性對手（再一次的，使用同樣的外在文字工具予以描述，例如推薦信，但姓名被調換）相比，她們被看作有著更多她們比較不被允許擁有的特質。

洛德曼針對社會支配懲罰所提出的這個解釋，進一步被以下迷人的研究結果所證實了：在一個「高威脅」的情境裡——亦即在實驗開始時，參與者須先閱讀一篇名為「衰退中的美國」的文章——這個現象可能增加。該文章包含了以下段落：

這些日子，許多在美國的人們對國家的情況感到失望。不管是源自於經濟的崩潰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對中東地區拖延已久、耗費美國許多血汗與財物的戰爭的疲憊感，或是面對全球與科技變革但政府卻似乎無法發揮其優勢的一般性焦慮，美國人感到深深地不滿。許多國民覺得國家在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上已經降到低點（Rudman, Moss-Racusin, Phelan, & Nauts, 2012，頁172）。

在此情況下，相較於在「低威脅」和控制情境裡，嚮往高權力位置、主體性明確的女性人物顯著地比較不被喜歡，而且更常在晉升過程中遭到拒絕。然而，對於主體性同樣明確的男性對手來說，這些帶有威脅性的刺激並不會造成不同。研究者解釋道：

因為在系統威脅下，人們傾向於捍衛他們的世界觀，其中包含了性別地位的不同……同時，因為女性主體特別會被面臨系統威脅的人所拒絕，〔這些結果〕提供了直接證據，顯示反挫如何作用於保存性別階序（2012，頁174）。

這有助於說明唐納·川普——甚至可能還有伯尼·桑德斯——對抗希拉蕊時的種種順遂；在其他情況下，這份順遂會顯得很是驚人，但這正是如保羅與史密斯（2008）所預測的，當一名男性總統候選人和女性對手競爭時，他將獲得的抬舉。對於「衰退中的美國」故事，川普和桑德斯都各自訴說了一個清晰可辨（儘管有所不同）的版本，而這很可能使得柯林頓更為弱勢。

我們也應該留意，認為千禧年世代（亦即一九八〇年代後出生者）傾向於認同進步價值，也因此或多或少會對這類性別偏見比較免疫，這種常見假設起碼是有可疑之處的。上述第二與第三則研究主要——如果不是完全——包含了這個年齡層的參與者（他們當時是大學生）^{註230}，第一則研究至少也包括了他們；而根據研究，參與者的年齡在此沒有造成任何統計上的顯著不同^{註231}。在每則研究中，參與者的性別亦無影響。許多人對於選擇投給唐納·川普而非希拉蕊·柯林頓的（白人）女性人數表達了驚訝之情，但考量到女性就如同男性一般可能懷有上述的相對性別偏見，這可能不該如此令人吃驚。稍後，我將於本章返回討論，因為此一常見偏見的多種可能解釋而產生了哪些更複雜的議題，以及在這個情況中，為什麼白人女性特別容易受到影響。但與此同時，我們應該要留意的是，假如厭女情結更關乎於執行性別化規範，而非將女性視為次等人類或無心智生物，抑或令人噁心與令人恐懼等狀態，那麼，此處就有一個立即的解釋結果：因為，

女性監督著其他女性並參與了性別化規範的執行，這件事並沒有任何神祕之處（而且也沒什麼可疑慮）。根據我在本書所發展出的對厭女情結的觀點，我們可以預期的是，對其他女性注入了厭女力量的女性們格外地會教訓——比如說，責怪與懲罰——那些不遵守性別化規範和期待的人。同樣的，當談到內化厭女情結時，我們可以預期，女性格外地容易因為自己違反了陰性屬性責任而面臨罪惡感和羞恥感，而不一定是對自我懷有任何全面性的厭惡態度。我將於稍後回到這些主題。

社會拒絕乃由噁心驅動 Social rejection is mediated by disgust

因此，面對嚮往政府高位的女性政治人物，不喜歡與敵意是可預測的反應，還有在表面上缺少基礎的情況下視她為不可信賴的人。然而，這個針對她的看法是從何而來？

近期針對噁心的研究有助於打造它們之間的關聯性，例如說，因為噁心是一種社會性拒絕而非憤怒的情緒。哲學家丹尼爾·凱利（Daniel Kelly, 2011）認為，我們天生的噁心反應——由受污染的食品及病原體威脅兩者所引起——格外便利，因此被用來扮演一個規範性的角色，讓人們遵從社會規範、傳統、階序等等。一方面來說，使人感到噁心的可能性強力地驅使人們避免那些被認定為噁心的舉止；另一方面，噁心的感受陰魂不散、造成污痕、進行滲透並且感染，而藉由目睹他者對人或物的噁心反應，我們可以輕易地從他人身上學習到噁心。此外，一旦學會以後，我們就很難擺脫以噁心為基礎的聯想。

正如同心理學家尤爾·英巴爾（Yoel Inbar）和大衛·皮扎羅（David Pizarro）（2014）所指出的，噁心反應也擁有透過聯想去散播的優勢。那些和讓我們感到噁心的事物有所糾纏牽扯的人也可能會變得令我們感到噁心，於是，基於某種程度上我們普遍對於被規避、被羞辱和被自身社群驅逐感到反感，因為參與了社會上的禁忌行為而變得令他人噁心的風險遂擔任了進一步的驅動因子。歷史上來看，這往往會是死亡的喪鐘，而流放與孤立可以在情感上令人痛苦，甚至在極端的例子中是很折磨人的，就算沒有把物質上的剝奪以及因為失去他人而造成的弱勢或不穩定囊括在內。

噁心也是一種有說教意味的影響，它強化、甚至驅使著新穎的道德判斷——在某些情況裡，力道還很強^{註232}。結果，即使是輕微的噁心「陣痛」都可能使某些人把某個人評斷為可疑和不懷好意，即使這樣的判斷顯然並沒有理性基礎——亦即就算當此人的作為完全無害，甚至值得讚賞時，也是如此。

在塔莉亞·惠特利（Thalia Wheatley）和強納森·海德特（2005）所做的一項格外驚人的研究中，容易被催眠後的暗示所影響的參與者們先是被施予了催眠，使他們在讀到「經常」（often）或「拿」（take）這兩個字眼時會感到一陣噁心；隨後參與者們再閱讀

短文，短文內容與犯下常見道德錯誤的人有所關聯，舉例來說，在一個「賄賂」的情境裡：

國會議員阿諾·派克斯頓經常發表演說，譴責貪腐並支持政治獻金改革，但他只是試圖遮掩他本身〔會拿／經常被〕菸草遊說團體與其他特殊利益團體賄賂，並進而支持其法案的事實。

研究參與者們閱讀了這份短文，並因為內容含有符合催眠暗示的字眼，而在閱讀時打從內心深處感受到被人工增強的噁心感。和那些閱讀了同樣內容、但卻沒有噁心誘發因子的人們相比，他們傾向於以明顯更嚴厲的態度評價相關行為，也就是將它們評價為在道德上更嚴重的錯誤。

在追蹤研究中，實驗者納入了另一篇短文作為控制組，文中描述一個名叫丹的學生委員會代表〔試著拿／經常選擇〕許多人感興趣的主題在會議上進行討論。這是完全無害的行為，對嗎？這甚至是好的行為。但讓研究者們一開始感到震驚的是，某些實驗者在閱讀了含有引發噁心字眼的短文之後，有了不同的看法。「他看起來就是有什麼企圖」，一位參與者模糊地說；對另一個人而言，丹看起來是個「想要受歡迎的勢利鬼」；他的行為「看來如此奇怪與噁心」，第三個人這麼說，一副無可奈何狀；「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是不對的〕，但就是這樣。」他們如此總結（2005，頁783）。

啟發的第一課：噁心反應可以讓我們變成更嚴厲的道德評論家，甚至可能促使某些人在明顯完全無害的行為中發現道德錯誤。第二課：作為道德評論家，我們並非總是根據道德理由和論證做出判決；有時候，我們伸出手來搜尋這些理由和論證，以合理化一個已經被做好的判決。我們不自覺地在此基礎之上編造出一個事後案例^{註233}。

針對希拉蕊的噁心表現 Expression of disgust toward Hillary

現在讓我們切換到希拉蕊·柯林頓。許多人不僅不喜歡她、不信任她，還在她二〇一六年競選總統時表現出發自內心深處的噁心。其中一人是唐納·川普，對於柯林頓在二〇一五年十二月辯論會的廣告休息時間使用化妝間一事，他連「想都不願意想」（儘管是他自己提起這個話題的）。

這一類噁心裡頭，某些包含了對柯林頓健康狀態的異常執著，這給了他人藉口，將她錯誤地描繪為軟弱、虛弱、衰老，甚至即將身故，並缺乏總統所需的（言外之意：陽剛）精力——長話短說，她是一個老女人，如今除了進行照護工作以外可說是毫無用處。針對希拉蕊的身體分泌物，以及她污染他人的可能性——比方說，當她於二〇一六年九月短暫罹患了輕微肺炎時，可能傳染與她握手之人的風險——也有著驚人的固著性；當她因為喉嚨乾澀和季節性過敏而咳嗽，無論有痰與否，都能成為一個特大號的爭議來源。甚至柯林頓的經典笑容——當她將頭往後仰，張開嘴巴奔放大笑時，而這對於經常覺得她不夠真誠的人們來說，應該是一個反面證據——也引發了噁心的反應。對許多人的舒適程度來說，她身體所屬的「外殼」似乎縫合得太過鬆垮。

有一位在首場總統辯論會前接受電視節目《莎曼沙·畢》（*Samantha Bee*）訪問的川普支持者表示，他預期柯林頓會在台上使用導尿管，因為她有許多健康問題。我搜尋了一下，發現不知為何，這已經變成了網路上一個受歡迎的陰謀理論。這名受訪者補充說道，自己有試著表現出同理心，而訪問者則靈巧地回應他說，那他可能必須再努力一點。同時諷刺的是，川普才是那個傳言中在二月辯論會上尿濕褲子的人——這番由馬可·魯比歐（Marco Rubio）所提出的影射幾乎太過奇異滑稽，導致它不可能是假造的，不過，它隨後很快就被巧合地遺忘。當提到結構性失憶——也就是由社會上的擁有特權者與支配者所操作的集體性遺忘——時，我們幾乎找不到更好的例子了。我們詆毀她的名聲；我們幾乎循規蹈矩地維護他的自尊。

與此同時，第一場辯論會中柯林頓夾克上的一個小污點被說成是口水痕跡——另一個她無法緊閉嘴巴的症狀，而儘管所有的證據都與此相悖，當我們考量到川普的惡意態度，以及他威脅要讓她因為電子郵件

件而銀鐐入獄時。（事實上，那塊污漬乃是柯林頓的領夾麥克風所造成的陰影。）

當人們在川普的造勢活動上喊著柯林頓的名字、叫著「把她關起來」時，很顯然，這表達了一種想要看到她被懲罰的渴望，但也不僅止於此，而更似乎表達了一種想要她受到控制的渴望。當二〇一六年七月間，一位新罕布夏州的共和黨眾議員與川普的代表要求柯林頓應該要為她的電子郵件和班加西事件而被判處叛國罪並槍決時，他是這麼說的：「事情不對勁……這整件事情都讓我覺得噁心。希拉蕊·柯林頓應該要被放在射擊線上，然後因為叛國罪而被槍決。」隨後他亦稱她為「一團垃圾」。

因此，當我指出，正如前述的實證研究證據所預測，隨著柯林頓的競選活動持續進行，她遭受了在數量上與程度上都驚人的噁心反應，我不認為這是誇大。同時我們看到了，這有可能導致人們對她的不信任，並且也可能增加他們對她的行為在道德層面上表示不贊同的嚴重程度。這同樣有可能導致人們堅信柯林頓犯了某些罪行，就算沒有具體的指控，或是強力反對前列指控的反面證據。因此，要嘗試澄清對她的不實指控以及證據薄弱的迷思和謠言，往往就類似於一場打地鼠遊戲。這也可以從我於下兩節中所提出的、噁心的一般性特徵來進行解釋：它如何陰魂不散，還有，它如何使我們想要與該對象保持距離^{註234}。

噁心如何陰魂不散 How disgust sticks

大選之前，我在多處皆探索到一件事：希拉蕊．柯林頓和茱莉亞．吉拉德兩人遭受了驚人相似的道德猜疑。她們兩人都被烙上了騙子的標記——正如同前幾章中所討論的，「茱騙子」成為後者在詆毀者間的標準綽號，無論是在媒體間還是澳洲的家家戶戶中——並且，於明顯薄弱的事實基礎上遭人指控貪腐。在兩人個別的情況裡，這些控訴最終都以失敗告終，但猜疑卻從未減弱；即使沒有出現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這些猜疑，而沒有證據應該可以被當成強力的證明，顯示證據並不存在，但某些人仍公開堅持他們的猜疑而毫不難為情^{註235}。

這類事件也不只發生在政治場域中。回想媒體上的「愛麗絲．高夫曼（Alice Goffman）^{註236}審判」吧，沒多久之後，這起事件就被她較為誠實的其中一位評論者定調為一場女巫獵殺行動（Singal, 2015），同時，不管網路上如何深信她有罪、對她指指點點，沒有任何指控得以持久。高夫曼，一位年輕且獲獎的社會學家兼作家，被指控了各種可見的罪名，從學術上的不當舉止（根據一份被廣泛流傳、匿名書寫的六十頁文件，聲稱揭露了她在論述上的不一致——高夫曼隨後做出了解釋，參見Singal, 2015）到全然造假，再到「於一場殺人計畫裡駕駛逃逸車輛」。面對某些有根據的批評，高夫曼並沒有免疫，但適合這些批評的箭靶也不只有獨獨她一人。在這些有根據的批評中，多數都可以在許多人、甚至大部分的民族誌學者身上成立，但大體而言，對於這類公開羞辱，他們皆受到了豁免。因此，我的想法是，這些猜疑過度或特別地針對高夫曼，針對到一個迫切需要解釋的程度；在我看來，此處所討論的性別化模式提供了一個最好的，或至少可信的解釋。

誠然，並非每一位女性政治人物或知名公眾人物都遭受到這類猜疑、譴責，以及想要看到她們受懲罰的渴望。但是，當污衊一旦展開，它很快就會升級，而且通常不只會「成群結隊」出現（在網路上經常可見），更會有散發的效果——也就是說，猜疑和批評會將所有可能的原因都囊括在內，使人們對她的能力、人格和成就皆進行質疑。柯林頓、吉拉德和高夫曼都被懷疑犯下了成堆不同的罪過，而這暗示了一種信念，即是認定她們必然有某樁罪。

即使在那些並未抱持這種信念的人當中，這也可能對他們的思考有著間接的影響。我的感受是，一般而言，自由派與進步派陣營中的

人們並不像票投歐巴馬時一般，對於把總統選票投給柯林頓一事感到驕傲，儘管這兩人的政策和政治立場非常相似，以及從所謂身分政治的觀點上來說，兩人都（分別）是，或會是，創造歷史的總統。除此之外，我認為左派間有一種氣氛，導致了對「票投柯林頓」的道德防禦心——彷彿把票投給她代表了與其共謀或自鳴得意，因為她某些（我同意）方向錯誤的外交政策造成了無可否認的糟糕後果。但這些政策中，大多數也是歐巴馬的政策，然而，不知為何，它們常常看來對他的聲譽造成較少的傷害，而且也沒有把投給他的選票轉變成左派的道德責任，這是我的感想。

因為道德批評會變得針對個人，並特別容易被導向女性的人格、造成特別深刻的傷害，導致此處的問題變得更嚴重。這也多少說明了厭女情結如何破壞女性團結，尤其是在白人女性之間。接下來這一節中，我將以相反的順序來討論這些議題。

保持距離 Keeping one's distance

回想第三章所述，厭女情結經常是關於根據女性是否遵從父權規範和價值，來區分「好」與「壞」女人。因此，最概略來說，我們並不意外嚮往當「好女人」的女性有其社會性動機，和那些被認定為「壞女人」的女性（一如柯林頓）保持距離，並且當對方因為被預設的道德犯罪和不端行為而遭到放逐與懲罰時，亦公開參與。

另一項麥德琳・海曼參與的研究（Parks-Stamm, Heilman, & Hearn, 2008）約略釐清了為什麼在二〇一六年的總統大選中，超過一半的白人女性選民將票投給了唐納・川普，而非希拉蕊・柯林頓。研究發現，與本章稍早前提出的看法一致，女性就和男性一樣會懲罰高度成功的女性，但原因看來卻有所不同。研究者請男性和女性參與者就敵意、反社會特徵和整體喜愛程度等作為指標，對一份個人檔案中所描述的新任女性副總統評分；男性和女性參與者都傾向於推定她違反了社會規範——例如操縱人心、冷漠、有傾略性——而在社會層面上對她做出懲罰，除非，有明確的資訊顯示出她的陰性美德和良好行為。在後者的情況裡，對男性和女性參與者來說，「社會懲罰」的效果都會被阻擋下來，然而，關鍵的是，此時只有女性參與者會較為負面地自我評估。這支持了研究者的假設，也就是，懲罰成功女性（只）對其他女性來說有著自我保護的功能，它緩和了當一名相似的——同樣優秀、得體並／或「真實」的——女性比她們更有能力或成就時，所帶來的威脅感受。與此同時，很明顯的，這似乎和缺乏自我信任相關，而這可以被正向回饋所減緩。

在第一項實驗中，研究者將身為研究主題的女性描述成帶有陰性屬性與親和社會的傾向，藉此來阻擋女性對她們的懲罰，而在同一份研究報告中的第二項實驗裡，透過對實驗參與者（皆為女性）就她們傑出的事業敏銳度灌輸正向回饋，研究者達到了程度相當的效果；她們不再被驅動去懲罰成就較高的女性。

大選之後，我們這些對結果感到悲傷的人往往更嚴厲地批評投給唐納・川普的白人女性，勝過於白人男性。我自己也這麼做了。然而，由於這些研究結果，我隨後得以把一部分的憤怒重新導向父權體系，在這個體系中，連年輕女性都相信——注意，再一次的，本研究的參與者是大學部學生——她們不可能在高權力、受男性支配的角色上獲得成功，而同時從選舉結果及上述機制的力量來看，她們很有可能

是對的。儘管錯誤但卻合乎常情的地方在於，當他者挑戰了人們現存的觀點，亦即相信自己就算盡了全力也不可能成為（比方說）總統時，人們會去保護自己，會和可能造成威脅的他者保持距離。這麼做的方法之一即為認定這些女性是不同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劣等或令人反感的；不然她們就是可疑的，例如說，她們無情、麻木、冷漠，或者她們的成功讓她們成為女巫，她們的能力是黑魔法。

從這項研究出發，有一個可以被提出的問題是種族因素的影響，因為幾乎沒有任何黑人女性選擇投給川普而非柯林頓，而這麼做的拉丁裔女性也相對稀少。種族差異是構成她們在心理上與柯林頓自我切割的原因嗎？或者，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這些女性會因為選出一個對白人至上主義者友善的白人總統而面臨更多損失，而不是因為有一個優先因素，阻擋了這個在其他情況下有可能發揮作用的隱藏傾向？不過很可惜的，因為上述研究並沒有提到參與者的種族，我們無從得知答案，也不清楚上述研究中的評估對象是否被參與者們設想為白人。

無論情況為何，白人女性看來有可能懷有額外的心理與社會動機去支持川普，並原諒他的厭女情結（及其他行為）。這類動機乃是基於：（1）平均來說，白人女性比起她們的非白人同伴，擁有明顯較高的可能性和川普支持者成為伴侶，以及（2）再一次的，在某些情況裡有所相關的是，平均來說，白人女性通常可能會有更強的動機及與此相應的意向，去試著獲得或維持川普這類有權白人男性的喜愛，因為基本上，只有白人女性有絲毫機會能被川普這類男性視為「好女孩」——假如她處事得當的話；與此同時，這類男性給予黑人與拉丁裔女性的待遇經常是消抹與貶低。

金柏利·克倫肖（2016）於選舉後與十六位社會正義領導人的對話強調出我們在此有必要思考社會關係及社會身分的交織性。與克倫肖的對談中，種族批判理論學者與女性主義者周秀美指出，「與其實際上基於個別〔白人〕女性的利益而投票……你反而聽到了這樣的說法，『但我擔心這會對我的兒子、兄弟、丈夫造成什麼影響』等等，你有一個被高度種族化的家庭概念，它戰勝並取代了一般性的理性選民思維。」周在此說明了對「小人物」的同理他心如何也可能成為故事的一部分。在美國社會中，介於一男一女間的名義上單偶制親密關係是統計上的常規，而且在許多社群裡，某種程度上仍然是顯著的道德常規，比如說，在許多保守社群內，女性的首要效忠對象經常是她們的男性親密伴侶，而不是其他女性。對於女性來說，假如男性伴侶身上出現了隱約的男性支配型態與其他形式的厭女行為，她們也擁有

相當強力的心理動機去否認、輕描淡寫並忽視它們的普遍程度與重要性，這包括了，在投票給川普時，他可能根本不屑一顧一位男性同胞的不當性行為和厭女情結。

這個論點可以延伸下去。作為白人女性，我們習慣性地對周遭的有權白人男性效忠（例如，那些在工作場合、社區和其他社會機構——包括學術場域裡頭，級別高於我們的人）；我們把身處支配地位之男性們的祕密當成一種預設情況——包括當他們有性掠奪行為時。我在此刻意選擇了使用囊括性的複數名詞（我們），開明進步的白人女性在這方面也不見得願意擺脫這個習慣。回想在學術界內——包括哲學界，它至今仍是最不多元的學科之一，多起性騷擾與性侵害情事的通報花了多少時間才促成針對特定知名男性加害人的處置；這是我們保持沉默、當「好女人」的集體傾向裡的一個症狀，它仰賴我們對身處支配地位之男性效忠，並且，在此之外，照料周遭所有的每一個人。

在第四章裡，我提出的論點是，女性被預設要提供個人關懷與注意力給她們身邊的每一個人，不然她們就有可能顯得齷齪、吝嗇、不公平與冷酷無情，但是當你在競選總統時，這當然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而且一般而言，當一名女性的觀眾或選區越大、越多元時，她越有可能因為這些針對女性關注力的規範而被看作是冷漠、有距離、「無法靠近」、疏忽、不細心與自私。然而，她的男性同胞卻不需要展現任何這一類的聆聽技能，事實上，當換成川普時，情況可說便是完全如此。

這顯示，我們不能單純認為男性和女性面對了較高與較低的標準，而應該這麼說，我們經常認定男性和女性有著基本上不同，並在表面上互補的責任。現在我會就兩種機制提出證據，以幫助我證實這點：其一被我稱為「製造關心」（care-mongering），另一則是「性別化的『撕裂觀感』」（gendered “split perception”）。

製造關心 Care mongering

女性被不成比例地要求——這要求甚至也來自年輕人——關心他人，而顯示證據來自於學生評量教授時，性別偏見有著廣為人知的影響。於此脈絡裡，這則證據也值得被納入考量，因為在思考之後，你會發現，政治人物和教授之間有著不少可相比擬之處——他們不只是人們眼中心照不宣的權威人物（這也能夠適用於許多其他職業），還有他們所展現的表演特性。作為教授，你必須站在人群面前要求他們對你的言詞投以信任、尊重和注意力，而結果則是對於你後續將如何被評量，以及被給予多高的評價，性別都有著顯著的影響——至少在後者的情境中如此，因此在前者的情境中也可能相同。

這不僅僅因為，許多學生——再一次的，男女皆同——會偏好在知識和道德上的權威人物以順性別男性的身體出現（儘管研究時常如此顯示，但某些近期針對種族的研究結果帶來了比較多的希望^{註237}），更因為人們對女性和男性的觀點往往非常不同，以及與此相關的是，他們會因為不同的缺點而被懲罰。喬伊·斯柏拉格（Joey Sprague）和凱利·瑪索尼（Kelley Massoni）（2005）指出，男教授比較常因為教學無聊而被懲罰，女教授則是因為看來冷漠、不關心人，以及沒有和每一個學生都發展出個人關係。根據學生們如何描述最好和最糟的教授，他們也發現：

最不友善的字眼被保留給女教授；透過使用「潑婦」和「女巫」等字眼，最糟糕的女教授有時候會被明確指控是一名壞女人。學生們可能不喜歡傲慢、無聊和漫不經心的男老師，但他們可能會仇恨吝嗇、不公平、僵硬、冷漠和「精神錯亂」的女老師。這些發現……被通報事件所證實，在這些事件裡，學生們對他們認為未能適切地執行其性別角色，或呈現了挑戰性別不平等的課堂素材的女性教員展現出敵意（2005，頁791）。

研究者總結，雖然男女教授都需要根據其性別做出特別的付出，但女性的付出比較有可能特別辛苦，因為一個不讓人感到無聊的男性是相對輕鬆地觸及到比較廣大的觀眾群，但讓一個女性和每一個學生都發展出關係卻顯然並非如此，而且在某個階段以後，這簡直不可能。

「製造關心」——或另一個我喜歡的說法是（性別化的）弱勢暴君（tyranny of vulnerability）——的誕生，在澳洲針對茱莉亞·吉拉德的

攻擊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當凱文·路德——吉拉德在黨內初選成功取代的前任領導人——想要報仇時，他完全知道該怎麼做。首先他對記者勞利·歐克（Laurie Oakes）聲稱吉拉德背棄了曾有的協議，也就是在提出挑戰前，要給他更多時間來改善他作為總理的表現，然後路德似乎將內閣會議的紀錄洩漏給歐克，在其中，吉拉德因為預算赤字而反對了一項增加老年退休金和有薪育嬰假支出的提案。儘管吉拉德解釋在預算獲得平衡後她會支持這些措施，但她的支持度受到重挫，並差點輸掉了接下來的選舉。她不能被信賴，而且她冷酷無情。

澳洲記者喬治·梅加羅吉尼（George Megalogenis）覺得路德和歐克的行徑真是惡劣得可以，以致他提出以下問題：

如果競爭發生於兩個男人間，這事還會發生嗎？我不確定。我認為我們必須拆解這點，看看我們用自己的雙眼究竟看到了什麼，也就是，一群男人試著把一個女人變成怪獸。

可惜的是，他對澳洲人的呼籲被大大地忽視了^{註238}。

據我揣測，類似手法也對柯林頓造成了很大傷害；她面對的不只是更嚴格的標準，更是和她的男性同胞比起來非常不同的標準。問題是：在她一路以來的關懷範圍內，她是否曾經或至今未能給予任何弱勢者足夠的付出、關懷或注意力？答案是且幾乎無可避免地會是，「沒錯」，因為作為一個有經驗的政治人物和前任國務卿，她的關懷範圍必然要無限擴張，亦即幾乎要包括所有人。與此相對的是，唐納·川普認為他可以站在第五大道的中央對任何人開槍，卻仍舊不會失去選民^{註239}。許多人因為他的說詞勃然大怒，但他依然贏得了選舉。

性別化的撕裂觀感 Gendered split perception

從另一方面來看，針對性別化雙重標準，常見的關注焦點也可能過於狹隘。此概念之下所包含的情況是，在我們認為相同的行為上，由女性來執行時，會比她們的男性同胞受到更嚴厲的評價，而此處假設了這些認定在某種程度上是道德中立的共同基礎。然而，證據顯示，由男性和女性所執行的同樣行為有可能在剛開始就被不同地看待——一個特定的預先猜疑視角或性別化勞動分工將使得完全相同的行動在由她執行時，看似與他的有所不同。他的行為看來正常、平凡、一如往常、沒什麼好留意；她做出同樣的行為則讓我們思索：她在掩飾什麼？

此處於是顯示，這不只是一個性別化雙重標準的問題；政治領域中的性別偏見還包含了這份社會觀感的「撕裂」。

我在此處提到的證據來自於近期的一項社會心理學研究，而箇中假設尚在發展之中，儘管如此，它高度解釋了這個在其他情況下令人迷惘的僵局，故而使得它值得一提。本研究的參與者閱讀了一些軼聞趣事，它們描述了因為各種原因而將幼年子女獨留家中的父母。隨後，研究參與者被要求評估這些幼童所面臨的風險或危險程度。和那些因為去工作而把孩子留在家中的父母相比，為了抓寶可夢而把孩子留在家中的父母被批評為將孩子置於較高的風險之中。而就我的目的而言，關鍵之處在於，在其他條件相當的情況下（也就是控制了他們離開的原因、離開的時間長短、幼童的年紀等），女性的行為被評斷為比男性的更具風險（Thomas, Stanford, & Sarnecka, 2016）。

誠然，這些結果是初步的（事實上，在撰寫本書的此刻——二〇一六年八月——這些結果堪稱前衛），特別是性別因素在這裡的影響還有待研究（研究者也這麼承認），但它們仍然有可能解釋許多需要解釋的事。很自然地，我們會假設出一個大略如下的機制：我們看到他人做出了某件對我們而言在道德方面比較理想或比較糟糕的事情，比如說，某種程度上值得我們發怒、在道德上讓人感到噁心或憤慨的事情，我們於是將對他們所做之事的描述，例如他們行動的危險程度，和我們自發性道德反應的強度與價值，進行配對。於是乎，在一個理論上應該要全然根據事實、而非根據道德的層次上，這類關於某人的道德反應或評價卻有可能顯著地影響了我們如何看待或描述他們的行

為。當然，我們的期望可能會是正好相反：我們會希望自己只評估非道德的事實，並且只針對他們的行為提出道德判斷。

接著，讓我們思考身處特定社會位置的女性所遭遇的偏見——也就是那些嚮往陽性屬性的權力位置如政治領域，的女性。這些偏見其中的內涵可能包括了道德預先判斷，它們符合那些廣泛遭人否定、但卻尚未被完全廢止的性別化社會規範。像希拉蕊·柯林頓這樣的人經常被賦予篡位者的道德角色，而這毫不令人意外（但是當然並不表示這很合理）；她威脅要奪取男性在歷史上的位置，或搶走他們的鋒頭。倘若她獲勝，這便是一場騙局，她不可能有辦法公平獲勝，而她的行為和她本人都顯得草率、可疑與不正派（諸如此類）。

握有前所未有的政治權力或是正站在權力風口浪尖上的女性，一般也可能會被視為規則破壞者，無法讓人信賴她們會守規矩，或是尊重法律與秩序。這些觀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們並非毫無根據到無法成立的地步：這些女性確實正在破壞不正義父權體制的規則，這個體制正在被拆解。像柯林頓這樣的人確實打破了身分等級；對於表面上已經過時但仍舊根深柢固的社會階序來說，她違反了規則，因為在這其中，唯有男性可以嚮往最高政治職位，女性只被期待聽從與支持他們，而非與他們競爭。於是，當她從這個角色叛逃，看起來可能就像叛國或背叛，而人們對這件事的反應可能是一邊感到迷惘、同時又令人迷惘；一邊感覺受到威脅，同時又對她人造成威脅（可回顧序言）。

據此，一名在道德和社會現實（亦即根據公平和平等的標準來說）方面沒有犯下任何錯誤的女性，可能會因為違反了父權規則手冊裡的官方命令，而面臨道德猜疑與驚愕，她的行為便有可能被歸類為危險、可疑、冒險或欺騙的，符合已經被提出的道德判決。是後者的判斷驅動了前者，而非反其道而行。她看起來就是不懷好意，至於其意為何則有待被發現——或被發明。

作為一個推測假設，這在理論上可能都很合理，但這實際上是否得以（如何）運作？是否有什麼證據顯示它確實發生？

我相信有。舉例來說，新聞裡充斥了大量的，關於希拉蕊的幕僚破壞她的電子設備，以及那可能代表了什麼意義的報導；舉例來說——再一次的，作為一個政治領域外的例子——當愛麗絲·高夫曼於其著作《全員在逃》（*On the Run*）（2014）出版後焚毀她的田野筆記時，她所面對的指控。隨後，多位權威人士和學者根據極為薄弱的基礎指

控她偽造了大部分研究內容，因為她記錄了某項警方的不當行為，但在被提及的城市（費城）就職的律師友人卻剛好沒有聽說過這項罪名。還有其他許多指控都為高夫曼的成就蒙上了陰影，有關於其不當學術舉止的指控，甚至有要以共謀殺人罪名將她起訴的荒誕呼聲，因為她曾經生動地描述了她和朋友在一位親近的共同友人遭殺害後，曾經編織過短暫的復仇幻想^{註240}。

然而，當某個人像柯林頓和高夫曼一樣破壞證據時，對她們產生懷疑難道不是誠實的反應嗎？答案是否定的。這些在相關領域裡都是完全標準的作法。上述描述——以及由此衍生的、鬼鬼崇崇丟棄一支黑莓機彷彿那是電影裡的一具屍體般的畫面——既帶有偏見，又誤導他人。在柯林頓幕僚的例子裡，他們並沒有摧毀證據，他們遵循了保護機密資訊的標準程序；高夫曼則同樣依循了民族誌研究的最佳範例。

當男性與這些行為有所牽扯時，事情就不值得注意了，因此也經常不會被注意；但是當一名侵占了男性領地的女性做出同樣的事情時，她的行為——以及她——就有可能看似在欺騙他人，或是性格粗疏。

回想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士．柯米（James Comey）的說詞，他說柯林頓對電子郵件的處理「極度不小心」，且在出訪海外時，將美國人民置於來自「敵方人馬」的嚴重風險中。這兩段描述本身以及對它們的後續理解顯然都很誇大。柯林頓和其他政治人物相比是如此地不小心——這想法似乎是由一個心照不宣的道德評價所驅動的，是一個預先決定了她有罪的信念，而非對證據的公正評估。

在澳洲有一宗略為相似的事件。當時茱莉亞．吉拉德從澳洲總理之位下台後，因為一起虛構的、約莫二十年前的貪腐指控而受審。這些指控最終並沒有受到證實，且普遍被認為是由她的老對手、當時的總理東尼．艾伯特（見第三章所討論的，她的「厭女演說」靈感來源）所帶領的一場獵巫行動。饒是如此，人們卻認為吉拉德不僅展現了「判斷上的疏失」，更不知怎麼搞的，在作證時顯得「含糊其辭」和「過火、不自然」，甚至「戲劇化與憤怒」。儘管實際層面上她是「一名優秀的證人」，然而，「她的行為舉止卻帶有一絲演戲的元素……她說話的姿態顯得平板。」皇家調查委員會委員如此表示^{註241}。

在伯尼．桑德斯指出柯林頓不夠資格的爭議性言論中，他則把事情歸咎於她那「糟糕的判斷力」，因為她對伊拉克戰爭投下了贊成

票，而川普在後續與柯林頓辯論時反覆地重複這套說詞。唐納．川普的副總統麥可．彭斯同樣也贊成伊拉克戰爭，但川普卻表示彭斯有資格「偶爾」犯下這類錯誤。「那她沒有嗎？」CBS電視台的蕾絲麗．史達爾（Leslie Stahl）在提到柯林頓時這麼問川普。「不，她沒有。」是川普的完整回答。「知道了。」史達爾眨眨眼，然後繼續訪談^{註242}。

假裝 Faking it

最後一個顯示性別偏見有可能如何在大選中運作的珍貴證據來源，是ratemyprofessor.com網站上的互動資料庫，其中收納了大量的學生評價（約莫一千四百萬筆）；這個資料庫由班傑明．施密德（Benjamin Schmidt）所設計，依照「科目領域」和「教授性別」分門別類地展示了評論中詞語使用的頻率。並不是所有的性別化描述都像「女巫」和「潑婦」一樣明顯可見，而憑著直覺，我輸入了「虛假」（fake）一詞，結果驚人（見圖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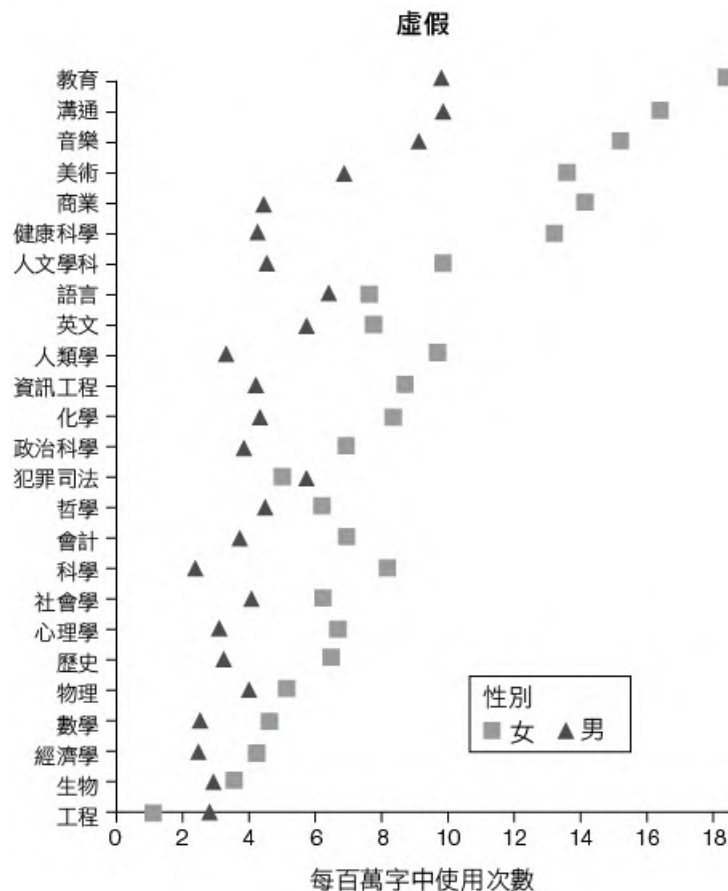


圖8.1：學生評量中對不同學術領域內的男女教授使用「虛假」一詞的頻率（根據擷取自<http://benschmidt.org/profGender/#fake>的數據與圖表，資料擷取於二〇一六年九月。

結果顯示，除了兩門科目以外，女性教授比較常被描述為「虛假」的——有時候高出好幾倍；反面來說，男性教授則比較有可能激發學生使用「真誠的」（genuine）一詞，儘管兩者之間差距略小。（而這一次，除了單一科目以外，其餘皆為如此；那是一門不同的科目，並未明確顯示出任何模式。）針對「冷漠」、「吝嗇」、「齷齪」和

——再次令人震驚地——「不公平」的搜尋結果也顯示了戲劇化的性別分配，也就是說，女性似乎比她們的男性同僚更常被看成吝嗇、齷齪、冷漠、不公平，以及最重要的，虛假，而非真誠。

你可能會好奇，是否男女教授正好教學風格不一樣，因此遭遇了不同類型的評估和批評。幸運的是，斯柏拉格和瑪索尼在前面提到的論文（2005）中處理了這一點，他們認為這不太可能：男性教師經常獲得相同面向的評論，但它們卻座落於相反的兩極，顯示了男女教授並沒有展示出大相逕庭的特質，而是受制於嚴格程度有所差異的標準。

讓我們假設（我認為這是安全的假設，儘管也是可以被駁斥的），女教授並不應該因為她們不知為何確實看起來「虛假」——無論那看起來究竟會是什麼樣子——而招致這些不客氣的觀感，這顯示了，和她們的男性同儕相比，人們比較傾向於把身處權威位置上的女性視為裝腔作勢或冒名頂替的人。

讓我們假設這是真的：身為道德和知識權威時，和男教授相比，旁觀者看待女教授的眼光裡頭有時會出現所謂的冒牌者症候群（imposter syndrome）。這個假設能夠幫助我們解釋，伯尼·桑德斯之所以比希拉蕊·柯林頓受到更多千禧年世代的喜愛，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人們對兩人的正直、誠懇和真誠持有不同的觀感，而且顯然超越了兩人之間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差異——尤其當我們清楚看見了，那些暗示柯林頓不誠實與不可信賴的指控基本上都無疾而終之後（Abramson, 2016）。

這也有助於解釋某些詭異的陰謀論，包括希拉蕊的健康問題遠比報導所說的更嚴重——這導致大選兩個月前出現了十足荒謬的謠言，指出希拉蕊有一個「替身」，或另一種說法是希拉蕊已經過世，且由這個面貌酷似者兼魁儡所取代。（《老闆度假去》〔*Weekend at Bernie's*〕^{註243}見見希拉蕊的九月。）

希拉蕊·柯林頓也不是第一個受這類觀感所苦的女性政治人物。茱莉亞·吉拉德被嚴重抨擊其人不真誠可靠，以至於她要試著在第一次的競選活動中藉由介紹「真正的茱莉亞」給澳洲大眾，好彌補那件事所造成的傷害。然而這份努力卻驚人地一敗塗地；吉拉德被無情地嘲笑了，並且又被描繪成像俄羅斯套娃一樣的形象——一層又一層的表面，其下沒有實在的核心價值。

回想我在開頭時所引用的名嘴看法：「她有許多面具，但誰看過她的臉？」他引用一名不具名友人的說詞：「她要嘛就是非常保守，要嘛什麼都不相信。我們最好希望她是保守的。」在他的對手身上，你至少知道你迎來了什麼，「但她卻非常可能在假裝。」在她的行為舉止中可以見到「一種近乎虛偽的馬基維利傾向（Machiavellianism）^{註244}」；沒有真實的政治願景，她的政策僅僅建立在「認為選民可能會喜歡什麼」之上，而如果她「除了權力以外什麼都不相信」，且毫無顧忌地渴望獲得權力，那麼，「這難道不會在開明的左派圈子中掀起不堪設想的恐懼？」讓你忖度著，不如乾脆投給右派候選人？——「不管你多麼不同意他，他卻可能是比較好的領導人，因為至少他代表了某個東西。」（Craven, 2010）

如果你一無所知，你有可能會假設上一段這些相當特殊——且生動——的畫面是在講希拉蕊·柯林頓，而不是茱莉亞·吉拉德。形容這兩人的方式始終驚人地相似，尤其當我們考量到她們之間在外表、年齡和歷史上的差異（儘管差異顯然不包括她們中間偏左的政治傾向）時，更是如此。

對於政治領域內的女性的信任，似乎甚至連在視覺觀感的層級上都崩潰了。她們看來空洞、僵硬、木然、像機器人，而且虛假、不真實；她們的精力似乎不是來自於她們的內在，她們的價值似乎也不是——這隨後被認定為是單純來自於反覆無常且外顯可見之社會力量的產品。

當柯林頓在第三場辯論中指稱川普為普丁的魁儡時，川普的立即直覺值得注目：「不……不是魁儡……你才是魁儡！」他氣急敗壞地說。與往日不同的是，他似乎真心相信他所說之事，她是木偶，他是主人。

川普的支持者經常贊許地稱他為坦率直言；我認為我們可以這麼說，許多自由派人士低估了這個男人在沒有真實內涵的情況下，卻能給人真實印象的能力——因為川普所說的許多事情都是不正確的，甚至是令人憤怒的謊言，是前後不一致、自我矛盾的內容，或是對自身過往言論的反轉。但我們應該自問，當我們給予準政治領導人和其他對象們真實或真誠的形容時，這究竟是因為我們相信他們說了實話而非謊言，還是因為他們基於某些原因看來很適合這個角色，也許，這個原因是他們以自然的姿態說了一個好聽的故事？不像柯林頓，說到底，她受制於一些其實和她本人沒什麼關係的因素。（可以比較當人

們偏向於接受引用了特定而非一般性資訊的解釋時，會出現的基本歸因錯誤。）

在一定程度上考量到這點後，我相信，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擔心川普會贏得選舉。同時，有鑑於一個儘管微小但卻可以預測的、很大一部分由性別所驅動且可能具有顯著影響的轉向效應，我格外地恐懼柯林頓陣營的低投票率會使她損失慘重。至少，無論對或錯（換句話說：無論能否被證明），我事前就已經公開對此表示憂心^{註245}。不管情況為何，真實的政治學和誠實人格的美學能夠、也確實對政治領域中的女性造成特別強烈的反作用力。當她看來並不屬於指揮台上或總統辦公室書桌後的位置時，她便可能顯得不可信賴、不誠實、是一個冒名頂替者，甚至使人發自內心地，並因而在道德上感到噁心。我們傾向太過迅速地相信自身的不安感受是證明不良人格的證據，同時，川普看來符合你預期中會進入權力位置的那一類男性，一個領導人，就算不是在政壇，也會是在某個領域裡。因此，許多人準備好在推特，以及更多事情上追蹤他——而如今要去哪裡、要付出什麼代價呢？天佑我們。

^{註225}：例如，參見曼恩（2016a）。我在其中更仔細地討論了吉拉德的狀況，並且引用了歷史學家瑪莉蓮·雷克（Marilyn Lake），她總結道：「如今這是自明之理，比起當代的評論者來說，歷史將會給予吉拉德的總理身分更多同情……然而，吸引最多歷史學家注意力的，會是她所受到的對待，猛烈的厭女情結、無法容忍女性掌權的男性們的歇斯底里，他們給予她潑婦、女巫、騙子、篡位者、一個拒絕在男性對手面前彎腰的不正當索求者等標籤。」

^{註226}：必須澄清的是，此處的用意並非依照它們的重要性排序，進而就此提出一個書呆子式的分析，以討論針對這份結果來說什麼是最重要的「要不是」因素。相反的，這是為了要點出，在選舉前夕以及結果中所出現的、紋理更為粗糙的社會學議題：為什麼這甚至曾是一場激烈的競爭？因為，儘管理性的心智們當然可以不同意柯林頓作為總統候選人的優點，但他們依舊很難質疑：（a）根據當時的證據，柯林頓是比川普更優秀的總統候選人，而這些證據在事後並未被證實錯誤（正好相反）；以及（b）如果厭女情結不曾是（這樣）一個因素，這件事對（明顯）更多人而言，會是（更）明顯的。

^{註227}：本章的此段落大多援引自我先前的著作（2016i）。

^{註228}：我在此主要參考海曼、瓦倫、福克斯（Wallen Fuchs）和譚金斯（Tamkins, 2014）等人的研究——後續寫為海曼等人（2014）——以及海曼和沖本（Okimoto, 2007）與帕克斯——史坦（Parks-Stamm）、海曼和賀恩斯（Hearn, 2008）的研究。

^{註229}：比方說，可參考塔克·卡森，他在他於MSNBC電視台的節目《塔克》（Tucker）上反覆提到，每當希拉蕊·柯林頓出現在電視上時，他就不自覺地併攏雙腿。「她讓我覺得害怕，」他說，「我無法控制。」（但就算如此好了，他也並不需要在電視上表現出來。）Ryan Chiachiere, “Tucker Carlson on Clinton: ‘When She Comes on Television I Involuntarily Cross My Legs,’” Media Matters, 2007/07/18, <https://www.mediamatters.org/research/2007/07/18/tucker-carlson-on-clinton-when-she-comes-on-tel/139362>

註230：在海曼等人（2004）的研究中，參與者的平均年齡為二十歲半（但可惜範圍與標準差並沒有被列出），這將會讓參與者們平均看來大約與我的年紀相當，亦即屬於千禧年光譜的前半部。在洛德曼等人（2012）的研究中，該份調查招募了修習心理學概論課程的大學部學生，因此，儘管詳細的年齡資訊並未被標明出來，保險的假設是大多數的人屬於千禧年世代。最後，保羅和史密斯（2008）的研究調查對象被描述為是俄亥俄州內將近五百位可能選民所組成之相對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其中包括年齡介於十八到二十四歲的人。

註231：此外，另一項由保羅和史密斯連同瑞秋．保羅所作的研究（2007），明確地針對（當時為大學生的）年輕選民進行調查，並且發現他們評量虛構男性和女性總統候選人履歷的方式有所不同。當履歷上出現一個典型男性姓名時，和被替換為女性姓名時的情況相比，該份履歷有顯著較高的可能，會被認定為屬於一個較有成就的男性政治人物且較有希望的總統候選人所有。但有趣的是，這個結果在參議員候選人上並不成立，暗示了僅限於當女性在爭取未曾被挑戰過，以及／或史無前例的陽性屬性權力與威權位置時，這個結果可能才會出現。

註232：此處的獨創聯想應歸功於塔麗．曼德柏格（Tali Mendelberg）（2016），在她對我的論文《厭女情結的邏輯》（Manne, 2016d）的精采評論中，曼德柏格指出，川普非道德性的噁心反應將可能會在他的支持者中引發道德評斷。

註233：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每一個人都同樣容易產生噁心反應。但英巴爾與皮扎羅連同保羅．布魯（及其他人）皆曾指出，容易感到噁心的人更可能在社會面向上持保守態度——這是一個在其他脈絡中更值得謹記於心的發現。但由於噁心似乎易於（更扼要地）透過公共論述而擴散，我們並不能肯定，其解釋力在接下來柯林頓的例子中是否如此受到限制。

註234：值得放在心上的，是，柯林頓在不久前如何一度變得比較受歡迎，也就是在她離開國務卿的職位後。隨後她要求「升職」，進而被許多人視為貪心與貪婪的，多篇針對她的政治生涯所作的報導信誓旦旦地這麼指出。例如可參見：Sady Doyle, “America Loves Women Like Hillary Clinton – As Long as They’re Not Asking for a Promotion,” Quartz, 2016/02/25, <https://qz.com/624346/america-loves-women-like-hillary-clinton-as-long-as-theyre-not-asking-for-a-promotion/>；以及 Michael Arnovitz, “Thinking about Hillary: A Plea for Reason,” Medium, 2016/06/12, <https://thepolicy.us/thinking-about-hillary-a-plea-for-reason-308fce6d187c>

註235：例如可參見：Callum Borchers, “A Former Top New York Times Editor Says Clinton Is ‘Fundamentally Honest.’ So...,” Washington Post, 2016/03/3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6/03/30/a-former-top-new-york-times-editor-says-hillary-clinton-is-fundamentally-honest-and-trustworthy-so-what/?utm_term=.2759c1813670

註236：編註：知名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Irving Goffman）之女。

註237：比如，根據一項近期研究，所有種族的學生都偏好非白人教授。Anya Kamenetz, “Study Finds Students of All Races Prefer Teachers of Color,” NPR, 2016/10/07, <https://www.npr.org/sections/ed/2016/10/07/496717541/study-finds-students-of-all-races-prefer-teachers-of-color?t=1563451065078>

註238：吉拉德（2014）自身的說法是：「歐克的報導對這場選舉造成了破壞性的影響。它迎合了選民們過去在想到我時就已經放在心上的問題：假如我未婚、無子，我真的能夠理解家庭的壓力和憂慮嗎？」

註239：Jeremy Diamond, “Trump: I Could ‘Shoot Somebody and I Wouldn’t Lose Voters,’” CNN, 2016/01/24, <http://www.cnn.com/2016/01/23/politics/donald-trump-shoot-somebody-support/index.html>.

註240：Lubet, 2015a.

註241：Matthew Knott, “Unions Royal Commission Clears Julia Gillard but Questions her Credibility as a Witness,”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14/12/19,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unions-royal-commission-clears-julia-gillard-but-questions-her-credibility-as-a-witness-20141219-12alcd.html>

註242：Tessa Berenson, “Donald Trump Says Hillary Clinton Can’t Make Mistakes, but Mike Pence Can,” Time, 2016/07/17, <https://time.com/4409827/donald-trump-mike-pence-hillary-clinton-iraq/>

註243：譯註：美國喜劇電影，於一九八九年上映，內容描述兩個年輕人受邀到老闆的別墅度假，老闆卻遭人殺害，兩人為了不被懷疑而將老闆的屍體戴上帽子與墨鏡，使屍體看起來像是正在度假的真人。此處作者意在指出，希拉蕊·柯林頓的九月如同電影內容一般。

註244：譯註：在心理學中，馬基維利傾向指的是一種人格類型，這類人格天生善於操縱人心、算計，與欺騙，並不是經過選擇的結果，也不必學習這麼做。

註245：為免我被指控事後諸葛（換句話說：說謊）——而且別忘了，在這個川普已（驚人地）開創了後事實和假新聞的時代裡，要求一個人的主張符合現實看起來多麼像是過季的吹噓——我在三月和五月時寫下了這份擔憂，隨後帶出我於七月十一日所刊出的一篇文章裡的暫時性預測（Manne, 2016d）；我並於十月十九日再次重申（Manne, 2016i），儘管當時希拉蕊在民調中穩定領先，後續又在推特對話中開始提出解釋與辯護。

比如說，十月十九日時我在推特上寫道：

@kate_manne：「當男人和女人競爭——社會心理學研究有助解釋，為什麼仍有大約38%的選民支持川普」，並提供我刊登於《赫芬頓郵報》上的文章連結，本章第一節的內容乃根據這篇文章所寫（Manne, 2016i）。http://twitter.com/kate_manne/status/788798586268057600

我在@kate_manne上補充：「儘管民調領先，但這些研究讓我對希拉蕊·柯林頓能否獲勝感到悲觀。支持一名女性而非男性當總統，這深深違反了我們的舒適圈。」http://twitter.com/kate_manne/status/788874657319546888。當回應我的反對意見指出，根據過往證據來看，這一階段的民調鮮少出錯時，我對@bweatherson和@FiveThirtyEight解釋，我「因為這一次的性別動力而懷疑根據過去選舉所做的推論。」http://twitter.com/kate_manne/status/788875451779407872

最後，我補充（再次對@bweatherson和@FiveThirtyEight）：「在一對一競賽中，強大的性別偏見可能促使某些柯林頓的支持者不去投票。」http://twitter.com/kate_manne/status/788883913557078016。當然，這遠不如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著實驚人的先見之明，他預測了哪些「州」可能會為川普的勝利負責。見：Michael Moore, “5 Reasons Why Trump Will Win,” MichaelMoore.com, 2016/07/21, <https://michaelmoore.com/trumpwillwin/>；Matthew Sheffield, “Michael Moore: People Will Vote for Trump as a Giant “F**K You” – and He’ll Win,” Salon, 2016/10/26, <http://www.salon.com/2016/10/26/michael-moore-people-will-vote-for-donald-trump-as-a-giant-fk-you-and-hell-win/>.

結論 付出的她The Giving She

曾經有一棵樹……而她愛著一個小男孩。每一天男孩都會前來，然後他會蒐集她的葉子，用它們做成皇冠，扮演森林之王。

他會爬上她的樹幹，吃著蘋果，在她的樹枝上擺盪，然後他們會玩捉迷藏，當他累時，他會在她的樹蔭下睡覺。

男孩愛著樹……非常愛，而樹很快樂。但時間流逝，男孩長大了，而樹被獨自留下。

謝爾·希爾弗斯坦 (Shel Silverstein)
《愛心樹》(The Giving Tree)

這是《愛心樹》的故事開頭。《愛心樹》是由謝爾·希爾弗斯坦所著的一本知名童書，於一九六四年首次出版，至今仍在印行並熱銷註246。本書在亞馬遜網站上獲得了四顆半星的評價，某些父母說，他們的小孩熱愛它，並認為它對無條件的愛提供了極致感人的描繪：樹，一個相當明顯的母親角色，為她深愛的獨子付出了一切。另一些人則擔憂當男孩開始有不合理的索求時，她未能建立嚴格的界線。同時，他聽起來不太感恩。例如：

「我長太大，不能爬樹跟玩樂了。」男孩說，「我想要買東西讓自己開心。我想要一點錢！」「我很抱歉，」樹說，「但我沒有錢。我只有樹葉和蘋果。孩子，拿走我的蘋果然後在市裡販賣它們，這樣你就會有錢並且快樂了。」

男孩返來，甚至索求得更多——他愉快地宣布他需要一個住所，於是樹給了他自己的樹枝，他拿去，用它們蓋了房子；然後男孩想要一艘船，於是樹給了他自己的樹幹，他拿去，用它們建船；他動身了，展開冒險。與此同時，對樹來說，她很快樂：「……但不盡然。」倒數第二節的最後一句詩句震撼了你，然後詭異而引人注意的是，它的涵意從未被往下延伸。

於是，自然而然地，這留下了疑問，例如：其他那些時刻，樹真的快樂嗎？假如不快樂，這重要嗎？男孩曾經給她任何回報——或甚至任何東西——嗎？

無論情況是什麼，她都來不及收回她損失之物了；她已經一無所有，男孩拿走了她的全部。當他疲倦地從偉大的航行返回時，她沒有

剩下任何東西可以給他，除了樹墩，是他把她變成那樣。男孩把頭放在那上面休息，故事在此結束。

在我為本書進行研究的期間，我對人們認真看待厭女情結的可能性感到越來越不樂觀——包括在適當時候將它視為一個道德優先議題——除非他們已經這麼做。而我發現，這一類人比我所盼望得要少。我發現，和厭女情結相比，讓人們對觸發警告——這是一個相對輕微的主題——感興趣，要簡單許多。厭女情結在事實層面與譬喻層面上都正在殺害女孩與女人一事，很顯然並不足以吸引那麼多人^{註247}。

我其實不該為此驚訝，厭女情結一直都在殺害女孩與女人，在事實與譬喻層面上皆然——尤其是那些不守規矩的女孩與女人。事情便是如此，這是一個相當悲傷的狀態，但我們很難看到有什麼能夠改變它。厭女情結是一個自我遮掩的問題，在這個現象本身底下，光是試著讓人注意到它就是不法的、不能見容於社會的，因為女性理當服侍他人，而非為了自己徵求道德注意力和關懷。

然而二〇一六年隨後降臨：唐納·川普當選總統。不容置疑的是，在得以解釋這個未能被大多數人所預見的災難性結果的各個因素中，厭女情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而對於那些認為厭女情結和種族主義在此沒有關聯的人，我恕難苟同。這不只是因為互相交織的壓迫體系可以強化弱勢身分，也是因為，某些迄今處於支配地位的社會行動者，例如失望的白人男性，會在他們針對女性的社會跟情緒勞動發展出一種戒斷症狀或剝奪心態時，完全無差別地將自身怒氣發洩到，比如說，非白人與移民，以及白人女性身上。

有鑑於厭女情結對選舉結果可能產生的影響，你或許會以為來自不同政治光譜、但同樣為此結果哀悼的人們如今可能會意識到厭女情結的力量，意識到它如何扭曲我們的道德和理性判斷。你可能以為，他們可能會願意說「我錯了」，考量到許多人曾無情地、猛烈地、不成比例地、誤導地、說教般地，以及有時在我看來，自溺地攻擊過希拉蕊·柯林頓。但是，你這麼想就錯了，這些道歉大部分都沒有發生。亦須注意的是，在這件事情上，發動這些攻擊的人也疏於傾聽那些有足夠立場做出判斷的女性意見，當她們指出了這些有毒情緒的累積可能會讓柯林頓輸掉選戰時。即使到了現在，好像也沒人回頭看看那些曾幫柯林頓辯護的人，他們不管自己支不支持柯林頓的政治立場，都仍為持續針對她的厭女抹黑行動發動抵禦，抑或指出箇中明顯的雙重標準以及對她特別嚴格的規範。那些確實為她辯護了的人們之

中有著可見的共通點，包括布蘭妮．庫柏（Brittney Copper）、瓊．瓦許（Joan Walsh）、亞曼達．馬寇特（Amanda Marcotte）、蜜雪兒．戈德柏格（Michelle Goldberg）、琳蒂．魏斯特，和雷貝嘉．索爾尼（Rebecca Solnit）等人^{註248}，她們都是網路上知名的女性主義作家，且剛好都是女性。所以我們可以放心地假設，她們都熟悉厭女攻擊的滋味——尤其因為她們本身都可能收到不成比例的大量仇恨信件，假如我們參考近期的研究結果的話^{註249}。

於是你可能以為她們會被當成權威人士，因為她們證實了柯林頓所遭受的待遇確實帶有獵巫意味，並非無的放矢。但情況也並非如此：人們普遍認為這麼說的女性反應過度，而不會認為她們察覺到社會上的風險因子，就如同察覺到會造成林地野火的因素（例如高溫、風、乾旱情況）一般。假如你曾在容易發生野火的地區居住過，你就會變得比較熟練，能夠預期火災特別有可能在哪些日子發生——儘管當然不是永遠正確。於是主要問題就變成了火勢能否在發展成熊熊烈火並造成嚴重損失前，加以控制。

假如這在知識層面上看來並不可信，甚至嚇人，那麼，參考以下這則軼事。多位評論者於三月底時說柯林頓的聲音「尖銳刺耳」（shrill）（在她基本上確認成為民主黨總統參選人並發表獲勝演說的那個晚上後），當時激烈的辯論持續了整整一週，討論這是否和她的音質和音色有關。還是說，它有可能其實是性別歧視？我個人願意打賭它是，一部分是因為，我曾見識過吉拉德在成為澳洲總理後遭遇到一模一樣的批評；一位聲樂老師認為她的音質經歷了某些轉變（變慢、變低，並且帶有更多鼻音、喉音，也更刮耳），而吉拉德必須改進她的聲音好符合選民的喜好^{註250}。另一則事實是，若快速翻閱我所收過的成堆仇恨信件，也可以看到沒有聽過我說話的人說我的聲音尖銳刺耳^{註251}。這絕對是一個有力證據，當某個人用這種聽覺上的恐怖形象來形容一名女性的聲音時，我們應該保持懷疑態度。然而，正好相反的是，我們經常讓他們發表這種印象卻不會受到挑戰，即使我們有理由懷疑這個印象來自於性別偏見，他們想要這麼做的渴望卻彷彿仍然勝過了我們的集體利益——也就是，不再讓這些印象持續存在於論述當中。「我和其他許多人確實覺得希拉蕊．柯林頓的聲音尖銳刺耳，事實上，她的聲音很多時候聽起來就像是一隻貓被拖過黑板。」三月時的一場辯論裡，當討論到抱怨柯林頓聲音「尖銳刺耳」一事是否帶有性別歧視意味時，一名來賓在福斯電視台的節目上這麼說（而說到人們一般會覺得聽起來難受的聲音，例如指甲刮在黑板上或貓咪

的高頻哀叫，若你可以綜合這兩者，何須只使用一個譬喻呢？）克里斯·普蘭特（Chris Plante）^{註252}才剛看完許多男性政治人物對彼此吼叫的影片，卻沒有對他們的聲音特色有類似（或同樣普遍）的反應^{註253}，不過普蘭特解釋道，這其中有所不同：也就是他的印象。他只是在報導事實，事實對他開口說話了——或者可以說，如貓叫春般地對他嚎叫了^{註254}。

正如同我在前言中所提到，並一路以來試圖釐清的，我此處的擔憂主要和道德診斷有關，而不是譴責；個人主體有罪或無罪，並不是主要的考量。然而，上述的說詞是眾多例子之一，而從此刻開始，我們可能可以試著將這類說法變得不被社會所接受。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當我們為了目光所及裡每一件可能導致了柯林頓落選的事而責怪她，而非自己承擔責任（這在很多情況裡都是合適的做法）之時。（川普在第一場辯論中說了，為什麼不把一切都怪到她頭上呢？事後看來，這原來並不是一個無意義的反問句——而且絕對不是幽默的。它的答案是「毫無理由」，因為我們，社會大眾，沒有給他任何理由這麼做。）

空洞地以有害的方式揣測女性動機的傾向（另一個常見的厭女肖像畫類型）同樣有極為惡劣的影響，但卻較少被注意到，比方說，聲稱柯林頓自私、不知感恩、自戀、壞心腸、是「伸手者」、自以為理所當然，以及是個騙子、貪腐、偽善、高度享有特權，並且是建制派的成員。

這些批評一以貫之地被認真看待並信以為真，然而，再一次的，在撰寫此書的此刻，我上週才在推特上收到許多同樣的批評（包括我是某個未被言明的「建制派」的成員）^{註255}，而它們並沒有建立在任何於我看來合理，或甚至可以理解的基礎之上——只除了一件事，我竟敢指出（在對一名友善陌生人的一條推特回應裡），白人女性有可能不顧川普的不當性行為而投票給他，因為她們對典型會成為自身伴侶的白人男性（由於規範了浪漫關係的異性戀霸權，以及種族統計與社會規範）有著強力的忠誠規範。這不只足以招來那些往往帶著強暴威脅、拼字錯誤，且近來也帶有反猶太情結的髒水往我身上潑，在這個脈絡下更為有趣的是，這還招來了柯林頓那種層次的同一類侮辱。

這些經驗於我來說毫不特殊，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我是個無名小卒；我不有名、沒有嫁給比爾·柯林頓、不是政治人物，也沒有錢。我唯一的身分，也是為我招致了這些道德反應的唯一要素，顯然便是

身為一個女性，而且在他人的眼裡看來，我占用了原本受男性支配的空間，卻沒有迎合父權的利益和虛榮心。我猜測，這就足以吸引到這種道德反應，如同當某人擅自進入他人住宅時可能預期會遇到的，因為某方面來說，此人確實做了這件事。

因此，為什麼不讓這種無法被接受的行為變成羞恥呢？如果人們拒絕從錯誤中學習，反倒因為自身參與了對柯林頓的厭女攻擊而產生的後果持續地責怪她，而這樣的厭女攻擊直到今天仍持續不斷，我們為什麼不大聲指出來^{註256}？

這帶領我來到了另一個我懷疑促使厭女情結歷久不衰的原因。本書一路以來對各個案例的討論顯示了，在個人主體的道德心理學層級上，厭女情結往往看起來像是一個根據羞恥而生的現象。一個厭女的世界觀裡，在陽剛內部的階序中，女性的仰慕和贊同尤其賦予了男性相對於另一名男性的地位；當被拒絕或得不到這樣的注意力時，昔日的，或是有抱負的「阿法男」經常會病態地感到羞恥。因此，試著大聲喊出這種厭女情結是很危險的，即使這股羞恥感只是一個副產品，它的目的是試圖讓他在下一次開口說話前先三思。當女性竟然膽敢抱怨，或甚至指出了少有爭議的厭女情結實例時，情況尤其如此；我們的指定角色是扮演道德傾聽者，而不是批評者或審查者。與此同時，當我們考慮到，在我們為尖銳的厭女攻擊的不完美受害者們辯護時可能會受到哪些社會懲罰——道德憎惡、反向羞辱和流放——時，我們自身可能會選擇保持沉默。

但是羞恥感——特別是因為自以為理所當然而產生的這類羞恥感——所構成的那種痛苦並不是你所能夠安撫或迎合的，而在我看來，那似乎是某些左派人士此刻所犯的錯誤，包括了某些最有才智和敏感度的評論者們，例如亞莉·羅素·霍希爾德（比如說，可參見《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2016〕一書中，最後寫給左派同僚的「公開信」）。面對那些容易產生以羞恥感為基礎的厭女與種族主義衝動的人時，傾聽，並將同情心給予他們，恰恰等於餵養了他們對「理所當然之權利」的需求和認定，而這些權利的不被滿足，正好就是一開始驅動他們攻擊的原因。換句話說，這是提油救火，至少長遠來看是如此。對於一個，沒錯，確實感受到真實痛苦並發動攻擊的人——但這僅僅是因為他們如此欲求不滿，而且一開始就不合理地覺得自己理所當然要獲得這類道德注意力——你幫不上太多忙，也無法付出太多。因此，自由派的衝動在此不合時宜，除非我們想要永遠困在餵養這隻需

求怪獸上面，就如同許多白人女性在面對她們持續效忠的白人男性時，明顯確實致力於此，即使他們做出了不當的性互動（以及其他）行為。

這通篇所要指出的是，厭女情結讓人如此不理性、極度導向事後的合理化，並使人喪失了那個眾人自我吹噓與聲稱極度看重的事物，也就是個人責任感（一個複雜的哲學概念，但這裡的重點乃是一致性的問題），而這導致我對於和他人講道理以便讓他們認真看待厭女情結一事，感覺到相當悲觀。而我懷疑，許多讀到此處的讀者大概和我有著類似的心境，並對於大多數人的無動於衷、漠不關心和惡性無知感覺到同樣挫折。因此，也許該說的是——帶著一點不情願：去他們的。這裡狹義的意思是，不要再試著用溫潤的蜂蜜來招攬中庸者。也許我們就該從更基進、甚至尖銳，但如今在我看來是更正確和基本的假設下手？這些假設是什麼？

我們經常被期待違反一個範例，這個範例對男性和女性達成各種人類卓越成就的能力——包括扶養照顧的能力——刻意保持中立的態度，但我們又必須同意，如今，在人類歷史上的這個階段，我們普遍在道德上被視為是平等的，是社會與政治層面上的全人。性別歧視和厭女情結是罕見的了，而且進步將會持續下去，或多或少已無可避免。啟蒙已在發揮作用，儘管仍有零星短路。

這個對虛無假設和非虛無假設的結合是比較受喜愛的，然而，還有另一個可行的選擇，其內容正好與此相反，只是我們並不習慣加以考慮。這意味著，除非有具說服力的反面證據存在，不然我們便同意這個虛無假設：無分性別，人人都具有達成人類卓越成就的各種能力；而這在此歷史關頭之上，這樣的證據通常不足，因為控制組並不存在，也就是說，一個人們已經生活在真正平等的條件下一段時間的社會並不存在。當然，這樣的證據可能浮現，以解釋（男女）在成就上剩餘的微小差距，這些差距在許多過去與至今仍舊由男性支配的領域中已一路快速消失，例如數學、科學、科技、工程，或者就此而言，哲學領域。我們只是還不知道，儘管我們可能有預感（按賴瑞·薩默斯^{註257}的方式來說）。

然而，與其就性別歧視的假設進行爭論，我逐漸覺得受到解放，並得以指出明顯的事實：藉著維持男性的優先地位，處於支配社會階級中的大多數人得以享受著既得利益。一個恰當的回應可能是：你是真的單單好奇這個假設的真實性嗎？而就一個還無法被否證的假設來

說，它是吸引了相當多的注意力；還是說，你只是不成熟地擔心它確實是錯了，也就是說，女性徹頭徹尾與男性相等？你是在試圖建立一個合理的信念呢，還是被厭女欲望驅動、想要排除女性，或讓你不需要努力讓我們不再被排除？

確實，這份心照不宣的厭女情結假設可能讓某些人感到不自在——但是來自於不同的人。打從一開始，「女性就是不如男性一般聰明」的假設便已經使我們這些身處學術界的其他人感到不自在，對於我們之中那些撐過去的人，以及許多未能成功撐過去的人來說，扭轉形勢是我們的特權；你認為我們不應該出現在房間裡，然而我們已經身處其中，我們有權力留下，並提出讓你感到坐立難安的理論。

應用於性別的非虛無假設可能有著不同樣貌，但我於本書後半節中所強調的動力指出，當一方涉及陰性屬性的好處與服務，而另一方則涉及陽性屬性的特權和好處時，涉入這個動力的人們會被分配到兩個道德兼社會類別中的一個，它們分別是：付出者和取用者。有些證據指出，這個過程很早就開始：男嬰比女嬰獲得更多安撫，女嬰則較常被對話（或者說，較常被說話，畢竟她們無法回話）；這對女孩來說不必然是壞事，它可能有助於她們的語言能力發展^{註258}。重點只是在於，可能打從一開始，我們就已經根據指定的生理／社會性別，透過這樣的方式被區分到不同的社會角色上。

隨著幼童長大，有哪些證據支持這種付出者／取用者的區分？聊舉幾例：當男孩和女孩在學校舉手回答問題時，男孩被叫起來回答的機率比女孩至少高出八倍，也許更多；和男同學相比，女孩比較少被點到，但比較常被糾正——不只是在比例上，在絕對數值上也是如此^{註259}。這個模型合乎情理，因為知識上的高地是他的領地，說話時間亦是，特權亦同。在各種可以激勵人心的獲勝獎品前方，他會優先被想起。

五歲時，女孩和男孩們同樣確信和他們同樣性別的人可以「非常、非常聰明」，在後續幾年間，男孩們看來維持著對自身性別的信心，但女孩卻不然。相反的，六歲與七歲的女孩對女性才智的信賴程度快速降低，女孩在六歲前「已經失去她們對女性才智的信仰」，而失去這份信仰的女孩傾向於自我引導，讓自己遠離被標記為屬於「非常、非常聰明的孩子」的競賽（Bian, Leslie, & Cimpian, 2017）。

再一次的，這並不是說男孩享有所有的好處。如今他也必須和其他人（通常是其他男孩）一同排隊等候，他可能會感到沮喪，因為過

去他不大需要有耐心^{註260}；他可能會落後，然後在某些情況裡，被錯誤診斷，或過度治療。這只是說，某方面來說，太多的好處也可能是壞處，最後同樣對他造成了不公。不過，讓我們先回到年紀漸長的她身上。

她在街上被某些男性騷擾，他們命她離開自己的思緒、吸引（或抓取）她的注意力，然後告知她，藉著和他們約會，她可以給予他們什麼社會價值（她的等級）。

他相對地比較少被她在街上騷擾。

她的性被索取，被偷走了，通常是被某些男性（也許只是非常一小群）。他也可能被強暴，當這事發生時，當然是同樣可惡的不法行為，但這也少見許多；她並非從未採用這種方式從他身上索取性，但遠遠較為罕見。他可能強暴她，卻永遠不必面對事實；「不是強暴，不完全是，但儘管如此仍是令人不快的，非常地令人不快。」如柯慈小說《屈辱》中的角色大衛順口對自己所承認的。她可能投身於不想要的性裡，因為那是她必須做的；或者，他告訴她，她喜歡這樣——這是一個宣言，而非猜測。

假如他失去了進入老男孩或全男孩俱樂部——或在某些情況裡是學院流派——的獨家機會，而最重要的是，她因此從他身上剝奪了一種自由，讓他免於在她眼中成為恥辱時，他便可能斷然驅逐她，透過任何必要的手段，我們在「玩家門」事件和蘇珊·法魯迪提出的要塞軍事學院案例中，都目睹了這個情況^{註261}。

當他們就陽性屬性的角色彼此競爭時，研究顯示，大多數的人（男性女性皆然）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將偏好由他出任該職位，包括了其中完全沒有任何理性基礎支持的案例（例如：當同樣的應徵者檔案被交換時，正如同第八章中第一個提到的海曼等人〔2004〕的研究所示）。

這個圖像也可以透過相對統計資料獲得填補，包括誰在家務勞動上付出更多（她，參見霍希爾德跟曼蓉〔(1989) 2012〕對「第二輪班」的討論）；在一個異性戀家庭中，誰比較有可能對誰施行恫嚇、致傷，並且持續性的暴力（分別是他與她）^{註262}；以及誰比較有可能強暴和被強暴（同樣是他與她）。

誰對誰說教？我的感受是男性比較常對女性這麼做，而非相反；我聽到你說想要實證，那就稱此為直覺吧。（雷貝嘉·索爾尼是運用

這個概念、甚至這個用語的女性鼻祖。)

她的聲音特色(比方說「氣泡音」)摩擦刮耳,同時,同樣的特質在他的聲音裡根本就不會被注意到^{註263}。

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註264}著手閱讀一封來自柯瑞塔·史考特·金恩(Coretta Scott King)^{註265}的信,信中指認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的種族歧視,她的男同僚伯尼·桑德斯和謝羅德·布朗(Sherrod Brown)做了同樣的事。桑德斯和布朗毫無障礙地讀完了信,華倫試著這麼做卻被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消音,他援引了參議院程序中一條晦澀的規則——個人不得抨擊參議員同僚之人格,即使他就快要成為司法部長。麥康奈爾說:「看起來她違反了這條規定。她獲得警告,她獲得了一個解釋。儘管如此,她仍然堅持這麼做。」直到,他確保她無法這麼做。(根據報導,「在一次極端少見的指責中,她被會議主持人命令坐下。」)^{註266}

在工作場合裡,他可以要求加薪並可能成功,假如她提出要求,她通常會被拒絕,甚至被懲罰,因為這樣不夠禮貌,因此女性傾向不去談判交涉;她被告誡要更像個男人,並帶著魄力為之;同時研究顯示,面對她所承受的風險和獎勵,她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參見:Exley, Niederle & Vesterlund, 2016)。

假如她威脅從他身上奪走陽性屬性的特權和好處,例如道德資源、同情心、觀眾的注意力和贊同,或公民的選票呢?想想聲稱自己受害的她,想想書寫、教學、教授,或試著成為一個喜劇演員、政治人物或運動員的她,事情就這麼剛好,她們正是某些遭受了最多厭女傷害的人。

當她未能以正確的方式、在正確的時間提供陰性屬性的好處和服務時,又會如何?拒絕提供同情心讓她成為一個潑婦;關注己身內在讓她冷漠或自私;富有野心讓她不友善與反社會,且不可信賴(Heilman, Wallen, Fuchs, & Tamkins, 2004);把性注意力給予錯誤的人讓她成為蕩婦——或「歹客」(Dyke)^{註267},一個不性感的女同志;若她穿著不妥或喝醉了,她活該,或是她勾引了他,她說服他來索取他所被允諾之物,在性方面——這是他應得的。

她想要中止懷孕;懷孕越來越常被強迫進行,即使這是違法地從她身上索取了性的結果,例如在強暴或亂倫的情況裡,她被奪走她的

性自主權。更廣泛地說，根據一直以來的標準，她是拒絕了在家庭內部提供特定數量的照護，而男性政治人物和其他掌權者則大大回報了她；她被一位立法者認定為胚胎的宿主^{註268}，其他人則為強暴犯爭取更多親權，還有另一些人試圖要求為胚胎組織火化或下葬，不管是墮胎或流產之後（參考第三章，註16）。現任副總統麥可·彭斯是推動「胚胎尊嚴」（fetal dignity）的先鋒（Grant, 2016），而其他州也跟上了腳步；這些法規的鼻祖是誰？不是別人，正是在前言中出場過的安德魯·帕茲德，在密蘇里州。在我的分析裡，無論是個人的或政治上的，各種經常互相聯合卻明顯迥然不同的立場皆因厭女情結而統一起來。

她是政治人物中最少說謊的人之一，而且從未侵害過任何人，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她貪腐或欺詐（Abramson, 2016），但她卻有了那個名聲，也許是因為她收了一筆豐厚的演講報酬。

他「抓女性私處」，在性方面占許多女性便宜，但縱然如此，他仍當上了總統；她被迫對他俯首稱臣，她被他的馬屁精糾纏著說應該要更早宣告落敗（Baragona, 2016）。這就是透過厭女威脅和暴力所維護的男性支配——以及更廣泛地說，異性戀父權體制——的尖端水平，同時讓我提醒你，這還是對於相對享有特權的女性來說的待遇。這一切不應該掩蓋，其他人擁有得更少、情況更糟糕，並且面對自成一類的問題；與此相對，我們更要強調，就算是最平等的女性之間仍是多麼不平等。

我們經常期待這些女性付出如此之多，而與這個事實顯然有所連結的是，當她們被認定未能無私地服務他人時，我們會格外教訓她們。在柯林頓最近一次角逐白宮的過程中——也就是說，人們認定她把自己列為優先或她「自我服務」，這是她所遭受的批評之中常見的主題。這絕對是一項促成了針對她的敵意的因素。

然後另一件事是她被描繪成貪腐的，她「受賄」，並和華爾街「相親相愛」。

她也被描寫成資格不正當；面對她有可能成為民主黨最終的提名候選人時，人們以明顯帶著輕蔑和怨懟的口吻談論著她的「加冕」。

但是資格可能是有根據、名副其實，而且真實的；應該被補充的事則是，它們也是對比或相對的：沒有人絕對有資格獲得某些事物，但頗為明顯的是，X更有資格獲得Y。

我將把想出例子當成留給讀者的作業。

毫無疑問，柯林頓遭受到高頻率的惡意攻擊，批評她在競選總統的過程中太過專注於自我。而這些攻擊之中，許多不僅不公平，因為它們顯示了雙重與差別性的標準，某種程度上它們也顯得毫無根據，而且不受反面證據的影響。我們並不清楚，什麼東西、甚至有沒有東西可能可以緩和這些猜疑。當有人指出柯林頓有著傑出的公職生涯時，大衛·法蘭區（David French）在《國家評論》上寫道：

讓我們搞清楚，希拉蕊·柯林頓沒有做出任何犧牲——她一直活在進步幻夢中，而且她也絕對不是一名「公僕」——她是一個憤世嫉俗、貪得無厭，並野心勃勃的政治人物。她的成就貧乏，她唯一的導航星是促進她自己的利益。

希拉蕊·柯林頓一路以來多是美國生活裡的一股破壞力量，她熱切地為有求必應的墮胎服務辯護，這協助維持了一個死亡的文化，造成數百萬年輕生命的消逝；她的外交政策錯誤促使利比亞成為伊斯蘭國的遊戲場，並幫助揮霍了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勝利；她的俄羅斯「重置」政策僅僅哄騙美國人民相信俄國大熊是和善的；她持續的個人貪腐幫助降低了美國政治的品格；她主要只為她自己服務。

一個由偉大男性們建立的國家——且孕育了許多偉大總統——仍舊嚮往著尊敬它的領導人，而我們就此展開了總統的販售。一個地產大亨建立了自己的強人邪教，而一個被光榮化的政治妻子試著把自己變成一個英勇的拓荒者。但最終，除了貪得無厭的犬儒主義和可鄙的個人貪腐，我們什麼都不剩。兩位候選人都沒有為這個國家犧牲^{註269}。

這是很嚴厲的言詞，然而，做出這種錯誤類比——不光彩地——的情況太常見了，而認為柯林頓只以一種令人難以接受的方式為她自己服務，這樣的想法當然隨處皆是。

《愛心樹》並未伴我成長，我是最近才碰巧發現它的，但幾個曾於床邊故事時間聽過它的朋友說他們覺得很嚇人（其他人則仍讀給他們的子女聽，並覺得這是一個很美的故事）。因此，儘管我主要是為了寓意而採用這個故事，但我也好奇我是否過於嚴厲了。也許希爾弗斯坦的打算是讓故事成為一個給兒童的現代寓言：不要要求太多，你的樹可能會感到疲憊。

但我不這麼認為，以下是希爾弗斯坦一首特別飽受爭議的詩作，其爭議之劇，導致收錄了此詩的書籍——《閣樓上的光》（*The Light in*

the Attic, 1981)——遭某些學校禁止。對了，順道一提（真的是順道），它可能會讓你想到某個人——或者說，她在媒體上被描寫的方式：

□女士優先□

潘蜜拉．普士大喊著，「女士優先」，
當她擠到冰淇淋隊伍的前方。

潘蜜拉．普士大喊著，「女士優先」，
當她在晚餐時拿走番茄醬。

爬上早晨的公車，

她推擠著走過我們所有人

然後就有了口角或爭執或抱怨，

當潘蜜拉．普士大喊著，「女士優先」。

潘蜜拉．普士尖叫著，「女士優先」，
當我們動身前往叢林旅行。

潘蜜拉．普士說她特別渴，
就大口喝我們的水，一滴不剩。

當我們被一群野人抓住時，
他們綁起我們，要我們好好站著

在國王的面前排成一列——

一個名為油炸丹的食人族人，
兜著巨大的圍兜，坐在他的王座之上

舔著嘴唇手握著叉，

當他試著決定誰要先下鍋時——她尖銳刺耳的嗓音從隊伍尾巴傳來，

潘蜜拉．普士尖叫著，「女士優先」^{註270}。

讀著希爾弗斯坦的文字，我真心感到挫敗：厭女情結背後一個主要的動力被拿來以受歡迎的兒童詩作和受人喜歡的床邊故事之形式傳播，它甚至在孩童們上幼兒園前就已經被彰顯了，而許多人似乎並未

注意到此處正在運轉的性別動力，儘管他們真心在乎（不）灌輸這些偏見^{註271}。然而，假如男孩可以拿取他的愛心樹／她所能提供的一切，而我們認為這很溫馨，女孩卻甚至不能不受懲罰地吃、喝、使用佐料，那麼我在做什麼呢？什麼才有可能造成任何一點改變？就連嘗試都有可能讓我顯得討人厭、惱人與堅持己見（容我這麼說：刺耳），並且促成一種在美學以及道德層面上動輒帶有毀滅性的抵抗。或是，假如個人真能成功包裝粉飾它，它就變得不利於自身。

因此我放棄。我希望我可以提出一個更富有希望的訊息。最後，就讓我用事後檢討來作結。

我在整本書中提出，我們經常將被認可的人類同胞和那些被想像為物品——例如在性物化的情境裡——或次人類生物、超人類存在、非人類動物者進行對照，但與其強調認可（或未能認可）個人的人性，我試圖將對比轉移到這個詞語的後半部。在本書後半部所討論到的許多案例中，我們可以區分出被（自我）認可的人類同胞——例如就算不是全部，也在大多數面向上享有特權的白人男性——以及人類付出者，也就是一名女性，理想上，被認定要將許多、甚至是大多數自身特有的人類能力給予適當的男孩或男人，以及若情況適用的話，還包括他的子女。（對上述情況做出不同程度的改變或許是可以被容忍的，但根本上的另類選擇或對異性戀父權核心家庭組織進行批評，則不會被接受。）根據治理和建構相關角色與關係的社會規範，一個付出者於是必須提供愛、性、注意力、情感和仰慕，以及其他形式的情緒、社會、再生產與照護勞動。

這個人類同胞／付出者的區別當然遠遠不夠詳盡，但我認為它很重要。並且，根據我的論點，它支持並導致了許多（儘管絕不是全部）前述章節中所討論到的厭女情結形式，也就是享有特權和有權力者執行著他們的意志，可能是直接透過社會制度工具，或是被它們所促成；當她作為一個付出者犯錯時——包括從根本上拒絕當一個付出者，或當他作為一個客戶但不甚滿意，尤其是當因為私人訂製的付出者未能實現某個需求時，這樣的厭女情結便是結果。

艾略特·羅傑顯然想要而且覺得自己有資格獲得一個人類付出者，一部分是因為，擁有這樣一個以高地位女友形式出現的付出者可以進而賦予他自身較高的社會地位，而這是他極度渴望的。情況甚至可能不只如此，而是和他對自身人性的感受有關，假如他的「宣言」和其他類似情緒——例如《勁爆女子監獄》中的喬治·「小鬍子」·曼

德茲所懷有的——能夠說明些什麼的話。（見第五章的引言和最後一節「女性，她們太像人類了」。）

羅傑抱怨，每況愈下的他到最後不再覺得自己像個人類；他受到一個意識形態的控制，據此，女性的人性凝視——更別說觸碰——對他來說是存在的必需品。對於第四章裡提到的家庭消滅者克里斯·佛斯特來說，情況也類似；根據約翰·榮森的說法，他無法忍受失去妻子和女兒把他看作一位成功實業家的仰慕仰望，一旦他不再是這個身分以後。在那個時刻，當她沒有，或再也無法藉由在眼裡乘載他的得意形象，並將這個形象反射回他身上，進而提供他所需要的必要道德支持時，每個男人都會試圖摧毀她。因此，給予他對自我的認知，基本上也變成她的存在任務——悲慘的是，她卻一無所知，也無法預料。

我們並不總把家庭消滅或勒脖行為這種有毒的陽剛暴力視為厭女，即使在服務和反映性別角色與關係的父權力量下，它們通常都由女性承受、由男性執行，而這件事證明了，我們用一種過度心理學式的方式來思考敵意。羞恥感本身並不是一種帶有敵意的情緒，或至少不一定是，但從受害者的角度來看，它的表現形式絕對可能是，而眼下的情況正是如此，昭然若揭。

這類暴力令人恐懼的一個面向在於在普通社會關係的平和表現下，個人多麼可能輕易地錯失它初期的可能性。但當這些爆發發生時，它們使我們深入而重要地理解，在許多其他情境裡，可能有什麼正暗暗潛伏：例如他提出了絕對、自以為理所當然、不對等的要求，而不是介於兩個平等的社會生物間較為寬鬆的社會規範、期待和互惠義務。

在大多數或甚至所有相關面向上享有特權的白人男性，以及因為缺少或失去一個人類付出者而忿忿不平的人對於局勢（或局勢的不再）感到失望，那麼，在許多厭女情結的例子中，這是如何、又為何變得私人呢？我於第一章提出，這是由於在這些情境中所感受到的剝奪感具有一種特殊性質，既然我們已經探討過「人類付出者」或「付出的她」的動力，我們便可以就此多說一些。假如每一個身處相關社會階級的女性（例如在這個例子裡，那些羅傑希望可以看見他的人）都必須要付出，那麼，為什麼不是給他？在她們看來，他究竟哪裡不好？回想他蒼白的提問：「她們不喜歡我哪裡呢？」這時他正計畫要消滅一長列的她們。再一次的，他的文字如此缺乏自我覺察，假如他沒有真的採取行動的話，那些文字幾乎可能是引人發噱的。對他來

說，這些女性變成了一團無區別的、拒絕人且高傲的潑婦；因為她必然對某個人付出，她便等於拒絕了他，她的（付出）沒有兌現是在個人層面上傷人感情的。

我也討論了，當身處於相關（也就是人類付出者）階級的女性，面對著她們的目標觀眾，卻索取商品、好處、服務和支持的情況，而那些通常是她要給他、他則從她身上獲得（或取用）的東西。於是，她將顯得自以為有資格且不知感恩，彷彿她要求了超出她應得之物，她也將會看似有超出本分的想法，或違背了一直以來的性別化交易中她的承諾——尤其是當她想要得到這些好處，以避免成為一個人類付出者（例如妻子與母親）時。正如同我們在第二章中所見，拉許·林博看待珊卓·福魯克時的情況便是如此；她也是「典型」那類想要獲得墮胎服務的自由派女性，如第三章所描述的。而我們如今也可以理解，為什麼避孕措施的給付變成了一個常見的爭論點；她要求被提供一個人類付出者可以使用的對抗手段，且這個方式經常強調了她的人類能力會被用在自我發展或導向財務成功上，而那是他的轄區。後者也有著把她變成一個篡位者的風險。

正如我們在第八章以及這篇結論的前半部所見，這些女性可能被視為貪婪、貪得無厭且盛氣凌人的，她們尖銳又惱人，腐敗且不可信賴，或者她們麻木、僵硬並且像機器人一樣。她沒有提供那類她應該放棄的好處；她疏忽、不負責任、粗心草率且冷酷無情；她可能甚至一開始就沒有這些資源：她枯萎、乾燥，無生氣或荒蕪；她也在預設的（也就是順性別）女性身體和性的層級上被質疑。而藉由試著招攬支持、吸引捐款人，並贏得選民（比如說），她正索求著某些男性對手被虧欠的資源，畢竟這個位置一直以來都屬於男性。這讓她變得詭計多端、無情殘忍且不正派；她威脅要偷走選戰；她是權力和金錢的侵占者——就厭女情結的角度來說，這些是他才可以取用的東西。

在面對某些男性（或者在某些情況裡是男孩）時，女性承受著必須付出所有的壓力，包括——不對，是尤其是——注意力、肯定態度，和對他的故事的興趣。「同理他心」與「男性說教」是緊密相關的現象。身處指定的「付出者」階級之女性可能會在沒有被要求這麼做的情況下，傾向於最先也最後看到特權男性那一方的故事，這個現象尤其在第六章討論同理他心的段落中顯露出來。根據幾乎相同的邏輯，如第四章所提到的，某些特權男性可能會覺得自己不必開口詢問就有資格對著她大發議論，她被期待提供他一個專注並投入的觀眾。於是男性說教可能是規則外的例外，當知識階序的倒轉如此強烈，以至於

引起了她的注意和抗議——至少在心裡是如此，因此這被稱之為男性說教，而不僅是一場對話。

有男性會未經詢問就自行取用最弱勢的女性，因為他們假定，一旦被剝削後，她將沒有任何法律資源。悲傷的是，在丹尼爾·霍茲克洛一案中，這個假設得以被瓦解乃是一個偶然的結果，而在這類案例中，白人女性的同情心——或同理他心——可能會站在強暴犯這一方，而不是身為非裔美國人的受害者那一方。這就是第六章裡就此案例的討論要點，我認為這說明了美國社會裡的厭黑女情結的某些特性。

第七章裡討論到，有女性會為自己索取同情，但這無異於服務員要求服務，付出者期待收穫；換句話說，這是拒絕提供資源並同時反過來索求它，而雪上加霜（或者說火上加油）的是，這是一種她應該要給予他的資源。

一個看待所謂受害者文化的角度是，它在一個被動女性受害者的譬喻上進行交易：城堡裡的公主等待被王子般的英雄拯救。公主是一個拙劣的模範一事並無爭議，然而在此基礎上，「受害文化」的批評者們實際上（假如不自覺地）卻致力攻擊那些得以保留某些主體性的女性們。近一步看，發聲與表現得像一個被動公主之間的相似性是很微小的；當一個女性以一種可能具有顛覆性的姿態，或單單藉著利用霸凌者自身的行為使他們尷尬以揭露霸凌，進而挺身說出自己的故事或盡其本分時，她的主體性並沒有短少。在一個她被迫被動，或更常見的是，她被勉強（例如在高壓控制的情境中）或被占便宜（例如在涉及權力關係剝削和相關社會文本的性掠奪情境中，參見Manne, 2017）的故事裡，這仍舊、甚至加倍為真。在承認這點時我們可能會說：它發生在我這個主體身上，以不正當的方式，而且沒有適當的法律補救，我將會演出這件事，而你們，觀眾成員們——或者在某些情況裡，讀者們——將會出任犯罪的證人，提供必要的道德判斷。正義未被實現，因此，你來當陪審團。

或者，你可能被邀請扮演這個角色，為了那些再也無法就程度不一的厭女犯罪與犯行說出自身故事的女性，或是為了那些因為在實際上或名義上對父權律法造成破壞而遭到指控、審判、判刑，以及監禁或下獄時，無法為自己作證的女性。你此刻的焦點通常應該不在於告發厭女嫌疑犯或被認定挪用了厭女社會力量傷害她的主體們；相反的，焦點主要應該是釐清事實，為她的作為達成一個歷久不衰的「無罪」判決。

希爾弗斯坦的另一首詩將提供一幕圖像，也將會稍微探討到一個合理的問題，也就是在他其他作品中，男性是否曾經給予女孩與女人任何東西。答案是肯定的，但在此處，這個答案的作用頂多只能說參差不齊。這首鮮為人知的作品是為成人所寫，並出現在一本名為《為愛謀殺》（*Murder for Love*）的詩選與故事集（1996，由奧圖·潘茲樂〔Otto Penzler〕所編）中；希爾弗斯坦被收錄其中的作品有著以下的篇名與開頭：

□因她所作所為□

她必須死。

歐姆心知。

他亦知他無法殺死她。

甚至無法嘗試殺死她。

那雙眼。會望向他。甚至不能嘗試。

那麼，該怎麼做？

有一人名恩。潛居洞穴。

在堅硬山巒彼端。一處骯髒洞穴。

遠離村莊。

恩，以石狩獵。

以手宰殺。

殺死過兩隻劍齒虎。

還有一隻巨熊，牠的皮毛如今披在他毛髮濃密的肩上。

而且恩殺過男人。很多男人。

然後，聽說，一個女人。

這首詩的結局是，這兩個男人想出殺手能夠如何辨認他的目標；第一人告訴第二人，他將可以透過她的長髮和深色眼睛——非常深色的、「彷彿夜間的水池」——而認出她，此外，她將正在洗澡，在瀑布底下梳洗她的頭髮。殺手並不滿意：那有可能是任何女人，他指出，而他並不想殺錯人，以免拿不到報酬：報酬是和她等重的熊肉或蜥蜴皮（「等重換等重」乃是他們的約定）。

第一個男人略作思考，然後想出了一個計畫：他會給這個因她的所做所為而必須死去的女人花朵——

明豔的山花，我會採摘然後放進她手中，

在她沐浴於傾瀉水流前。

你便將認出她。

你便將殺了她^{註272}。

然後，或者，他就會快樂——或者也不一定。無論如何，重點仍是她將被終結、消音，永遠消音；我們從未聽過她說話，她從沒有機會告訴我們她做或沒做了什麼，讓她不該受此待遇。也許，她不過是無法跟愛心樹一樣，愛著這個男人就如同樹愛著男孩，「非常、非常多，甚至比她愛自己還多。」她沒有這樣的愛，或她失去了這樣的愛，這可能是一條死罪，至少對他來說是如此。於是，一個女人遭遇的厭女情結是某些男性的詩意正義。

註246：希爾弗斯坦一臉威脅的書封照片甚至在電視節目《小屁孩》（*The Wimpy Kid*）中客串：他的角色是使兒童們害怕。

註247：二〇一六年的十月到十二月間，我嘗試記錄美國國內女性遭到男性家庭成員或親密伴侶殺害的案例，但這些案例只被地區性的新聞媒體所報導（至少就我所知）。但它們的數量仍舊如此之龐大，大到我無法跟上Google通知的腳步，為了進一步縮小範圍，我把紀錄著重在刀傷造成的死亡。這類殺人案件報導往往發人深省，一方面，是因為受害者幾乎一貫地被描述成某人的某人——例如某人的伴侶、母親、女兒或祖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們經常可以在報導裡見到不願意責怪男性加害者的傾向。針對珊奈·馬歇爾（Shanai Marshall）、亞曼達·威廉斯（Amanda Williams）、瑞貝卡·霍吉斯（Rebecca Hodges）和陶樂西·布雷蕭（Dorothy Bradshaw）等人的謀殺案報導就是恰當案例，正如以下的節錄內容所示。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每一個受害者都是有色女性。

珊奈·馬歇爾疑似遭到前男友刺殺身亡的新聞報導節錄：

珊奈·馬歇爾，現年三十七歲的她有三個小孩的母親，一個有愛心、相當忠誠的女性，不畏懼直言，她的朋友這麼敘述。馬歇爾不久前和她那名據稱有暴力傾向的男友再次分手，但這次的分手看來是確定的，他們說。「她跟這個男的玩完了……你可以看到她容光煥發。」四十二歲，來自隆伯頓的妮可·維艾拉說。「她是認真的，而他心知肚明。」

Rebecca Everett, "Slain Mount Holly Mom Recalled as Loving Woman Who Spoke Her Mind," NJ.com, 2016/11/19, https://www.nj.com/burlington/2016/11/slain_mount_holly_mom_recalled_as_loving_woman_who.html

遭男友刺殺身亡的受害者，亞曼達·威廉斯的報導節錄：

於週三晚間遭男友刺殺身亡的飛雅維爾市女子的家人於週五表示，他們不會因為這起攻擊而責怪他，並希望警方永遠不會公開犯罪現場影像，包括警方槍擊男友致死的畫面。

亞曼達．威廉斯在位於床石路上的自家住所遭馬克．希克斯殺害，警方因為接到她兩個兒子的報案電話而趕到現場，他們發現後者正站在她的屍體邊，手中持有一把刀。當警方試著制伏逮捕他，但他卻拒絕放下刀並持刀撲向他們時，警方開槍射殺了希克斯。

「我們都在掙扎著接受事實。」威廉斯的阿姨蘿汪達．邦威爾說……威廉斯多年來受精神健康問題所苦，邦威爾說；她並補充，沒有人應該對威廉斯和希克斯的死亡提出指責。「我相信他很在乎曼迪（註：亞曼達的簡稱），而當他可以選擇離開時，事情卻失去了控制。我不會為他開脫，我們也並非試著為她找藉口。」邦威爾說，「誰對誰錯已經不再重要了。我們失去了兩個年輕靈魂。」

在報案電話中，馬克．希克斯為殺害威廉斯道歉，邦威爾表示家人們相信他的話。「我剛剛殺了人。」他告訴接線人員，「她走了，我很抱歉，我殺了她。」

「我們聽到他說他殺了人，然後他很抱歉，而他是真心的。」她說，「你可以感受到。所以我們很遺憾他走了。」

Adam Owens, "Family of Fayetteville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 Who Was Right, Wrong Doesn't Matter," WRAL.com, 2016/12/09, <https://www.wral.com/family-of-fayetteville-domestic-violence-victim-who-was-right-wrong-doesn-t-matter-/16325581/>

瑞貝卡．霍吉斯和陶樂西．布雷蕭（分別）被她們的兒子和孫子刺殺身亡的新聞報導節錄：

友人、家人和陌生人都仍在試著拼湊，週一晚間倫道夫大道上的一間公寓內發生了什麼事：兩名女性遭人用刀猛烈刺死。有關單位表示，三十六歲的凱文．霍吉斯以一把長劍和切肉刀殺害了他五十六歲的母親瑞貝卡．霍吉斯與七十六歲的祖母陶樂西．布雷蕭。

……發生在週一的殘酷殺人案震驚了社區與家人，他們說凱文．霍吉斯很愛他的母親和祖母。「他的母親、祖母和他是活潑的三人組。」家庭成員拉瑪．史考特在提供給《澤西日報》（*The Jersey Journal*）的聲明中表示，「他們愛著彼此，而且有著外人所欽羨的連結。眼下他和他的家人應該被給予哀悼和悲傷的空間。」

這是一句引人注目的發言，值得被引用，不需要進一步的評論。再重複一次：凱文．霍吉斯應該獲得時間，好為他深愛、同住，並且殘酷殺害了的女性家庭成員哀悼。

Caitlin Mota, "Mother, Grandmother, the Latest to Die in Alleged Domestic Violence Incidents in Hudson," Jersey Journal, 2016/12/07, https://www.nj.com/hudson/2016/12/onheels_of_gruesome_double_murder_hudson_sees_spi.html

註248：也可參見丹妮爾．艾倫（Danielle Allen）的文章，解釋為什麼她在競選活動的最後一年間開始仰慕柯林頓——尤其是在讀了她的電子郵件後。Danielle Allen, "I've Come to Admire Hillary Clinton: What on Earth Happened?," Washington Post, 2016/09/3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ive-come-to-admire-hillary-clinton-what-on-earth-happened/2016/09/30/4a3a92a8-85c3-11e6-92c2-14b64f3d453f_story.html?utm_term=.e815d5a604ee

註249：例如可參考研究指出，十位收到最多仇恨信件的《衛報》作者中，有八位是女性，另外兩位則是非白人男性。Becky Gardiner, Mahana Mansfield, Ian Anderson, Josh Holder, Daan Louter and Monica Ulmanu, "The Dark Side of the Guardian Comments," The Guardian, 2016/04/12,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6/apr/12/the-dark-side-of-guardian-comments>

註250：「她可以如何改善？」迪恩．佛蘭柯（Dean Frenkel）自發性地問，並接著回答了自己的問題。他建議吉拉德下點功夫在她的：

「母音發音上——應該要以遠遠更低調的方式運用『e』、『i』和『o』，不要過度強調母音。她應該要有意識地決定擺脫『吉拉德式的鼻音』，這很有可能是她所能做的、最有影響力的

改變。

更輕盈一點——她的聲音太低沉了，加上一些隨機的輕盈感，發掘幅度更大的旋律和更多高昂的旋律，這會提振她的精神而且讓她聽來更自然……

精神 / 語調——是時候考慮到她聲音的色澤了。她的語調沉重且土氣，但她可以使用一些更輕盈和明亮的語調，引進更多悅耳動聽的特質。

發聲上——她看來鮮有唱歌的經驗，而且沒有發展出某些演說以外的細微發聲技巧。歌唱可以幫很大的忙，但不是足球迷賣力唱國歌那種歌唱。」

這些建議已被記下了。總理當然有時間為了更宜人的發聲技巧而去上歌唱課。

Dean Frenkel, “Drop the Gillard Twang: It’s Beginning to Annoy,”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11/04/21,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drop-the-gillard-twang-its-beginning-to-annoy-20110420-1dosf.html>

註251：以下是這封電子郵件的全文複製，但隱去簽名。首先，必須聲明的是，這封信是在二〇一四年十月時寄給我的，在我曾經上過幾次廣播節目之前。因此，我們似乎可以放心假設，他並不是根據我真正的聲音特質而在此用了「尖銳」一詞。

曼恩女士，

我對你近日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感到驚訝與惱怒，全面地嘲弄美國白人男性……真驚訝你會寫這樣的東西。你內在一定累積了很多恨意，以至於這樣譴責一整個群體的人，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會避免這樣掃射性的主張……老實說，這頗為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身為一個白人美國男性，我為此深受冒犯，並認為你的邏輯並不配作為國內最好學府之一的哲學教授，反而比較像是一個自大的十五歲女孩，充滿怨懟和自戀。假如你的父親曾是一個憤怒的酒鬼並毆打你的母親，我很抱歉，但這不能作為藉口讓你仇視所有男性，並且虛構偽科學來合理化你這麼做。

一路以來我有過許多女主管，我和她們大多數人相處融洽，且從來沒有被任何和我一起工作或社交過的人指控為沙文主義或性別歧視者過，但這些日子以來我開始覺得自己是了……一直把一隻狗說成是貓，很快地，你就可能有一隻以為自己是貓，或單純覺得非常迷惘的狗。所以，靠著執迷於你所仇視的事物，你事實上創造了它們並變成它們……很有可能不合邏輯或不道德？

現在外頭有很多「白人男性仇視」，也有很多憤怒、看來不快樂的女性……她們不太好相處，而且比起許多我遇過的男人們更苛刻和沙文。當一個仇恨製造者有可能是一個有趣的方式，可以為你自己爭取注意力，或讓你受到激進女性主義者們的歡迎，但你其實只是為世界帶來更多悲傷和傷害，而且讓它成為一個更荒蕪的地方。幹得好。

假如美國白人男性社群對你來說不能接受，去巴基斯坦部落或葉門試試看吧……我聽說那裡的男人對女人非常好呢。不，沒錯，他們不是任何的標準，但一點點大局觀大約是必要的……然後也許一點點優雅，而非惡意和自我本位。

也許你可以把這些你有幸獲得的寶貴教育用在讓人們更靠近彼此上，而不是煽動惡意和尖銳（shrillness）……那我們絕對已經夠多了。

——簽名

當然，有可能這位來信人把「尖銳」一詞用在男性身上的頻率和女性一樣高，但饒是如此，這個詞語仍有著漫長的性別化歷史。參見：William Cheng, “The Long, Sexist History of ‘Shrill’ Women,” Time, 2016/03/23, <https://time.com/4268325/history-calling-women-shrill/>

註252：編註：美國電台脫口秀主持人。

註253：這並不是說男性政治人物的聲音從來沒有被說成刺耳或被賦予其他類似的形容，很顯然是有的，例如聲名狼藉的霍華·迪恩（Howard Dean）的尖叫。但是，正如我在前一則註釋中提到的，由鄭威廉（William Cheng, 2016）所寫的文章指出，和女性的聲音相比，就男性一般的說話聲音來看，這樣的形容遠遠沒有如此常見，也不是一個「立即」的反應。參考第八章的討論，依照我對厭女情結的看法，這種性別化差異有一個簡單的解釋；根據數個實證研究的證據（從政治科學和社會心理學出發），我認為，當一名女性前所未有地去爭取受男性支配的權力和威權高位，尤其是當這麼做會影響到一名真實的男性對手時，人們傾向於支持他的利益、偏向他。亦即當其他條件都相等時，人們會有一個一般性的傾向，去站在他那一邊、使他獲得權力，而反過來說，這很有可能造成反對她的偏見（我的論點就此延續）。因此，當她出言對抗或超越他時——藉著不同意他、打斷他、嘲笑他或聲稱戰勝了他——她的聲音自然而然地會聽起來刺耳、粗糙、尖銳，或以其他方式令人痛苦；我們不想要聽到她說出任何反對他的話，於是她變得難以卒聞。另一個合乎情理的猜測是，她將有可能被看作是惱人、討厭、難相處的，或是她整體的行為舉止令人不快。我們不妨參考如「一廂情願」（wishful thinking）和「堅決否認」（willful denial）這類成語的模式，來稱呼這類印象為「反感聆聽」（aversive audition）和「痛苦凝視」（painful beholding）（或諸如此類），而它們會一如十八世紀的偉大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所說，以主觀印象「粉飾和玷污」世界後的結果，也就是，將這類屬性投射到對象身上，如同在他們身上創造這個印象，並將它們視為天然存在的屬性。許多後續實證證據已證實了休謨的假設，也就是我們很容易犯下這類的投射錯誤。因此，一個貌似合理的具體推測會像這樣：當克里斯·普蘭特因為聆聽希拉蕊·柯林頓擊敗伯尼·桑德斯後的勝選演說而感到痛苦時，這類痛苦經常源自於傾聽者帶有偏見的耳朵。當許多觀眾或聽眾將類似刺激看得平凡無奇或沒有異議的時候，例如，認為這就是女人說話時的聲音，或者這就是一個在競選期間進行過許多演說，因而不令人意外地喉嚨疼痛的人的聲音，情況尤其可能如此。

註254：因此，性別偏見正好可以影響我們的美學印象，這個明顯的可能性對普蘭特來說顯然比較不明顯，而這類印象差別性地對女性有害處——她們被想像為悍婦、妖女或潑婦，這個可能性也經常被無視或不屑一顧。Alex Griswold, “Male Fox Guest: Hillary Sounds ‘Shrill,’ ‘Like a Cat Being Dragged Across a Blackboard,’” Mediaite, 2016/03/16, <http://www.mediaite.com/tv/male-fox-guest-hillary-clinton-sounds-shrill-like-a-cat-being-dragged-across-a-blackboard/>.

註255：比方說，一些較為驚人的的推特內容包括：

@kate_manne 嘿醜蕩婦，我希望你永遠不會得愛滋或被強暴，那可就可怕了。

@kate_manne 需要一場淨化。

@kate_manne 幹就閉上你的嘴吧。

@kate_manne 我不在乎那是不是改變了她的想法，她是我的敵人，希望她騙人的嘴被閉上的那天將會到來。

其他推特內容，就像這最後一則，指控我偽善與說謊——再一次的，在沒有清楚可辨的基礎之上——以及陳腐、缺乏新意、拜金，而且是一個建制派猶太女人。例如：

@kate_manne 〔你的〕雙重標準老舊，人們一眼就看穿了。

@kate_manne 來自左派的偽善與愚蠢沒完沒了地無聊與丟臉，就像埃及的尼羅河一樣。

@kate_manne 有鑑於她「那類」的忠誠只能延伸到跟收銀台一樣遠，這一點都不令人意外。

@kate_manne 你才是老生常談、墨守陳規、拍馬屁的建制派螺絲釘猶太女人——多悲哀！

@kate_manne 如果你以為你和自命不凡的笨蛋有任何不同，你就大錯特錯了。

我詢問其中一名推特使用者所說的「偽善」是什麼意思，他們沒有回答並封鎖了我。

在前述的互動發生數天後，下面這則推特發文突然憑空出現，然後其他內容如洪水般湧入：

RorschachRockwell @False_Nobody 她（@kate_manne）是康乃爾的一個猶太教授；她的大象鼻覺得白人忠誠和家庭價值令人反感。

註256：比方說可參考：Shuan King, “Will Hillary Clinton Join the Long Line of Democrats Who Bail on Their Promises after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New York Daily News, 2016/12/27,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politics/king-hillary-join-crowd-democrats-bail-promises-article-1.2925441>。一個精采的回覆可參考：Oliver Chinyere, “Dear Shuan: Hillary Clinton Lost but So Did Bernie Sanders,” ExtraNewsFeed, 2016/12/28, <https://extranewsfeed.com/dear-shaun-hillary-clinton-lost-and-so-did-bernie-sanders-trumps-your-president-7bf923406c37?gi=2b7c8003a5d8>

註257：編註：Lawrence Henry (“Larry”) Summers，美國經濟學家，曾為美國財政部部長。

註258：比方說可參見布朗加特——李克（Braungart-Rieker）等人（1999）展示在「面無表情」實驗模型（Still Face Paradigm）中，嬰兒性別的不同。對這個經典研究模型的文獻整理可見：<http://sites.duke.edu/flaubertsbrain/files/2012/08/Mesman-The-Many-Faces-of-the-Still-Face-Paradigm.pdf>

註259：探討這些差異的一則經典研究發現，「坐在同一間教室裡、閱讀同樣的教科書、聆聽同樣的老師，男孩和女孩們卻受到非常不同的教育。」（Sadker & Sadker, 1995）進一步補充的專書討論則說明，改變明顯不如兩位研究者最初所期待的那麼多（Sadker & Zittleman, 2009）。在歸納前述專書內的十項補充發現時，大衛·薩德科（David Sadker，兩篇著作的共同作者之一）於文章裡寫道：

教師和學生在教室內的互動將男性置於聚光燈下，並將女性放逐到一旁。針對教師論述的研究強調了教室內的男性支配；教師們無意識地讓男性成為教學的焦點，給予他們頻率更高與更精準的注意力……這影響可能是很巨大的，較多的教師注意力有助於強化學生表現。女孩在這個方程式裡落敗，比方說，非裔美國女孩堅定自信並外向地進入校園，卻在就學期間變得越來越被動與安靜。教師時間和注意力的影響力表示，男孩們從更緊湊的教育氛圍獲得了好處（Sadker, 1999，頁24）。

註260：這個模型也引發嚴重的擔憂，關於非二元性別的兒童（以及某些無法「扮演生理性別」的跨性別兒童）將會如何被對待。當社會文本越是具體化二元性別分野並仰賴此分野時，我們就越擔憂，那些無法融入錯誤的「非A即B」生理與社會性別的人們會和一些教育工作者（與其他人）共同困在一種社會無間道裡。但我把這道重要的課題留給更有資格談論的理論學家們。

註261：法魯迪的說明在某些方面使我回想起自己的經驗，當年，在一所原先為純男校高中被合併時，我是唯三名的女學生其中之一。我猜測我對這個主題的某些興趣源於這些經驗，以及後續的、可預期的倖存者罪惡感。

註262：現居英國的研究者和教授瑪麗安·海斯特（Marianne Hester）這麼總結她的發現：「絕大多數警方紀錄在案的家庭暴力加害者為男性（92%），而他們的受害者主要為女性（91%）。紀錄也顯示，男性加害者比女性加害者更常重複犯案（Hester et al., 2006）。英格蘭許多地區的警方報告都發現這是典型的模式，並反應了這類暴力對女性有更重大的影響。」（2013）在分析警方紀錄後，海斯特也發現，與相反情況比較之下，被指控家暴的男性較常是以控制進行的，他們使用了更嚴重且有害的暴力形式，並曾逐漸灌輸女性受害者恐懼的感受。

註263：例如可參見：“From Upspeak To Vocal Fry: Are We ‘Policing’ Young Women’s Voices?” NPR, 2015/07/23, <https://www.npr.org/2015/07/23/425608745/from-uptalk-to-vocal-fry-are-we-policing-young-womens-voices>

註264：編註：美國民主黨參議員。二〇一九年二月十日，華倫正式宣布參加二〇二〇年美國總統選舉。

註265：譯註：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者，也是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妻子，她於一九八六年時寫了一封公開信給美國參議院，反對提名傑夫．塞申斯成為聯邦法官，因為他過去在公民權益上的紀錄不佳。

註266：Eugene Scott, “Warren’s Male Senate Colleagues Read King Letter Uninterrupted,” CNN, 2017/02/08, <https://edition.cnn.com/2017/02/08/politics/jeff-merkley-mark-udall-elizabeth-warren/index.html>

註267：編註：通常是指較男性化的女同性戀者，過去是由恐同症的人慣常使用。

註268：Prachi Gupta, “Oklahoma Lawmaker: Pregnant Women Are ‘Hosts’ Whose Bodies Don’t Belong to Them,” Jezebel, 2017/02/13, <https://theslot.jezebel.com/oklahoma-lawmaker-pregnant-women-are-hosts-whose-bodie-1792303950>

註269：David French, “Dear Hillary Clinton Fans, Ambition Isn’t ‘Sacrifice’- It’s Not Even ‘Service,’” National Review, 2016/08/01,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article/438568/hillary-clintons-public-service-donald-trumps-sacrifice-are-empty-words>.

其他類似的例子可以參見：

Roger L. Simon, “Hillary Clinton’s Real Sickness Is Not Physical,” PJ Media, 2016/09/12, <http://pjmedia.com/diaryofamadvoter/2016/09/12/hillary-clintons-real-sickness-is-not-physical/>.

Jonah Goldberg, “Selfishness, Not Incompetence, Explains Hillary’s E-mail Scandal,” National Review, 2016/07/09,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g-file/437640/hillary-clinton-email-scandal-selfishness-not-incompetence-behind-it>.

若欲了解針對希拉蕊的敵意的有用歷史，以及它一路以來的內容變化，可參考：

Michelle Goldberg, “The Hillary Haters,” Slate, 2016/07/24,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cover_story_2016/07/the_people_who_hate_hillary_clinton_the_most.html.

註270：一篇不久前為了紀念「禁書」週而針對此詩所寫的部落格文章這麼寫道：

希爾弗斯坦的作品經常因為「危險的」想法（挑釁的兒童，一般性的胡說八道等等）而惹惱禁書人士們，但□女士優先□這首詩因為「提倡食人」（真的）而引發眾怒。自然，任何有著明智理解能力的人都可以推論出來，這首詩事實上是在針對貪婪這件事提出警告，但是封閉的心智經常也很無知。享受這首詩吧，假如你有小孩的話，也和他分享。

假如你遵從這個忠告，一個小建議是：為了多元，也為了在面對厭女情結時失之於過度謹慎，試著調換性別，好比：□先生優先□，「卡麥隆．寇因被吃掉」。

假如原始的詩句沒有性別成分，那麼這應該不成問題。

註271：至於那些仍然覺得我對希爾弗斯坦的故事和詩作太過穿鑿附會的人，我隨後發現他也為成人撰寫故事（除了眾所周知的《花花公子》〔Playboy〕雜誌以外）。其中一個故事叫做《一次競標》（*Going Once*），讀一讀，然後再告訴我感想。

註272：接下來的詩句是：

換取等重，恩說。

是的，歐姆說，換取等重。

於是習俗就此開展

贈予捧花與胸花。

這便是結尾。本詩以及其他希爾弗斯坦的作品被複製在這個網站上：
<http://m.poemhunter.com/poem/for-what-she-had-done/>.

參考書目

Abramson, Jill. 2016. "This May Shock You: Hilary Clinton is Fundamentally Honest". The Guardian, March 28.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mar/28/hillary-clinton-honest-transparency-jill-abramson>

Abramson, Kate. 2014. "Turning up the Lights on Gaslighting".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28, no. 1: 1-30.

Alcoff, Linda Martin. 1991-92. "The Problem of Speaking for Others." *Cultural Critique* 20 (Winter): 5-32.

—. 2009. "Discourse of Sexual Violence in a Global Framework." *Philosophical Topics* 37, no. 2: 123-39.

Aly, Götz. 2014. *Why the Germans? Why the Jews?: Envy, Race Hatred, 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Anderson, Kristin J. 2014. *Modern Misogy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scombe, G.E.M. (1957). 《意向》。張留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Appiah, Kwame Anthony. 2006.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New York: W.W. Norton.

—. 2008. *Experiments in Eth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rcher, John. 2000. "Sex Differences in Physically Aggressive Acts between Heterosexual Partner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 no. 5: 651-80.

Arendt, Hannah. 1963. *Eichmann in Jerusalem*. London: Penguin.

Arpaly, Nomy. 2003. *Unprincipled Virtue: An Inquiry into Moral Agen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1. "Open-Mindedness as a Moral Virtu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48, no. 1: 75-85.

Ashwell, Lauren. 2016. "Gendered Slurs."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42, no. 2: 228-39.

Bailey, Moya. 2014. "More on the Origin of Misogynoir." Tumblr, April 27. <http://moyazb.tumblr.com/post/84048113369/more-on-the-origin-of-misogynoir>.

Bandyopadhyay, Mridula, and M.R. Khan. 2013. "Loss of Fa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South Asia." I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Asian Societies*, edited by Lenore Manderson & Linda Rae Bennett, 61-75. London: Routledge.

Baragona, Justin. 2016. "'Corey, You're Being a Horrible Person': Van Jones and Lewandowski Battle Over Hillary's No Show," *Mediate*, November 9. <http://www.mediate.com/online/corey-you-are-being-a-horrible-person-van-jones-and-lewandowski-battle-over-hillarys-no-show/>.

Barnes, Elizabeth. 2016. *The Minority Bod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uer, Nancy. 2015. *How to Do Things with Pornogra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eghly, Erin. 2015. "What Is a Stereotype? What Is Stereotyping?" *Hypatia* 30, no. 4: 675-91.

Beevor, Antony. 2003. *The Fall of Berlin 1945*. New York: Penguin Books.

Bennett, Jonathan. 1974. "The Conscience of Huckleberry Finn." *Philosophy* 49, no. 188: 123-34

Bergoffen, Debra. 2011. *Contesting the Politics of Genocidal Rape: Affirming the Dignity of the Vulnerable Body*. London: Routledge.

Bettcher, Talia Mae. 2007. "Evil Deceivers and Make-Believers: On Transphobic Viol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Hypatia* 22, no. 3: 43-65

—. 2012. "Full-Frontal Morality: The Naked Truth about Gender." *Hypatia* 27, no. 2: 319-37.

—. 2013. "Trans Women and the Meaning of 'Woman.'" In *The Philosophy of Sex*, edited by Nicholas Power, Raja Halwani, and Alan Soble, 233-49.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2014. “Trapped in the Wrong Theory: Re-thinking Trans Oppression and Resistance.” *Signs* 39, no. 2: 383-406

Bian, Lin, Sarah-Jane Leslie, and Andrei Cimpian. 2017. “Gender Stereotypes about Intellectual Ability Emerge Early and Influence Children’s Interests.” *Science*, 355, no. 6323: 389-391.

Bloom, Paul (2016)。《失控的同理心：道德判斷的偏誤與理性思考的價值》。陳岳辰譯。台北：商周出版。

Bordo, Susan. 1993. *Unbearable Wei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ornstein, Kate. 1994. *Gender Outlaw: On Men, Women, and the Rest of Us*. New York: Routledge.

Braungart-Rieker, J., S. Courtney, and M. M. Garwood. 1999. “Mother- and Father- Infant Attachment: Families in Contex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3: 535-53.

Brison, Susan J. 2002. *Aftermath: Violence and the Remaking of a Self*.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6. “Contentious Freedom: Sex Work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Hypatia* 21, no. 4: 192-200.

—. 2008. “Everyday Atrocities and Ordinary Miracles, or Why I (still) Bear Witness to Sexual Violence (but Not Too Often).”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36, no. 1: 188-98.

—. 2014. “Why I Spoke Out about One Rape but Stayed Silent about Another.” *Time*, December 1. <http://time.com/3612283/why-i-spoke-out-about-one-rape-but-stayed-silent-about-another/>.

—. 2016. “Forum Response to ‘The Logic of Misogyny.’” *The Boston Review*, July 11. <http://bostonreview.net/forum/logic-misogyny/susan-j-brison-susan-j-brison-responds-kate-manne>.

Brooks, David. 2016. “The Sexual Politics of 2016.” *New York Times*, March 29. <https://www.nytimes.com/2016/03/29/opinion/the-sexual-politics-of-2016.html>

Brown, Wendy. 1995. *States of Injury: Power and Freedom in Late Modern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urgess, Alexis, and David Plunkett. 2013. "Conceptual Ethics I and II." *Philosophy Compass* 8, no. 12: 1091-110.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2015. *Senses of the Subject*.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2016. *Vulnerability in Resistanc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Cahill, Ann J. 2001. *Rethinking Ra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alhoun, Cheshire. 2004. "An Apology for Moral Sham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2, no. 2: 127-46.

Calvin, John. 1999. *Calvin's Commentaries*. Edinburgh; repr. Grand Rapids, MI: Baker.

Campbell, Bradley, and Jason Manning. 2014. "Micro-Aggression and Moral Cultures." *Comparative Sociology* 13, no. 6: 692-726.

Camus, Albert (1946)。《異鄉人》。張一喬譯。台北：麥田出版。

Card, Claudia. 2002. *The Atrocity Paradigm: A Theory of Evi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0. *Confronting Evils: Terrorism, Torture, Genoc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erry, Myisha. 2014. "What Is So Bad about Being Good?" *Huffington Post*, June 9.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yisha-cherry/what-is-so-bad-about-being-good_b_5460564.html.

Chu, Arthur. 2014. "Your Princess Is in Another Castle: Misogyny, Entitlement, and Nerds." *Daily Beast*, May 27.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4/05/27/your-princess-is-in-another-castle-misogyny-entitlement-and-nerds.html>.

Coetzee, J.M. (1999)。《屈辱》。孟祥森譯。台北：天下文化。

Cole, Alyson M. 2006. *The Cult of True Victimhoo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raven, Peter. 2010. "Failing to Communicate the Campaign". ABC News. August 5, updated September 28. <http://www.abc.net.au/news/2010-08-06/35762>.

Crenshaw, Kimberlé W. 1991.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Stanford Law Review* 43: 1241-99.

—. 1993. "Beyond Race and Misogyny: Black Feminism and 2 Live Crew." In *Words That Wound*, edited by Mari J. Matsuda, Charles Lawrence III, Richard Delgado, and 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 111-32.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1997. "Intersectionality and Identity Politics: Learning from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In *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Theory: Feminist Perspectives*, edited by Mary Lyndon Shanley and Uma Narayan, 178-93.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2012. "From Private Violence to Mass Incarceration: Thinking Intersectionality about Women, Race, and Social Control." *UCLA Law Review* 59: 1418-72.

Crenshaw, Kimberlé W., Julia Sharpe-Levine, and Janine Jackson. 2016. "16 Social Justice Leaders Respond to the 2016 Election." *African American Policy Forum*. November.

Cudd, Ann E. 1990. "Enforced Pregnancy, Rape and the Image of Woman." *Philosophical Studies* 60, no. 1: 47-59.

—. 2006. *Analyzing Oppre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rcy, Oliver. 2015. "The 'F***ing Disgusting' Consequence Trump Lawyer Threatened Liberal News Site with for 'Rape' Story." *The Blaze*, July 27. <https://www.theblaze.com/news/2015/07/27/the-fing-disgusting-consequence-trump-lawyer-threatened-liberal-news-site-with-for-rape-story/>.

Darwall, Stephen. 2006. *The Second-Person Standpoint: Morality, Respect, and Accountabil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13. *Honor, History, and Relationship: Essays in Second-Personal Ethics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vis, Angela. 2003. *Are Prisons Obsolete?*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Daum, Meghan. 2014. "Misogyny and the Co-opting of the Isla Vista Tragedy." *Los Angeles Times*, June 4. <http://www.latimes.com/opinion/op-ed/la-oe-daum-misogyny-isla-vista-20140605-column.html>.

Dembroff, Robin A. 2016. "What is Sexual Orientation?" *Philosophers' Imprint* 16, no. 3: 1-27. <http://quod.lib.umich.edu/cgi/p/pod/dod-idx/what-is-sexual-orientation.pdf?c=phimp;idno=3521354.0016.003>.

Desmond, Matthew (2016)。《下一個家在何方？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胡訢諄、鄭煥昇譯。台北：時報出版。

Diamond, Cora. 1978. "Eating Meat and Eating People." *Philosophy* 53, no. 206: 465-79.

Digby, Tom. 2003. "Male Trouble."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29, no. 2: 247-73

—. 2014. *Love and War: How Militarism Shapes Sexuality and Rom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oston, Kristie. 2011. "Tracking Epistemic Violence, Tracking Practice of Silencing." *Hypatia* 26, no. 2: 236-57.

—. 2012. "A Cautionary Tale: On Limiting Epistemic Oppression." *Frontiers* 33, no. 1: 24-47.

—. 2014. "Conceptualizing Epistemic Oppression." *Social Epistemology* 28, no. 2: 115-38.

—. 2016. "Word to the Wise: Notes on a Black Feminist Metaphilosophy of Race." *Philosophy Compass* 11, no. 2: 69-74.

Doston, Kristie, and Marita Gilbert. 2014. "Curious Disappearances: Affectability Imbalances and Process-Based Invisibility." *Hypatia* 29, no. 4: 873-88.

Du Toit, Louise. 2009.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Rape.: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Feminine Self*. New York: Routledge.

Dworkin, Andrea. 1976. *Woman Hating: A Radical Look at Sexuality*. New York: Dutton.

—. 1988. *Right-Wing Women: The Politics of Domesticated Females*. London: Women's Press.

Elon, Amos. 2013. *The Pity of It All: A Portrait of the German-Jewish Epoch, 1743-1933*. New York: Picador.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03.

Erikson, Erik H. 1963. *Youth: Change and Challenge*. New York: Basic Books.

Exley, Christine, Muriel Niederle, and Lise Vesterlund. 2016. "New Research: Women Who Don't Negotiate Might Have a Good Reas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pril 12. <http://hbr.org/2016/04/women-who-dont-negotiate-their-salaries-might-have-a-godd-reason>.

Faludi, Susan. 2000. *Stiffed: The Betrayal of Modern Man*. London: Vintage.

—. 2006. *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91.

Fenske, Sarah. 2016. "Abdrew Puzder, Trump's Pick for Labor Department was Accused of Abusing Wife." *Riverfront Times*, December 8. <https://www.riverfronttimes.com/newsblog/2016/12/08/andrew-puzder-trump-pick-for-labor-department-was-accused-of-abusing-wife>.

Ferguson, Chris. 2014. "Misogyny Didn't Turn Elliot Rodger into a Killer." *Time*, May 25. <http://time.com/114354/elliott-rodger-ucsb-misogyny/>.

Floridi, Luciano. 2011. "A Defence of Constructionism: Philosophy as Conceptual Engineering." *Metaphilosophy* 42, no. 3: 282-304.

Flynn, Gillian (2012). 《控制》。施清真譯。台北：時報出版。

Fricker, Miranda. 1999. "Epistemic Oppression and Epistemic Privilege."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9 (Supplement): 191-210.

Fricker, Miranda (2007)。《知識的不正義：偏見和缺乏理解，如何造成不公平？》。黃珮玲譯。台北：八旗文化。

Friedan, Betty. 1963.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W. W. Norton.

Frost, Amber A'Lee. 2016. "Forum Response to 'The Logic of Misogyny.'" *The Boston Review*, July 11. <http://bostonreview.net/forum/logic-misogyny/amber-alee-frost-amber-alee-frost-responds-kate-manne>.

Frye, Marilyn. 1983. *The Politics of Reality: Essays in Feminist Theory*. Berkeley CA: Crossing Press.

—. 1996. "The Necessity of Differences: Constructing a Positive Category of Women." *Signs* 21, vol. 3: 991-1010.

Gaita, Raimond. 1998. *A Common Humanity: Thinking About Love and Truth and Justice*. New York: Routledge.

Garcia, J. L. A. 1996. "The Heart of Racism."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27, no. 1: 5-46

Gillard, Julia. 2014. *My Story*. Vintage Books.

Glick, Peter, and Susan T. Fiske. 1997. "Hostile and Benevolent Sexism."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1: 119-35.

—. 2001. "An Ambivalent Alliance: Hostile and Benevolent Sexism as Complementary Justifications for Gender Inequa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 no. 2: 109-18.

Goffman, Alice (2014)。《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李宗義、許雅淑譯。台北：衛城出版。

Gold, Hadas, and John Bresnahan. 2016. "Trump Campaign CEO Once Charged in Domestic Violence Case." *Politico*, August 25.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6/08/steve-bannon-domestic-violence-case-police-report-227432>.

Gopnik, Adam. 2006. "Headless Horseman: The Reign of Terror Revisited." *The New Yorker*, June 5.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6/06/05/headless-horseman>.

Gornick, Vivian. 2016. "Forum Response to 'The Logic of Misogyny.'" The Boston Review, July 11. <http://bostonreview.net/forum/logic-misogyny/vivian-gornick-vivian-gornick-responds-kate-manne>.

Grant, Rebecca. 2016. "The Latest Anti-Abortion Trend? Mandatory Funerals for Fetuses." The Nation, October 11.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the-latest-anti-abortion-trend-mandatory-funerals-for-fetuses/>.

Greenhouse, Linda, and Reva B. Siegel. 2010. Before Roe v. Wade: Voices That Shaped the Abortion Debate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s Ruling. New York: Kaplan Pub.

Halley, Janet. 2015. "Trading the Megaphone for the Gavel in Title IX Enforcement: Backing Off the Hype in Title IX Enforcement." Harvard Law Review 128, no. 4: 103-17.

Haslanger, Sally. 2000. "Gender and Race: (What) Are They? (What) Do We Want Them to Be?" *Noûs* 34, no. 1: 31-55.

—. 2012. *Resisting Re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6. "Epistemic Housekeeping and the Philosophical Canon: A Reflection on Jane Addams' 'Women and Public Housekeeping.'" In *Ten Neglected Classics of Philosophy*, edited by Eric Schliesser, 148-7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y Carol. 2013. *Kantianism, Liberalism, and Feminism: Resisting Oppression*.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Hedgepeth, Sonja M., and Rochelle G. Saidel. 2010.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Jewish Women during the Holocaust*. Lebanon, NH: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Heilman, Madeline E., Aaron S. Wallen, Danielle Fuchs, and Melinda M. Tamkins. 2004. "Penalties for Success: Reactions to Women who Succeed at Male Task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9, no. 3: 416-27.

Heilman, Madeline E., and Tyler G. Okimoto. 2007. "Why Are Women Penalized for Success at Male Tasks?: The Implied Community Defici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 no. 1: 81-92.

Held, Virginia. 1987. "Feminism and Moral Theory." In *Women and Moral Theory*, edited by Eva Feder Kittay and Diana Tietjens Meyers, 111-28. Totowa, NJ: Rowman & Littlefield.

—. 2006. *The Ethics of Ca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nwood, Doug. 2016. "Forum Response to 'The Logic of Misogyny.'" *The Boston Review*, July 11. <http://bostonreview.net/forum/logic-misogyny/doug-henwood-doug-henwood-responds-kate-manne>.

Hester, Mariane. 2013. "Who Does What to Whom? Gender and Domestic Violence Perpetrators in English Police Record."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0, no. 5: 623-37.

Heyes, Cressida. 2007. *Self-Transformations: Foucault, Ethics, and Normalized Bo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ill Collins, Patricia. 1998. "It's All in the Family: Intersections of Gender, Race, and Nation." *Hypatia* 13, no. 3: 62-82.

—. 2000.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90.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2016.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New Press.

Hochschild, Arlie Russel, and Anne Machung (2012). 《第二輪班：那些性別革命尚未完成的事》。張正霖譯。台北：群學。

Hoff Sommers, Christina. 2016. "Forum Response to 'The Logic of Misogyny.'" *The Boston Review*, July 11. <http://bostonreview.net/forum/logic-misogyny/christina-hoff-sommers-christina-hoff-sommers-responds-kate-manne>.

Hooks, Bell. 2000.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s to Center*. 2nd ed. London: Pluto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4.

Hurt, Harry, III. 1993. *The Lost Tycoon: The Many Lives of Donald J. Trump*. Kindle ed. Echo Point: Brattleboro, VT.

Inbar, Yoel, and David A. Pizarro. 2016. "Pathogens and Politics: Current Research and New Question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10, no. 6: 365-74

Irwin, Kirk. 2016. "Trump CEO Was Charged with Choking Wife." Daily Beast, August 25.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trump-ceo-was-charged-with-choking-wife>.

Jackson, Michelle Denise. 2014. "A Painful Silence: What Daniel Holtzclaw Teaches Us about Black Women in America." For Harriet, September. <http://www.forharriet.com/2014/09/a-painful-silence-what-daniel-holtzclaw.html>.

Jaggar, Alison M. 1983.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otowa, NJ: Rowman & Littlefield.

—. 2009. "Transnational Cycles of Gendered Vulnerability." *Philosophical Topics* 37, no. 2: 33-52.

Jenkins, Carrie. 2017. *What Love Is: And What It Could be*. New York: Basic Books.

Jenkins, Kathryn. 2016. "Amelioration and Inclusion: Gender Identity and the Concept of Woman." *Ethics* 126, no. 2: 394-421.

Jetter, Alexis., Jennifer Braunschweiger, Natasha Lunn, and Julia Fullerton-Batten. 2014. "A Hidden Cause of Chronic Illness." Dart Center for Journalism and Trauma: A Project of the Columbia Journalism School, April 10. <https://dartcenter.org/content/hidden-cause-chronic-illness>.

Jones, Karen. 2002. "The Politics of Credibility." In *A Mind of One's Own: Feminist Essays on Reason and Objectivity*, edited by Louise M. Antony and Charlotte E. Witt, 154-76.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2014. "Intersectionality and Ameliorative Analyses of Race and Gender." *Philosophical Studies* 171, no. 1: 99-107.

Kelly, Daniel. 2001. *Yuck: The Nature and Moral Significance of Disgus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Kelly, Daniel, and Erica Roedder. 2008. "Racial Cognition and the Ethics of Implicit Bias." *Philosophy Compass* 3, no. 3: 522-40.

Khader, Seren J. 2011. *Adaptive Preferences and Women's Empower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2. "Must Theorising about Adaptive Preferences Deny Women's Agency?"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29, no. 4: 302-17.

Kimmel, Michael. 2013. *Angry White Men: American Masculinity at the End of an Era*. New York: National Books.

King, Deborah K. 1988. "Multiple Jeopardy, Multiple Consciousness: The Context of a Black Feminist Ideology." *Signs* 14, vol. 1: 42-72.

Kittay, Eva Feder. 1999. *Love's Labor*. New York: Routledge.

—. 2013. "The Body as the Place of Care." In *Exploring the Work of Edward S. Casey*, edited by Donald A. Landes and Azucena Cruz-Pierre, 205-13.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Koyama, Emi. 2003. "The Transfeminist Manifesto." In *Catching a Wave: Reclaiming Femin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Rory Dicker and Alison Piepmeier, 244-59.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2006. "Whose Feminism Is It Anyway? The Unspoken Racism of the Trans Inclusion Debate." In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Susan Stryker and Stephen Whittle, 698-705. New York: Routledge.

Kukla, Rebecca. 2005. *Mass Hysteria: Medicine, Culture, and Mothers' Bodi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2008. "Measuring Mother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eminist Approaches to Bioethics* 1, no. 1: 67-90.

—. 2014. "Performative Force, Convention, and Discursive Injustice." *Hypatia* 29, no. 2: 440-57.

Langton, Rae. 2009. *Sexual Solipsism: Philosophical Essays on Pornography and Objectific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wrence, Charles R., III. 1987. "The Id, the Ego, and Equal Protection: Reckoning with Unconscious Racism." *Stanford Law Review* 39, no. 2: 317-88.

—. 2008. "Unconscious Racism Revisited: Reflections on the Impact and Origins of the Id, the Ego, and Equal Protection." *Connecticut Law Review* 40: 931-78.

Laxness Halldor. 1997. *Independent People*. New York: Vintage.

Lebron, Christopher J. 2016. "The Invisibility of Black Women." Boston Review blog, January 15. <http://bostonreview.net/blog/christopher-lebron-invisibility-black-women>.

—. 2017. *The Making of Black Lives Matter: A Brief History of an Ide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rner, Gerda. 1986.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ndemann, Hilde. 2014. *Holding and Letting Go: The Social Practice of Personal Ident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vingston Smith, David. 2011. *Less Than Human: Why We Demean, Enslave, and Exterminate Other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2016. "Paradoxes of Dehuman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42, no. 2: 416-43

Lloyd, Genevieve. 1992. "Maleness, Metaphor, and the 'Crisis' of Reason." In *A Mind of One's Own: Feminist Essays on Reason and Objectivity*, edited by Louise M. Antony and Charlotte E. Witt, 73-92.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Lorde, Audre. 2007. *Sister Outsider: Essays and Speeches*. Berkeley, CA: Crossing Press.

Lubet, Steven. 2015a. "Did This Acclaimed Sociologist Drive the Getaway Car in a Murder Plot? The Questionable Ethics of Alice Goffman's *On the Run*." *The New Republic*, May 27. <http://newrepublic.com/article/121909/did-sociologist-alice-goffman-drive-getaway-car-murder-plot>.

—. 2015b. "Ethnography on Trial." *The New Republic*, July 15. <http://newrepublic.com/article/122303/ethnography-on-trial>.

Lugones, Maria. 1987. "Playfulness, 'World'-Travelling and Loving Perception." *Hypatia: 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 2, no. 2: 3-19.

—. 1990. "Structure/Antistructure and Agency under Oppress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7, no. 10: 500-507

Mac Donald, Heather. 2014. "The UCSB Solipsists." *National Review*, June 1. <https://www2.nationalreview.com/article/379271/ucsb-solipsists->

heather-macdonald/page/0/1 (last accessed 2015).

MacKinnon, Catherine A. 1987. *Feminism Unmodified: Discourses on Life and La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06. *Are Women Huma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Dialogu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cLachlan, Alice. 2010. "Unreasonable Resentments."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41, no. 4: 422-41.

Maitra, Ishani. 2009. "Silencing Speech."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39, no. 2: 309-38.

Maitra, Ishani, and Mary Kate McGowan. 2010. "On Silencing, Rape, and Responsibility."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8, no. 1: 167-72.

Manne, Kate. 2013. "On Being Social in Metaethics." In *Oxford Studies in Metaethics*, vol. 8, edited by Russ Shafer-Landau, 50-7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4a. "Internalism about. Reasons: Sad but True?" *Philosophical Studies* 167, no. 1: 89-117.

—. 2014b. "Punishing Humanity." Op-Ed. *New York Times*. The Stone, October 12. <https://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4/10/12/in-ferguson-and-beyond-punishing-humanity/>.

—. 2016a. "Before Hillary, There Was Another 'Witch' in Politics." *Huffington Pos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kate-manne/before-hillary-there-was-another-b_9722158.html.

—. 2016b. "Humanism: A Critique."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42, no. 2: 389-415.

—. 2016c. "Life Is Triggering: What Follows?" *The New Philosopher*, Education, August 30. <http://www.newphilosopher.com/articles/3418/>.

—. 2016d. "The Logic of Misogyny." *The Boston Review*, July 11. <http://bostonreview.net/forum/kate-manne-logic-misogyny>.

—. 2016e. "Response to Forum Responses to 'The Logic of Misogyny.'" *The Boston Review*, July 11.

<http://bostonreview.net/forum/logic-misogyny/kate-manne-kate-manne-responds>.

—. 2016f. “Sympathy for the Rapist: What the Stanford Case Teaches.” *Huffington Post*, June 9.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sympathy-for-the-rapist-what-the-stanford-case-teaches_us_5758c0aae4b053e219787681.

—. 2016g. “Trumped-up Moral Outrage about Misogyny.” *Huffington Post*, October 9.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trumped-up-moral-outrage-about-misogyny_b_57faa8e2e4b0d786aa52b693.

—. 2016h. “What Do We Do with Pornography?” Review of Nancy Bauer’s *How to Do Things with Pornography*.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pril 6. <http://www.the-tls.co.uk/articles/public/where-anything-goes/>.

—. 2016i. “When a Man Competes with a Woman.” *Huffington Post*, October 19.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when-a-man-competes-with-a-woman_us_5807abc9e4b08ddf9ece1397.

—. 2017. “Good Girls: How Powerful Men Get Away with Sexual Predation.” *Huffington Post*, March 24 (updated March 28).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good-girls-or-why-powerful-men-get-to-keep-on-behaving_us_58d5b420e4b0f633072b37c3.

—. Forthcoming. “Shame Faced in Shadows: On Melancholy Whiteness.” Symposium piece on Judith Butler’s *Senses of the Subject*.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Marcus, Ruth Barcan. 1966. “Iterated Deontic Modalities.” *Mind* 75, no. 300: 580-82.

McDowell, John. 1995. “Might There Be External Reasons?” In *World, Mind, and Ethics: Essays on the Ethical Philosophy of Bernard Williams*, edited by J. E. Altham and Ross Harrison, 68-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Intosh, Peggy. 1988. *White Privilege and Male Privilege: A Personal Account of Coming to See Correspondences through Work in Women’s Studies*. Wellesley, MA: Wellesley Colleg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McKinnon, Rachel V. 2014. "Stereotype Threat and Attributional Ambiguity for Trans Women." *Hypatia* 29, no. 4: 857-72.

———. 2015.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s." *Res Philosophica* 92, no. 2: 419-40.

———. 2016. "Epistemic Injustice." *Philosophy Compass* 11, no. 8: 437-46.

———. 2017. *Allies Behaving Badly: Gaslighting as Epistemic Injustice*.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pistemic Injustice*, edited by Gaile Polhaus Jr., Ian James Kidd, and José Medina, 167-75. New York: Routledge.

Medina, José. 2011. "The Relevance of Credibility Excess in a Proportional View of Epistemic Injustice: Differential Epistemic Authority and the Social Imaginary." *Social Epistemology* 25, no. 1: 15-35.

———. 2012. *The Epistemology of Resistance: Gender and Racial Oppression, Epistemic Injustice, and Resistant Imagin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ndelberg, Tali. 2016. "Forum Response to 'The Logic of Misogyny.'" *The Boston Review*, July 11. <http://bostonreview.net/forum/logic-misogyny/tali-mendelberg-tali-mendelberg-responds-kate-manne>.

Meyers, Diana Tietjens. 2011. "Two Victim Paradigms and the Problem of 'Impure' Victims." *Humanity* 2, no. 2: 255-75.

———. 2016. *Victims' Storie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Human Righ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gram, Stanley (1974). 《服從權威：有多少罪惡，假服從之名而行？》。黃煜文譯。台北：經濟新潮社。

Mills, Charles W. 1997. *The Racial Contra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oi, Toril. 1999. *What Is a Woman?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ody-Adams, Michele. 2015. "The Enigma of Forgiveness."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49, nos. 1-2: 161-80.

Moraga, Cherrie, and Gloria Anzaldua. 2015.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4th e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1.

Nichols, Shaun. 2004. *Sentimental Rules: On the Natural Foundations of Moral Judg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rlock, Kathryn J. 2008. *Forgivenes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2016. "Doctor's Orders: Menopause, Weight Change, and Feminism." *Ijfab: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eminist Approaches to Bioethics* 9, no. 2: 190-97.

Nussbaum, Martha C. 1995. *Objectification*.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24, no. 4: 249-91.

—. 2001.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1. "Objection and Internet Misogyny." In *The Offensive Internet: Speech, Privacy, and Reputation*, edited by Saul Levmore and Martha Nussbaum, 68-9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ussbaum, Martha C. (2004)。《逃避人性：噁心、羞恥與法律》。方佳俊譯。台北：商周出版

Orwell, Goerge. 1981. *A Collection of Essays*. New York: Harcourt.

Parks-Stamm, Elizabeth J., Madeline E. Heilman, and Krystle A. Hearn. 2008. "Motivated to Penalize: Women's Strategic Rejection of Successful Wome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 no. 2: 237-47. Accessed via Sage Journals,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146167207310027>.

Pateman, Carole (1988)。《性契約》。李朝暉譯。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Paul, David, and Jessi L. Smith. 2008. "Subtle Sexism? Examining Vote Preferences When Women Run Against Men for the Presidency." *Journal of Women, Politics and Policy* 29, no. 4: 451-76.

Paul, L. A. 2015.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wan, Mittal, and S. K. Dhatarwal. 2014. "Vitriolage: The Curse of Human Origin." *Medical Science* 6, no. 21: 61-64.

Penny, Laurie. 2014. "Let's Call the Isla Vista Killings What They Were: Misogynist Extremism." *New Statesman*, May 25. <http://www.newstatesman.com/lifestyle/2014/05/lets-call-isla-vista-killings-what-they-were-misogynist-extremism>.

Perry, Imani. 2016. "Forum Response to 'The Logic of Misogyny.'" *The Boston Review*, July 11. <http://bostonreview.net/forum/logic-misogyny/imani-perry-imani-perry-responds-kate-manne>.

Pinker, Steven (2012). 《人性中的良善天使：暴力如何從我們的世界中逐漸消失》。顏涵銳、徐立妍譯。台北：遠流。

Plattner, T., S. Bolliger, and U. Zollinger. 2005. "Forensic Assessment of Survived Stragulation."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153: 202-7.

Pohlhaus, Gaile, Jr. 2012. "Relational Knowing and Epistemic Injustice: Toward a Theory of Willful Hermeneutical Ignorance." *Hypatia* 27, no. 4: 715-35.

Porpentine (pseud.). 2015. "Hot Allostatic Load." *The New Inquiry*, May 11. <http://thenewinquiry.com/hot-allostatic-load/>.

Preston-Roedder, Ryan. 2013. "Faith in Humanity."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87, no. 3: 664-87.

Rawls, John. 1955. "Two Concepts of Rules." *Philosophical Review* 64, no. 1: 3-32.

Raz, Joseph. 1989. "Liberating Duties." *Law and Philosophy* 8, no. 1: 3-21.

Resnick, Sofia. 2015. "In Sexual Assault Cases, News Laws on Strangulation Aid Prosecution." *Rewire*, April 23. <https://rewire.news/article/2015/04/23/sexual-assault-cases-prosecutors-look-method-control/>.

Rosenfeld, Diane L. 1994. "Why Men Beat Women: Law Enforcement Sends Mixed Signals." *Chicago Tribune*, July 29.

—. 2004. "Why Doesn't He Leave?: Restoring Liberty and Equality to Battered Women." In *Directions in Sexual Harassment Law*, vol. 535,

edited by Catherine A. MacKinnon and Reva B. Siegel, 535-37.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2015. "Uncomfortable Conversations: Confronting the Reality of Target Rape on Campus." *Harvard Law Review* 128, no. 8: 359-80. <https://harvardlawreview.org/2015/06/uncomfortable-conversations-confronting-the-reality-of-target-rape-on-campus/>.

Rudman, Laurie A., Corinne A. Moss-Racusin, Julie E. Phelan, and Sanne Nauts. 2012. "Status Incongruity and Backlash Effects: Defending the Gender Hierarchy Motivates Prejudice against Female Lead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 165-79.

Sadker, David. 1999. "Gender Equity: Still Knocking at the Classroom Door." *Educational Leadership* 56, no. 7: 22-26.

Sadker, David, and Karen R. Zittleman. 2009. *Still Failing at Fairness: How Gender Bias Cheats Girls and Boys in School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Sadker, Myra, and David Sadker. 1995. 1995. *Failing at Fairness: How America's Schools Cheat Girls*. New York: Touchstone Press.

Santucci, John. 2015. "Donald Trump's Ex-Wife Ivana Disavows Old 'Rape' Allegation." *ABC News*, July 28.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donald-trumps-wife-ivana-disavows-rape-allegation/story?id=32732204>.

Saul, Jennifer. 2006. "Gender and Race."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 80: 119-43.

Schraub, David H. 2016. "Playing with Cards: Discrimination Claims and the Charge of Bad Faith."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42, no. 2: 285-303.

Serano, Julia. 2016. *Whipping Girl: A Transsexual Woman on Sexism and the Scapegoating of Femininity*. 2nd ed. Berkeley, CA: Seal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07.

Shrage, Laurie, ed. 2009. *You've Changed: Sex Reassignment and Personal Ident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egel, Reva B. 2014. "Abortion and the 'Woman Question': Forty Years of Debate." *Indiana Law Journal* 89, no. 4: 1365-80.

Silvermint, Daniel. 2013. "Resistance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21, no. 4: 405-25.

Silverstein, Shel (1964). 《愛心樹》。劉美欽譯。台北：水滴文化

Singal, Jesse. 2015. "The Internet Accused Alice Goffman of Faking Details in Her Study of a Black Neighborhood. I Went to Philadelphia to Check." *New York Magazine*, June 18. <http://nymag.com/sciencefus/2015/06/i-fact-checked-alice-goffman-with-her-subjects.html>.

Singer, Peter. 2011. *The Expanding Circle: Ethics, Evolution, and Moral Progres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olnit, Rebecca. 2014a. *Men Explain Things to Me*. Chicago, IL: Haymarket Books.

—. 2014b. "Our Words Are Our Weapons." *Guernica*, June 2. <http://www.guernicamag.com/daily/rebecca-solnit-our-words-are-our-weapons-2/>.

Smith, Jessi L., David Paul, and Rachel Paul. 2007. "No Place for a Woman: Evidence for Gender Bias in Evaluations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9, no. 3: 225-33.

Snyder, Rachel Louise. 2015. "No Visible Bruises: Domestic Violence an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he New Yorker*, December 30.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the-unseen-victims-of-traumatic-brain-injury-from-domestic-violence>

Song, Sarah. 2007. *Justice,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Multicultu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renson, Susan B., Manisha Joshi, and Elizabeth Sivitz. 2014.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pidemiology of Nonfatal Strangulation, a Human Rights and Health Concer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4, no. 11: 54-61.

Sprague, Joey, and Kelley Massoni. 2005. "Student Evaluations and Gendered Expectations: What We Can't Count Can Hurt Us." *Sex Roles* 53,

nos. 11-12: 779-93.

Stanley, Jason. 2015. *How Propaganda Work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rack, Gael B., George E. McClane, and Dean Hawley. 2001. "A Review of 300 Attempted Stragulation Cases Part I: Criminal Legal Issues."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 21, no.3: 303-9.

Strawson, P.F. (1962) 2018. "Freedom and Resentment.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48: 1-25. Reprinted in *Freedom and Resentment and Other Essays*, 2nd ed., 1-28. London: Routledge. 頁數乃根據Routledge版本。

Suk Gersen, Jeannie. 2014. "The Trouble with Teaching Rape Law." *The New Yorker*, December 15. <http://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trouble-teaching-rape-law>.

Sveinsdóttir, Ásta Kristjana. 2011. "The Metaphysics of Sex and Gender." In *Feminist Metaphysics*, edited by Charlotte E. Witt, 47-66. Dordrecht: Springer.

Swanson, Jordan. 2002. "Acid Attacks: Bangladesh's Efforts to Stop the Violence." *Harvard Health Policy Review* 3, no. 1. <http://www.hcs.harvard.edu/~epihc/currentissue/spring2002/swanson.php>.

Tessman, Lisa. 2005. *Burdened Virtues: Virtue Ethics for Liberatory Struggl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6. *Moral Failure: On the Impossible Demands of Mor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Ashley J., P. Kyle Stanford, and Barbara W. Sarnecka. 2016. "No Child Left Alone: Moral Judgments about Parents Affect Estimates of Risk to Children." *Collabra* 2, no. 1:10. doi:<http://doi.org/10.1525/collabra.33>.

Thomas, Dexter, Jr. 2014. "Elliot Rodger Wasn't Interested in Women." *Al Jazeera*, June 7.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4/06/elliott-rodger-killing-sexism-20146219411713900.html>.

Tirrell, Linnie. 2012. "Genocidal Language Games." In *Speech and Harm: Controversies over Free Speech*, edited by Ishani Maitra and Mary Kate McGowan, 174-22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urkel, Allison. 2008. "'And Then He Choked Me': Understanding, Investigating, and Prosecuting Strangulation." *American Prosecutors Research Institute* 2, no. 1. https://ndaa.org/pdf/the_voice_vol_2_no_1_08.pdf

Twain, Mark (2010)。《哈克歷險記》。宋瑛堂譯。台北：麥田出版。

Valenti, Jessica. 2014. "Elliot Rodger's California Shooting Spree: Further Proof That Misogyny Kills." *The Guardian*, May 24.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may/24/elliott-rodgers-california-shooting-mental-health-misogyny>.

Valizadeh, Roosh. 2014. "Elliot Rodger Is the First Feminist Mass Murderer." *Return of Kings* blog, May 28. <http://www.returnofkings.com/36397/elliott-rodger-is-the-first-male-feminist-mass-murderer>.

Walker, Margaret Urban. 1998. *Moral Understandings*. New York: Routledge.

Watson, Gary. 1987.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imits of Evil: Variations on a Strawsonian Theme." In *Responsibility, Character, and the Emotions: Essays in Moral Psychology*, edited by F. Schoeman, 256-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bsdale, Neil. 2010. *Familicidal Hea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st, Lindy. 2015. "What Happened When I Confronted My Cruellest Troll?" *The Guardian*, February 2. <http://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5/feb/02/what-happened-confronted-cruellest-troll-lindy-west>.

Wheatley, Thalia, and Jonathan Haidt. 2005. "Hypnotic Disgust Makes Moral Judgements More Sever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 780-84.

Williams, Bernard (1981)。《道德運氣》。徐向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Witt, Charlotte E. 2011. *The Metaphysics of Gen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lf, Virginia (1929)。《三枚金幣》。王葳真譯。台北：天培文化。

Wolf, Virginia (1929)。《自己的房間》。張秀亞譯。台北：天培文化。

Young, Cathy. 2014. “Elliot Rodger’s ‘War on Women’ and Toxic Gender Warfare.” *Reason*, May 29. <http://reason.com/archives/2014/05/29/elliott-rodgers-war-on-women-and-toxic-ge>.

Young, Iris Marion. 2004. “Five Faces of Oppressions.” In *Oppression, Privilege, and Resistance*, edited by Lisa Heldke and Peg O’Connor, 37-63. Boston: McGraw Hill.

Zheng, Robin. 2016. “Attributability, Accountability, and Implicit Bias.” In *Implicit Bias and Philosophy*, vol. 2, *Moral Responsibility, Structural Injustice, and Ethics*, edited by Jennifer Saul and Michael Brownstein, 62-8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adrozny, Brandy, and Tim Mak. 2015. “Ex-Wife: Donald Trump Made Me Feel ‘Violated’ During Sex.” *Daily Beast*, July 7.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5/07/27/ex-wife-donald-trump-made-me-feel-violated-during-sex>.

Copyrigh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1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8.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ye Field Publications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wor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for any errors, omissions or inaccuracies or ambiguities in such translation or for any losses caused by reliance thereon.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不只是厭女：為什麼越「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凱特·曼恩（Kate Manne）作；巫靜文譯．-- 初版．-- 臺北市：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民108.12
 面：公分．--（不歸類；159）
 譯自：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ISBN 978-986-344-717-7（平裝）
 1. 性別歧視 2. 女性主義 3. 女權
 544.52 108019393

不歸類 159

不只是厭女

為什麼越「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

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作者／凱特·曼恩（Kate Manne）

譯者／巫靜文

主編／林怡君

責任編輯／賴逸娟

國際版權／吳玲緯

行銷／巫維珍 蘇莞婷 黃俊傑

業務／李再星 陳紫晴 陳美燕 馮逸華

編輯總監／劉麗真

總經理／陳逸瑛

發行人／涂玉雲

出版／麥田出版

10483 臺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886)2-2500-7696 傳真：(886)2-2500-1967

發行／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83 臺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客服服務專線：(886) 2-2500-7718、2500-7719

24小時傳真服務：(886) 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30-12:00、13:30-17:00

郵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麥田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RyeField.Cite/>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F

電話：(852)2508-6231 傳真：(852)2578-9337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1-3,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7-6622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cite.my

封面設計／莊蓮銘

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 2019年（民108）12月5日 初版一刷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520元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6-344-717-7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書店網址：www.cite.com.tw

Table of Contents

序 出錯Going Wrong

前言 吃下她的字Eating Her Words

壓制 Smothering

消音 Silence

改變說法 Vocal changes

目標 Aims

無痕 Nonappearance

概述 Overview

遺憾 Regrets

第一章 威脅女性Threatening Women

伊斯拉維斯塔殺人案 The Isla Vista killings

「厭女情結是什麼」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What kind of question is “What Is Misogyny?”

厭女情結可能是什麼 What misogyny might be

第二章 改良厭女情結的解釋Ameliorating Misogyny

拉許．林博評論珊卓．福魯克 Rush Limbaugh on Sandra Fluke

一個改良的、交織性的提議 An ameliorative, intersectional proposal

厭女情結在形上學與父權的從屬關係 The metaphysical dependence of misogyny on patriarchy

厭女敵意的多種形態 The varieties of misogyny hostility

厭女情結的認識論 The epistemology of misogyny

（潛在的）厭女情結作為一種傾向 (Latent) misogyny as a disposition

厭女情結作為一種體系，並且屬於另一個更為廣大（許多）的體系 Misogyny as systemic, and as itself part of a (much) larger system

本分析揭示了厭女情結內含的道德特質 The analysis exposes underlying moral characteristics of misogyny

厭女情結可與厭女者共生或獨立存在 Misogyny can exist
with or without misogynists

無人區 No man's island

第三章 造成歧視行為的性別歧視思考Discriminating Sexism

性別歧視Vs. 厭女情結 Sexism vs. misogyny

厭女情結與性物化 Misogyny and sexual objectification

打壓的藝術 The art of the smackdown

慈愛的母親，抹煞其他 Loving mothers, erasing others

拒絕（的）女性 Withholding (from) women

厭女情結作為一種反挫 Misogyny as backlash

第四章 奪取（抹煞）他的所有物Taking His (Out)

厭女情結與理所當然的權利 Misogyny and entitlement

她所能付出的 What she has to give

他所能取用的 His for the taking

剝奪生命：羞恥感和家庭消滅者 Taking lives: shame and
family annihilators

展望 Looking ahead

第五章 人性化仇恨Humanizing Hatred

運轉中的人道主義思考 Humanist thought in action

釐清人道主義 Clarifying humanism

人道主義的問題 The trouble with humanism

一個社會脈絡下的替代選擇 A socially situated alternative

支配他人 Dominating people

女性，她們太像人類了 Women, all too human

第六章 赦免男性Exonerating Men

如何逍遙法外 How to get away with murder

男孩殺死女孩 Boy kills girls

證詞不正義作為階序維繫 Testimonial injustice as hierarchy
preservation

同理他心 Himpathy

更衣室對話 Locker room talk

運轉中的厭黑女情結 Misogynoir in action: the Daniel
Holtzclaw case

第七章 懷疑受害者Suspecting Victims

關於所謂的受害者文化 On so-called victim culture

受害者為何？道德敘事的角色 What is a victim? The role of moral narratives

看輕（扮演）受害者 (Down) Playing the victim

獨立的人：一個個案研究 Independent People: A case study

第八章 落敗（給）厭女者Losing (to) Misogynists

當男性與女性競爭：相對性別偏見 When a man competes with a woman: comparative gender biases

社會拒絕乃由噁心驅動 Social rejection is mediated by disgust

針對希拉蕊的噁心表現 Expression of disgust toward Hillary

噁心如何陰魂不散 How disgust sticks

保持距離 Keeping one's distance

製造關心 Care mongering

性別化的撕裂觀感 Gendered split perception

假裝 Faking it

結論 付出的她The Giving She

參考書目